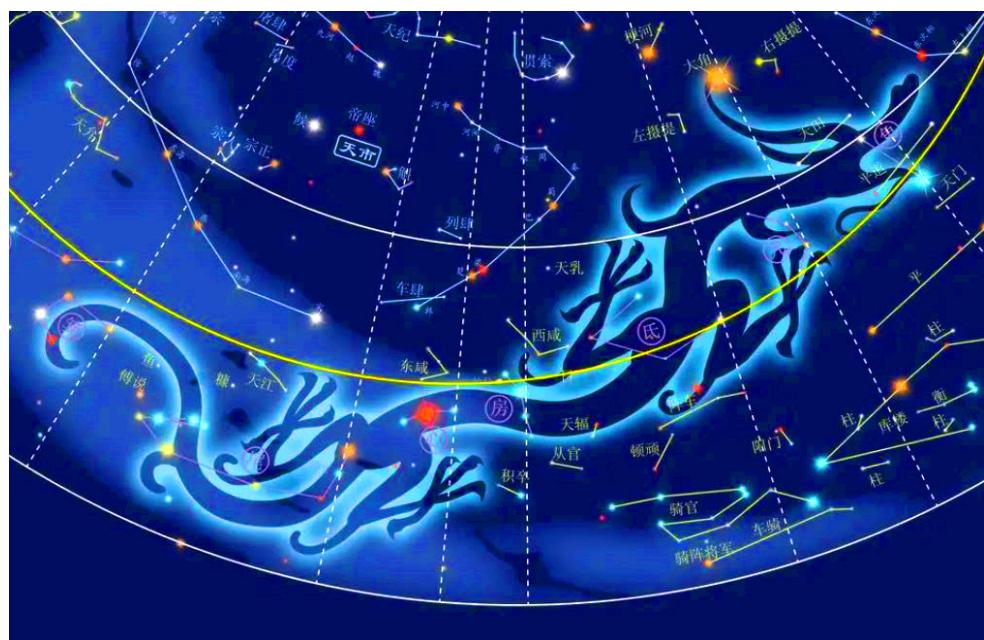

庞进文集第十四卷

龙道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内容简介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
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本书以
阐述龙道为主旨，收入论文、随笔、评论等六十一篇，配图七十八幅，
共三十二万字。内容有《中国龙的“扬”“汰”“建”》《龙文化与中华
文明特性》《龙文化的特征、功能、现实意义》《结晶智慧 彰显精神 承
载信仰 推进文明——中华龙文化研究的成果与价值》《龙文化精髓与
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龙思维》《龙道文明概说》《龙
道信仰》（“初立魂到再立魂”“依他性和利己性”“良知就是刚刚好”
等一至十六题），以及《铜梁龙与中华龙渊源研究》《秦岭龙文化及谐
天内涵》《龙企业、龙产品与龙文化》《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的龙凤
文化》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与演绎相结合，注重将思想深度、
理论高度、文化厚度、情感浓度融为一体是本书的特色。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1956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庞进文集》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十四卷



庞 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十四卷

龙道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11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32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68.00

ISBN 9781988641553



9 781988 641553

目录

中国龙的“扬”“汰”“建” /1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特性/7
龙文化的特征、功能、现实意义/19
结晶智慧 彰显精神 承载信仰 推进文明——中华龙文化研究的成果与价值/27
龙文化精髓与全球治理/3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龙思维 ——在“天下大同”主题第二次研讨会上的发言/40
龙道文明概说/43
由“初立魂”到“再立魂”——龙道信仰一/51
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局限——龙道信仰二/57
“依他性”和“利己性”——龙道信仰三/60
互爱：人类之爱进行时——龙道信仰四/62
善恶辩证——龙道信仰五/67
良知就是刚刚好——龙道信仰六/71
“中庸”就是“使适度”——龙道信仰七/77
“和”字五解——龙道信仰八/80
依伦与由自——龙道信仰九/84
孝的解析——龙道信仰十/89
诚明与明诚——龙道信仰十一/92
思无邪——龙道信仰十二/94
和平、承续、互利、共享——龙道信仰十三/96
超知超验即为神——龙道信仰十四/99

超验与抗体——龙道信仰十五	/102
“心隔”如何打通——龙道信仰十六	/106
关于华胥氏的四个观点	/111
生：华胥文化的关键词	/119
龙的传人说之根据	/123
炎帝与龙文化	/127
舜与龙	/135
龙文化可以容合易文化	/139
龙的神性	/144
龙凤配	/155
龙爪	/162
北京奥运：“龙柱”高耸的意义	/165
“凤回巢”的文化背景	/169
北京残奥会：太阳鸟的寓意	/172
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	/175
龙灯的意蕴	/179
舞龙的创造学考察	/187
铜梁龙与中华龙渊源研究	/194
秦岭龙文化及谐天内涵	/217
骊山龙凤文化考察	/224
佳县的龙文化资源及现实意义	/231
梅山龙文化考析	/239
龙文化与城隍文化	/244
龙企业、龙产品与龙文化	/248
水龙腾空 彩凤展翅——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的龙凤文化	/257
凤凰博物馆的主题策划与展示方式	/264

中国古代文化的八大创造/273
中华之根及陕西的贡献/277
西安的历史文化及特色/282
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的特点（肖云儒）/286
从民族文化的深渊大海中“淘腾”出一门学问（李星）/289
拓展龙凤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刘学智）/291
一个擅长以散文形式表达哲理性思考的学人（刘学智）/294
腾龙起凤 福惠世界（晨雨）/299
庞进：一生情系中国龙（常强）/304
龙道，连接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专访龙文化研究专家庞进（魏韬）/307
庞进的“龙道”（柏峰）311
关于龙道——来自庞进与师长、文友的通信/313
庞进的“六个一工程”——在传承弘扬龙凤文化拜师仪式上的致辞（田玉川）/315
《庞进文集第十四卷·龙道》后记/317

中国龙的“扬”“汰”“建”

《光明日报》编者按：今年春节前（200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公布了“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统一标志。该标志由汉字“文”、龙、长城等元素构成。其对龙的阐释是：“龙的形象象征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具有亲切感，易于传播；动态的龙，表达了全民行动，投入到提高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中来。”

春节中，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春潮般到处涌动着一行行舞龙队伍，是那么的红红火火，昂扬奋进，鼓舞人心。

今年的“两会”上，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委员提出：全世界华人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但关于“龙”文化还没有一个令中国乃至世界信服的说法，建议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

为此，我们特请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先生撰写本文，供大家参考、研究。

中国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经过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演变和升华，已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这是笔者对“龙文化”的一个整体认识。

对中国龙“承古”的职能，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几乎没有争议；而对中国龙“开新”的职能，人们或重视不够，或表示怀疑。我在这里提出中国龙的“弘扬”“淘汰”“新建”问题，旨在说明中国龙不仅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古老神奇、丰富多彩的龙文化能够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认知过去，关怀当下，瞩望未来。



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龙文化，生活在 21 世纪历史时空中的我们，应该传承、弘扬哪些内容？清理、淘汰哪些内容？创建、新增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从源头梳理起——

一. 传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

所谓容合龙，就是形象地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容合的龙。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龙是容合的神物。中华先民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容合的结果，便产生了龙。容合意味着凝聚，意味着团结，意味着协作，意味着合力。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容合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这个过程。

遥远的古代，容合龙渗入中华民族的始祖崇拜，于是中华儿女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容合龙是中国龙文化中最本质、最重要、最需要传承和弘扬的部分，容合龙使中国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文明标志和情感纽带。

容合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大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处理国际关系，小到个人事业、人际交往、家庭生活，容合龙都可以提供智慧参照、精神动力和象征载体。

比如我们讲和谐，容合就是和谐的前提。关于和谐文化，有学者提出了“利和”“竞和”“法和”的观点。所谓“利和”，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和，即双赢、多赢、共赢的和，而不是只对一方有利的和。所谓“竞和”，就是鼓励出类拔萃、你追我赶向前进的和，而不是不分优劣，或把先进拉下来，让大家都停留在落后层面的和。所谓“法和”，就是讲法治、讲秩序的和，而不是无法、无序的和。显然，无论是“利和”“竞和”还是“法和”，都要以“容合”为基础。

所谓福生龙，就是造福众生、诚心诚意为众生服务的龙。首先，福生龙是水利神和农业神，以兴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为理想境界。其次，福生龙是人格神，中国古代的创世英雄、圣哲明君、精英贤良，多有龙之比、龙之名、龙之誉，这些人物所开创和从事的兴国利民的事业，所建立的千古传颂的功德，也都是福生龙的事业和功德。再次，福生龙是吉祥神，具有显灵、兆瑞的神性，人们相信，福生龙能给他们带来绵延不绝的幸福和嘉惠多多的好运。当然，福生龙既是造福众生的龙，也是幸福自身的龙，是将造福众生与幸福自身相统一，且以造福众生为最大幸福的龙。

所谓奋进龙，就是奋发进取的龙。奋进龙首先表现在形象和内涵两方面的与时俱进。最早的龙是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原龙”，中经夏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刚柔并存的“行龙”、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祥龙”：中国龙的历程是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吸纳、不断创新的历程。其次，奋进龙彰显着龙的“好飞”的神性，总是以扬头挺胸、瞠目振鳞、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第三，遍布水乡各地的龙舟竞渡，是奋进龙的一种典型的外化形态，那种人人努力，龙龙争先的场面，总是令人振奋，给人鼓舞。

二. 清理、淘汰：帝制龙、灾祸龙

所谓帝制龙，就是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秦汉时期，龙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有了所谓的“真龙天子”一说。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帝制龙高高在上，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尽管早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原始先民就把龙创造了出来；尽管几千年来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两种龙并行不悖；也尽管因了帝制龙的尊贵和彰显，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而且某些帝制龙也做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但我们还是要清理和淘汰帝制龙。因为，帝王专制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已不需要所谓的“真龙天子”了。

所谓灾祸龙，就是发洪施旱，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祸害的龙。这样的龙，通常被称为孽龙、恶龙、毒龙、歹龙、妖龙等。民间有不少灾祸龙作孽多端、为害一方，后被明君贤臣、英雄俊杰降服、斩杀的传说。灾祸龙的出现，源自动物界和自然天象凶险无常，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威胁的一面，反映了龙的容合过程的复杂性和龙文化的丰富性。对灾祸龙我们持清理和淘汰的态度，尽管其出现有不可避免性。灾祸龙的出路无非两条：改邪归正，成为福生龙，或被龙族彻底剔除。

三. 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

文明这个概念可以从大、中、小三个不同的角度理解。“大”文明等同于“文化”，指由人类所创造且影响人类的一切，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中”文明指的是社会在物质、制度、精神等方面进步所达到的高度。“小”文明指政府、团体、公民的行为进步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讲的文明龙主要指“中”文明和“小”文明，尤其是“小”文明，即体现和反映着社会进步尤其是行为进步所达到的高度的龙。

文明龙的概念过去不曾有，属于新创。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当代文明龙能否在古老的中国龙母体上产生？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中国龙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摄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

全时态象征。中国龙的这种纳新、容合的特质，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如中国龙自身从形态到内涵的不断演进，如中国龙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容合，等等。第二，当代文明龙应当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素质？从公民的行为进步应达到的高度讲，起码要做到：遵循国家法律，行使应有权利，克尽应尽义务；遵守社会公德，摒弃各种陋习；坚守职业道德，尊重他人劳动等等。近年来各地大力提倡和推动的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等活动，都可以归入文明龙的范畴。

所谓科学龙，就是具有科学精神、遵守科学规律的龙。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龙是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结果，只是先民选择了神物——来自自然物又超越自然物这样的非一般的表现形式而已。我们讲美之所以美，是因为美符合自然规律，所以美是科学。反过来说，大凡美的事物都具有科学性，都符合科学规律。从形象上看，龙是符合对称、平衡、整齐、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的。这也就是说，龙的身上本来就含有科学的因素。这样的因素为我们将中国龙与当代科学结合起来，即创建科学龙提供了基础。科学龙尊重科学，对任何一项科学成就，都采取学习、吸取的态度；科学龙尊重规律，不做违背规律、盲目蛮干、劳民伤财、遗患无穷的事。

所谓环保龙，就是与天和谐、关注生态、倡导绿色生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龙。龙的取材对象来自自然界，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尊重。因而可以说，龙本身就是环保的产物。现在我们把过去不曾露面的环保龙突出地提出来，纳入创建、新增的行列，就是要告诉世人，环境污染以至于持续恶化的问题，已严重地威胁到了包括全体地球人在内的众多生灵的生命安全和种群的延续，因而，对环保龙要有深刻的认知、充分的关注并努力地践行——中华民族理应成为环保理念深刻、环保制度健全、环保行为普及的与大自然相和谐的龙族。

（此文原以《中国龙文化解读》为题，以整版的篇幅配图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3月23日第12版；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版；转发于《江淮文摘》2008年第1期；2023年12月10日润色）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这些特性。

一 .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连续性

从远古至今，中华文明连续性地大体经历了起源、初成、成型、强盛、延展、复兴六个历史时期。龙文化是这六个时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标志者。其情形大体如下：

(一) 中华文明起源期 时间跨度从前 8000 年至前 3000 年，即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距今约一万年至五千多年。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发现于山西吉县柿子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一万年，由鹿头鱼尾等元素组合而成，堪称“萌龙”的岩画；有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和两枚龙纹陶片；有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约八千年至五千五百年的两条猪首龙；有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年的鱼龙凤鸟纹蒜头壶；有出土于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六千八百年的猪龙纹、鹿龙纹、鸟龙纹陶尊；有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蚌砌龙；有出土于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遗址，距今约六千年至五千年的河卵石摆砌龙；有出土于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千三百年的龙首镯等。中华文明起源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二) 中华文明初成期 时间跨度从前 3000 多年至前 2000 年，即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距今五千多年至四千多年。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有被研究者推断，可能出土于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距今五千多年的鸟龙纹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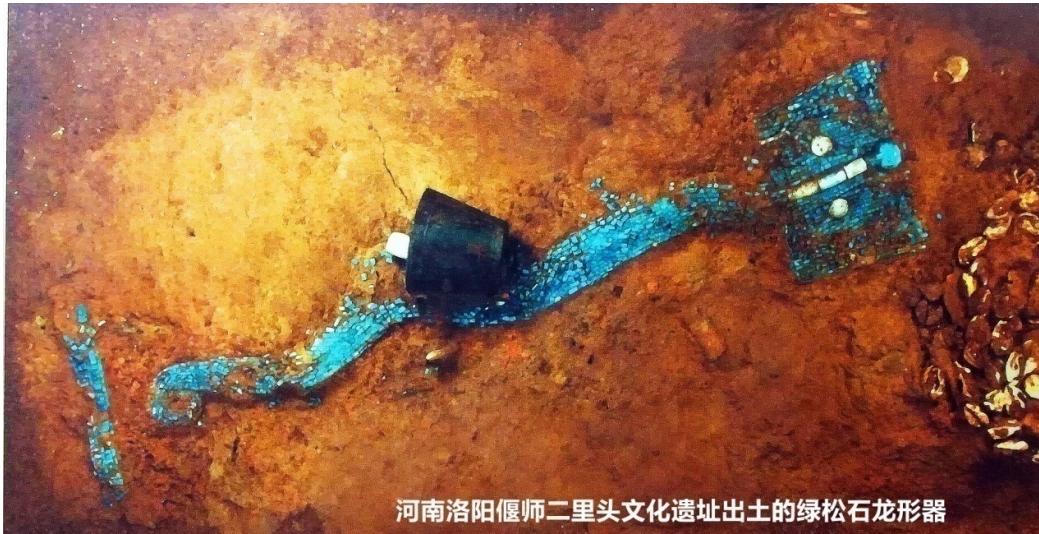


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蟠龙纹彩陶盘

盆；有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属于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年的玉龙；有出土于东北西辽河流域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千年的多件兽首蟠体玉龙；有出土于甘肃甘谷西坪镇、甘肃武山傅家门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千年的鲵龙纹彩陶瓶；有出土于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千三百年至四千年的蟠龙纹彩陶盘；有发现于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千一百年的龙纹石雕；有发现于山东昌乐的距今约四千年的甲骨文龙字等。中华文明初成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初成。

(三) 中华文明成型期 时间跨度从前 2000 年至前 220 年，即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汉朝，距今约四千年至约一千八百年。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约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的龙面纹铜牌饰、绿松石龙形器；有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玉雕龙；有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龙纹青铜立人像；有出土于陕西西安、宝鸡周代墓葬，距今约三千年的堪

称西周龙纹青铜重器的利簋、何尊、大盂鼎；有出土于山东邹县峄山乡斗鸡台遗址，距今约两千八百年的饰有卷体变形龙纹的费敏父鼎；有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距今约两千五百年的饰有龙形耳、攀缘飞龙、交龙纹的莲鹤方壶；有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距今约两千五百年《人物龙凤帛画》；有出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距今约两千四百年的雕饰有龙纹的曾侯乙编钟；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陕西咸阳秦二号宫殿遗址出土的龙纹空心砖

有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区，距今两千二百多年的夔龙纹铜车马、夔龙纹大瓦当；有出土于陕西咸阳秦二号宫殿遗址，距今两千二百多年的龙纹空心砖；有出土于陕西汉长安城遗址，距今两千多年的龙纹瓦当；有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距今约两千年的绘有龙形象的帛画等。成型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成型。

（四）中华文明强盛期 时间跨度从 220 年至 1279 年，即历魏晋南北朝、

隋、唐、宋，距今约一千八百年至八百年。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出土于河南邓县南朝墓，距今约一千六百年的行龙纹画像砖；有出土于宁夏固原城郊贵族墓，距今约一千六百年的鎏金透雕人龙纹饰件；有镶嵌于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龙纹石栏板；有出土于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龙纹石刻；有出土于陕西三原李寿墓，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龙纹石刻；有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郊草场坡唐墓，距今约一千三百年的鎏金铜龙；有西安博物院藏，距今约一千三百年的唐代鎏金走龙；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距今约一千年的宋代磁州窑白底黑釉龙纹梅瓶；有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画家陈容作，距今约八百年的《云龙图》，等。强盛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强盛。



(五) 中华文明延展期 时间跨度从 1279 年至 1949 年，即历元、明、清、中华民国，距今七百多年至距今七十多年。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龙事象，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窑烧制，距今约七百年的青花云龙纹罐、蓝釉白龙纹盘；有南京博物院藏，距今约七百年的龙凤纹玉帽顶；有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六百多年的山西大同九龙壁；有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距今四百多年万历皇帝金翼善冠、乌纱翼善冠；有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二百六十多年

的北京北海九龙壁、距今二百五十多年的北京故宫九龙壁；有清政府于 1888 年确定的以长方形黄龙纹旗为大清国国旗；有 1923 年铸造的，采用了鲁迅等人所设计的国徽图案的“龙凤银币”，等。延展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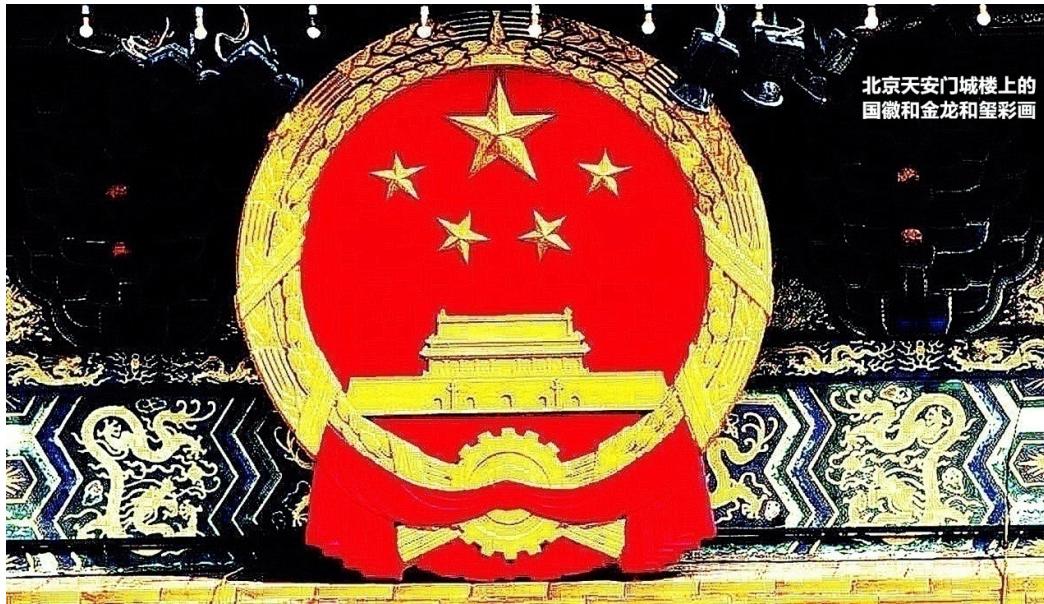
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山西大同九龙壁



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北京北海九龙壁

(六) 中华文明复兴期 时间跨度从 1949 年至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今。相应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龙文物、龙事象，有置于北京天安门城楼正面，从新中国成立（除过 1969 年至 1984 年）至今，衬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金龙和玺”彩画；有 1969 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重建天安门》报告后言“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有 1978 年由音乐家侯德健创作、首唱、很快流行于华人世界的歌曲《龙的传人》；有 1981 年邓小平题写“兆龙饭店”；有 2000 年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文章；有 2007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甘肃兰州小西湖公园同小学生一起，“画了一条腾飞的龙，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有 2007 年中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公布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统一标志由汉字“文”、龙、长城等元素构成；有 2010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福建龙岩古田镇为金色的长龙点睛；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龙柱高耸”、奖牌镶嵌玉璧取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

型；有 2015 年，中国向联合国赠送的顶部有龙饰的“和平尊”；有 2017 年 11 月 8 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向美国总统讲“我们叫龙的传人”；有重庆铜梁龙舞、广西宾阳炮龙节、四川泸州雨坛彩龙，广东、湖北、陕西等多省区都有的龙舟赛等。复兴期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复兴。



二.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创新性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创新。

在中华文明起源期和初成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比较简约、朴拙的“原龙”，即“原始的龙”。在中华文明进一步形成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比较神秘、抽象的“夔龙”。在中华文明成型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比较粗犷、雄健的“飞龙”。在中华文明的强盛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雍容大气、刚柔并存的“行龙”。在中华文明的延展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威严、华糅的“黄龙”。在中华文明复兴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吉祥、和悦、美丽、时尚的“新龙”。从“原龙”“夔龙”“飞龙”“行龙”“黄龙”到“新龙”的轨迹，是与时代进展相契应的、不断纳新的轨迹。如：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就出现了群龙、交龙。汉唐国势强盛、

社会开放，龙就显示出大气、刚健的神采。元明清三朝，皇权对五爪黄龙实行垄断，其龙就呈现威严、狞厉的神态。

当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大踏步的前进，龙的形象也有了新的改变和拓展，出现了骑摩托、打手机、玩电脑的“时尚龙”，穿福字褂、钱字衫、手握银行卡的“财富龙”，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活跃在影视屏幕上、举手投足人模人样、满口普通话的“卡通龙”，将信息的输入、处理、传输、存贮系统化的“数码龙”等。从功能上讲，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



具体到与龙相关的民俗活动中，创新的成果比比皆是。如：源远流长的舞龙品种本有几百种之多，新的舞龙形式、套路还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赛龙舟，即龙舟竞渡，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过去都在江河湖海里举行，现在不仅在江河湖海里举行，还发展到也可以在雪上、冰上、陆地上举行。

显然，龙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脚步前进的、不断创新的智慧系统，龙文化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在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作为中华文明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标志者的龙文化，必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发挥无可替代的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三.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统一性

谈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必然要涉及若干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华文明初成期，轩辕黄帝在先后战胜炎帝、蚩尤后，完成了促使华夏族形成的较大范围的统一，并建宫室、开井田、造车船、启纺织、作彩陶、琢玉器、创文字、制音律等，使中华文明进入“古国”阶段。

龙文化显然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轩辕黄帝的统一大业，本文前面列举过的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良渚文化玉琮龙纹、陶器龙纹，红山文化玉龙，马家窑文化鲵龙纹彩陶瓶等，就是物证。之外，还表现在古籍文献所记述的，将轩辕黄帝“龙化”上。如：“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黄帝轩辕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汉学堂丛书》辑《河图稽命征》）；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列仙传·黄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史记·封禅书》，等。

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实行中央集权，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龙文化对秦朝“大一统”的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表现在本文前面列举过的秦陵夔龙纹铜车马、夔龙纹大瓦当，咸阳秦宫殿遗址龙纹空心砖等物象器具上，也表现在将秦始皇“龙化”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有“祖龙”之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帝国”时期的第一个被比称为“龙”的帝王。秦始皇是“中华大一统”的开创者，将秦始皇比称为龙，也就意味着“中华大一统”也可以比称为龙。换句话说就是，龙可以比称“中华大一统”。

于是，便有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凡是结束战乱分裂，使国家重新统一、中华各民族再次融为一体的政治家，几乎都被“龙化”。如：《史记·高祖本纪》言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隋书·高祖上》言隋文帝杨坚“为人龙颔”；《旧唐书·本纪第一高祖》言唐太宗李世民“龙凤之姿”等。

四.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包容性

笔者在研究龙文化的过程中，创用了一个词：“容合”。“容合”是“包容、兼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头、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中国人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这是笔者给龙下的一个定义。

“多元容合”是这个定义的关键词。它提示人们注意，龙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对象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学者郭若虚总结“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图画见闻志》）；民间画龙有“九像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其实，龙的容合对象无穷无尽，龙文化之容合也无穷无尽。媒体曾报道，有人用废旧的易拉罐做龙，有人用塑料泡沫板刻龙，有公司用激光雕龙、用无人机编排组合成龙……这些不同材质、技术、手段的参与，不光构成了龙的形象，也把这些材质、技术、手段本身的特点贡献给了龙。

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有“多元一体”的说法。“多元”意味着“容”，“一体”意味着“合”。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容合过程相一致，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大容合的参与者、

助力者、见证者、标志者、体现者。前面笔者阐述的中华文明的各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因容合而形成，也都有龙的容合。如龙出现于佛教经典、亮相于佛庙殿堂，就是东汉以降，中华文明容合印度佛教文明的反映。

五.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和平性

历史上，龙文化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龙的“容合”精神意味着“和”。“和平”由容合而来，是容合形成的局面、状态。

二是将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开创和平的政治家比称为龙，如轩辕黄帝、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等，都有龙的比称和相关说辞。

三是在文学作品中，将“龙”与“和”比并、连称，如：“龙旗阳阳，和铃央央。”（《诗经·周颂·载见》）“日龙上偕羲和。”（张说《舞马词六首》）

四是以龙雕、龙纹装饰名称含“和”字的建筑，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都是龙纹集中、显赫之宫殿。有研究者做过统计，整个太和殿的龙雕、龙纹多达 13844 条。

本文前面介绍过，北京天安门上，衬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是“金龙和玺”彩画。

2006 年 10 月，由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国务院五个部委、全国政协两个专门委员会共同发起和组织实施的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的多名负责同志发出呼吁：应该在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一位于北京中轴线的“龙脉”上建设一条“中华和平龙”。于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面向全球开展了“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集工作，以期集中全球华人和国际友人的智慧，塑造众望所归的“中华和平龙”形象。

2015 年 9 月，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了顶部有龙饰的“和平尊”。相关报道说，“和平尊”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工艺制成，以“中国红”为主色调，“顶部有龙饰，象征守望和平”。

中国向联合国赠送的“和平尊”



(2023年9月1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龙文化的特征、功能、现实意义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龙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关于龙的各种成果的总和。那么，龙文化有哪些特征、功能和现实意义呢？

一. 龙文化的特征

龙文化至少具有容合性、民族性、象征性、广渗性四个特征。

“容合”是笔者创造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性是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

第一，龙的取材对象是容合的。宋代学者罗愿等提出“龙有九似”说，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民间画龙有“九像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笔者给龙下的定义中提到了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雷电、云、虹、星宿、龙卷风等十五种。上述之外，象、狗、猴、羊、蚕、螺、虾、龟、蛙、蚯蚓、穿山甲、动物胚胎、海潮、泥石流、古动物化石，以及树木花草、江河山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容合。可以说，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生物和非生物都可以成为龙的容合对象，尤其那些具有或能够具有飞腾、盘旋、曲折、绵延形态者。

第二，龙的精神内涵是容合的。对龙的精神内涵，笔者提出了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王东先生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或叫变易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四大基本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精神。（王东：《中国龙的新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其他学者对龙的精神内涵也多有概括、总结和揭示。

第三，龙的展现方式是容合的。龙的展现方式，从载体的角度看，有石、玉、陶、贝、瓷、木、土、水、火、竹、铜、金、铁、锡、铝、各种合金、丝绸、麻布、塑料、树脂、奶油、面粉、人、机器，以及新出现的各种材料等，总之是凡能承载龙的形态的材料，都可以成为展现龙的载体；从技法的角度看，已有摆、砌、堆、雕、塑、拼、捏、写、画、织、绣、烧、喷、吹、拉、串、排、绕、垂、舞、演、激光等等，总之是凡能构成龙的形态的技术方法，都可以作为展现龙的技法。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随着新的材质和技术不断涌现，龙的展现方式也就不断地在“扩容”。

龙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说龙文化具有显明的、和中华民族关系密切的特征，表现在——

第一，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炎黄部落联盟。炎黄族团联盟到华夏族的形成过程，在时间框架上基本上可以与中国考古界提出的中国早期的六个区域文化圈即“六大文化区系”相对应，而在“六大文化区系”各类型文化中，多有龙的形象出土。如属于北方区系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石块摆砌龙及龙纹陶片，内蒙古赤峰小山遗址出土的赵宝沟文化陶器龙纹，内蒙古赤峰、辽宁辽西众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雕龙；属于中原区系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蚌砌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彩陶盘龙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及陶器残片龙纹；属于东方区系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山东临朐朱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龙纹，山东昌乐发现的龙山文化骨刻文龙字；属于东南区系的浙江余杭瑶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龙首镯、海盐龙潭港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龙纹，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凌家滩文化玉雕龙及陶器龙纹；属于南方区系的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河卵石摆砌龙，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龙形玉环、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龙形玉佩，等等。炎黄族团联盟和华夏族就是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中，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步容合而成的。而龙，显然是这种大容合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当然，也是体现者、标志者，因为不管容合前的各族团以何物为标志，容合后的华夏族选择了龙。

第二，龙渗入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夏

禹等远古帝王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这些人文先祖都与龙发生了关联，他们崇龙、比龙、用龙、称龙。这说明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很早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结合，文献和考古都提供了证据，这便是《左传》《帝王世纪》《史记》等古籍的记述和汉代画像石的显示。人文先祖是民族的缔造者，缔造者们崇龙、比龙、用龙、称龙，其缔造的民族自然会崇龙、比龙、用龙、称龙；而作为祖先的后代、民族的成员，也自然就是“龙的传人”了。歌曲《龙的传人》之所以能获得世界各地华人的广泛认同，其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龙参与、助力、见证、体现、标志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华夏族至汉族、汉族至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龙依然是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证据很多，这里只举三例：1，公元前49年，汉宣帝以“黄龙”为年号，这是龙文化正式成为国家文化、汉民族文化的标志。2，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以黄龙旗为国旗，这是龙正式作为古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走向世界的标志。3，1950年至今，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以金龙和玺彩画配饰、衬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是龙继续参与、见证中国、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繁荣昌盛的标志。

第四，龙标志得到了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认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有五十六个成员。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以龙为标志毋庸置疑。汉族之外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崇龙、敬龙者有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瑶、白、哈尼、黎、傣、畲、傈僳、仡佬、拉祜、佤、水、纳西、羌、仫佬、景颇、布朗、毛南、普米、阿昌、怒、京、基诺、德昂、门巴、独龙、珞巴、蒙古、藏、朝鲜、锡伯、满、土、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回等四十二个民族，其他十三个民族从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那一天起，就程度不同地对龙文化持理解、尊重、欣赏、认同的态度。随着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团聚在了龙的旗帜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龙文化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事象表现、喻示某种特殊的意义或其他事物、事象。龙文化的象征性特征是突出且丰富的，表现在——

龙文化既可以象征非凡、高大、杰出的事物，如象征宇宙力，象征中华民族，象征人文先祖，象征帝王皇权，象征英雄才杰；也可以象征平凡、一般、普通的

事物，如象征生男孩，象征排长队，象征搞错了、误会了、导致不必要损失的事件。

龙文化的象征性之丰富可以通过龙的成语作说明，如：“龙飞九五”象征即天子位；“龙兴云属”象征王者兴起、贤臣良将随之；“龙虎风云”象征英雄豪杰际遇得时；“龙马精神”象征人健旺的精神状态；“龙精虎猛”象征精力旺盛、斗志昂扬；“藏龙卧虎”象征潜藏的人才；“龙门点额”象征仕途失意或科场落第；“龙争虎斗”象征双方势均力敌；“龙蟠虎踞”象征地势雄壮险要；“龙口夺粮”象征抢收庄稼；“龙肝豹胎”象征珍贵稀有的食品；“龙蛇飞动”象征书法笔势遒劲生动；“龙章秀骨”象征文采秀逸遒劲；“叶公好龙”象征表面上爱好而非真正爱好甚至惧怕某种事物；“龙凤呈祥”象征吉庆和美之事；“龙眉凤目”象征神采非凡，仪表出众；“龙言凤语”象征轻松悠扬的音乐之声，等等。

龙文化的广渗性特征，是说龙文化具有广泛渗透的特点，都够和龙文化之外的任何一种文化相融会、结合。

文化作为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包括，或者说可分为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论三个层面。物质器用文化是有具体形象的、人的感官可接触的文化；习俗仪规文化是或约定俗成，或人为制订，作为礼法、规矩而存在的文化；观念理论文化是作为精神、思想、意识形态，并通过语言文字系统地予以表达的文化。三个层面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关联。

龙文化广泛地渗透到物质器用文化、习俗仪规文化和观念理论文化。不管是衣食住行、工艺美术、歌舞影视，还是岁时节令、婚丧礼仪、精神信仰，龙文化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盘旋、腾跃、翔舞、奋飞等多种表现形式，占据着醒目的位置，体现着不可或缺的文化蕴涵。人们通过雕塑书画，展现龙的形象，显示龙的神力；通过祭祀祈祷，召唤龙的神灵，传达龙的信息；通过著述文章，探讨龙的源流，索解龙的秘密；通过歌舞、竞技、影视剧作品，秉赋龙的神性，焕发、弘扬龙的精神。

总之，广渗性使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既是微观文化，也是宏观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龙文化的广渗性也使龙文化具有了博杂性，似乎龙文化是个“大筐”，各种

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朝里面装。在龙文化这个“大筐”里，有对人类，尤其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有益的、有利的、善的、正能量的东西，也有对人类，尤其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有害的、不利的、恶的、负能量的东西。比如民间传说中的发洪作恶、为害一方的孽龙；而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用现在的观点看，也有为专制独裁壮胆效力的问题。

好在对龙文化中的负面内容，学界已经做了必要的分辨清理的工作，绝大多数人已同意这样的认识，即：1，龙文化由起源至今已有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承载、携带一些负面内容是自然的，这些负面内容，是龙文化对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有害的、不利因素的反映。2，龙文化的主干、主流内容对人类，尤其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是有益的、有利的、善的、正能量的；对人类，尤其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有害的、不利的、恶的、负能量的内容，在龙文化中是支干、支流。对支干、支流要分析、清理，但不能因支干、支流的存在就否定主干、主流。

二. 龙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龙文化具有标志、凝聚、福生等功能，这些功能，使龙文化具有了促进国家统一和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为民族复兴提供助力、为百姓生活增添福乐、为人类文明奉献智慧等现实意义。

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是其象征性使然。简约地说就是：龙因其与中华民族根脉相连，是中华民族起源、初成、成型、强盛、延展、复兴的象征，故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凡标志都具有识别性和显明性。龙标志的识别性和显明性，使龙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成员的“身份证”，也即人们一看见龙，就会联想到中华、华人、华侨、华裔，就会将拥有、使用龙标志的人群与其他民族的人群区别开来。

对龙文化的标志、凝聚功能，以及促进国家统一和海内外华人团结的现实意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先生有经典论述，他说：“在中华民族诞生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繁衍生息在共同的区域，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就产生了共同的文化标志及其强烈的认同感。”“海内外华人都会认同中华文化中龙与凤的文化标志。这些形象很容易唤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钱其琛：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5月31日）“从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上说，龙文化首先体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龙的形象，最初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舞龙和赛龙舟都需要运用集体的合力来完成，而无法运用单个人的力量去运作。在这种集体的合作中，如果单个人的力量不能融入整个集体的节奏中去，所有人都会招致失败”。“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龙文化，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真理”。（钱其琛：《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民日报》2000年4月3日）

在21世纪的今天，龙标志像一面大旗，能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招揽、汇聚、团结在大旗之下。龙文化的标志、凝聚功能在促进国家统一、海内外华人团结方面意义重大。比如海峡两岸制度不同、价值观念有异，但都崇龙敬龙，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这便为国家统一提供了根本性的认同基础。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一个大体上的时序框架：约前8000年至约前3000年，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期。约前3000年至约前2000年，是中华民族的初成期。从前2000年至220年，即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的成型期。220年至1279年，即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是中华民族的强盛期。1279年至1949年，即历元、明、清、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延展期。1949年之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进入复兴期。复兴的意思是重新兴盛。当代语汇中的民族复兴指的是中华民族重新兴盛起来，也即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龙文化的凝聚、福生功能，具有为民族复兴提供助力的现实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理论层面讲，龙文化的容合精神，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持；龙文化的福生精神，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价值观、目的论的支持；龙文化的谐天的精神，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天人观、生态论的支持；龙文化的奋进的精神，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人生观、强盛论的支持。从操作层面讲，龙文化的凝聚、福生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吸引、团结海内外华人，和其他一切有利因素，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福生，即造福众生，既是龙文化的精神之一，也是龙文化的功能所具。福生的龙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在满足人的生物性需要的同时，可以给人以精神的愉悦；而精神文化也能走出头脑和书本，转化

成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状态的文化。

龙的精神文化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可以通过图书、音像制品的撰编、制作、发行；影视歌舞的创作、演播；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的制造、销售；相关节日、庙会的筹划、举办等形式来实现，这便是人们讲的龙文化产业了。这方面各地已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如重庆铜梁龙灯、广西宾阳的炮龙节、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庙会等。转化的目的，是为了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增添幸福和快乐。

龙文化还可以为人类文明奉献智慧。关于文明，有多种说法，我们可以简要地理解：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人类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那么，龙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何作用和意义呢？

人类文明需要普适的公理和通行的准则，龙文化所蕴涵、所体现、所昭示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理念，以及笔者提出的作为龙道信仰核心理念的“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就可以成为这样的公理和准则。当今世界冲突不断、战乱不止，许多家园被毁，许多生灵涂炭，其原因，就是有些人不讲、不行（或只是局部地讲、行）上述理念。所以，加大力度，弘扬、宣传、推广上述理念，让更多的地球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领袖们接受上述理念，并将其尊重为普适的公理和通行的准则，自觉、自愿地应用于国家、地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中，就显得特别有必要。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由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构成的纷纭复杂的国际社会，面对由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疫病流行、跨国犯罪、难民潮及宗教冲突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中国政治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龙文化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方面，相对应的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五大目标。实现这五大目标的基本途径、主要方式是包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交流互鉴、义利兼顾、共同发展等原则在内的“合作共赢”。我们讲容合是龙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个“容合”就与“合作共赢”是同义词。也就是说，只有发扬容合的精神、采用容合的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构建成功。我们还讲福生既是龙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龙文化的主要功能，这个“福生”，就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即“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相一致。

（2021年11月2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结晶智慧 彰显精神 承载信仰 推进文明

——中华龙文化研究的成果与价值

一. 中国古代的龙文化研究

考古发现证明，龙产生于距今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

作为全层位文化，龙广泛地渗透、体现于中华文化物质器用、习俗仪规、精神观念的方方面面。

龙的理论研究，是从生活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的。孔子在其晚年学习、解析《周易》的过程中，提出了“龙德”“龙位”“龙道”“龙神”等概念，成为是中华龙学的创始人、奠基者。

孔子以龙喻君子，认为“龙德”就是君子之德。“龙德的本质特征是大，龙德广大，包容万千”。（王东：《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孔子讲的“龙位”，就是出现在《周易·乾卦》中的龙的六种形态，即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在孔子看来，“龙有不同时位，君子有不同处境时遇。因而，龙德、君子之德，既是一以贯之的整体品德，又有不同时位、不同境界的具体品德、具体表现”。（同上，第107页）如“潜龙之位的隐忍之德，善于忍耐；见龙之位的正中之德，有利于民；跃龙之位的时动之德，应时而动；飞龙之位的举贤之德，用贤利民；亢龙之位的忧患之德，居高思民；群龙之位的谦虚之德，不强当头。”（同上，第111页）

孔子讲的“龙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天之道，就是一阴一阳、发展变化的易之道。”（同上，第114页）

孔子讲的“龙神”，就是龙的神能、神威、神性、神职。表现在龙能“御天”

“云行雨施”，从而“保合大和”，使“万国咸宁”“天下平”。

当然，孔子毕竟是在研究《周易》时涉及到龙文化的，因此，其研究属于初创性质，有不够明晰、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的局限。

孔子之后，对龙文化作出理论贡献的是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王充对龙文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论衡》一书中，包括对龙的本质的认识、对龙的神性神职的认识、对龙与帝王关系的认识和对龙字号物象的考察四个方面。

在龙是什么、其本质如何的问题上，王充已认识到了龙原型的多元性和龙作为神物的容合性。对龙原型多元性的认识体现在龙是一种虫、龙是鳞虫之长、龙是鱼鳌一类的水生动物、龙属于马蛇之类、龙是云的同类物、龙是雷的同类物等多种说法上；对龙作为神物的容合性的认识体现在言龙为“马蛇之类”——既不是马类，也不是蛇类，而是马类和蛇类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认识到这一步是很可贵的，是龙文化研究史上第一次以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相结合的方式解释龙。

只是在龙是不是神物问题上，王充有些模糊不清，好像同意龙是神物的判断，但又明言龙不是神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模糊不清，原因有二——

一是王充没有搞清楚动物、天象和神物的关系。动物、天象和神物的关系是这样的：动物、天象是神物的原型、取材对象和基础，神物是动物、天象的集纳、神化和升华。龙是产生在动物和天象基础上的神物，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动物和天象的集纳、神化和升华，即多元容合的结晶，龙来自动物和天象，又高于动物和天象。

二是王充没有认识到在对待龙的问题上，古人实际上运用的是原始的“模糊思维”。原始的“模糊思维”是建立在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和群体意象基础上的不清晰、不唯一、不固着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导致古人常常将容合对象和容合结果相互取代。表现在龙的问题上，就是常常把由对动物和天象容合而来的神物称龙，赋予其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征瑞、示威、兆祸等种种神性和司水布雨、喻人比帝等神职，又把参与容合的种种动物和天象称龙，如把蛇、鳄、鱼、蜥称龙，把马、猪、牛称龙，把云、雷电、龙卷风、星宿等称龙。——史籍古书上记载的所谓“龙见”，实际上见的都是龙的某种容合对象，即自然界中的某种动物或天象。古人正是运用这样的模糊思维，打通了抽象的神物和

具象的动物、天象之间的联系，解决了龙既能成“神”又能为“物”的问题。

在龙的神性、神职问题上，王充的考察和论述值得肯定。龙有善变、好飞、通天、征瑞、示威、兆祸等神性和司水理水行云布雨等神职。对这些神性和神职，王充都有考察和论述。其中不乏见识独特、意味积极者，如将龙的祥瑞与人才的发现与使用相联系，所谓“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圣主获瑞，亦出群贤。君明臣良，庶事以康”（《论衡·验符篇》）。其实，龙的诸多神性和神职，都是人赋予的，是人希望龙能具备的。龙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文化。王充能写出“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八个字，说明他已经领略到了这一层，只是没有点透而已。

在龙与帝王关系的关系问题上，王充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说龙与帝王有关系，甚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又说有关龙与帝王的许多说法都是虚妄之言。这里，王充陷入了对神话“较真”的误区。神话都是人编造的。人编造龙与现实帝王的神话，是政治斗争、追逐权力、巩固统治的需要；人编造龙与远古帝王的神话，是崇祖荣族、光前裕后、继往开来的需要。神话固然有因编造而呈虚妄的一面，但也有反映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愿望的一面。对神话，不能用“现实中到底有没有”来较真，而应该寻找、追问、研究隐含在神话文本后面的东西。如对黄帝乘龙升天的神话，如果将黄帝定位在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黄帝就不可能乘龙升天；如果将黄帝定位在具有传说色彩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人文先祖，黄帝乘龙就可以理解——无非是借助龙的力量，神化、抬高黄帝而已。

二. 现当代的龙文化研究

现当代，即从20世纪初至今，龙文化研究大体上出现了三波比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参与的学者有章鸿钊、史密斯、叶玉森、杨钟健、章炳麟、黄石、吴大琨、闻一多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和本质上，代表性的著述是闻一多的《伏羲考》。观点主要有：外来物说，恐龙说，扬子鳄说，灵物说，水神说，综合图腾说等。其中闻一多先生提出的综合图腾说影响最大，而外来说因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产物而被学界否定。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的学者有刘敦愿、贾兰坡、张孟闻、祁庆富、王明达、朱天顺、赵天吏、孙守道、郭大顺、何新、徐乃湘、胡昌健、陈绶祥、阎云翔、刘志雄、杨静荣、何星亮、庞进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本质及民俗文化上，代表性的著述有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王大有的《龙凤文化源流》、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庞进的《龙的习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何新的《龙：神话与真相》、何星亮的《苍龙腾空》、阎云翔的《试论龙的研究》等。观点主要有：蛇说，爬行动物综合想象说，闪电说，猪首说，云神说，水牛说，湾鳄说，星象说，虹说，物候参照动物说，部族徽识说，模糊集合说等。

关于龙的起源，观点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单一原型说（单一的动物起源或单一的天象起源）；综合原型说。两说基本上平分秋色。关于龙的本质，观点也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图腾说；神物说。神物说占上风。

第三波浪潮，出现在世纪之交至今。参与的学者有钱其琛、王大有、王东、何星亮、庞进、王维堤、吉成名、郭大顺、黄信、冯时、蒋明智、欧清煜、胡照华、闸东山、黄益苏、廖金文、赖翅萍、杜新艳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精神蕴涵、文化功能、当代意义、对外传播上；同时，对龙的民俗文化研究、龙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有进一步的涉及和深化。代表性著述有钱其琛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王东的《中国龙的新发现》《龙是什么》、王维堤的《龙凤文化》、庞进的《中国龙文化》《龙道文明概说》、吉成名的《中国崇龙习俗》、胡照华的《中华神龙》、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蒋明智的《悦城龙母文化探秘》、廖金文《苗栗舞龙文化之研究》等。观点主要有：团结合力说，源于图腾、超越图腾——综合创新说，多元容合——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说，龙道文明——龙道信仰说等。

期间，2006 年 12 月，还发生了一场“弃龙”风波，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龙与 dragon 的区别”“龙与皇权专制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还需要龙”等问题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人们普遍认识到：龙与西方文化中的 dragon 是源流、形象、性质、地位、功能都不同的两种象征物，龙已告别了皇权专制，龙的中华文化标志的地位不可动摇，龙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对当代中国文明进程有无可替代的促进意义。

从理论贡献上来看，第三波浪潮比前两波浪潮，研究得要更全面、更深入，成果也更丰硕、更突出。

王东先生提出龙的本质新论，认为中国龙的形成有二重性，源于图腾，更超越图腾，本质上已不是原始图腾的实物崇拜，而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创造。文化内涵上，从氏族血缘关系，发展到民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上，从氏族文化表征，发展到民族文化象征。他总结了从周易到孔子开创的中国龙学，揭示出龙形象背后隐含着的中国人的四大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指出龙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即追求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矛盾关系——多元文化关系。龙的精神是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王东认为，继承发展龙的文化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代文明的四大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人际关系危机、文明冲突危机。

庞进，即笔者，在系统、全面研究龙文化的基础上，对龙的精神作了概括和总结，将龙文化提升为龙道文明，提出了龙道信仰的系列观点。指出：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一种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多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微观文化，也是宏观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龙的精神是“容福谐奋”即“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即造福众生，是价值观、幸福论；谐天，即与大自然相和谐，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是人生观、强盛论。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

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龙道文明就是弘扬、践行龙道信仰所形成的文明。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目前可以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其“尊”即“尊天尊人尊己”，是处世观、交往论；“爱”即“爱天爱人爱己”，是感情观、关系论；“利”即“利天利人利己”，是互利观、共享论；“和”即“和天和人和己”，是理想观、境界论。龙道信仰倡导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平衡点、公约数、贯穿线、合适域，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所面临、所出现的问题。

“尊天”“爱天”“利天”“和天”的“天”，指的是具有无限性的、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能不断地认知、有局限地利用，却永远不能掌控的大自然、宇宙力。“尊天”“爱天”“利天”“和天”，就是尊重、爱护、利益、和谐大自然、宇宙力。

“尊人”“爱人”“利人”“和人”的“人”，指“己”之外的生命个体、群体。“尊人”“爱人”“利人”“和人”，意味着要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身之外的人，即他人。有三层意思：1.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物质生命体，即身体。2.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精神生命体，即思想。3.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价值生命体，即人格、人权。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明对话中，“人”指本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本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本国文化之外的他国文化、本族文明之外的他族文明。

“尊己”“爱己”“利己”“和己”的“己”，首先指的是人类的生命个体，即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尊己”“爱己”“利己”“和己”，意味着要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体。也有三层意思：1.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物质生命体，即身体。2.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精神生命体，即思想。3. 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价值生命体，即人格、人权。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明对话中，“己”就指本国家、本民族、本国文化、本族文明。

笔者认为，龙道信仰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因为——

第一，有根。龙道是从中华文化本根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龙道信仰的根，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儒家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为贵”“修己以敬”；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佛家的“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等传统文化精华，都被“尊、爱、利、和”所萃取、纳含。

第二，有容。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通讯、交往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面向全球，和世界文明接轨。故建构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就应该吸纳全人类的文化精华。龙道信仰就汲取、体现着西方文明的一些主要思想成果，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共同善思想、互主体观等。

第三，通约。中华民族及人类世界，可谓成员众多、结构复杂，有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等等的区别，这就要求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具有通约性，即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能为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尊、爱、利、和”就具有这样的通约性。

第四，普适。“公约”意味着价值广适。龙道信仰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可以超越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居民，也适用于居住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各地的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不仅适用于华人、华裔，也适用于生活在地球各地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第五，时新。时新就是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要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契合，具有时代性，反映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的观念、理想和愿望。如“尊”，即对每一位公民人格、人权的尊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缺少的、建立法治的公民社会最需要的。

第六，精炼。即内容上要萃取精华，表述上要精确、精练。一个信仰体系，若作理论阐述，可以是长篇大论；但若要让中华民族的广大成员方便地接受，就得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用简约、晓畅的几个词汇，甚至几个字表述出来，让人们好理解、便记忆、易表达、交流无障碍。龙道信仰目前提出的基本理念只有四个字：尊，爱，利，和。这样的表述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表达，便传播。

龙道信仰如何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如何解决中华民族目前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龙道十不》可以作为方案：1. 不辱中华；即有辱、有损、有害于中华民族的话和事不说、不做。2. 不小看人；即尊重他人和自己的人格尊严、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3. 不恶父母；即孝敬父母，对父母不厌恶（wù）、不冷淡、不疏远。4. 不懈子教；即不松懈对子女的教育，包括校教、家教、言传身教。5. 不起贪念；即克制、放弃、不产生分外的、过度的求多、不知足的念头。6. 不说谎话；即不说虚假的、欺骗人的话，言而有信，说到做到。7. 不事毒假；即不制毒、贩毒、吸毒、散毒；不造假、售假、传假。8. 不怠工作；即对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做到最好。9. 不虐动物；即不用狠毒残酷的手段对待动物。10. 不行浪费；即珍惜、节约、合理使用生产、生活资源。

既然是信仰，就有一定的超验性，就要为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终极问题提供说法、方案。终极问题就是“我到哪里去”的问题，即人的最后归宿问题。因为人是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灵魂的结合体，物质的肉体肯定有消亡的时候，那么，人的终极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灵魂的归宿问题。出于这样的思考，庞进提出并解释了两个概念：宇宙力、灵魂力。

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力量的综合。一定程度上，宇宙力相当于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先哲老子讲的“道”、哲学家讲的“无限”。宇宙力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宇宙力具有超验性，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去认知、一定程度上去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够整体上掌控宇宙力。灵魂力是人的灵魂，即思维、意识、精神所产生的能力。龙是宇宙力的代表和体现，可以作为人类的灵魂力与无限的宇宙力之间的中介。灵魂力主要由信力即信仰之力、慧力即智慧之力、德力即道德之力构成，人们通过信力、慧力、德力的秉持、修炼、践行，在人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前，其灵魂力，就有可能通过龙的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的框限，而与宇宙力相汇合，从而成为宇宙力的一部分，获得永恒。

三. 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的功能与价值

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的功能与价值，概括起来是六个词十二个字：参与、助

力、整合、见证、标志、引领。

参与的同义词是参加、融入、在场。中华文明起源的上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到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龙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参与者。龙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初成、成型和强盛，也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延展和复兴。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龙的身影。

助力的意思是帮助、援助、推动，用当代流行的话说就是给力、提供正能量。如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龙文化就能发挥其助力作用。首先，龙的核心的目的性精神是造福众生，简称福生；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说得简要些，也是福生。龙的核心的目的性精神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内涵具有同一性。其次，龙的显明的构成性精神是容合，龙是容合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也必然、必须走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路。龙的显明的构成性精神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之路相吻合。再次，龙的基本的状态性精神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中华民族复兴的打造者，若不迎难而上、努力拼搏、顽强奋斗，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中华龙基本的精神状态与中华民族复兴打造者、实现者应当具备的精神状态具有一致性。

整合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将分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更优秀更有价值的整体、体系。龙的排在第一位的精神是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容合的精神使龙文化天然地具有了整合的功能。龙文化产生于中华本土，本来就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广渗于与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与中华文明的根根枝枝血脉相连，又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故龙文化有能力，也有责任，将中华文明的诸多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文明。不仅如此，龙文化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一直秉持着借鉴、吸纳、消化的态度。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显明的例证。笔者提出的龙道文明、龙道信仰，就是对古今中外诸多文明要素整合的结果。

见证的同义词是证明、证据、作证。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四大要素。考古发现证明，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即人们通常说的炎黄时代，文明的四大要素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表明中华文明已经在地球东方初步生成。而龙，不但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共生，也与四大文明要素相伴共生。

龙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生成。

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图符、记号。龙标志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龙标志着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龙标志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现在和未来。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智慧系统，当今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龙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龙文化不但能“承古”“炼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文化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

引领的同义词是导引、指引。文化的高层位是精神，精神的至高点是信仰。思想决定行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为问题，而信仰则是思想的本原性、根基性、主导性因素。长期以来，一些人对龙文化抱有误解或者说认识不到位，一说龙，要么就和帝王皇权相联系，认为龙象征着专制；要么就把龙文化只看作是民俗文化。现在，我们在清理“帝王龙文化”、研究“民俗龙文化”的基础上，把龙文化升华为龙道文明，而且进一步地提出了龙道信仰，这样，我们就站在了精神的至高点、理论的制高点上，龙文化就具备了引领的能力，也有了引领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 页）



我们的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完全符合，龙文化可以担当起习主席提出的“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的历史使命。可以这样讲：中华龙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近百年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华龙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已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已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揭示、呈现于世人。它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龙文化已能够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简言之，龙文化可以结晶智慧、彰显精神、承载信仰、推进文明。而我们这些龙文化的研究者和践行者，也正再接再厉，努力地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奋斗着，努力地让龙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2016 年 9 月 14 日于西安龙凤院；在“2016 首届巴岳山 · 中国龙文化研讨会”上宣讲；收入《亘古一龙腾——2016 首届巴岳山 · 中国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

龙文化精髓与全球治理

所谓全球治理，可以简要地理解为对全世界的治理，即对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大事务的治理。按领域分，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等；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其实，从根本上讲，全球治理是思想治理。上述种种治理，都是在某种或多种思想、理念指导下的治理。

有报道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

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为指导的，体现的是以“霸”字出头的“美国理念”“美国思想”，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利坚民族是优等民族，基督教文明是最好的文明，美国文化是唯一合理的文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于是，维持巨额军费，研制高端武器，实施先发制人，频频主动出击；以经济制裁、政治威逼、军事干预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实行内外不一的双重标准，以民主、自由、人权、打击恐怖主义等为借口，支持分裂势力，颠覆主权国家，出兵亚非多地，祸及无辜平民。可以说，当今世界性的人为的大动荡、大灾难，若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追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追到以“霸”字出头的“美国理念”“美国思想”。

显然，若继续让以“霸”字出头的“美国理念”“美国思想”治理全球，全球将继续动荡不休、灾难不已。怎么办呢？

龙文化精髓，即“容、福、谐、奋、尊、爱、利、和”八字理念，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智慧参考和思想依据。

可以设想和期待：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领袖，以及能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的其他各界领袖，如果将龙文化精髓，即“容、福、谐、奋、尊、爱、利、和”八字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尊天、爱天、利天、和天，即尊重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爱护、有利生态文明，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那么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生态就不会加剧恶化；如果在处理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按“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和己和人”的理念和准则行事，努力找到互惠、多赢、同福、并进、共享的平衡点、公约数、合适域。那么，就不需要大动干戈，就不至于硝烟弥漫、导致众多的生灵涂炭，和谐的人类、和美的世界就有可能实现。

令人欣喜、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一系列言行，都与龙文化精髓，即“容、福、谐、奋、尊、爱、利、和”八字理念相契合。如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构想。该构想，“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21 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进行有机地衔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力”。

上述概括，与龙文化精髓是契合的：团结、互信、平等、包容、互鉴、合作与“容”“尊”“谐”相契合；互利、共赢、和平、发展与“利”“和”“福”“奋”相契合。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国际研讨会”（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办，在武汉东湖召开）上宣讲；同题论文收入《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全球治理·东湖论坛 2015”文荟》，欧阳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龙思维

——在“天下大同”主题第二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天下大同”主题第一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天下大同”属于“想得美”》的观点，说：“‘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十分美好的社会形态。就全人类而言，‘天下大同’属于难以实现，或者说实现不了的‘想得美’。因为，这样的‘想得美’忽视了人的复杂性，或者说只看到了人的向善性，忽视了人的向恶性。而人的向善性和向恶性是与生俱来、相伴互参的，一直如此，永远如此。当然，大同社会就全人类而言实现不了，但在局部范围内，则有可能某种程度的实现。而且，作为一种理想，‘天下大同’有让人向往、憧憬，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价值。”

今天，我再提出一个观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龙思维。

我言大同社会在局部范围内，有可能某种程度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构建成功，就是大同社会在当今世界的某种程度的实现。

大家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全球价值观。其提出的背景是，进入21世纪的地球人，已经明显或者说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大家必须携起手来，应对由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构成的纷纭复杂的国际社会；应对由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难民潮及宗教冲突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呢？

龙思维可以提供精神资源和能量助力。

首先，龙思维是“容合”性思维。“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也是容合而成

的。当今的世界无疑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媒介和工具的大容合的时代，容合的事实已体现地球人生活、生存的方方面面。从哲学上看，容合可作为一种世界观，也可作为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宇宙间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以容合的方法形成的；人类要构建命运共同体，也必须采用容合的方法，否则，就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交流互鉴、义利兼顾、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原则的提出和运用，就是“容合”性思维的体现。

其次，龙思维是“福生”性思维。“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造福众生而容合、展现的。事实上，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福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福生的。福生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规定。也就是说，容合是以福生为目的的，也是有原则和限定的，这个原则和限定的根本点，便是看这个对象是否福生。福生则容合，不福生，祸生，则不容合。福生之“生”，指的是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所有生物。福生是“以人为本，兼顾众生”。当然，人是高级动物，位于生物演化序列中的最高端，故福生首先是“福人”，然后才是“福”其他生物。“福人”可分为福个人、福家庭、福集体、福社会、福人类等不同的层次。各层次之间，倡导“小让大”的原则。福生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幸福论。

第三，龙思维是“谐天”性思维。“谐天”就是与天，即自然界相和谐，就是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龙的容合对象，囊括了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众多动物和天象。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给人的生动直观、意味深长的符号。人与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使龙成为通天神兽；龙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相合”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谐天”是一种天人观，也是一种生态论。

第四，龙思维是“奋进”性思维。“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在龙的诸多民俗活动中，龙舟竞渡就较好地体现着龙的奋进的精神。奋进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强健论。一个人精神气质上要强健，一个民族要强大，一个国家要强盛，有赖于

这个人、这族人、这国人团结奋进。“奋进”性思维强调有三个要素：自强不息、学创结合、适变图强。尤其是“适变图强”。龙具有适应环境，积极应变的品性。这样的品性，启示人们，要以积极的、灵活的姿态，以随机的、适度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

(2019年1月31日于西安)



龙道文明概说

一. 全球化时代呼唤新的文明

茫茫世界，悠悠青史，芸芸众生。人类由荒凉的远古走到今天，创造、拥有并享用着往昔从未有过的丰富、繁荣和便捷，同时，却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危机和困境——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构成矛盾，人类欲求的无限性若不加节制，生态危机必然发生。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私欲膨胀，公德缺失，诚信危机触目惊心。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机制的有限性构成矛盾，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若不加平抑，诚信危机必然发生。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心绪紊乱，思路昏昧，精神危机已成通病。人的思想的主观性与社会现实的客观性构成矛盾，人的思想的主观性若不加调理，精神危机必然发生。

在经济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全球化与垄断化矛盾加剧，美元霸权陷入困境；在政治领域，战火不息，恐怖不断，多极化与一极化矛盾突出，单极霸权陷入困境；在文化领域，族群众多，万象杂陈，多元化与单质化矛盾明显，强势霸权陷入困境。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文明。这样的文明——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节制人类需求，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平抑人的欲望，倡导公德，强化机制，高扬诚信旗帜；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调理人的思想，疏导人心，提供药方，疗救精神疾病。

在经济领域，调节资本，整理金融，削富济贫，抑制一家横行、美元霸权；

在政治领域，消弭战火，根治恐怖，协和五洲，解除暴力威胁、单极霸权；在文化领域，多样共存，多维互渗，多元并盛，告别文化殖民、强势霸权。

这是什么文明呢？

龙道文明。

二. 龙道文明释义

龙是中华先民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的神物；其实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神化。经过漫长时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龙文化有一个极其深远而宽广的坐标系。它的时间纵轴已达八千年，甚至可以探伸到一万年；它的空间横轴扫揽了整个中华大地，及至地球上所有有华人、华裔生息、繁衍的地方。

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道者，道理、道德、方法、思想学说、理论体系也。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

龙道文明即是以龙道的创造、演进、宣传、推广、弘扬、应用所形成的文明。

龙道文明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

龙道文明使龙由中华龙演进、升华为人类龙，由中国龙演进、升华为世界龙。

龙道文明以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为旨归。

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龙与西方文化中的 dragon 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不可混同。西方的 dragon 是魔鬼、邪怪、暴力的象征，主要代表恶。龙的英译名可为“loong”，dragon 的中译名可为“劫根”。

三. 龙道文明内容举要

(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敬遵“天道”

天道概念主要来自中国道家的“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即认为此道不是一般意义的作为道路、方法的道，而是作为宇宙本原、世界总根、万物之母、众象法则、演化规律的道。天道强调道的天然性，即天道是自然、自在之道，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之道。天道具有人类智慧所不能彻底抵达的神秘性、人类的感官所不能全面体察的超验性，和渗透于、体现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普遍性。世界上所有物种都体现着天道，都受天道的制约。

按照天道，万事万物都要经历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太阳系、地球、人类不会例外。说得明白些就是，人类总有一天会随着太阳系、地球的毁灭而灭亡。那么，按照天道，这个时间可能很遥远很遥远，但人类如果破坏地球，使自己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这个时间就会临近。也就是说，等不到太阳系、地球毁灭的那一天，人类就有可能自己先灭亡了自己。据此，我们可以说，天道就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就是使人类安享天年而不至于提前夭折之道。

贪欲违天道。生命所需要的资源是一个定数，超过了这个定数对生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贪欲意味着过度、超量、无休止地索取，这样的索取会导致对其他生命、后续生命所需的地球资源的侵占和消耗，故当力戒贪欲。

惜俭顺天道。地球上的一些资源是有限的，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而这些资源又是人类生存和繁衍所必须的，破坏、浪费这些资源违天道，珍惜、节俭地使用这些资源顺天道。

(二)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弘扬“仁道”

仁道概念主要来自中国儒家的“仁”。“仁”字从“人”从“二”，可理解为“人与他人”，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使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理想状态呢？儒家的说法是：“仁者爱人”（《孟

子·离娄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墨家的说法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综而言之，仁道就是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他物之道；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他物之道；就是能够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维持、调理到和谐美好状态之道。

仁道用于政治，于一国之内，意味着疆域统一，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意味着利民、富民、保民、敬民、爱民。于国国之间，意味着天下“无外”，众国平等，万邦可和；意味着“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篇》)“有矛盾，坐下谈，弃暴力，戒强权，崇理性，释前嫌，存小异，求大全”(庞进《龙凤三字经》)。

仁道以德服人，以和制暴；霸道以力服人，以暴制暴。以和制暴，有望化干戈为玉帛，解决争端，消弥战火；以暴制暴，使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恶性循环，世界永无宁日。

霸道是仁道的反动，从而是龙道文明的反动。

当今世界，美国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推行霸权，竭力打造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为主导的“美国全球体系”，认为全球化等于单一化、等于美国化；于是，维持巨额军费，研制高端武器，实施先发制人，频频主动出击；以经济制裁、政治威逼、军事干预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实行内外不一的双重标准，以民主、自由、人权、打击恐怖主义等为借口，支持分裂势力，颠覆主权国家，出兵亚非多地，祸及无辜平民。与政治上的霸权相适应、互支撑的是文化上的霸道，即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等民族，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基督教文明是最好的文明，美国文化是唯一合理的文化。

霸道是战争之源、仇恨之根、万众之祸；龙道是和平之基、沟通之本、人类之福。

霸道当衰，龙道当兴。

(三)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贯彻“行道”

行道的提出，参考了佛家的“悟道”。佛家讲究，通过“禅悟”，而觉察、明了世界的真相、人生的真谛。所谓“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安世高译《佛说八大人觉经》），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智度论》卷二十二），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佛家号召人们看破红尘，与世无争，澄心净意，随缘转化。

佛家的“悟道”不免指向消极。行道吸收佛家深入思考人生、随时空变化而变通的有益成分，却有着积极有为的指向，即认为人生是生命演化的一个环节，其意义由人的能动性的创造性的践行所赋予。人生的价值在于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知行关系表现出来。行道，即积极入世、发奋践行、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之道；即通过敬遵天道、弘扬仁道而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唯有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开拓创新，造福人类社会，才能使人告别封闭，走出狭隘，走向阳光明媚的广阔天地；才能使人活得有滋有味、生机勃勃，精神健旺，心情愉悦。

五. 龙道文明的立论依据

（一）多互主体观

所谓多互主体，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和自然都是主体；在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自我是主体，他人、社会也是主体。各主体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彼此支持的。

龙的形象、功能，体现了多互主体观。中华民族在创造龙这个神物时，不是只取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而是取多种动物，大凡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龙都能够兼收并蓄；不仅取多种动物，还取多种天地之象，云雾、雷电、虹霓、卷风、海潮、江河、山脉……

将多互主体观作为立论依据，意味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要承认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尊重人的尊严，又要承认自然存在的合理性，尊重自然的尊严；

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既要承认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尊重自我的尊严，又要承认他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尊严。龙道文明中的仁道，强调的就是，要像尊重、珍爱、成就自我一样尊重、珍爱、成就他人。

什么是民主？在笔者看来，民主就是多互主体，或曰多互主体是民主最核心的内容。民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如果这一个个个体都是主体，其权利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保障和实现，这就是民主。而所谓的不民主，就是少数人只认为自己或小集团是主体，从而只尊重、保障、实现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认为自己或小集团之外的人都不是主体，从而不尊重他们，损害、侵犯、剥夺他们的利益。

多互主体观与单极主体观相对。单极主体观是西方近当代文明的核心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滥觞，可以追溯至14世纪至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与其时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崭露头角相适应，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反对神学束缚，倡导个性解放，对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积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由此也为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私欲膨胀、狂妄无羁的单极主体观奠定了基。一路发展下来，于人际，唯我至上，“他人是地狱”；于国际，我是老大，他国只配我奴役；于自然，野蛮征服，疯狂索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如今，单极主体观已走到尽头，若顽固坚持，势必继续祸害自然、祸害人类，最终也必将祸害了自己。

世界文明呼唤多互主体观。

多互主体观，意味着同生、并存、互尊、共赢。当然，各主体之间，也会有矛盾，甚至对立，但矛盾和对立，可以通过交流、沟通、对话等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至于水火不容，有我无你，诉诸暴力。

（二）世界可龙观

龙是中国人创造的神物，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中华民族是世界人类的组成部分，故龙的智慧，是全人类各个民族都可以享用的智慧。

龙的形态、功能，可以给人们诸多的启示：

首先，龙是容合的、开阔的系统。

龙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大的功能，其形态和功能由兼容、包容、综合、化合，

即容合而来。龙容合的广阔度和丰富度，不仅自然界中的具体动物无法比拟，其他国家创造的神物也找不到可比肩者。龙的胸怀是博大、开阔的，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非生物，各种天象、地理，都可以成为龙的容合对象，都可以进入龙的容合过程，都可以成为龙的组成部分。同样，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也都可以成为龙的容合对象，都可以进入龙的容合过程，成为龙的组成部分。

其次，龙是有机的、协调的系统。

龙容合了众多的元素、成分，这些元素、成分聚拢、团结在一起，构成了整体存在的龙。在龙这个整体性的系统中，各种元素、成分各得其所，即各有其主体性，而且其主体性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然而，这些具有并显示着主体性的各种元素、成分，在龙这个整体性的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分散的、简单相加的、几何拼凑的，而是有机的、关联的、相互支持、彼此依存的。各种元素、成分的有机关联、相互依存，构成了整个龙体的协调、有序。

龙由龙头、龙颈、龙身、龙鳞、龙足、龙趾、龙尾等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中，龙头是关键，起着引导、率领、协调全身的作用。马颅、鹿角、牛耳、兔目、狮鼻、猪口、虎牙、猫须、蛇颈……龙头容合的成分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是有机关联的，不是孤立分散的。这样的容合，成就了一具集纳各种智慧、兼顾大家利益的龙头，只有这样的龙头，才能对龙身各部位发挥协调、引领的作用，才能保证整个龙身有序地活动。

再次，龙是适变善化的、与时俱进的系统。

《说文》言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管子》言龙“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乎云气，欲下则入乎深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言龙“乘时变化”“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些都是在告诉人们，龙具有适应环境，积极应变的品性。这样的品性，启示人们，要以积极的、灵活的姿态，以随机的、适度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

龙的容合开阔，龙的有机协调，龙的适变善化，决定了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系统。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国龙，龙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演进；作为世界龙，龙随着人类前进脚步而演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世人——
龙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龙道，对中华民族而言，是和谐之道、和富之道、和盛之道；对全人类而言，
是和平之道、和睦之道、和美之道；
龙道文明，可以与西方文明相对应、相对话，是福祉世界的文明！

（刊于《陕西终南文化研究》2012 夏之号、《儒风大家》2012 年第 2 期、
《西部学刊》2013 年第 1 期、《西安龙凤文化春之卷》2013 年 3 月）



由“初立魂”到“再立魂” ——龙道信仰一

一个民族有无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是一个至关重要、必须面对的问题。人是物质存在，更是精神存在和文明存在，精神存在和文明存在使人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而信仰，则是精神存在、文明存在的至高点、总根基、主心骨、中枢系统。一个人活出最大价值、活到最高境界的标志是拥有向上向善、高妙圆融的信仰；而其灵魂最后到哪里去即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也得靠信仰。一个民族要有向心力、凝聚力，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是必要条件。而一种文明，要在世界文明的丛林中巍然屹立、光华四射，就必须有其强健的、特色独具的中枢系统。

如果用“魂”指称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的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历了一个“初立魂”“弃魂”“觅魂”“再立魂”的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

“初立魂”由新石器时代的开蒙、夏商的探索、西周的初步，到春秋战国时期，即所谓的轴心时代，由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创建。其主要内容是以“道”为核心理念的道学，和以“仁”为核心理念的儒学。之后的东汉时期，以“空”为核心理念的佛学传入，经过一番辩争、融合，至唐宋，以儒为主，以道、佛为辅的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体系得以确立。这便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华传统信仰体系。

任何信仰体系都有可验、超验两个层面的内容。可验意味着可以验证，主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人与己，即人生、社会问题；超验意味着不可以验证，主要解决的是灵魂的最终归宿问题，即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与天、人与神的问题。在可验层面，中华传统信仰体系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奉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讲辩证、励有为等精华，也有维旧制、强等级、轻个权、重人治、避科技等局限。在超验层面，传统信仰体系有“归祖”“成仙”“往生”“升天”等说词或者说方案，但这些说词或者说方案，给人的感觉是儒家偏弱，道家偏玄，佛家偏

空，凡俗民间则笼统、不清晰、不确切，说来说去，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体系在超验层面总归是杂而多歧，混而无定。

延至近、现代，中华传统信仰体系中的各种局限日益凸显，面对列强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入侵，堂堂中华，竟然落后到被动挨打的地步。以鲁迅、胡适、郭沫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将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究于传统信仰体系，于是，中华民族在这些精英们的倡导、引领下，进入“弃魂”阶段。所谓“弃魂”，就是批判、抛弃以儒为主，以道、佛为辅的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体系。于是，“孔家店”被打倒、否定，“归祖”“成仙”“往生”“升天”等，也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遭受冷落甚至批判。此阶段从“五四”前后开始，至“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极致，余绪一直延宕到今天。

传统之“魂”被“弃”了，新“魂”又在哪里？这样，在“弃魂”的同时，“觅魂”的历程也就宣告开始。精英们纷纷走出去，急急引进来。于是，德国人的思想来了，俄国人的思想来了，英国人的思想来了，美国人的思想来了……一时间，中华民族的思想家园变得异彩纷呈。然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或因本异末别而水土不服，或只能与中华传统信仰中的可验的内容，部分地、一定程度地契合，而在超验层面，没有说法，甚至排斥任何说法。于是，寻觅了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之“魂”，即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至今仍然没有确立。

没有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的危害是严重的、触目惊心的。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可我族类之中，竟然涌现出几百万汉奸！成为汉奸的原因可能有多条，但没有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应该是主因之一。当今社会，文明进步的、让人赞赏的一面有目共睹，但不文明的、让人忧心的事件，如制毒贩毒、造假售假、贪污腐化、坑蒙诈骗，等等，也是屡有发生，禁而难止。还有一些生活条件优渥、个人资质优秀的年轻人竟然患上了“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有强烈自杀意念”的“空心病”。产生这些社会病的原因可能有多条，但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性信仰的缺失，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缺失，才导致诸多社会病一定程度上呈泛滥之势，且难以根治。

人类的精神星空需要北斗，民族的精神航道需要灯塔。你没有，别人有；你的杯子空着，别人就会将水倒入。于是，异族信仰体系利用国家宪法彰示的“信

仰自由”的条款，乘虚而入，声、光、电、动、网，全方位、多手段地大肆渗透，其目的，就是“洗脑”“换心”，即让异族的根本性信仰体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胸怀异心，必非我族”。心都变成异类了，人还能是我族吗？异族信仰体系渗透的结果，便是中华大地上行走着为数不少，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外“黄”内“白”的“香蕉人”。这些“香蕉人”，说着汉语、写着汉字、花着人民币，却认为自己已经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了，而是什么什么的“子民”。这样的人，如果到了异族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其立场选择，可想而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中唱出的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至今没有确立，是明显的、地球人都公认的事实。怎么办？好比一个人得了病，病情已诊断清楚，病根、病灶也已找到，可治疗方案何在？药方是什么？面对“失魂”之“病”，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理应负起“医生”的责任和使命。然而，一些人忧心忡忡，但拿不出方案，开不出药方；即便拿出了方案、开出了药方，其方案、药方却根本就治不了病。另一些人，以嘲讽、诟病、说怪话为能事，总是在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地“砍”“弃”，从不考虑怎样“建”“立”什么。还有更多的人，压根就不想这些问题，吃喝拉撒睡，混一天是三晌，得过且过而已。

1988年年初，一个机缘，我进入了龙文化研究领域。三十多年来，焚膏继晷，孜孜矻矻，穿行文山史海，奔走四面八方，研究，考察，撰文，著书，演讲，宣传……在将龙的起源与本质，龙的观念与民俗，龙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尽可能地梳理到位，并提出自己的系列观点后，一个问题在脑海涌现：面对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的缺失，龙文化能不能提供一个方案？这个念头一冒出，我的心灵便一直震动不已：是啊，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以多元容合的方式发明、展现的，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龙文化渗透、呈现在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论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的民众、民俗、民情、民意基础。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物质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时

尚文化、官方文化、精神文化、世界文化。这样的文化，理应为中华民族之“再立魂”做出贡献；即能够担得起建立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的历史使命。

于是，经过深入、反复、慎重的思考，我提出了龙道信仰。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之道。

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即认同、信服、尊崇、秉持、践行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坚信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是正确的、美好的、普适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前面说过，一个信仰体系，必须有可验、超验两个层面的内容。尤其要有超验层面的内容，如果只有可验层面的内容而无超验层面的内容，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信念，还达不到信仰的高度。信念可以只“脚踏实地”，不“仰望星空”；而信仰，不但要“脚踏实地”，更要、尤其要、一定要“仰望星空”。

在超验层面，龙道信仰提出了“宇宙力”“暗物力”“灵魂力”等概念，并对龙的功能、使命做出新的揭示。总的表述是这样的一一

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暗物力是暗物质具备、释放的力。暗物质存在于宇宙中，是人类肉眼看不到，即使借助最先进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也观测不到的物质。科学界有观点认为，宇宙中总物质的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是暗物质。暗物力属于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在宇宙的演化、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灵魂力是由人的灵魂，即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构成的力。灵魂力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尽管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却受着地球引力和大气层

压力，及人的肉身的束缚和框限，是有限的力。

龙是宇宙力，尤其是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的代表，是灵魂力与宇宙力、可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人们敬畏、崇拜龙，实际上主要是在敬畏、崇拜暗物力。龙的形象，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对暗物力赋予的一个由自然界诸多动物的身体部件和各种天象的形态组合起来的形象而已。人使暗物力、宇宙力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将人的理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赋予到龙的身上，这样，龙就一身而二任、一肩挑两头，成为暗物力、宇宙力与人的灵魂力之间的中介，也有了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人都有灵魂，即人都有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等，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差别只在于强与弱。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即能够引起龙关注、重视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在人的物质生命结束之前，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至高境界，即解决终极问题的必要条件。

强健灵魂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信力是信仰的力量，慧力是智慧的力量，德力是道德的力量。灵魂力由信力、慧力和德力结构而成。

坚定信力就是要坚信宇宙力、灵魂力、龙的存在；坚信通过淘漉、熔炼、萃取、正当地运用慧力，修养、提升、践行德力，灵魂力就能够得到不断地强健；坚信龙能够接纳、承载、中介人的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框限，到外空间去，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正用慧力就是要对产生于自己大脑的智慧，通过学习、借鉴而获得的智慧进行淘漉、熔炼、萃取，然后正当地运用于造福众生、文明世界的事业中。

修行德力就是要修养、提升、践行道德的力量。具体操作按龙道信仰的“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理念，和“龙道十不”即“不辱中华、不小看人、不恶父母、不懈子教、不起贪念、不说谎话、不事毒假、不怠工作、不虐动物、不行浪费”做即可。

总之，灵魂的至高境界在地球框限之外的宇宙空间，抵达的方式是通过龙的中介，使足够强健的灵魂力与宇宙力相汇合，而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则是强健灵魂力的必要途径。

上述话语，是对龙道信仰的简要、粗略的表述。这样的表述，对一个信仰体系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龙道信仰要成为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拓展。我深知，一个人的智慧、才能、功力是有限的，龙道信仰的建立，需要众多有识人士，甚至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的参与、认同和奉献。也许，龙道信仰命运不济，很长时间内，都仅仅只是一个方案、一个说法而已。然而，我相信，这个方案、这个说法，是有价值的，甚至价值是很大的。它至少表明，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一个名叫庞进的成员，对本民族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结束民族“觅魂”阶段、进入“再立魂”阶段，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思考，提出了一个可资参考和选择的方案。

（2017 年 10 月 6 日初稿于西安龙凤堂；2017 年 11 月 16 日再稿于加拿大枫华阁，2020 年 12 月 8 日修订于加拿大枫华阁）



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局限

——龙道信仰二

儒家思想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其精华可以概括为七：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励有为——前六项由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讲出（新华社 2014 年 2 月 26 日电），“励有为”系笔者增加。对七大精华，儒家都有经典语句。

讲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重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守诚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四书章句集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崇正义：“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尚和合：“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求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励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总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铭》）

受时代限制，儒家思想也有局限。其局限可以概括为五：维旧制、讲等级、轻个权、缺法治、避科技。五个局限也都有经典语句。

维旧制：“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讲等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轻个权（即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缺法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避科技：“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儒家思想历史上曾是支撑中华民族信仰大厦的中心支柱，其精华在当代依然有重大价值，是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也是笔者提出龙道信仰的重要的思想资源。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己尊人、爱天爱己爱人、利天利己利人、和天和己和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为贵”“修己以敬”等精华，都被“尊、爱、利、和”所萃取、纳含。

但上述局限，已使儒家思想不适宜，也不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统领。

如“讲等级”：儒家秉持的是以亲亲尊尊为特色的伦理主义，基本理想是维护宝塔式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样的特色和理想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至今仍有价值。但今天的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相比于以血缘、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亲亲尊尊，人们更多面对的、需要的是非血缘、非家庭、非家族的平等合作；社会结构也已由纵向的宝塔式走向横向的平面化；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已不是处于宝塔底层的不可移动、交往相对固定的一块砖，而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动态的、有无限交往可能的一个结。也就是说，时代已经变化了，不是儒家设计师们当年面对的情况了。

如“缺法治”：儒家主张“人治”，其思想体系里，没有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臬的“法治”的内容。儒家的一些主张，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明显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的法治精神。

如“避科技”：儒家思想中找不到重视科学技术的内容，儒家领袖们多是“坐而论道”，罕见用心、用力于物质器用。“君子不器”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君子不从事物质器用方面的工作、不在物质器用方面下功夫。

还有，历次运动，如五四“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批孔”、改革开放“西潮”涌入，儒家受到很大冲击，在许多人心目中，形象已受损严重，很难重新树立。

龙道信仰吸取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精华，对各家思想的局限则予以回避和超越。

(2015年12月6日于西安龙凤院)



“依他性”和“利己性” ——龙道信仰三

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社交媒体兴盛繁荣起来：微信、抖音、快手、推特、脸书、油管……笔者故乡中国，客居枫叶之邦，这些自媒体发表的东西，都能方便地看到。

比如油管(youtube)，就常见一些海外华人发表涉及中国情况的节目。对这些节目，笔者的总体印象是：鱼龙混杂，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有不怎么客观公正的。其中一些，总是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罔顾事实、以谣为据、以偏盖全、以昔非今，甚至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在他们眼里，中国什么都不好，好也是不好；西方社会的一些不好，也都是因为与中国发生了关系，甚至是中国造成的。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出身的、遭遇的、立场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条——此条是笔者特别想指出的、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对人之成为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认识不到位，导致了思维模式的偏执化。

任何生物，从获得生命的那一刻起，都不能独自成长，都必须由他者（人、物）提供营养。就说人吧，一个婴儿生下来后，若没有他人提供吃的喝的，婴儿的生命就会终结。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笔者将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称为人的“依他性”。同时，要看到，婴儿是把他者提供的吃的喝的，本能地吃到、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笔者将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称为人的“利己性”。

人天生地既具有“依他性”也具有“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一开始就交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存于人体中。也就是说，“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本能、本性。人类以“依他性”为酵基，生发、彰扬出了倡导互利互惠、公利优先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人类以“利己性”为酵基，发起、彰扬出了倡导个己中心、私利至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

主义。

“依他性”和“利己性”相互矛盾、争斗又相互依存地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世间不会有、也不可能出现只有“依他性”没有“利己性”，或只有“利己性”没有“依他性”的状况。因此，人类对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向往、践行，和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向往、践行，都是自然的、必然的、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在人世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排除、消灭不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也排除、消灭不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人类在宇宙间存在，“依他性”和“利己性”就存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就同时间同空间存在。

既然我灭不你也离不开你，你也灭不了我又离不开我，哪该怎么办呢？观念理论上，笔者提出的以“尊、爱、利、和”为核心理念的龙道信仰可供参考和选择。所谓“尊、爱、利、和”，就是地球村的所有成员，无论你是何种族、何身份，身在何国、持何文化、讲何语言，在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等关系时，都遵循“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践行方案上，笔者觉得中国政治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很不错。阐述到这里，就可以指明某些华人自媒体节目的偏执之处了：只要或只强调、只倡导人的“利己性”，不要，或忽视、贬弃人的“依他性”，梦想、幻想、妄想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取代、消灭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笔者对将人的“利己性”发扬、推展到偏执、极端的言行，持批评态度；同时，笔者对将人的“依他性”发扬、推展到偏执、极端的言行，也持批评态度——这是需要说明和强调的。

(2020年12月1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互爱：人类之爱进行时

——龙道信仰四

爱是发自人内心的，对相关的人、物、事，具有肯定、喜悦、关怀、投入等感情取向的能量。古往今来，人类之爱以对象、程度、方式等的区别，有“仁爱”“兼爱”“博爱”“奉爱”等等之说。

“仁爱”是由中国东周时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倡导的爱。

“仁”是一个会意字，表示两个人发生关系，一个人是自己，另一个是他人。这里的人和他人，可以是单数，即一个人；也可以是复数，即两个人、几个人或一群人。那么，一个仁字，就可以表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表示一个人与几个人、一群人的关系，还可以表示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关系。那么，简要地理解，仁，就是用来处理人与人即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主张、理念。

关于仁爱，儒家有多种表述。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综合这些表述，可见儒家仁爱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好、与人为善。

然而，尽管儒家讲“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但其仁爱却是有差等的爱。《论语·学而》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孝悌是仁爱的根本，可理解为仁爱要从孝悌出发。《中庸》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经解》讲：“上下相亲谓之仁。”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仁爱的讲究和实现要以血缘关系为首要，尤其要以父母子女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为首要。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仁爱要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即有血缘，尤其是直系血缘

的“亲亲”之间做起，然后再推向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孟子讲得很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说，要先爱自家的老人，再爱别人家的老人；先爱自家的小孩，再爱别人家的小孩。孟子还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仁爱要先从每个家庭做起，然后向外推到爱社会上众多的人，然后再向外推到爱自然万物。

“兼爱”是由中国东周时期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提出、倡导的爱。

“兼”的本义是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那么，“兼爱”，就是同时爱不同的人或事物。孟子将其表述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他解释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何以知之爱天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之。”（《墨子·法仪》）显然，墨子的兼爱说，是针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提出来的。

面对墨家的挑战，儒家反应强烈。孟子斥责兼爱说淡漠亲情，是置人间伦理于不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博”字从“十”从“尃”。“十”有东西南北中齐备义，“尃”有分布、散布义，合起来，“博”的意思就是散布到了东西南北中，广大、广泛。

“博爱”在西方基督教话语体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首先，基督教认为，“博爱”是来自上帝的爱。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人因偷吃禁果而犯了原罪，人又不能救自己，于是上帝就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来施救，上帝的救赎就是博爱——广大的、伟大的爱。其次，“博爱”是平等的爱，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都要直接面对上帝，都要靠上帝来救赎，最终都要到上帝那里去，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博爱”是连仇敌都要爱的爱。《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

“奉爱”是来自印度的巴克提瑜珈所讲的爱。巴克提瑜珈梵文为“Bhakti Yogo”，“Bhakti”是“奉爱”的意思，故巴克提瑜珈也称奉爱瑜珈。据相关介绍，奉爱就是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奉献给某种理想、事业，

或他人、社会需要的爱。这样的爱，使人想起 20 世纪中国红色革命年代所倡导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上述“仁爱”“兼爱”“博爱”“奉爱”，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愿景，总体上都有值得肯定的价值。但是，也都有值得讨论、商榷之处。

儒家的“仁爱”有差等，“亲亲”优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与子女、兄姐与弟妹的关系，是原初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将爱优先施予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再推延到无血缘关系的人，应当说是自然的、符合伦理常情的。“亲亲优先”使中国社会成为亲情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亲情的滋养、浸润、关怀、包围中，这当然是有利于个体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的。

但是，“亲亲”优先，很容易导致“亲亲”过度，或者说这样的有差等的爱缺乏阻止“亲亲”过度的机制。所谓“亲亲”过度，是说将亲情，以至于人情，置于过分高、过分重的位置。遇到需要做是非判断时，公理、法律往往让位于亲情、人情，所谓“情大于法”。典型的例证是《论语·子路》中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译成白话：“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体现在这里呀。”

墨家的“兼爱”是一种理想化的爱。不讲等级差别、不分亲疏远近地向一切人施同样的爱，世间能完全做到者，有几人？

基督教宣扬的“博爱”与“兼爱”有一致性，然而在理想化的路上，“博爱”似乎走得更远。让人爱仇敌，且不说一般人做不到、不愿意做，即使有人真地去做，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打个比方，一颗生鸡蛋，如果内里没坏，你给它以温热，到一定程度，它会孵出小鸡或变成可食用的熟蛋；如果内里已坏，你再给它温热，它也孵不出小鸡变不成可食用的熟蛋。如果本来就不是鸡蛋，而是一颗石头，你还要像对待鸡蛋一样温热它，那就不是石头的问题了，而是你脑子有问题了。再如人们熟知的《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好心的农夫将冻僵的蛇放进自己怀里温暖，蛇苏醒后却用毒牙咬了农夫，使农夫受伤而死。这个故事

意在说明“恩将仇报”的现象和道理。当然，也在提示人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施爱，在施爱之前要对施爱的对象有所了解。

至于奉爱瑜伽讲的“奉爱”，也是理想化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的爱，不具普遍性。

笔者认为，生物天生地具有“依他性”和“利己性”，二者从地球上有了生物的那一刻开始就相互交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存于生物体中。也即，只要作为生物存在，就不可能不“利己”，不“利己”就不是生物；同时，只要作为生物存在，就不可能不“依他”，不“依他”也就不是生物。

是对人类而言，人的“依他性”是人的“善端”，人的“利己性”是人的“恶端”。由于“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人的本能、本性，故人天生地、本能地既具有善端也具有恶端。善端可以发展为善，恶端可以发展为恶。故人既有可能行善，也有可能作恶。

人类之爱，无论“仁爱”“兼爱”“博爱”还是“奉爱”，都源自人的善端，即人的“依他性”；相对应，人类之恨，无论怨恨、愤恨、嫉恨，还是仇恨，都源自人的恶端，即人的“利己性”。由于人本能地既具有“依他性”也具有“利己性”，故人就本能地既可以爱、施爱、被爱，也可以本能地恨、施恨、被恨。也就是说，是人，他就既可能爱，也可能恨，既可能爱得如痴如醉、死去活来，也可能恨得咬牙切齿、入骨入髓。

人类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依他性”使然，是向善的、乐意施爱、被爱的。但也有少数人，在一些情况下，“利己性”膨胀，是向恶的、乐意施恨、被恨的。向善、施爱、被爱，使人间暖意融融、欢喜多多；向恶、施恨、被恨，使人间寒风刺骨，悲剧不绝。

鉴于上述观察、认知，本人在构建龙道信仰体系时，提出了“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核心理念，主张、倡导在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等关系时，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显然，在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龙道信仰主张、倡导将“爱人”与“爱己”相统一，即既爱人，也爱己，努力地在“爱人”与“爱己”之间，寻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这样的“爱”，笔者谓之“互爱”。说得再透彻些，“互爱”是从人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出发，既“爱人”又“爱己”的“爱”。

“互爱”与“仁爱”“兼爱”“博爱”“奉爱”相比较，“互爱”突出、强调了“互”字，即相互性，即“互爱”是相互的，是我“爱”人、人“爱”我的。那么，我“爱”人，人不“爱”我；或人“爱”我，我不“爱”人，就都不是“互爱”。

于是，“互爱”就有了基本要求：希望，甚至追求回报。若没有回报，就不是“互爱”了。当然，回报有方式、大小、快慢、程度的不同。

也就是说，我爱人，希望人也爱我。人若不爱我，我可以继续爱人，即继续希望人爱我，也可以不再爱人。如果我爱人，希望人爱我，而人非但不爱我，还恨我，甚至伤害我，那么对不起，我将视人对我伤害的程度，予以适当的回应，甚至回击。

笔者认为，在如今这个广泛联系、利益交错、情况复杂的互联网时代，对大多数人而言，龙道信仰主张、倡导的“互爱”，是现实的、理性的、可操作、可践行的人类之爱。

(2021年1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善恶辩证 ——龙道信仰五

汉语“善”字，与“羊”有关。甲骨文“善”，从“羊”从“目”，表示“羊看”（如羊般看）或“看羊”（看羊怎么做、照着羊的样子做）。金文“善”字，形状为“羊”下两“言”，意思是像羊一样发声、说话。一般情况下，羊的声音都是温和的；羊与羊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不会争吵、打架。羊有角，但朝内弯，这样的角，即使发生抵斗，也不会致对方于死地。总之，羊是比较温顺、友好、合群的。于是，善，就有了对人好、完好、全好、共同满足、圆满、吉祥等引申义。《说文解字》：“吉：善也。”“祥：福也。从示羊声。一云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给“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容易的。笔者思来想去，觉得可以笼统地认为：善是用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益、有利的效能。

“恶”字从亚，从心。甲骨文、金文的“亞”，与繁体字“亞”形状接近，有“圈闭”“封闭”“禁锢”义。“亚”下加“心”为“恶”，表示“心”被封闭、被禁锢。

“心”被封闭、被禁锢，当然会憋闷、憋屈、难受，于是，“恶”就表示令人难受的事、不好的事，引申为坏人坏事，脏乱、伪劣、歹毒、凶残、暴虐之事。《说文解字》：“恶，过也。从心亚声。”“凶，恶也。”

与善的定义相对，恶也可以笼统地认为：恶是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害、不利的效能。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提出了“人性可善论”（或可称“人有善端论”），其典型的表述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shuò）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译成白话：“从天生的情况来说，可以为善，就是我们说的善。至于说有些人不善，那不能归罪于天生的才质。同情心，人都有；羞耻心，人都有；恭敬心，人都有；是非心，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是平时没有想起它们罢了。”

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论”。其典型表述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译成白话：“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善的言行是人为的。现代人的性，一出生就有好利之心，顺着这种性，所以争夺就产生了，辞让就消失了；一出生就有嫉妒憎恨之心，顺着这种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了，忠诚守信就消失了；一出生就有耳朵听、眼睛看的欲望，有喜好声色的本能，顺着这种性，所以淫乱就产生了，礼义规范就消失了。所以说放纵人的性，顺依人的情，一定会出现争夺；与违犯名分、扰乱规范者合流，最终走向暴乱。所以一定要有师长和法规的教化，有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辞让出发，与礼义规范相合，最终走向天下大治。以此看来，人的性是恶的就很明显了，其善的言行是人为的。”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性本恶。其原因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于是人类有了与生俱来的“原罪”。

借鉴中国先哲的说法，结合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对人性的善

恶问题，有以下认识——

第一，人从受孕、出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人、物）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人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己性”。人的依他性可谓人的善端，人的利己性可谓人的恶端。人天生地既具有依他性也具有利己性，故人既具有善端也具有恶端，善端和恶端一开始就交织着，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存于人体中。也就是说，善端恶端并存是人之初的本能、本性。

第二，依他性即善端可以发展为善，利己性即恶端可以发展为恶。人都是既有善端又有恶端，因此，人都可能行善，也都可能作恶。从人的善端，即人的依他性起步，可以发展出社群性、类存在、共同善、伦理本位、群体优先、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大一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从人的恶端，即利己性起步，可以发展出单一性、个存在、我中心、己本位、个体优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等等。可以说，人类社会大大小小的善行善举，都多源自人的善端；人类大大小小的恶行恶举，都多源自人的恶端。

第三，善恶相互争斗又相互依存。人不可能只有依他性即善端，而没有利己性即恶端，也不可能只有利己性即恶端，而没有依他性即善端。那种企图将利己性即恶端从人身上彻底剔除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做不到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家庭、家族、团体、民族，还是社会、国家、国际，善恶都是同时存在的，都是善恶的矛盾统一体。不可能没有善，也不可能没有恶，善恶之间也不可能不发生争斗。人类在地球、在宇宙中生存一天，善恶就存在一天、争斗一天。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群体、事体中，有时善占上风，有时恶占上风，但从长远的、宏观的角度看，善恶是相互制衡的。

第四，人的依他性”即善端，和利己性即恶端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些时空条件下的行善，换个时空来看就是作恶；一些时空条件下的作恶，换个时空来看就是行善。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对一些人而言是行善，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作恶；反过来，对一些人作恶，对另一些人则是行善。若将依他性即善端绝对化，比如只讲、只要依他性，不讲、不要，甚至完全排斥、摒弃利己性，这时候的依

他性，就因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害、不利而意味着作恶。反过来，将利己性绝对化、极端化，毫无疑问是在作恶，但恰当、适度地满足利己性，就因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益、有利而意味着行善。总之，对待善恶问题，只能既具体地又历史地，既整体地又辩证地来看。

第五，必须顺善应恶、扬善抑恶、奉善惩恶。人类必须以社会的形态才能生存，家庭是社会，家族是社会，民族是社会，国家是社会，国际也是社会。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满足人的依他性即善端为出发点，人人为我以满足人的利己性即恶端为出发点。无论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还是作为社会成分的群体，都必须顺善应恶、扬善抑恶、奉善惩恶。所谓顺善应恶，是说对于作为人的本能的善端，要顺理；对作为人的本能的恶端，要应对。顺理意味着助其成长，应对意味着适当满足。所谓扬善抑恶，是说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对善的言行、事物，要发扬、广大；对恶的言行、事物，要抑制、框范。所谓奉善惩恶，是说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对特别突出的善人善事，要敬奉、奖赏，对特别突出的恶人恶事，要惩罚、处治。人类社会，在对善的顺理、发扬、广大、敬奉、奖赏中，和在对恶的应对、抑制、框范、惩罚、处治中，形成了礼仪法律、道德规范。

现实生活中，善恶的界线一些情况下很分明，一些情况下往往不分明。兴一利即生一弊，善的鲜花下往往隐藏着恶的陷阱，善举之树，总是既结善果，也结恶果。世间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完善无恶、全利无弊的状况。人类能够做的，只能是在多重关系、多方利益、多种选择中，尽智、尽力地统筹兼顾，择优而行。

笔者提出龙道信仰，主张、倡导在“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笔者认为，只有这样做、做到这样才是善。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字经》的起首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说得不够准确，似应改为：“人之初，性启元：依他性，善之端；利己性，恶之端；两兼参，代代延。重依他，倡行善；顾利己，不极端。”

(2021年1月15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良知就是刚刚好 ——龙道信仰六

汉语中，“良知”是由“良”和“知”构成的一个偏正词，以“良”修饰“知”。“良”的基本义是“善”“好”。《说文解字》：“良，善也。”《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知”的基本义是“认识”“晓得”“明了”。《玉篇》：“知，识也。”引申为“知识”“知觉”。《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无知。”“知”有名词、动词之分，相应地，“良”有作定语、作状语之别。“知”若作名词，“良知”就指“好的、善的认识、知识”。“知”若作动词，“良知”就指“良好地、善良地认识、了解”。

中国东周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将“良知”升华、定义为上天赋予的，人类不学而得、而能、而知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意识、观念、智慧、能力。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不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到了明代，有“真三不朽”之誉的大儒王阳明，提出了心学的核心理念：“致良知”。王阳明对“良知”的阐发主要有三——

一是“良知”即“天理”。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天理”的一般解释是：“天理”即“天道”，大体上与后世人讲的“自然法则”同。

二是“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以上两条，可以从探讨宇宙本原、世象总根的本体论视角来分析。对此问题，笔者在提出“龙道信仰”时，提出了“宇宙力”概念，认为：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意识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

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笔者的“宇宙力”说，与王阳明的“良知”即“天理”说，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说，有同有异。同的是都探讨到了宇宙本原、世象总根；异的是王阳明的将作为“天理”和“造化的精灵”的“良知”，追溯到了“吾心”，也即，王阳明认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完全在人的意识；而笔者认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总体上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尽管与人的意识相关，是人意识到，并用文字予以揭示的。可以这样说，笔者讲的“宇宙力”，与中国先哲老子讲的“道”，具有同一性；而王阳明讲的作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的“吾心之良知”，倒让人想到了英国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讲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三是“良知”就是孟子讲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王阳明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王阳明全集·悟真录》）“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此说与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值得特别重视。

孟子讲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来自一段颇有名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端”在此处为“起始”“开头”义，即“萌也，始也，首也”（《康熙字典》引《篇海》）。

显然，在孟子眼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之为人的、生来就具有的“四端”。而王阳明，则是把“四端”中的“是非之心”择出来，谓之“良知”。王阳明亦认为，这样的“良知”与生俱有，所谓“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王阳明全集·悟真录》）；而且，“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汉语词汇中的“是非”，指的是事理的对与错，也即：对了，就是“是”，错

了就是“非”。按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人与生俱来地就具有了“是非之心”，即判断对与错的“良知”。

那么，问题来了：人为何与生俱来地就具有了判断是与非、对与错的“良知”呢？这个问题，孟子、王阳明好像没有说明，后世的诸多学者，似乎也都没有涉及。

现在，笔者试着从分析人的“利己性”与“依他性”之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

如果整体上把对人类的生存、延续有益、有利的行为，判断为“是”“对”“善”，把对人类的生存、延续无益、不利的行为，判断为“非”“错”“恶”的话，可以发现：对人而言，源自本能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也即，人要生存、延续，就必须：第一，既要“依他”，又要“利己”，不可能只“依他”不“利己”，或只“利己”不“依他”。第二，通过“依他”来“利己”。第三，只有“依他”才能“利己”，故“依他”就意味着，或者说必然会衍生、发展出“尊他”“爱他”“利他”“和他”，以及“伦理”“集体”“族群”“社会”等等。也就是说，“依他”，是“尊他”“爱他”“利他”“和他”，以及“伦理”“集体”“族群”“社会”等等的基础、出发点；人的以“尊他”“爱他”“利他”“和他”等为基本内容的，以“伦理”“集体”“族群”“社会”等等为载体的种种道德原则、礼仪规范，都是以人的“依他性”为根源。

显然，“依他”与“利己”形成了本能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兼顾“依他”与“利己”，将两者关系处理、调整到适度的状况，就整体上对人的生存、延续有益、有利，就可判断其为“是”“对”“善”；未兼顾“依他”与“利己”，将两者关系处理、调整不到适度的状况，就整体上对人的生存、延续无益、不利，就可以判断其为“非”“错”“恶”。

那么，所谓“良知”，就是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适度把握。或可言：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适度，就是“良知”，就是“是”，就是“善”；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失度，就是非“良知”，就是“非”，就是“恶”。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良知就是“依他”“利己”刚刚好。而人主动地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在感悟、认识的基础上作适度把握的行为、过程，就是“致良知”。

这里至少出现四个问题——

第一，人是否天然地具有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回答是肯定的。王阳明之所以能提出并倡导“致良知”，就是感悟、认识到了，是人，就具备这样的能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界中的生物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若没有这样的能力，生物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生物之外的非生物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人因其擅思维、有智慧而成为生物中的强者，其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也最强。当然，人是有差别的，人天然地具有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不等于人能运用、施展这样的能力。王阳明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二，“依他”与“利己”之关系达到适度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基本的标准，是满足人生存、延续的基本需要。要满足这个基本需要，既要有“依他”，又要“利己”；而不是只“依他”，不“利己”，或只“利己”，不“依他”。当然，适度的标准是一个变量，时空不同，标准不同。也即，“依他”与“利己”达到适度的标准，会受到时代、人群、种族、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之，就是笔者讲的“‘依他’‘利己’刚刚好”。对这样的“刚刚好”，王阳明显然注意到了，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当有人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时，王阳明说：“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三，如何将“依他”与“利己”之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呢？这个问题只能笼统地、整体上地回答，即笔者提出龙道信仰时讲的：兼顾各种相关因素，尽力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到适度的关键，是对“利己”的处置。“利己”是人的本能，人不可能不“利己”，人若一丝一毫不“利己”，人就活不下去，就会失去生命。

“利己”与“人欲”，即人的欲望相关。人要生存、延续，本能地会产生以饮食欲为主要成分的物欲和男女相合的性欲，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作为人生存、延续基本需要的物欲、性欲，具有“可满足”和“不可满

足”两面性。“可满足”是说“物”至营养够、“性”至有对象即可；“不可满足”是说“物”至营养够、“性”至有对象之后，还要求更多、更好、更美，所谓“欲壑难填”。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老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话。这个“矩”，可理解为底线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法律约束。然而，事实是，人间超越底线伦理、道德规范，乃至法律约束的“纵欲”行为，并不少见。于是，王阳明强调：“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四，将“依他”与“利己”之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有何意义？王阳明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他认为，“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它能使人成为“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王阳明全集·知行录》）“通天地，亘古今，彻昼夜，一死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的“君子”。“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但致良知，可造圣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显然，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彰天理，就是行大道，就是《大学》里讲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能战胜灾难，吉祥随身，成君子、成贤良，甚至“内圣外王”“平天下”“造圣域”，成圣人。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王阳明全集·悟真录》）

有了上述分析，笔者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知行录》），就有了下述理解——

“无善无恶心之体”，可理解为人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这两“性”，因是人天然的、本能所具备的，故可谓“无善无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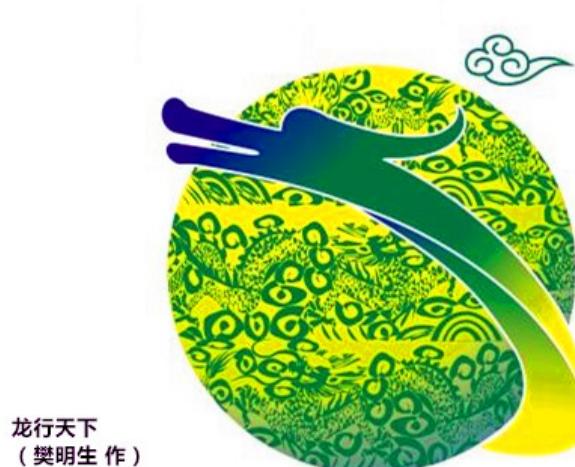
“有善有恶意之动”，可理解为人开始对“依他性”和“利己性”有了感悟、认识，开始把握，即处理、调整“依他”与“利己”的关系，即“动”了“意”，于是，就“有善有恶”了。这里的“善”，就指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这里的“恶”，就是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得不适度；尤其是出现了放纵“人欲”，过分“利己”，按王阳明的话说，“着了私累”（《王阳明全集·知行录》）的情况。

“知善知恶是良知”，可理解为，人认识到了人类要生存、延续，无论是自我，还是家庭、族群、国家、社会，都要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当的程度；认识到了“依他”与“利己”，适度就是“善”，失度就是“恶”；尤其是过分“利己”，就是“恶”，甚至是大“恶”。

“为善去恶是格物”，可理解为“格物”即生活实践的过程，就是将“依他”与“利己”的关系，由失度，处理、调整到适度的过程，也即“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过程。

行文至此，向先圣学习，笔者也想出四句话，算是对上述析理一个总结，曰：“依他利己人本性，适度与否善恶生；良知就是刚刚好，尊爱利和龙道行。”

（2021年2月1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中庸”就是“使适度” ——龙道信仰七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成为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经典之一。一般认为，“中庸”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如何会有这样一个标准呢？

前面讲过，人的与生俱来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可以作为解释“善”“恶”“良知”“致良知”等的根据。兼顾“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把握适度，就是“善”，就是“良知”；对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失度，就是“恶”，就是非“良知”，而人主动地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在感悟、认识的基础上，作适度把握的行为、过程，就是“致良知”。

《中庸》第一章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顺着“性”生活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就是“天命”的，即“上天赋予人的”“性”。那么，可以说，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就叫做“道”，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修养心身，就叫做“教”。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是怎样的生活？也即这个“道”是怎样的“道”？回答是：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处理、调整到“适度”的生活；这个“道”，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处理、调整到“适度”的“道”。简言之：“依他”“利己”适度就是“道”。

第二，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也即按什么理念、规范来修养心身？“教”的目的又是什么？回答是：总体上讲，

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是“适度”，也即按“适度”的理念、规范来修养心身；而“教”的目的是“使适度”。说得稍具体些，“适度”，就是在“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適域。

《中庸》第一章第二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意思是：“这个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

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按其要求生活，就叫做“道”。因为“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具备的，它们和人的生命交织、结合在一起，只要人活着，“依他性”和“利己性”就存在，故言“不可须臾离也”。也即人离不开“依他性”和“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也离不开人；人是主体，“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主体性。二者若分离，人和“依他性”和“利己性”都不存在。

汉语中，“中”有多种解释。发第一声 zhōng 时，有“适于”“合于”义；发第四声 zhòng 时，有“正对上”“恰好合上”义。河南省的方言中有“中不中？中”之语，其“中”就有“是”“对”“好”“行”“可以”等意。这“适于”“合于”“正对上”“恰好合上”，就是“适度”；而河南省方言中的“是”“对”“好”“行”“可以”，或与“适度”意同，或与“适度”意近；故“中”可以理解为“适度”，也即俗语中的“刚刚好”。

汉语中，“庸”也有多种解释，其中一个释为“用”。《说文解字》：“庸，用也。”。如果将“庸”释为“用”，“中庸”就可以理解为“以中为用”“用中”。“中”是“适度”，“用中”就是“做到适度”“使适度”。又，魏晋时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释“庸”为“常”，言“中庸”为“中和可常行之道”——“中和可常行之道”亦可理解为“使适度”之道。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明德”“善”“良知”是同义词。那么，可以说，“中”即“适度”，就是“明德”“善”“良知”；“中庸”就是“明明德”，就是“至善”，就是“致良知”，就是“使适度”。

《中庸》第二章中有这样的话：“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是：“孔子说：

“君子中庸，小人违反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时时都能做到适度；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做事没有顾虑和畏惧，越过了度。”

在这段话中，孔子阐明了“中庸”就是“做到适度”，即“使适度”，并认为能否“中庸”，即能否“做到适度”“使适度”，是判断、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君子是能做到适度的人，小人是不能做到适度的人。

《中庸》第三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人们缺乏它已经很久了！’”显然，在孔子看来，“中庸”，即“做到适度”“使适度”，是人间最高的德行，也即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于是，《中庸》第二十八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号召：“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可以理解为：“品德高尚的人，应尊崇道德本性而追求学问知识，达到广博的境界又钻研至精微的妙处，做到高屋建瓴洞察世情而行为适度。”

（2021年2月2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以《“中庸”之思》为题刊于《西安日报》2021年3月18日第8版）





“和”之五解 ——龙道信仰八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古代的先哲们把“和”作为做人的基本、立论的基础和理想社会的至高境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阐述过“和”。如“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为贵”(《论语·学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等等。秦汉之后，儒、道、佛三家，儒家为主，道、佛两家为辅地撑起了中华文化大厦。而这三家的思想，以其理论侧重而论，似乎都可以概括为“和”：儒家主要讲的是“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道家主要讲的是“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佛家主要讲的是“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华文化尤其是龙凤文化过程中，对“和”有一些感悟、认知，主要有五一—

1. “和”的意味，可以从“和”字的结构来理解

“和”由“禾”和“口”结合而成。“禾”是象形字，本意为庄稼的茎秆，所谓“茎节为禾”(《说文·禾部》)；引申为粟(嘉谷)及粮食作物的总称。由于

野生植物是禾的来源——有说法认为，禾由原始先民用野生的狗尾巴草培育而成，我们就可以将“禾”视为植物的一个代表。而“口”，也是象形字，是人和动物用来发声和进饮食的器官。所谓“口，人所以言食也”（《说文·口部》）。大凡动物，都会长口，以至于将牲畜的年龄以“口”视之。据此，我们可以将“口”视为动物的代表。那么，一个“和”字，就具有了将“植物”和“动物”结合在一起的意义。

这样的结合，至少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一个和谐的世界来自于植物和动物的结合，也就是说，必须既有植物，也有动物。动物的生活资料来自于植物，植物的生存也有赖于动物的援助，如动物为植物传粉、促进种子的传播，动物的代谢产物为植物提供营养和能量等，二者相互依存。第二，植物和动物的结合，大体上要维持一定的比例；如果只有植物没有动物，当然谈不上“和”，而动物将植物吞食、消灭光了，使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口”，那就更谈不上“和”。第三，“和”中之“口”，是整个动物界的“口”，而不仅仅是人的“口”。可见，一个“和”字，体现着人对动植物关系的认识，昭示着人对植物和动物即自然界各种生物的尊重。

2. 龙凤是“和”的象征

“和”的前提、基础是“合”，没有集合、结合、化合，就没有“和”，故有“和，犹合也”（《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合，聚也”（《论语集注·子路第十三》）之说。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的神物。凤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鸡、鹰、燕、鸟、鹤、鹑、鸿、孔雀、鸵鸟等动物，和太阳、风、火等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的神物。可以说，没有“合”，就没有龙凤；而“和”则是龙凤都具备的精神蕴涵之一。“和”与“谐”也是同义词。“和，谐也。”（《广雅》）“和”有“协调”“舒适”“和平”“和解”等意，“谐”有“配合适当”“妥贴”“匀称”等意，合在一起，就可以“协调舒畅，配合适当”理解“和”。

龙凤的形象同“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是吻合的。由众多的动物、天象，合成两个和谐生动、神奇万方的形象，而这两个形象又进而同众多的动物、天象，及人事相和谐，这便是龙凤。而龙与凤，也有阳阴契合、雄雌谐悦、男女合好、力美互济等意，所谓“龙凤呈祥”“龙凤和美”。那么，可不可以用龙凤来象征“和”呢？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生动活泼的、内涵丰富的、不可多得的。

3. “和”根源于人的“依他性”

人从受孕、出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人、物）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人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

依他性和利己性，尤其是依他性，使“和”成为必然。也就是说，人要活着，就必须与他者“和”，否则就没有生活资源。也即人只有与他者“和”，才能满足人的利己性，才能活下去。于是可断定：每个人都是“和”的存在（只是“和”的程度和方式会有差异），没有“和”就没有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日常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含有这个意思。

4. “和”是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之一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之道。

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也是基本原则目前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尊”是处世观、交往论；“爱”是感情观、关系论；“利”是互利观、共享论；“和”是理想观、境界论。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这里的“天”，指的是具有无限性的、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能不断的认知、有局限的利用，却永远不能掌控的宇宙力、大自然。“人”，指“己”之外的生命个体、群体。“己”，指的是人类的生命个体，即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

作为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之一，“和”意味着与天和、与人和、与己和。

5. “异和”“竞和”“斗和”“适和”

“和”有不同的形态。

“异和”就是有儒家讲的有差异的、“和而不同”的“和”，就是讲原则、辨是非、以符合文明社会基本的公理、道义为底线的，既彼此包容又尊重各自独特性的“求大同存小异”的“和”。人间的“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异和”。

“竞和”就是参与事物的双方或多方，保持一种即竞争又合作关系的“和”，就是鼓励追求卓越、出类拔萃、互相比赛、彼此赶超、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和”。

“斗和”就是事物的双方或多方，通过斗争（甚至战争），使矛盾、冲突发展、演进、转化，从而达到“和”的局面的“和”。宋代思想家张载讲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就是这样的情况。

“适和”就是不偏不倚、恰当适度的“和”，就是遵守国家法律、不违公序良俗、一切都刚刚好的“和”，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和”，就是笔者提出并强调的，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而兼顾、协调、践行之的“和”。

（2022年4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依伦与由自 ——龙道信仰九

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往昔的一个场景：大概是 1980 年前后吧，时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的我，看见一位褐发、高鼻、深睛的中年男士坐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的水池沿上，就主动上前和他攀谈。当得知他受聘本校外语系已做“外教”数年后，我问他在他的感觉里，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双臂合拢，做了一个抱团状，然后双掌交叉合在一起，用不怎么熟练的汉语说：“中国人，合，亲……密。”然后摊开两掌，向外伸展，又右手一攥，将凸出的大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说：“西方人，散，自……我。”几十年过去了，已有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经历的我，回味起来，觉得这位外国教师的感觉、理解、描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任何生命体从萌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生命本体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生命本体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是生命体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

在目前地球上活着的无数生命体中，人是最高级的。这个最高级表现在人具有人之外的其他任何生命体都不具备的，能够思维并产生智慧的大脑。大脑思维使人对自身具备的属于本能、本性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有了认识、思考，进而形成观点、理论，这些观点、理论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于是，“依他性”和“利己性”便成为人们进行思维，产生观点、理论的一个依据、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

人的“依他性”，引起了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儒家先哲们的重视。他

们发现，为人的活着、活下去提供必需营养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也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一群人联系着，每个个体的人，实质上都是一种“群存在”。考察得再仔细些，他们发现，为人的生命提供营养，使一个人活着、活下去的“群”，起初是一个“家”，即主要由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构成的“群”。家这个“群”要有效地为家中的成员提供活着、活下去的营养，即有效地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就得有作为领导者、指挥者、管理者的家长，和家庭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家规，于是，“伦理”出现了。

“伦”字的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所谓“伦，辈也，从人伦声”（《说文解字》）。辈分意味着等级、次序，故“伦”就是等级和次序。“理”的本义是物体的纹路，引申为道理、准则。合在一起，“伦理”就是“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

有了“伦理”的概念，儒家先哲们就提出一系列观点、建构起一套理论，将属于人本性的“依他性”阐释、发展为“依伦性”，将人的“群存在”阐释、发展为“伦存在”，由此，加上由汉王朝开始的、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导，中华文化便打下了“伦本位”（本位即原初的、主体的、中心的位置）的根基。“伦本位”，即以“伦理”即“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为本位，强调秩序和服从。比如儒家提出并倡导的“孝”，尽管有“父慈子孝”之说，但侧重点在于“子孝”，即晚辈对长辈，尤其是子女对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尊重和服从。家国同构，家庭血缘伦理可以推移、放大到国家政治伦理，于是，“孝”就进变为“忠”。尽管有“君礼臣忠”之说，但侧重点在于“臣忠”，即臣子对君主（扩展至国民对国家）的尊重和服从。

基督教文化是北美、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基础性主流文化。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文化本来强调的是“神本位”即“上帝本位”，宗教改革后，“神本位”实质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本位”，即人以自己为本位。因为，上帝毕竟是彼岸的、虚远的，个人、自己才是此岸的、实近的，要不要面对上帝、什么时候面对上帝、怎样面对上帝，是要由自己来选择、做决定的。从人性上考察，基督教文化的这种“自本位”，是与人的“利己性”相吻合的。

这样，我们看，中西方文化便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性中的“依他性”而形成的“伦本位”，主张群体优先、集体主义、“依伦”而行，对不“依伦”的行为进行限制、打压；由此，可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概括为“依伦”。

西方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性中的“利己性”而形成的“自本位”（也可称“己本位”），主张个体至上，自由主义，“由自”而行，对不“由自”的行为进行声讨、摒弃；由此，可将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概括为“由自”。

“依伦”的中国文化的优点，概括起来有：1，对家庭而言，有利于亲情的建立和维系，使中国人大多生活在亲情的抚慰、关心、关怀、关照之中。2，对国家而言，有利于推行“王道”“礼制”，使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3，有利于“大一统”，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且高效率。社会成员之间，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由自”的西方文化的优点，概括起来有：1，有利于个人特长的发现、兴趣爱好的培养、创造性的发挥。西方世界的发明创造多，与此条相关。2，个人行为受到的限制相对少，活动的空间相对大，选择的方案、路径相对多。从而心理上的受制约感、被压制感、委屈求全感等负面的感觉相对轻、相对少。3，家庭关系，尤其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义务相对少，活得相对轻松。

“依伦”的中国文化和“由自”的西方文化，都有各自的问题或者说局限。

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容易“依伦”过度，即把人的“依他性”强调、显化到过分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利己性”。讲伦理本来有依人性、顺人情的一面，但在实践中常常就过了度，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虽然有识之士想了很多、讲了很多、做了不少努力，但却一直不能杜绝这个“依伦”过度。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实质上都是“依伦”过度的问题。“依伦”过度造成的危害，一是在限制、打压人的非分欲望的同时，也限制、打压了人的正常欲望，尤其是创造性欲望；二是容易形成、助长“家长制”“一言堂”“一刀切”“以情代法”“循情枉法”等，使现代文明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价值准则流于形式或出现偏差。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实现、完成“全员”的目标、任务，“一刀切”地让长期居家不出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凌晨四五点起来，冒着风寒和被感染的风险，去做核酸检测。

西方文化的问题是容易“由自”过度，即把人的“利己性”强调、显化到过分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依他性”。西方社会的诸多社会病，如吸毒、枪支暴力、种族歧视、党派恶斗、工作效率低等，都可以追溯至“由自”过度。自由的定义有许多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行动是最基本的解释。按照这样的解释，自由就是“由自”。然而，“由自”并不是没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讲的“无害于他人”（原语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西方社会，“由自”过度，即“有害于他人”的行为多有发生。就说美国的枪支暴力吧，美国人有拥有枪支的自由，近期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约有2.65亿支枪在个人手中。有枪在手，就难于做到“无害于他人”。自己受挫折了，抑郁了，不想活了，就持枪到学校、超市、街道乱扫一通。于是，媒体上时见枪支犯罪的报道。每年，美国都有几万人因此而死于非命。令人惋惜且值得整个人类思考的是，这样的“由自”过度，以“人权至上”标榜于世的堂堂美利坚，竟然解决不了，眼见着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发生。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有几条结论性的认知——

第一，“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不分男女、肤色、人种、国家、民族，只要是人，都具有，没有例外，差别只在于比重的多少

和程度的强弱。这一条，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认识、理解万物、万事、万象的立足点。由这个立足点出发，对世间的形形色色，诸多问题，我们就可以一眼望穿，豁然通透。一般来看，世间的所有善行，多源于人的“依他性”；世间的所有恶行，多源于人的“利己性”。



第二，由“依他性”可以发展出“群本位”“伦存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由“利己性”可以发展出“个本位”“自存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显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其源自人性的天然依据，消灭社会主义或消灭资本主义都意味着消灭人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突出、侧重、强调“依他”，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由自”；资本主义突出、侧重、强调“由自”，也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依他”。

第三，“依他性”会导致“依伦”过度，“利己性”会导致“由自”过度，人类的思维和智慧，是导致这两个过度的根源，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令人叹惋甚至悲哀的是，这样的对人类生活造成或小或大影响，甚至种种祸患灾难的两个过度，人类社会竟不能避免，尽管我们希望避免、呼吁避免。

(2022年9月2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孝的解析 ——龙道信仰十

孝字的古形，像一个孩子搀扶着老人，即“子承老也”。《说文解字·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尔雅·释训》：“善父母为孝。”善事父母、善父母，就是对父母善、对父母好。作为儒家提倡的基本伦理规范之一，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学而》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孝经》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对下一代的教育就由孝生发。《孝经》还讲：“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身之为人，就应该行孝、尽孝。

在儒家看来，孝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或者说功用：一是为人父母者年老时能得到赡养，死前有人关怀，死后有人祭祀。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能维护伦常等级秩序，使社会得以长治久安。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孝，还有弟，即悌，为何会有这样的功能呢？因为中国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家庭血缘伦理可以推移、放大到国家政治伦理。在家孝亲，在国就可以忠君；在家悌兄，在国就可以敬长。所谓“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小孝齐家，大孝兴邦”。

笔者在论述龙道信仰时，揭示、提出的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可以用来解析“孝”。作为儿女，当他们从受孕成胎、出生，到成年之前，都要“依他”，若不“依他”，就不能成活、成人。这个所“依”之“他”，一般来说是父母。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依他”，主要是“依父母”；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依父母”而“利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尤其是母亲，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怀胎的不易、担忧，分娩的艰难、痛楚，

喂养的繁琐、操劳，所谓“一把屎一把尿”。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付出，儿女们受在身而感在心，所谓“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刻骨铭心”。于是，由“依他”而“爱他”“尊他”“利他”——“孝他”。故，孝的实质，是儿女对给予自己生命、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的辛勤劳动的尊重、感恩和回报。

作为父母，把儿女从胎儿、婴儿养大成人，“依他性”和“利己性”也是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儿女，父母只有“依他”，才能“利己”——对为人父母者而言，此过程的“利己”表现在：1，通过养育儿女，使自己的生命基因得以遗传，完成天然的、人之为人的，家族、民族，乃至人类，在地球上延续不绝的使命。2，通过养育儿女，使自己“老有所依”，即实现“养儿防老”的愿望。以上两条是最基本的，如果，不但把儿女养育成人，还把儿女养育成了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中龙凤”，那么，作父母者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活得分外“光彩”而精神特别愉悦。

《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儿女们珍惜生命、爱护身体，进而立身行道、建功扬名，表面上看是“利己”，实质上是“利己性”与“依他性”的辩证统一。可见，无论从儿女方面看，还是从父母方面看，“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孝的根源和基础。

孝是“善事父母”，而现实生活中，有能“善事父母”而不“善事父母”者，也有想“善事父母”而不能“善事父母”者。能“善事父母”而不“善事父母”者，人们谓其“不孝”；对那些不但不“善事父母”，还嫌弃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人们谓其“忤逆不孝”“白眼狼”。从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来分析，“不孝”的儿女，基本上都是“利己性”在发酵、膨胀、作孽，认为自己长大了、自立了，不需要“依”父母这个“他”了；也即认为年老的父母“无用”了，不能“利己”了，成了“负担”“累赘”了。对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不孝者，人们在给予道德的谴责、劝诫，甚至法律的惩处时，常言“羊跪乳，乌反哺，何况人乎？”

“善事父母”，即行孝、尽孝的一般要求是：物质上安康其身，精神上顺乐其心。“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反对那种昧于事理的、极端化的“愚孝”，如《二十四孝》中的“埋儿

奉母”。“善事父母”也不等于一点原则都不讲，一点底线都没有，不管父母说的对与错，都全盘接受；不等于父母错也跟着错，父母违法犯罪也随着违法犯罪。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发现父母有过错，要及时地、理性地劝其认识、改正，只是言语上尽量做到和颜悦色；发现父母违法犯罪，要及时予以阻止，并视情节轻重，鼓励其自首、悔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是古代儒家的局限，与当代法制文明相违背。对因违法犯罪受到惩处、制裁的父母，要鼓励、帮助其重新做人，不可放任，甚至遗弃。

想“善事父母”而不能“善事父母”者，情形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职责在身，他们只能少“利己”，甚至舍“利己”而“依他”“利他”——这里的“己”，指的是包括孝的对象——父母在内的家庭；这里的“他”，往往不是指某个人、某些人，而是指民族、国家、天下。对这样的人，社会在予以褒赞的同时，还应运用、发挥因人的“依他性”而生发、形成的集体的、族群的力量，尽可能地替代其“善事父母”。

(2021年4月4日农历辛丑年清明节于加拿大枫华阁)



诚明与明诚 ——龙道信仰十一

《康熙字典》释“诚”：“《說文》信也。《广雅》敬也。《增韵》纯也，无伪也，真实也。……《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看来，“诚”的基本义，就是“把真实的情况表达出来”，或“表达出真实的情况”。

笔者依观察人的生命从受孕、出生到成长都必须依靠他人才能存活之事实为基据，提出了人与生俱来具备“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观点，并以此观点解释《中庸》的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就是“天命”的，即“上天赋予人的”“性”；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就叫做“道”；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修养心身，就叫做“教”。而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就是“适度”的原则，即在“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的原则。

由此来说人之“诚”，就有两条基本要求——

一，把自身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真实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若在某件事情上只表达出自己的“依他性”，而未表达出自己的“利己性”；或只表达出“利己性”，而未表达出“依他性”，那么，此人的表达就“有伪”，就不“诚”。

二，把自己按“适度”的原则，处理自身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人之“诚”，是道德修养，即“明明德”“致良知”等等之后的真实情况的表达，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表达，而非“随心所欲”的表达。



这样，对《中庸》中“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一语，就可以理解为：自己真实地认识并表达自身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本性，自己通过道德修养使自身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达到适度就是教化；真实地认识并表达自身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本性的要求和彰显，通过道德修养使自身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达到适度，并予以真实地表达就是诚。即：“诚则明”之“明”，是人自身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彰显；“明则诚”之“明”，是人通过道德修养使自身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达到适度。

（2021年5月20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思无邪

——龙道信仰十二

“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原诗句为：“駉（jiōng）駉牡马，在坰（jiōng）之野。薄言駉者：有駜（yīn）有駟（xiá），有驥（diàn）有鱼。以车祛（qū）祛，思无邪，思马斯徂（cú）。”意思是：“一群健壮的马，放牧在郊野啦。看看它们吧：有毛色浅黑带白的马，有毛色红白相间的马，有黑身黄脊毛的马，有白色眼眶的马。强健的它们拉起车呀，不会跑到邪道上去，直达远方实可夸。”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学人们对“思无邪”的基本解释有二：一是将“思”释为“思想”。“思无邪”的意思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一是认为“思”是发语词，没有意义。“思无邪”就是“无邪”，就是“直”“正”。于是，有的学者就在“直”“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如：“《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李泽厚《论语今读》）

“邪”字的本义指“像犬齿一样凸出的城堡”，引申为“倾斜之形”，再引申为“不正”。西汉《贾子·道术》：“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那么，“无邪”就是“正”。

汉语中的“正”，有“不偏斜”“合于法则”“合于道理”“恰好”等解释，这些解释都意味着“适度”。故可以说，“无邪”就是“正”、就是“适度”。

笔者认为：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把握适度，就是“正”；不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把握失度，就是“邪”；“无邪”，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到适度。

这样，孔子讲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就可以

置换，或者说理解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适度。”

那么，《诗经》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上述判断呢？也即《诗经》是不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到适度”了呢？

以《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为例。这是一首描写“君子好”与“窈窕淑女”两人爱情的诗，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女之间基于生理的繁衍需要的爱情像鸟儿鸣叫着求偶一般，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和发散，“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本性，故爱情的本质可谓男女双方“依他性”和“利己性”自然流露和发散。这样的流露和发散如果适度，就是“正”，不适度，就是“邪”。而《关雎》诗中，写到了“君子好”在追求“窈窕淑女”的过程中，“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等，这些手段、做法，都是正常的，甚至是美好的，没有什么逼迫呀、胡搅蛮缠呀，甚至暴力呀等过分的举动出现。显然，《关雎》一诗，符合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到适度的要求。《论语·八佾》有言：“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自己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适度。

不光是描写男女爱情，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诗经》也是“无邪”即适度的。如《小雅·大田》中有“有渰(yǎn)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句。意思是：“天上阴云密布，小雨徐徐而下；这雨水滋润了主人家的公田，也滋润了我家的私田。”诗中的“我”给主人家干活，并为主人家的“公田”得雨而高兴，反映了其时人们“依他性”生存的情况，而“遂及我私”，则是其时人们“利己性”的写照。

《诗经》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讲究一个“美”字。孔子以“无邪”评价《诗经》，说明在孔子的意识里，“无邪”即“美”。笔者以“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到适度”为“无邪”，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到适度”就是“美”。

(2021年5月2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和平、承续、互利、共享

——龙道信仰十三

笔者认为，地球村的所有成员，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都生活在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中，都要面对和处理这三大基本关系。面对和处理这三大基本关系，是人类的命运，也是人类的日常。

笔者强调，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要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遵循“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对个人而言，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的过程，就是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认知、把握、践行到适度的过程，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过程。

对群体（包括团体、民族、国家、人类）而言，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的过程，就是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认知、把握、践行到适度的过程，就是构建命运共同体、推进文明的过程。

那么，“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回答：公约数是和平；贯穿线是承续；平衡点是利益；合适域是共享。

和平，指的是无战争、非暴力的状态。和平意味着和谐、和睦、和乐、平安、

平顺、平衡。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向往和平，故说“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公约数是和平。和平，是目的，也是手段。言其是目的，是说地球村的绝大多数居民，在绝大多数时空条件下，都希望、期待、追求和平。言其是手段，是说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情况下，实现和平的方法、途径是和平。如笔者在《龙凤三字经》中言：“有矛盾，坐下谈，弃暴力，戒强权，勿急躁，勿狂癫，存小异，求大全。崇理性，释前嫌，共赢好，多者先。”

承续就是继承和延续，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人的承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生物载体的承续，和作为文化载体的承续。作为生物载体的承续，通俗地说就是传宗接代，就是人的生产，即把个人的、家庭的、族群的生命基因继承、延续下去。作为文化载体的承续，就是把人类创造的文化、文明继承、延续下去。承续不光意味着继承、延续传统，还意味着在继承、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每一个人，只要还生活在地球上，就天然地担负着承续的使命，其从生到死的过程，就是承续的过程。故说“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贯穿线是承续。

利益是生命必需的，能够使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得到满足的材料。利益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等不同侧重、不同标准的划分。物质利益是最基础、最必需的利益。家庭、家族、团体、民族、国家，古今中外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利益共同体；而古今中外一切矛盾、较量、冲突、竞争、斗争、纷争、战争，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言“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平衡点是利益。也就是说，找到并把握好天、人、己的利益平衡点，是兼顾“依他性”和“利己性”，实现“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必要条件。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利益绝对均衡是不可能的，贫富差距是一定会有的，但不能让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下降到生命的维持线之下，否则，就会“饥寒生盗贼”，出现形形色色的暴力争利者。一些国家之所以实行削富济贫的福利政策，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共享就是共同享用。就是“我用他”“他用我”，即“我”在“依他”的同时，“他”也可以“依我”；而“我”在“利己”的同时，也“利他”。言“尊天尊人

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合适域是共享，是说在兼顾“依他性”和“利己性”，实现“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过程中，要谋求、开发、维护能够共享的领域。能够共享的领域，就是合适的领域；能够共享的事物，就是合适的事物。比如，一个作家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在某媒体展台上发表，供读者们阅读、欣赏，这时的某媒体展台就是合适域。反之，不能够共享的领域，就是不合适的领域；不能够共享的事物，就是不合适的事物。比如，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意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于知道的信息，如身体的、行为的、身份的、名誉的、肖像的、个人收入的、个人经历的隐私。如果将某人的隐私在媒体上公开，就是不合适的、违法的。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种种，只是对“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价值取向的原则性提出，遇到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人、事，要具体地分析、对待、把握。

(2021年5月2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超知超验即为神 ——龙道信仰十四

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龙的实质是中国人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化。

这是笔者给龙下的一个定义。“神物”是这个定义的关键词。

“物”字好理解，指宇宙间存在的东西。《说文》：“物，万物也。”

“神”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其古字形由“示”和“申”相合而成，兼象形与会意。“示”表示祭台、祭祀，可引申为崇拜。“申”字在甲骨文中是闪电的象形。

“示”和“申”结合为“神”，表示古人在祭祀雷电、崇拜雷电。古人为什么要崇拜雷电呢？因为雷电超出了古人的认知和经验，是古人的认知、经验无法理解的，是神秘的，不可测度、不可掌控的。也就是说，雷电对古人而言，是超知、超验的，是可以代表超知、超验的。故“神”字的初义，可理解为古人对超知、超验的崇拜。简言之，神是人崇拜超知、超验的产物，神是超知、超验的存在。古籍中对“神”的一些解释，和笔者的理解相一致。如：《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孟子》：“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笔者在构建龙道信仰体系时，提出了“宇宙力”概念，指出：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显然，宇宙力是一个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沿、功能上不可计量的无限；人类，以及人类所能够感悟、认知、掌控的，是包含在无限的宇宙力之内的、极其渺小的有限。对人类而言，可知、可验的，是宇宙力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对宇宙力中极其无限的绝大部分，人类是不可知、不可验的，即对人类而言，是超知、超验的。尽管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力图不断地拓展对宇宙力的认识，增加对宇宙力的可知、可验，但这样的拓展、增加，永远都是有限。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宇宙力中，永远都是只有极其微小的部分可以由超知、超验，转化成可知、可验，而宇宙力中的绝大部分永远都是超知、超验的。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先生提出的“物自体”和“现象界”两个概念来理解、说明。“物自体”指人类认识之外的、人类不可能认识的存在，即超知、超验的存在。“现象界”指人类所认识的存在，即可知、可验的存在。“物自体”是“现象界”的基础，“现象界”是对“物自体”的认识。“物自体”之部分一旦被人类认识，此部分“物自体”就脱离了“物自体”，变成了“现象界”。“物自体”具有无限性，有限的人类，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认识“物自体”，都不能使“物自体”全部变成“现象界”，即不能使超知、超验，全部变成可知、可验。

那么，对人类而言，宇宙力中极其无限的超知、超验部分，就是神。

笔者还根据科学界对暗物质、暗能量的表述，提出了“暗物力”概念，指出：暗物质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人类目前借助最先进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也观测不到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暗能量是暗物质本身具备的能量。暗物力是由暗能量的释放所构成的力。

显然，暗物力属于宇宙力的组成部分，暗物力和“明物力”（笔者起用的词，即人类能看到、测到的物质力）共同构成了宇宙力。暗物力，甚至可能是宇宙力中的“主力”，即在宇宙演化过程中，暗物力发挥的效能可能大于明物力。然而，这个“主力”对人类而言，却是隐晦不明、难以测度、不可把控的。于是，就有一个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对人类而言，宇宙力中极其无限的超知、超验部分，就是神。

小前提：对人类而言，暗物力是宇宙力中极其无限的超知、超验部分。

结论：对人类而言，暗物力就是神。

笔者认为，龙的实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尤其是对宇宙力中的暗物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龙以由多种动物的部分形象构件和多种天象的功能形态组合而成的形象，反映、代表、体现着暗物力。于是，又有了一个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对人类而言，暗物力就是神。

小前提：龙以由多种动物的部分形象构件和多种天象的功能形态组合而成的形象，反映、代表、体现着暗物力。

结论：龙是神物。

当然，从物的方面说，龙具有具象性，它集合多种动物的部分形象构件和多种天象的形态构成生物界没有的形象，并以绘画、雕塑等形式表现出来，可观看，可感受，可认知，可经验；从神的方面说，龙具有抽象性，它反映、代表、体现的是无限的宇宙力（尤其是暗物力），有人类不可观看，不可感受，不可认知，不可经验，即超知、超验的一面。龙一身二任：它既是有有限、可知、可验（或者说反映了人类的有限、可知、可验）；又是（或者说反映了）宇宙力的无限、超知、超验。龙是有限、可知、可验，和无限、超知、超验之间的中介。

（2021年6月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超验与抗体

——龙道信仰十五

一个民族的被占领是文化的被占领，一个民族的被征服是信仰的被征服。面对异质文化多样化、全方位、无孔不入地渗透或者说“侵略”，中华文化有没有足以抵制的“抗体”？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抗体”应该说是有的。这便是由“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奉正义、尚和合、讲辩证、求大同、励有为”等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精华结构成的文化综合力。只是和异质文化相比，这个文化综合力显得不够强大。

差在何处呢？差在中华传统文化除上述优秀精华外，还有“维旧制、强等级、轻个权、缺法治、避科技、弱超验”的局限或者说“短板”。其中的“弱超验”可能是致命的，是尤其需要重视，并认真对待、予以解决的。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解决本民族的超验问题，就谈不上全面、系统、完整、崇高意义上的文化自信。

所谓“弱超验”，是说在超越人类经验的问题上，中华民族是有过感悟、认知的，如出现在圣贤经典中和百姓日常言语中的“天”“天命”“老天爷”等。只是，很遗憾，受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不怪力乱神”，和“唯物论”“无神论”的影响，古往今来，国人为地将超验问题弱化了，将对该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搁置了，使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摆脱简单、笼统、含混的局面，未能超越一般化认识的层次而达到根本信仰的高度。

超验问题，实质上是“终极关怀”问题，也即人的灵魂的最终归宿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都是必然、必须要面对、要解决、要有说法和方案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异质文化已然解决，他们已建构起一套堪称庞大的言释体系。而我们的文化，却一直未能很好地、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问题。加上“五四”的“打倒”、“文革”的“批判”、改革开放西潮涌入，

不但使超验问题的解决无从谈起，也使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有的“抗体”，竟被“自阉”“自残”得七零八落、力弱势衰了。因此，当异质文化，尤其是针对人们超验需求的异质信仰文化，借现代化的“声光电数字化”，长驱直入、全面渗透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国人已然失去了免疫力，不少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竟改门换庭，跪倒在异质信仰文化的旗幡之下。

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攻关破隘”“夺城掠地”，是因为我们的“关隘”不坚固、我们的“城墙”有缺口、我们的“地面”有空白。人家钻的就是你的漏洞，填的就是你的空白。你没有，又需要，那么好，人家就见缝儿插针、见空杯子就倒水地提供给你。

情状已十分清楚，危机已扑面而来。怎么办？缺钾补钾，缺钙补钙，文化的问题要用文化来解决。既然我们的文化存在局限和短板，那我们在继承、弘扬优秀精华的同时，就要克服局限，弥补短板。既然“弱超验”使我们的“抗体”不强，那我们就“强超验”使我们的“抗体”增强。

如何“强超验”呢？作为中华民族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情感纽带的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能够超越地域、党派、宗教、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为精神底蕴的龙文化；以“有根、能容、通约、时新、广适”为特色，以“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为基本理念的龙道，就可以为国人提供可参考、可选择、可继续完善的思路和方案。“信仰”由“信”和“仰”构成。“信”是“相信”，“仰”是“仰望”。没有坚定的“相信”，没有对超验的“仰望”，就没有“信仰”。那么，龙道信仰的思路和方案是什么呢？简要地说，就是——

1，相信宇宙力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究极存在，是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造化万物；宇宙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

2，相信人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具有灵魂力却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框限；相信人的灵魂力由意识、思想、理念、情志等构成。

3，相信龙是宇宙力，尤其是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的代表，是宇宙

力与灵魂力之间的中介。

4，相信在人的肉身消散之前，龙能够吸纳、承载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的束缚和框限，到更广阔的外空间去，成为宇宙力的一部分，随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5，相信龙因与中华民族关系密切而具有向善好德的特性；相信龙在吸纳、承载人的灵魂力时，以善多德隆的强健者为优先。

6，相信经过善德的习养和践行，人的灵魂力能够得到不断的强健。

7，相信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先祖，孔子、老子等先哲，肇启文明、慧福众生、德善后世，从而因具备了超强健的灵魂力而被称龙、比龙，成为龙的人间化身的楷模，并在其肉身消散之前，通过龙的中介，已永生于地球之外的空间。

8，相信龙对与善德相反的恶行有惩处的功能。

显然，对中华儿女、龙的传人而言，要“强超验”，即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实现灵魂力的永恒和不朽，就要建立、强化龙道信仰，并使灵魂力不断地得到强健；要使灵魂力不断地得到强健，就要习养和践行善德。什么是善德呢？对生活在当今地球世界、中国社会的中华族群而言，就是龙的精神底蕴“容福谐奋”和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尊爱利和”，以及是笔者提出的“龙道十不”，即——

1. 不辱中华；即有辱、有损、有害于中华民族的话和事不说、不做。
2. 不小看人；即尊重他人和自己的人格尊严、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3. 不恶父母；即孝敬父母，对父母不厌恶（wù）、不冷淡、不疏远。
4. 不懈子教；即不松懈对下一代的教育，包括校教、家教、言传身教。
5. 不起贪念；即克制、放弃、不产生分外的、过度的求多、不知足的念头。
6. 不事毒假；即不制毒、贩毒、吸毒、散毒；不造假、售假、传假。
7. 不怠工作；即对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做到最好。
8. 不说谎话；即不说虚假的、欺骗人的话，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9. 不虐动物；即不用狠毒残酷的手段对待动物。
10. 不行浪费；即珍惜、节约、合理使用生产、生活资源。

民族超验问题的完美解决，文化“抗体”的生长壮大，绝非一天两天、一人两人、一文两文所能完成。全民族的事情，需要全民族参与。我泱泱中华，悠悠

万载。赖圣贤智慧，民众勤奋，发展至今，国力日渐强盛。是的，我们的文化，历来推崇兼容并蓄，但兼容并蓄，绝不意味着被“喧宾夺主”、被“鸠占鹊巢”、被“换血灭种”、被“取而代之”！

(2017年3月14日于西安龙凤堂)



“心隔”如何打通 ——龙道信仰十六

读到一段话，觉得不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空间的分隔而是心与心的隔阂。要达到心灵相通，特别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要在沟通中形成共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只能通过密切的沟通。……应该看到，把话语视为征服他者权力资源的欧美经典理论很难引导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天下一家’的追求需要有话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我国而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核心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语言能力和学科能力为基础，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独特历史资源，充分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思想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优秀成果……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促进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沟通中形成共感。”（姜锋、李岩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光明日报》2021年6月7日）

这段话含有一个事实判断：我们中国人，与以欧美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存在着“心与心的隔阂”。那么，这个“心隔”，“隔”在何处呢？

笔者想到了多年前美国政治家希拉里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的话。

希拉里的话有“攻击”之嫌，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确实点出了中西“心隔”的关键或者说要害。

言希拉里的话不准确，是说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几千年来，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人有以儒为主，以道、佛为辅，加上民间俗信的中华传统信仰体系。

任何信仰体系都有可验、超验两个层面的内容。可验意味着可以验证，主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人与己，即人生、社会问题；超验意味着不可以验证，主要解决的是灵魂的最终归宿问题，即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与超验的

问题。在可验层面，中华传统信仰体系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奉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讲辩证、励有为等精华。在超验层面，中华传统信仰体系有“归祖”“成仙”“往生”“升天”等说词或者说方案，但这些说词或者说方案，总体上可说是儒家偏弱，道家偏玄，佛家偏空，杂而多歧、混而不一。

相比之下，以欧美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在信仰的超验层面，就相对的清楚而统一：推出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即“上帝”，似乎就把所有关乎信仰的问题都解决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拉里确实点出了中西“心隔”的要害：西方人有一神信仰，中国人没有一神信仰。或者说，在希拉里为代表的西方精英们看来，中国人在解决信仰的超验层面的问题上，是混杂的，不清晰、不统一的。

问题很清楚了。怎么解决呢？

让中国人也都信上帝吗？不可能。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了几百年，有一部分中国人也确实变成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基督徒。但，深受儒、道、佛浸润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生活习俗等等，决定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成为西方上帝的子民。

继续维持中国传统信仰在超验层面的杂而多歧、混而不一状态，可以吗？可以。千百年来，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国人没有一神信仰，不是也已经“站起来”“富起来”，而且正在“强起来”吗？

但是，如果要打通中西之间的“心隔”，让中国人的精神文明、话语体系，更具有感召力、渗透力，让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强”得令西方人心服口服，就有必要在信仰的超验层面用用心思。况且，超验问题，即就是对当代及后世的中国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需要比较好地予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人是有思维有灵魂的高级动物，而人却无一例外地都要死亡。于是，人总想知道自已死了以后，即肉体消散了以后，灵魂到哪里去。如果觉得自己的灵魂有着落，而且到达的地方很美好，人就会感到宽慰，也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或消除对死亡降临的恐惧。所以，人死后灵魂到哪里去的问题，即超验问题，便成了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国人中的崇儒者可能会说：我活着就好好活着，该干啥干啥，死了就一了百了，所谓“存，吾顺事；歿，吾宁矣”（张载《西铭》）；

崇道者可能会说：我死了就成仙呀——然古往今来，“羽化成仙”者有几人？崇佛者可能会说：我死了就“往生净土”呀——“净土”又在哪里？然而，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认同自己“龙的传人”身份的中国人，在终极关怀问题上，既不崇儒、崇道、崇佛，也不崇拜上帝，却还想死后，自己的灵魂有一个相对清楚、比较高妙的走向、去处、着落。于是，笔者就针对中国人的信仰，尤其是超验问题，将“龙道信仰”作为一个新的选择项提了出来。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即认同、信服、尊崇、秉持、践行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坚信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是正确的、美好的、普适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在超验层面，龙道信仰提出了“宇宙力”“暗物力”“灵魂力”等概念，并对龙的功能、使命做出新的揭示——

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暗物力是暗物质具备、释放的力。暗物质存在于宇宙中，是人类肉眼看不到，即使借助目前最先进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也观测不到的物质。暗物力属于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在宇宙的演化、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灵魂力是由人的灵魂，即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构成的力。灵魂力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尽管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却受着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及人的肉身的束缚和框限，是有限的力。

龙是宇宙力，尤其是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的代表，是灵魂力与宇宙力、可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人们敬畏、崇拜龙，实际上主要是在敬畏、崇拜宇宙力，尤其是敬畏、崇拜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龙的形象，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对宇宙力，尤其是对宇宙力中的暗物力赋予的一个由自然界诸多动物的身体部件和各种天象的功能形态组合起来的形象而已。人使暗物力、

宇宙力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将人的理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赋予到龙的身上，这样，龙就一身二任，成为暗物力、宇宙力与人的灵魂力之间的中介，也有了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人都有灵魂，即人都有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等，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差别只在于强与弱。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即能够引起龙关注、重视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在人的肉身消失之前，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至高境界，即解决终极问题的必要条件。

强健灵魂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信力是信仰的力量，慧力是智慧的力量，德力是道德的力量。灵魂力由信力、慧力和德力结构而成。

坚定信力就是要坚信宇宙力、灵魂力、龙的存在；坚信通过淘漉、熔炼、萃取、正当地运用慧力，修养、提升、践行德力，灵魂力就能够得到不断地强健；坚信龙能够接纳、承载、中介人的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框限，到外空间去，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正用慧力就是要对通过学习、借鉴，以及“开悟”而获得的智慧，进行淘漉、熔炼、萃取，然后正当地运用于成就自己、造福众生、文明世界的事业中。

修行德力就是要修养、提升、践行道德的力量。具体讲，就是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要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遵循“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总之，灵魂的至高境界在地球框限之外的宇宙空间，抵达的方式是通过龙的中介，使足够强健的灵魂力与宇宙力相汇合，而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则是强健灵魂力的必要途径。

如此这般，广大的生活在地球各个地方的“龙的传人”及其他人群，在解决终极关怀，即解决信仰的超验问题、使灵魂得以安妥方面，就多了一个选择项。

龙道信仰“立足中华文化”——“宇宙力”概念，与道家的“道”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宇宙力”是“道”的当代表述。龙道信仰之“尊天”“爱天”“利天”“和天”，也与道家思想相契合。“修行德力”与儒家思想相契合，龙道信仰强调的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的过程，就是“中庸”“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过程。“正用慧力”与佛家思想相契合，龙道信仰强调的，对通过学习、借鉴，以及“开悟”而获得的智慧，进行淘漉、熔炼、萃取，然后正当地运用于成就自己、造福众生、文明世界的事业中的过程，就是“成佛”的过程。

龙道信仰“容合世界文明”——“宇宙力”概念的提出，借鉴了当代天文学的成就。“宇宙力”与“上帝”在本体论，即对世界的本原、本质探讨、认知方面，有一致性。主要区别在于：“上帝”被定位成“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宇宙力”不能被定位，因而非“全知、全能、全善”。

显然，笔者提出的“龙道信仰”，如果被大多数“龙的传人”们接受、秉持，那么，中华民族就有望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具有根本性的信仰体系，就有望走出中国人信仰之超验层面的杂而多歧、混而不一的状态，就有可能使西方精英们改变以往的相关看法，进而在信仰的超验层面进行平等的中西对话，就有可能打通中西“心隔”，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信仰领域，尤其是超验层面得以构建。

(2021年6月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关于华胥氏的四个观点

关于华胥氏，笔者提出四个观点：一、华胥氏可列入“前三皇”；二、华胥氏与伏羲共同开启了中华龙文化；三、华胥氏之“华”有可能是“水花”；四、古籍中的“雷泽”有可能在陕西蓝田境内。

一. 华胥氏可列入“前三皇”

关于“三皇”，古籍有六种说法：1.《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地皇、泰皇。”2.《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纪》，《太平御览》卷七八引《春秋纬》：“天皇、地皇、人皇。”3.《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4.《白虎通义·号》：“伏羲、神农、祝融。”5.《风俗通义·皇霸》第一引《春秋纬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6.《帝王世纪》：“伏羲、神农、黄帝。”

三皇之号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外史》，原句为“掌三皇五帝之书”。这句话未说明“三皇”的具体所指。《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之语，而“泰皇”即指“人皇”。这样看来，上述六种说法，实为五种说法。

五种说法中，伏羲、神农各出现了四次；燧人、祝融、女娲、黄帝各出现了一次；天皇、地皇、泰皇（人皇）各出现了一次。

说法比较多，也比较杂。多而杂的说法依据的是神话传说。笔者根据现、当代考古发现提供的资料，将三皇系统予以梳理和归整。

三皇系统可以分为“前三皇”和“后三皇”。

“前三皇”为有巢、燧人、华胥；“后三皇”为伏羲、女娲、炎帝。

“前三皇”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至距今约一万年）相对应。旧石器时代是指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

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其时期划分一般采用三分法，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笔者以“有巢”对应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至距今约十万年）。这个时期，人类的体质进化到能人和直立人阶段，开始直立行走，使用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以采集、狩猎和捕捞维系生存，住在山洞里或以结巢的方式住在树上——“构木为巢”可以有效地防止毒蛇猛兽的偷袭。故以“有巢”相对应。

笔者以“燧人”对应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十万年至距今约三万年）。这个时期，人类的体质进化到早期智人阶段，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有所进步，使用功能开始分化，出现了各式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已相当规整。尤其是发明了摩擦取火，人们开始普遍熟食，由此促进了体质体能特别是大脑的发育。故以“燧人”相对应。

笔者以“华胥”对应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三万年至距今约一万年）。这个时期，人类的体质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出现了比较精细的石器和骨器，发明了弓箭，人们用大兽皮等修建简单的房屋，用骨针缝制衣物，还创造出了绘画、雕刻等原始艺术品。这个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由于华胥氏堪称中华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人物，故以“华胥”作为这个时期的对应。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有：距今约三万年到距今约二万八千年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距今约二万三千年至距今约一万六千年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距今约二万三千年的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距今约二万二千年至距今约一万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距今约二万年以上的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距今约二万年至距今约一万年的湖北江陵郢北鸡公山遗址；距今约一万九千年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距今约一万五千年的贵州兴义猫猫洞遗址；距今约一万年以上的河南许昌灵井遗址、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广西柳州白洞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等。

“前三皇”中的有巢、燧人，前人多有提及，将华胥列入“前三皇”是笔者的新说。之所以让华胥进入“前三皇”，除了上述“华胥氏堪称中华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人物”外，还有几条理由。先看以下有关记载：《潜夫论·五德志》：“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母曰华胥。”

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

1. 华胥是伏羲的母亲，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或者可以说，华胥氏族是伏羲氏族的母系，在伏羲氏族之前，有一个华胥氏族。华胥氏族处于燧人氏与伏羲氏之间。

2. 华胥氏族属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因为不知其父，才有履“大人迹”“巨人迹”之说。

3. 华胥氏族开始了族外婚。族外婚又称外婚制，指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禁止一定范围内血缘亲属成员间通婚的一种婚姻规则。原始人由族内血缘婚发展到族外非血缘婚，是生产力发展、人口增殖的需要，体现着社会的进步。

4. 华山方圆是华胥氏的发祥地、生息繁衍地，相传华胥陵就在华山之阳的现在的陕西蓝田县境内。学界普遍认为，中华之“华”，当与华胥氏有关。山西吉县柿子滩距华山不远，与华山一河之隔，可框在“华山方圆”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可以将考古工作者在吉县柿子滩防风崖发现的岩画人物图与华胥相联系，即这个女性人物有可能是柿子滩先民对母系氏族社会首领华胥的描绘，反映的是柿子滩先民对母系氏族首领的尊敬。

二. 华胥氏与伏羲共同开启了中华龙文化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距今约一万年。两幅古岩画在该遗址西北防风崖的“岩棚”下，用赤铁矿石的赭红色绘成。

两幅岩画，一幅为女性母亲图，一幅为鹿头鱼尾组合图。

女性母亲图可视为华胥氏的形象，鹿头鱼尾组合图因符合龙的“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概称)”规律，故可视为早期“萌龙”图。

这两幅岩画，与华胥时代相对应，说明华胥和他的儿子伏羲（或华胥氏族与其继承者伏羲氏族）共同开启了龙形象的展现和龙文化的创造。

三. 华胥氏之“华”有可能是“水花”

“华”字繁体作“華”，本义为植物开花或植物花朵。《说文·华部》：“华，荣也。”《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引申为“光彩”“光辉”“华丽”“鲜美”“精华”“繁盛”等。

对中华之“华”，可以追溯到华胥氏。古籍载华胥氏是伏羲、女娲的母亲或母族，学界普遍认为华胥氏族是崇拜花，或以花为图腾的部族。但其花是什么花呢？说法不同。

苏秉琦认为是玫瑰花，他以“华山玫瑰燕山龙”讲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7页）

陆思贤认为不光是玫瑰花，还是菊花。“华族的族徽是两种花：玫瑰花与菊花。它们在生产、生活上的意义，分别表示夏半年生长的节令与冬半年收藏的节令，起着历法的作用，应是最古的物候历。”（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0页）

何光岳认为是瓠（hù）瓜花，即葫芦花。他说，瓠瓜“普遍蔓生于土壤疏松深厚而肥沃的黄土高原。……华胥氏利用煮熟的瓠瓜为食……以瓠为图腾”。（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9页）

付永聚认为是谷子和黍子所开的花。他分析说：“华夏主要居于中原一带，较早从事定居农业，将一种野生的莠草培植为谷子和黍子，并赖以为生。谷子和黍子都能开出一种白色或黄色的小花。以植谷谋生的华夏族，对于农作物开花结果的崇拜正在情理之中。”（付永聚：《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

何新认为“日光之华”，是“中华民族母族之一的远古华族，其族名之所以称‘华’的原因”。他“推测华字是‘晔’字省文。《说文》：‘晔，日光也。’……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而日光之华，可能就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0页）

都有一定道理。

笔者认为，华胥氏之“花”，也有可能是“水花”。其理由——

第一，水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一，是生产生活的“命脉”，原始先民都是逐水草而居、近水源而聚，产生对水的崇拜是很自然的事情。华胥氏族也生活在水边，古籍中提及的“雷泽”“华胥之渚”“华胥之渊”，都是有水之地；“泽”指水中洼地；“渚”指水中的小块陆地；“渊”指回旋的水流或深水潭。

第二，水花也是“花”，其形状不但与作为植物的花相似，而且其流动、激溅时发出的声音（hua）也与花的发音一致。上述诸说，不管是玫瑰花、菊花、瓠瓜花，还是日光之华，都不能解释“花”为何发“hua”音，只有“水花”能解释这个问题。

第三，考古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多见水波纹、漩涡纹；即使被学术界认定的一些变形花纹，如苏秉琦列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玫瑰花图案，视其为水花图案也未尝不可。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华胥族是一个崇拜水，自然喜爱水花的氏族；而崇拜水必然崇拜龙，因为龙因其容合对象多为水物（鳄、鱼、鲵等动物均喜水）和水象（雷电、云、虹霓、龙卷风等与水关系密切），而成为先民心目中的水神。——这或许是华胥族与雷神族联姻的深层原因：一个崇拜水、一个崇拜雷，水神是龙，雷神也是龙，两族联姻其实是龙族或准龙族之结合。

综而述之，中华之“华”，当指“系华胥氏后裔，崇尚植物之花和水花，发祥于华山一带，且服饰华美”。

四. 古籍中的“雷泽”有可能在陕西蓝田境内

笔者前面分析过，华胥氏族所崇拜之花，有可能是“水花”；华胥氏族有可能是一个崇拜水，且以水花为图腾的氏族。而崇拜水必然崇拜龙，因为龙因其取材对象多为水物（鳄、鱼、鲵等动物均喜水）和水相（雷电、云、虹霓、龙卷风等与水关系密切），而成为先民心目中的水神。

把华胥与伏羲、与龙联系起来的关键是雷泽。

从字面上看，泽，指的是聚水的洼地，引申为多水的地区。雷泽，就是经常打雷闪电的多水的地区。从神话的角度看，雷泽则是雷神居住的地方。《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论衡·龙虚篇》：“雷龙同类”。

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容合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故雷神与龙神具有同一性，雷神就是龙神。

《帝王世纪》言华胥生伏羲“蛇身人首”。“人首”当来自作为人的华胥，“蛇身”当来自雷泽中的雷神。蛇是龙的主要的、重要的取材对象，“蛇身”即“龙身”，闪电的形状也与蛇身相似。

华胥履雷神之迹而孕，也就是履龙神之迹而孕。生下的伏羲是雷神的儿子，自然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这样，如果说伏羲是龙，就意味着说华胥是龙母；如果说伏羲是龙祖，华胥就是龙祖母。

那么，雷泽在哪里呢？

清代傅恒等《通鉴辑览》：“太昊伏羲氏帝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此载将雷泽与“华胥之渚”相等同，认为其地在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

清代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雷泽即震泽。《汉志》区具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敷，古文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此载将雷泽与“震泽”相等同，认为在吴西，即今天的江苏省太湖。

《集解》引《地理志》：“雷泽在济阴城阳县西北。”《正义》引《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有学者考证后认为，“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成阳即雷泽县，在山东省鄄城县境内，其代表地望是旧城乡。濮县旧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的范县境内，其代表地望为濮城镇。……古雷泽在濮城镇与旧城乡之间，早年被湮淤，今黄河改道后从中穿过。”（许顺湛：《说雷泽》，《中华第一龙——95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60—261页）

以上三说可称为“甘肃成纪说”“江苏太湖说”和“鲁豫交界说”。

还有“四川阆中说”“山西运城说”和“陕西蓝田说”——

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太昊纪》：“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跨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生于仇夷，长于起城。”宋代罗萍《路史·注》：“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周地图》：

“阆中水为渝水。”《遁甲开山图》：“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根据以上记载，有学者提出了雷泽的“四川阆中说”。

“山西运城说”由李侃良提出。他指出：“在历次造山运动的作用下，原先华山所在的秦岭段与北边的太行山之间，是通过中条山这一细脉连在一起的。黄河以及它的两大支流渭河与汾河共同汇聚到这里，形成了一个浩瀚的内陆湖。被冰川从华山段的秦岭深处逼出的西候度人（最初还只是猿），来到这里开始进化繁衍。一直与这一圣湖朝夕相处。到了距今万余年前，在一次新的板块活动所引发的地震中，华山与中条山之间的地震断裂带上终于出现了一条大裂沟，才使湖水奔涌下泻。这样导致的结果是，露出的湖底形成了肥沃的渭河与汾河冲积平原，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至今中条山北麓连绵百里的历史上就以盛产‘潞盐’而知名的晋南运城盆地为证。因为盐湖本身就表明了它是一个古内陆湖，是亿万年来形成的一个死海遗存。”[7]“雷泽就是华山脚下黄河臂弯处之西候度附近运城盐湖的古内陆湖——它是巨灵擘山导河之后所留下的遗迹。”（李侃良：《中华探源》，华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华阴市地方志办公室2014年印行，第59—60页、第72页）

“陕西蓝田说”由笔者提出。证据有一——

1. 蓝田华胥镇孟岩村有华胥陵。
2. 华胥镇东有华胥沟，附近山中有盆地，古有水泊，民间传为华胥之渚，即雷泽。
3. 雷泽也可能指整个蓝田盆地。从地质构造上看，“蓝田地处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属祁、吕、贺山字型前弧东翼南部的一个大型新生带断陷盆地，也是汾、渭断陷盆地的西南断”。蓝田水资源也很丰富，大小河流十多条，“其中灞河、浐河不但横贯县境，而且流域面积大，支流覆盖着山、原、岭、川各类地区”，（蓝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蓝田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第 74 页）称得上一个“泽”字了。
4. 华胥陵附近女娲氏庄（今阿氏庄），据说是华胥氏生女娲氏之地。西边白鹿原上有女娲村。北边不远，骊山上有祭祀女娲伏羲的人种（人祖）庙，有娲氏谷、女娲堡等遗迹，还有正月二十日过“补天补地节”、吃“补天饼”的习俗。

5. 据统计，蓝田县境内有古遗址一百零一处，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九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十六处。（畅林芳：《为了寻找失落的凄美——序〈神秘的华胥国〉》，见《神秘的华胥国》，曾宏根编著，西安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7页）

其中的孟家岩遗址就在华胥陵所在的华胥镇孟岩村北。从该遗址出土的石器、泥质陶、夹砂红陶和少量彩陶，可判断其为仰韶文化前期，即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800年。这说明，早在距今约七千五百年的時候，就有先民在现在的华胥镇一带居住、生活。

根据上述论据，笔者判断——

1. 传说中的雷泽即“华胥之渊”“华胥之渚”及“华胥氏之国”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陕西省蓝田县境内。
2. 伏羲（某一代）有可能生于雷泽之畔，即今天的陕西省蓝田县境内。

（2018年12月10日于西安龙凤院）





生：华胥文化的关键词

文化的定义有好多种，认同度比较高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那么，华胥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有关华胥的各种成果的总和。

华胥文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后人的研究、揭示中。

这些成果，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定位、说明的话，这个词就是：生。

一. 华胥“生”的文献举例

生，有“生出”“造出”“造生”“起动”“生育”“养育”“生命”“生活”“生存”等意。

《山道经·海内东经》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伏羲履之，生伏羲。”

《春秋世谱》载：“华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为女娲。”

上述记载说明，也可以推衍出——

1. 伏羲，以及女娲，是华胥“生”出来的。或可说：华胥氏族是伏羲氏族、

女娲氏族的母族，华胥氏族“造生”“养育”了伏羲氏族、女娲氏族。也即：没有华胥氏族的“造生”“养育”，就没有伏羲氏族、女娲氏族。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黄帝。或可说：华胥氏族“造生”“养育”了伏羲氏族、女娲氏族；伏羲氏族、女娲氏族“造生”“养育”了少典氏族；少典氏族“造生”“养育”了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华胥氏族是炎帝氏族、黄帝氏族的直系祖先。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炎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的祖族是华胥族，故可言：华胥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

2，华胥氏是在雷泽履大人迹而孕生伏羲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感生神话，探其实质，可能是华胥氏主动选择族外婚。

族外婚就是不在本氏族内通婚，而到另一个氏族选择婚配对象。相比于族内婚，族外婚符合自然选择的法则，有利于优生和繁衍，是进步的表现。

华胥氏为了生出健康、优秀的后代，主动去雷泽，找居住在雷泽，也可能是以雷电为图腾的雷族人中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大人”结合，从而“生”出了出类拔萃，后来有诸多创造和贡献，被后世尊为“三皇”之首的伏羲。

3. 雷是龙的主要的、重要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即“容合”对象，雷发出的“隆隆”声，是龙字发音之源，与雷相伴的闪电是龙形态的取材之一，故雷图腾就是龙图腾，雷神就是龙神，雷族就是龙族。

华胥氏与雷族人结合，就是与龙族人结合。华胥氏“生”下了伏羲，伏羲因雷的原因而有了“龙”的品质。《左传·昭公十七年》记伏羲“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西晋杜预认为伏羲氏“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后世称伏羲为“龙祖”。

华胥“生”了“龙祖”，是“龙祖”的母亲，故可说：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龙祖母”。

二. 华胥“生”的考古证据

华胥氏生存的年代可定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考古发现证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直有人类在蓝田盆地生存、

繁衍。

旧石器时代，蓝田有距今约一百一十万年的“公王岭人”、距今约六十五万年的“陈家窝人”、距今四十万年的“涝池河人”、距今二十万年至三十万年的“桐花沟人”、距今三万年的“冯家村人”。

新石器时代，蓝田境内，从东部的辋川、篑山、黄沟，到西边的曳湖、新街，遗址有二十多处。蓝田邻近不远，还有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沿渭河上下，还有宝鸡北首岭遗址、华县泉护村遗址，等等。

为什么先民要选择在蓝田，及蓝田方圆居住呢？适合“生”，即适合生育、生养、生活、生存、生息也。

生，需要水源，水源是“生”的命脉。蓝田有纵横交织的灞河水网，水量丰富，水质清冽甘美。——我曾提出，华胥之“华”，很可能源自“水花”，因为唯有水花能发出的与“华”发音一致的“hua hua hua”的声音。而且，与其它植物之花相比，水花和先民之“生”关系更直接、更密切，离开植物之花，短期内不至于死人；而离开了水花，即没有了水源供应，三四天人就没有了生命。

生，需要沃土，土地是“生”的根基。蓝田位于骊山南麓、河谷盆地、地势平缓、间有台塬，土层厚，土质肥。

生，需要物产，物产是“生”的营养。蓝田境内及方圆周边，河流成网，水汪鱼虾肥，土厚树木丰，地沃稼禾壮。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华胥先民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生活、生产资料。



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省吉县，有一处名为“柿子滩”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年代测定为距今一万年左右。该遗址发现有两幅岩画。其中一幅被称为“母亲崇拜图”或“女性生育图”：图的主体是一位乳房硕大突出的女性人物，表达了柿子滩先民对女性、对生育的重视和崇拜。有学者将这位母亲释作女娲，我觉得也可以释为华胥——从年代来说，释为华胥更恰当些。因为女娲所处的年代，学界一般定在距今八千年到距今六

千年。

这位可称为华胥的母亲，头顶上有若干个黑点，可能代表星空；分开的两腿下也有若干个黑点，可能表示她生育能力强，以至于子女众多。

是啊，对一个母亲而言，“生”，即生育、生养，是最重要的使命；对一个氏族而言，“生”，即生活、生存，是第一要务。《易·系辞》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对人类而言，其大德也是“生”。没有“生”，就没有人类、没有文化、没有文明。

三. 华胥“生”的文化开发

既然华胥文化的关键词是“生”，那么，华胥文化要进一步开发，就可以围绕“生”字作文章。

文化可分为物质器用、习俗仪规、精神观念三个层面。在三个层面中，精神观念位置最高，是物质器用、习俗仪规的内涵、灵魂；精神观念指导物质器用、习俗仪规，物质器用、习俗仪规体现精神观念。精神观念可通过各种载体展现于世，可以通过宣传、灌输、学习进入人们的心灵。

有关华胥的精神观念，已形成“华胥中华民族始祖母、龙祖母”的判断，已形成“华夏之根、民族脉源”的定位，以及我提出的“华胥之‘华’源于水花”、“华胥文化的关键词是‘生’”，等观点，需要继续研究、丰富、弘扬。

有关华胥的习俗仪规，已形成农历二月二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仪式，等等，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

有关华胥的物质器用，已有一些产品问世，还需要招揽人才，吸纳智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突出“生”的造型美、款式新、受大众欢迎的产品来。

愿华胥文化生机盎然、生生不息！

(2017年2月14日于西安龙凤院)

龙的传人说之根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时说：“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那么，龙的传人说有何根据和意义呢？

中华民族由起源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初起源的时候可称炎黄族团联盟，即黄帝族团与炎帝族团通过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即“容合”，构成一个比较大的以黄帝为领袖的族团联盟。这个族团联盟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为活动中心，然后滚雪球一般，向东南西北发展，在容合了东方的东夷族团和南方的苗蛮族团后，到了唐尧、虞舜做族团联盟领袖的时候，也就是大禹建立夏朝之前，基本上形成了更大的族团联盟——华夏族。华夏族依然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为活动中心，依然向东南西北发展，在容合了众多部族之后，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形成了汉族。汉族继续发展，终于在近现代，团结其他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前身，可由汉族、华夏族追溯至炎黄族团联盟。而炎黄族团联盟再朝上追溯，就要说到伏羲女娲了。

民族学意义的伏羲女娲至少有三个意指：伏羲女娲时代、伏羲女娲族团、伏羲女娲其人。伏羲女娲时代贯穿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是由采食、猎食经济向产食、养食经济过渡、转变的时代，时间断代在公元前 8000 年前后至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即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可归入伏羲女娲族团的氏族部落遍布于黄河、长江、辽河等流域。伏羲女娲其人即指伏羲女娲族团的，传承了好多代的，以伏羲女娲为名号的部落首领。我们现在所讲的伏羲女娲，既指伏羲女娲其人，也指伏羲女娲族团、伏羲女娲时代。

那么，伏羲女娲其人、伏羲女娲族团、伏羲女娲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是龙。证据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考古发现。在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即属于伏羲女娲时代的考古发现中，龙的岩画、摆砌、陶绘等已有若干件，如发现于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8000 年前后，即距今约一万年的“萌龙”岩画；如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前后，即距今约八千年的“原龙”石块摆砌；如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即距今约七千年的“原龙”陶纹；如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4500 年前后，即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原龙”蚌壳摆砌；如出土于湖北黄梅焦墩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4000 前后，即距今约六千年“原龙”河卵石摆砌。

二是文献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邾子语：“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孔颖达疏：“大皞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大皞、太皞、太昊，都是伏羲的名号。《三皇本纪》言伏羲降生之时，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三坟》称伏羲任命“飞龙氏造六书”“潜龙氏做甲历”“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降龙氏倡率万民”。

三是民间传说。《帝王世纪》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庖牺。”庖牺即伏羲。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民间还有“伏羲龙颜”“伏羲龙身”“伏羲龙祖”“伏羲首创龙图腾”等说法。

龙是伏羲女娲其人、伏羲女娲族团、伏羲女娲时代的主要标志，而伏羲女娲其人、伏羲女娲族团，是炎帝黄帝其人、炎黄族团联盟的直系祖先，断代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至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即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至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炎黄时代是伏羲女娲时代的直接承继。

那么，炎帝黄帝其人、炎黄族团联盟、炎黄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

依然是龙。证据也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考古发现。在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属于炎黄时代的考古发现中，龙的玉雕、陶绘等已有几十件，如，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3300 年前后，即距今约五千三百年龙形玉雕；出土于甘肃甘谷西坪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即距今五千多年的龙纹陶绘；出土于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等地，断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即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龙形玉雕；出土于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2300 年，即距今近四千五百年的龙纹陶盘。

二是文献记载。如，《潜夫论·五德志》：“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淮南子·冥览训》：“黄帝治天下……青龙进驾。”《史记·孝武本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迎黄帝。”《今本竹书纪年》：“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三是民间传说。相传炎帝出生时曾在九龙泉沐浴，去世后曾变作赤龙升天；亦传说“黄帝龙颜”“自以为云师，有龙形”“黄帝乘龙升天”等。

显然，龙是伏羲女娲族团、炎黄族团联盟形成和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标志者，而伏羲女娲族团、炎黄族团联盟是中华民族主体华夏族的前身，故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参与者、见证者、标志者。

中华民族的起源离不开中华人文先祖的卓越贡献，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华人文先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中华人文先祖与龙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比龙、称龙，认为他们秉赋、体现、践行、弘扬着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人文先祖的精神与龙的精神同一。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是中华人文先祖的后裔，人文先祖是龙，后裔自然是龙的传人。

作为概念，即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汇，“龙的传人”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中国台湾籍音乐家侯德健通过歌曲《龙的传人》首唱出来后迅速传播，从而被海内外华人广泛使用的。但作为观念，“龙的传人”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就已经在其时人们的认知中形成，证据是汉代画像石上出现有伏羲女娲的人身龙尾像。伏羲女娲是祖先，龙是神物，将祖先与龙结合，意味着龙已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族的祖先崇拜，也就是说，至晚在汉代，华夏族已认为本民族与龙关系密切，华夏族的传人就是龙的传人。

需要指出的是，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即后世汉族崇拜的对象，也是汉族之外众多少数民族崇拜的对象。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有五十六个成员。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以龙为标志毋庸置疑。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崇龙、敬龙者有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瑶、白、哈尼、黎、傣、畲、傈僳、仡佬、拉祜、佤、水、纳西、羌、仫佬、景颇、布朗、毛南、普米、阿昌、怒、京、基诺、德昂、门巴、独龙、珞巴、蒙古、藏、朝鲜、锡伯、满、土、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回等四十二个民族，其他十三个少数民族从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那一天起，

就程度不同地对龙文化持理解、尊重、欣赏的态度，对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持肯定、认同、弘扬的态度。随着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各少数民族也都团聚在了龙的旗帜之下，成为中华巨龙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龙的传人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将龙的中华民族文化标志的身份凸显于世。

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图像徽帜。民族文化标志的形成有不同的途径，形成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一旦形成，就具有意象性、恒久性和不可变更性。中华民族创造和选择龙作为文化标志，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它凝结、寄托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其产生时间之久远，认同人数之众多，都是世界其他民族不可比肩的。

龙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标志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三——

1. 标志身份。它使中华民族不至于与其他民族相混同。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世界实现了大同，人类不再有民族之分，龙作为中华民族标志的作用随之消亡，但那毕竟太遥远，生活在 21 世纪的各民族，还都需要标志，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同时，它也提醒中华民族成员，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不说有辱、有损、有害民族形象的话，不做有辱、有损、有害民族形象的事。

2. 凝聚华族。龙标志像一面大旗，能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招揽、汇聚、团结在大旗之下。龙标志的凝聚作用在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及抵抗外侮方面意义重大。

3. 激励前行。龙标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有“意”之“象”，人们见象思意、会意，从而对认知、传播中华文明，焕发、弘扬中华精神形成良性推动。

(刊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北美时报》、《中国小康》2017 年第 12 期)



炎帝与龙文化

炎帝是中国古代炎黄部落联盟的一位杰出首领，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众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炎帝与龙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

一. 古籍中的载述

1.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条记载告诉我们以下信息：第一，炎帝的母亲叫有蟜氏，或炎帝的母亲出自有蟜氏族。蟜，音 jiao，《说文》释为“虫”，《玉篇》释为“毒虫”。“虫”在古代首先指的是蛇，尤其是毒蛇，而蛇、毒蛇，是龙的主要容合对象。之外，蟜还有释为“虹霓”“蚕”“蜂”，蜂似乎远一些，而虹霓和蚕，也都是龙的容合对象。第二，炎帝和黄帝具有同祖同宗的血缘关系。那么，如果说黄

帝是龙，也就等于说炎帝也是龙，反之亦然。说黄帝是龙的载述已有不少，如“黄帝龙颜”（《论衡·骨相》）、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列仙传》）、黄帝“日角龙颜”（《路史》）等。第三，炎帝和黄帝都是以“水成”，而喜水，正是龙的基本神性之一；龙的主要容合对象，如蛇、鳄、鱼、雷电、虹霓、龙卷风等，都与水关系密切。

2. 《潜夫论·五德志》：“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wei）。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路史·后记》“炎帝……龙颜而大唇”。这三条记述，告诉我们三条信息：第一，炎帝是其母亲感应了神龙首后生下的，据此，可以判断炎帝是一个“龙种”，或“准龙种”。第二，炎帝的形象是人身牛首，而牛也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一些龙的角，就多取材于牛头。苗族同胞就绘制并崇拜牛龙、牛角龙——相传炎帝被黄帝打败后，退守南方，跟随他的苗民也跋山涉水最后落脚于西南山区；或说是炎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农神”“谷神”，最后成了管辖南方的天帝，被本是当地土著的苗民认做了自己的始祖。第三，炎帝长着一副龙的容颜。

3.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被认为是炎帝的后裔。后代与龙的关系如此密切，可溯见其祖先与龙的关系亦非同寻常。

二. 民间传说的描绘

一类是直接说炎帝是龙子、龙。

1. 炎帝的母亲女登在宝鸡天台山游玩时，一条巨龙腾飞而下，直向女登扑来。于是有孕，生下一个人体龙颜、头上长龙角的男孩，于是取名“神龙”。

2. 炎帝的母亲安登（女登的别名），在山上牧羊，困睡在一个龙洞口。七龙子归来后发现，将其抱入洞中，放在龙床上，与其亲热。第二年生下一个肉球，从中蹦出一个男孩，是为炎帝。

3. 炎帝误尝断肠草去世后，人们先是把他放入九龙泉让大家瞻仰，然后堆起柴草将其火化。熊熊火焰中炎帝作一条赤龙飞上天空，接着，还将自己的胡须

拔下，落地而成龙须草。

一类是说炎帝与龙有密切关系。

1. 炎帝快降生的时候，其住地附近的九口井自动相互流通，从一口井中汲水，另外八口井中的水也会随着波动；天上也出现了九条龙，一直在他家屋顶上空盘旋着不走。炎帝出生后，其母亲女登曾在陕西宝鸡姜水东岸的九龙泉为炎帝洗澡，洗完澡后又骑上一条青龙，飞到蒙峪石洞隐居。其泉也因炎帝的出生和光临而显现出九条小龙。或言，炎帝生下来牛头人身或蛇身，十分丑陋，被弃于草丛之中。这时草丛中出现九条小龙，口喷温泉，形成一潭清水，为炎帝进行沐浴。

2. 炎帝三岁时就拜见龙王，要求龙王施雨要均匀，龙王们都听他的话。到他老死的时候，各处的龙王都争抢着要把炎帝的遗体葬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最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的龙如愿以偿，并在炎陵山下洣水河边留下了龙脑石、龙爪石等遗迹。

3. 炎帝的妻子是龙女。两说，一说是炎帝驾驭六螭悬车，监视着太阳赶路。途中休息，在一棵蟠桃树下发现一位弹着玉琴的美女，于是一见钟情，结为百年之好，而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是龙女。另说龙女主动来到炎帝家，为其做饭洗衣，炎帝发现后藏其龙壳，使其不能回去，遂成为炎帝之妻。后来，龙女还向其父老龙托梦，给炎帝送来了由龙吐之气凝结成的宝药——冰片，让炎帝为百姓疗疾。

4. 炎帝的母亲女登带着炎帝上山找东西吃，为了行动方便，她常将睡着了的炎帝放在一块能晒到太阳的草地上。炎帝醒后不见母亲，哇哇大哭。其声有时像小鹿叫，有时像小鹰啼。于是，就有白鹿跑来，以其奶水饲喂炎帝；就有山鹰飞来，展开翅膀为炎帝搭凉遮阴。——这则传说，意在说明炎帝的神异不凡。而鹿和鹰，也都是龙的容合对象。

5. 在虫灾为患的时节，炎帝将自己的龙头拐杖化为一条火龙，或教人用稻草扎成龙形，龙身插满用艾叶制成的燃烧物，夜间沿田埂起舞，其他人则呐喊助威，意在“诱杀成虫，吓破虫卵”。炎陵一带有舞“火星龙”的习俗，即源于此。——这则传说，意在说明炎帝有司龙之职、用龙之能，而且说明龙高于虫，且有显灵、征瑞、示威的神性。

6. 湖北随州有神农架山，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搭架采药，故名。而此山自古又有“神龙架”“神龙山”之称。由此可见，在老百姓心目中，“神农”与“神

龙”具有同一性。又相传，炎帝曾在神农架黑龙洞斩杀了一条毒妖化成的孽龙。神农氏把龙骨肉碾碎化为鱼籽，冬天放在地下河养育，春荒时节，成千上万的鱼籽已长成成千上万尾小鱼，小鱼游出洞来为百姓解荒。至于鱼虱，那是毒龙心肝碎片所化，神农氏让其以毒攻毒，为百姓治病。——这则传说，意在说明炎帝以净化龙族为己任，并能够化恶为善、变害为利。

其他相关的传说还有：炎帝养了一条龙犬，这条龙犬帮助炎帝盗来了谷种；炎帝常年奔波，破烂的衣片落地变成了地衣，人称“老龙衣”；炎帝帮助善良的黑蛇打败凶恶的白蛇、修炼成真龙；炎帝死后葬入水底龙宫，等等。



三. 学者们的考证

1. 何光岳先生考证：炎帝和黄帝都是华胥氏及伏羲氏的后代。（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在古代神话中，伏羲氏被认为是其母华胥氏感应雷神或虹神而孕生的，可说是雷神或虹神的儿子，因雷电和虹都是龙的容合对象，故雷神和虹神都是龙神，那么伏羲氏就是龙神之子，是“龙种”；而且，古有人说他生就一副“龙相”，所谓伏羲“龙

颜”（《春秋元命苞》），又称其“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潜夫论·五帝德》）“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宫。”（《帝王世纪》）。祖先是龙，一脉相承，其后代自然也是龙。

2. 葛文华先生考证：炎帝之炎不是两火相叠，而是两鱼相随的形象，反映的是一种原始的“鱼从”观念。（葛文华：《再论炎帝名号的原始意义》，宝鸡市社科联：《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2 页）而喜水的鱼，正是龙的主要的容合对象。

四. 考古发现提供的佐证

炎帝生存的年代大约距今五千年以上，而考古发现的距今五千以上的龙已有多件。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近七千年的彩陶龙、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八百年的陶纹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年蚌砌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距今近六千年的河卵石摆砌龙。五千年左右的龙亦有多件，如甘肃甘谷西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五百年的彩陶龙、内蒙古翁牛特旗赛 i ny 塔拉村出土的距今五千以上的玉雕龙、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五千年的白玉龙，等等。

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第一，龙崇拜是先于炎帝出现的，在炎帝做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原始先民的龙崇拜已经有很长时间，而且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这些“原龙”，分别分布于各个区域类型文化圈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既然在炎帝之前，龙崇拜已相当普遍，那么炎帝将龙作为崇拜、运用、比附、象征的对象就成了很有可能的事。

五. 文化精神的同一

我们把文化事象所蕴含、体现的主要意义、基本理念称为“精神”，那么，龙的精神，就可以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四个词八个字来概括。

1. 容合

炎帝文化是容合的。古籍提供的资料表明，容合在“炎帝”这面大旗下的，至少有神农氏、魁隗氏、烈山氏、大庭氏、氐羌氏、无怀氏、共工氏、夙沙氏、奔水氏、蚩尤氏等氏族；而“炎帝”作为一种因袭的法统和传承的名号，也先后“容合”了八世，所谓“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或十七世，所谓“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吕氏春秋·慎势览》）。目前学术界倾向于八世说，也大都认同何光岳先生的考证。八世炎帝依次为：帝神农、帝临、帝承、帝魁、帝明、帝直、帝厘、帝居。按这样的谱系，出生、活动并葬于陕西宝鸡的是第一世炎帝神农，出生、活动于湖北随州的是第二世炎帝临（或帝柱）、第三世炎帝承（或其后裔），活动并葬于湖南酃县（今改炎陵县）的是第八世炎帝榆罔。（何光岳：《炎帝八世考》，宝鸡市社科联：《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7页）

炎帝族后来又同轩辕氏黄帝族团相容合，共同构成炎黄部落联盟，即华夏族团的主体——汉民族；汉族之外，中国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根据台湾学者姜竹的考证，五十六个民族中，有汉、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瑶、白、哈尼、黎、傣、畲、傈僳、仡佬、拉祜、佤、水、纳西、羌、么佬、景颇、布朗、毛南、普米、阿昌、怒、京、基诺、德昂、门巴、独龙、珞巴三十三个民族出自炎帝世系，占59.2%强。（姜竹：《炎帝与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之渊源》，宝鸡炎帝研究会：《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显然，容合意味着凝聚，意味着合力，意味着团结，意味着多样统一。

2. 福生

炎帝是“福生”的典范。他带领民众耕田辟土，播种百谷，发展生产，“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绎史》卷四引《周书》），是为农业神。他为了“和药济人”，解除人间疾苦，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篇》），“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搜神记》卷一），是为医药之神。炎帝的事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事业。他“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越绝书》）。据此，我们可以说，炎帝是人格化的、“以民为本”的福龙和善龙。

3. 谐天

炎帝之“炎”，不管是“两火相叠”，还是“两鱼相随”，都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敬重和崇拜。古籍、民间传说和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表明，炎帝族是崇拜太阳和火的族团，他“以火德王”“为火师而火名”（《帝王世纪》），据此，我们可以说，炎帝是一位人格化的以善于用火、以传播光明为己任的“火龙”。又有记述和考证称炎帝“以水成”（《国语·晋语》），其后裔“有的以鱼为氏，有的以鱼命国”（葛文华：《从鱼图腾到对龙的崇拜——炎帝与中华民族》，宝鸡炎帝研究会：《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据此，我们也可以说，炎帝是一位人格化的借力于河泽的“水龙”。

古籍载炎帝“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腊祭，以报天地”（《三皇补》）。有一篇腊祭辞相传是炎帝使用过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古诗十九首》）又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淮南子·主术训》）；还记其“削桐为琴，练丝为弦”（《路史》），作“下谋”（《竹书纪年》）、“扶犁”（《孝经援神契》）之乐，“以通神明之法，合天地之和焉”（桓谭《新论》）。可见，炎帝是一位深知“谐天”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的远古贤王。

4. 奋进

炎帝的身上，充盈和洋溢着奋进的精神。他带领部族，多次、多处迁徙，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开辟新的生活基地，拓展新的生命空间。他是农业的肇始者，所谓“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白虎通义》）；是医药业的发明者，他“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成为名副其实的“医药鼻祖”；是工具制造业的推进者或发明者，所谓“耕而作陶”（《太平御览》），“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使“耒耨之利，以利天下”（《周易·系辞下》）；他还是畜牧业、纺织业、原始贸易、原始音乐和劳动分工制度的创立者，所谓“拘兽以为畜”“治麻捆布”以为衣裳（《淮南子·本经训》），“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神农作琴”“神农作瑟”（《世本·帝系》），“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等等。为了开拓和创造，炎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尽瘁，无私无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龙的精神和炎帝的精神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龙



的精神，也就是炎帝的精神；炎帝的精神，也就是龙的精神。龙之所以会被炎帝族团选择，作为象征、比附、崇拜的对象，或言炎帝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的“龙祖”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显然，继承和发扬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团结凝聚、繁荣富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六. 史实炎帝与人文炎帝

曾有少数学者怀疑炎帝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炎帝是实有其人的。其主要根据是《左传》《国语》这两本史料价值很高的典籍里有关于炎帝的论述，而经过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学科的综合考察，证明这些论述是信而有证的。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人文炎帝”的概念。人文炎帝可以包括史实炎帝，史实炎帝是人文炎帝的生发点和基础，但不能代替人文炎帝。神话炎帝、传说炎帝、象征炎帝、符号炎帝、精神炎帝等等，都可归于人文炎帝的范畴。我们谈龙与炎帝的关系，显然也属于人文炎帝的范畴。史实炎帝无可怀疑，而我们更需要人文炎帝，它是华夏儿女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精神圣殿，是龙的传人世世代代都要高高举起的一面大旗。

（刊于《唐都学刊》2006年第7期）

舜与龙

舜与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谈。

一. 龙族领袖

舜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是黄帝的七世孙。按古籍所言，炎黄族的先祖伏羲“龟齿龙唇”（《拾遗记》）“龙身牛首”（《春秋合诚图》）“鼻龙伏”（《白虎通》）“受龙图，画八卦”（《宋书·符瑞志》）“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帝王世纪》）；女娲人面蛇身或龙身——《山海经·大荒西经》注言女娲“人面蛇身”，因蛇为龙的重要取材对象之一，蛇是将自己的弯长的身躯贡献给了龙的，因而说女娲“蛇身”，也就等于说女娲“龙身”；炎帝是其母女登“感神龙”而生的（《史记·三皇本纪》司马贞补），属于“龙子”无疑；黄帝更是具“龙颜”（《论衡·骨相》），有“龙形”（《列仙传》），“黄龙体”（《史记·天官书》）。因而，炎黄部落显然是以龙为象征、为图徽、为标志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龙族”。

一脉相承，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帝自然而然地成为龙族的领袖——祖先
是龙，后代又怎能不是龙呢？

舜为龙族领袖还有几个比较切近的佐证。一是他的前任尧，被认为是赤龙之
子——《诗纬含神雾》：“庆都与赤龙合婚，生赤帝伊祁，尧也。”二是他的接班
人禹，被认为是一条“虬龙”；而他自己，则是其母“见大虹，意感而生”，一生
下来便“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宋书·符瑞志》）或“龙颜重瞳大口”
（《孝经援神契》）。虹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舜母生下龙子当在情理之中。

传说中的舜还曾化游龙逃生：其父鼓叟同舜的异母弟象密谋，让舜去淘井，
然后断绳填石，予以加害。舜穿着娥皇和女英为他准备的“龙工”衣，危机关头，
化作一条鳞甲闪闪的游龙，钻入黄泉，然后从另外一眼井里钻了出来。

相传舜去世之后，老百姓感念他，便刻了一块重三千斤的龙碑。有两头大象，在一群白鹤的带领下，用长鼻子将石碑带到湖南九嶷山舜源峰，一座形状像龙，龙角龙眼龙须龙牙俱全，山下还有两眼龙泉的大石岩下安放。

二. 秉赋龙德

作为龙族的首领，舜的身上秉赋着龙德。龙德有多项内容，我们这里只谈两种。

一曰自强不息。

《易经》第一卦《乾卦》是一个著名的“龙卦”，其爻辞以龙为喻，从“初九，潜龙勿用”，经“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和“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以及“上九，亢龙有悔”，演述了一个“君子”步步上升的成长经历，透示着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大传·象传》）的品德，不怕苦难、愈磨愈艰、力戒自满、奋斗不已等等，都是这种品德的体现。

舜幼时即失亲娘，其父鼓叟续娶生子名象，鼓叟同继母爱象嫌舜，对舜百般虐待，还数次欲致舜于死地而后快。身处如此艰险的家庭环境，舜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他似乎什么苦都吃得，什么气都受得，甚至将吃苦受气作为自强的动力。后来，他又“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墨子·尚贤下》），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克勤克奋、自省自励，尽全力把事情做到最好。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易大传·象传》的话改几个字来说：“天行健，虞舜自强不息。”

二曰造福众生。

造福众生，是龙的一个重要品德。龙既能兴云布雨，司水理水，使田园润泽，五谷丰成，又能给人们带来福惠连绵的吉祥和嘉瑞。

这样的品德，在舜的身上有突出的表现。

舜在做氏族酋长的时候就克己奉公，受到百姓拥戴，后来被四岳推荐，成为尧的接班人。继位后，他不但举贤用能，使禹平水土，契管民生，益掌山泽，等等，自己更是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勤政爱民，鞠躬尽瘁。

九疑山舜陵前有一条母河，河左岸的杜鹃花全开红花，河右岸的杜鹃花全开白花。为什么会这样呢？民间相传舜帝当年南巡来到这里，听一位双目失明的老阿妈诉说自己的六个女儿如何被酋长看中，女儿们宁死不从，歹毒的酋长如何把她们一个一个地喂了老虎，后来又如何化作六座山峰的悲惨遭遇时，不禁泪如雨下，滴在杜鹃花上，使花朵全变成了白色。

访贫问苦之后，舜帝在这里住了下来，他设计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坏酋长，射杀了为害一方的毒蛇猛兽，精心地教山民耕作，三年时间，使这里的山水面貌一新，百姓安居乐业。而他自己，却因劳累过度患病，又中了瘴疠之毒，死在了苍梧。

九疑山有二奇，一奇是女英峰上遍野的斑竹，一奇是舜源峰上高耸云天的两株石枞。这石枞一丛九叶，一叶三棱，笑傲霜雪，长青不凋。民间相传这是舜的功德所至——不仅福佑民生，而且泽及草木。

由此可见，舜的一生，是善龙造福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从而是伟大的一生，辉煌的一生。

三. 斩除恶龙

万物莫不有对。有善龙、祥龙，就有恶龙、孽龙；善龙、祥龙是龙族的主流、正宗、中坚，代表着龙族发展的方向；恶龙、孽龙是龙族的支流、邪脉、副产品，是龙族前进的反衬和反动。

舜是龙族的领袖，是一条善龙、祥龙，那么，有没有和他做对的恶龙、孽龙呢？有的。这恶龙、孽龙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腐化堕落、祸害黎民、恶行昭彰的酋长、头人，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强娶不成，便将六姐妹喂了老虎的那个苍梧酋长。另一方面是自然界中的毒蛇猛兽。龙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猪、鹿、熊、牛等动物，和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泥石流等天象的“模糊集合”，这些动物和天象，有平和、驯顺，让人喜爱，为人效力的一面，也有凶恶、狞厉，让人畏惧，为害一方的一面，这后一面的集中，就是恶龙了。

民间相传九疑山有一座九龙岩，九龙岩下有九口潭，九口潭里盘踞着九条恶龙。这九条恶龙经常到潇水河和湘江戏水作乐，使洪水暴涨，冲毁两岸田园房屋，

老百姓叫苦连天。关心百姓疾苦的舜帝闻讯寝食不安，决心为民除害。经过艰苦卓绝的跋涉和搏斗，舜帝终于用三齿鱼叉刺死了九条恶龙。后来，那三齿鱼叉便化作三峰石，一直耸立到今天。

恶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邪恶势力的代表和象征，不除无以使天下治、社会清、龙族纯、大道行。

舜帝是斩除恶龙的英雄。

四. 龙功凤泪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中，龙凤是同步起源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陕西宝鸡北首岭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彩陶瓶，瓶上刻绘有距今达七千年的龙凤纹，显示着早期的龙凤对应、沟通、配合的信息。此后，龙崇拜不断丰富，不断升华，有了象征帝王君主的神性，凤也就相应地开始象征帝后妃嫔了。

龙有龙德，凤有凤仪。善龙、祥龙是龙族精英，美凤、贤凤是凤族佼佼。

一般来讲，善龙、祥龙身边，总有美凤、贤凤相配，所谓龙飞凤舞、龙凤呈祥。娥皇和女英就是相伴、相配于舜的两只美丽、贤惠的凤凰。她们为舜织绣龙工衣，让龙在鼓叟加害的危难时刻，能够顺利地化作游龙逃走。舜继位后，她们又齐心协力辅佐丈夫治理天下，做了许多好事情。舜巡赴南方，久盼不归，她们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千里寻夫。得知丈夫累病而死的噩耗，姐妹俩泪如泉涌，哭绝于地。泪珠洒落在丛丛山竹上，那竹竿上便泪痕斑斑……

这真是：九疑山上起龙冢，竹斑尽是凤凰泪！

（2000年8月作于西安慧雨庐；在2000年9月上旬于湖南省宁远县举行的“首届中国舜文化研讨会”上宣讲；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文化可以容合易文化

易指的是《易经》。传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之序列，因《连山易》《归藏易》亡佚不存，故易一般专指《周易》，即成书于周代的《易经》。易的含义还有“简易”“变易”“不易”之分，以“变易”为基本。所谓“变易”，原义指以揲蓍数目之变来推断事物之变，引申为改变、变化。那么，易文化就指的是《周易》一书所展示的，以及围绕着《周易》所形成的，以探索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的文化。

在简要地指出了什么是易文化之后，笔者提出本文的核心观点：龙文化可以容合易文化之精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下述理由——

一. 龙文化早于易文化，为易文化提供取象参照

龙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易文化若从伏羲创卦起算，距今在六千年左右；若从文王演易起算，距今不过三千多年。这说明，龙文化早于易文化。正因为龙文化早于易文化，故可能为易文化的创立提供取象参照。

这样的提供至少可以有两项说明：一是龙容阴阳众物象于一体；二是龙态变化成为卦象演化的喻体。

龙的容合对象，蛇、鳄、蜥、鲵等，生活在阴潮多水之地，可谓“阴气”很重；而鹿、虎、牛、马等，生活在山野原林，“阳气”旺盛。龙的形成，是阴与阳的结合。龙的形象也多有反映阴阳对应、交合者，对应如“双龙”“对龙”“雌雄龙”；交合如“交尾龙”“交缠龙”“同体龙”等。龙容合了生活于天地间的众物，如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也容合了存在于天地间的众象，如天上的雷电云、虹，地上的山原河流，天地间的龙卷风等。

而易呢？也是容阴阳众物象于一体。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其“两仪”，指的就是“阴阳”，即自然界中两两对立、对应又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现象；而其“八卦”，则是指由阳爻（一）和阴爻（--）搭配、组合成的八种符号，而这八种符号又分别代表着自然界中的八种物象，即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泽。

那么，从产生的先后顺序看，易的“容阴阳众物象于一体”是有可能以龙的“容阴阳众物象于一体”为参照的。

至于龙态变化成为卦象演化的喻体，则集中表现在《周易·乾》的爻辞上，所谓“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等。这是以龙态喻卦象，从而说明人事变化之吉凶。

二．龙文化对易文化的创立者以深刻影响

按通常的说法，易文化有两位重要的创立者：伏羲氏和周文王。

伏羲氏也称包牺氏。《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是说伏羲氏创立了八卦。

伏羲氏与龙关系密切。《帝王世纪》载：“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庖牺。”《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庖牺、宓羲均为伏羲的异名。于是可以这样推理：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容合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自然就是“龙”了。

《拾遗记》是另一种说法：“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由于虹也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其形状如龙，且两端常垂江河，民间谓之“龙吸水”。据此可断虹的后人即是龙的后人，龙的后人是“龙”无疑。

伏羲还生就一副“龙相”。《拾遗记》称其“长头修目，龟齿龙唇”；《春秋元命苞》称其“龙颜”；《春秋合诚图》言其“龙身牛首”、“龙唇龟齿”；《白虎通》说伏羲“鼻龙状”；《玄中记》直言“伏羲龙身”。

另有说伏羲为“蛇身”的，如《列子·黄帝篇》：“庖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帝王世纪》：“庖羲氏……蛇身人首。”蛇是龙的主要容合对象，龙的身躯多取材于蛇。因而，蛇身也就是龙身。

《三皇本纪》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此说来自《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话：“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及杜预注：“有龙瑞，故以龙命官”。伏羲怎样“以龙纪官”呢？孔颖达为郯子的话作疏曰：“太昊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三坟》则称伏羲任命“飞龙氏造六书”、“潜龙氏做甲历”、“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降龙氏倡率万民”。

而伏羲氏画卦之举，也被认为与龙有关。所谓伏羲“受龙图，画八卦”（《宋书符瑞志》）；“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参照此图，“以画八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关于“龙马”，一说是具有龙性之马；一说是马头龙身，即既像龙又像马，龙马合体：不管怎么说，都与龙发生了关系。

以上种种，尽管只能多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还不能做出完全的史实性的判断，但足以说明，易文化的创立者伏羲氏，是深受龙文化影响的。

周文王是商末周族首领。学术界大都认同《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说法：“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安书》），即认为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是由周文王完成的。

周文王崇龙吗？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据《国语·周语上》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窶因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知周族先人曾在夏朝作官，周文化有夏文化的渊源（也有周族是夏族之一支的说法）。夏文化是崇龙文化。夏的立国者禹有“虬龙”之称，闻一多先生曾从“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归藏·启噬》）的神话中，推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是夏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闻一多全集》第1卷《龙凤》，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考古发现也提供着证明: 与夏的存世的时间大体吻合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 出土有龙形文物多件。其中的绿松石龙出土于该遗址宫殿区属于第一等级的贵族墓中, 说明此龙与夏代贵族关系密切, 象征着身份、地位的高贵, 也说明其时龙崇拜已渗入到统治阶层的观念之中。周族先人受夏代崇龙文化熏陶, 其后裔自然崇龙。

其次, 周人是崇龙的。《周颂·载见》载周王室活动中, “龙旂阳阳, 和铃央央”。《仪礼·觐礼》载诸侯朝见周天子时, “乘墨车, 载龙旂”; 而周天子则“乘龙”车, “载大旂, 象日、月、升龙、降龙”。不仅是旗帜, 龙纹还出现在周代统治者的衣服上。《礼记·礼器》载: “礼有以文为贵者, 天子龙衮。”龙衮就是画有卷龙纹的衣服, 所谓“衮, 卷也, 画卷龙于衣也”(《释名·释首饰》)。也不光是文献, 考古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上, 也多有龙纹, 如夔龙纹鼎、夔龙纹簋、龙纹玉璜、龙纹玉璧等。这些都说明龙在周代是受到尊崇的, 甚至已成为王权的象征。

周文王崇龙, 周文王的子孙及其统治集团都崇龙, 那么, 由周文王创立, 由其后代, 或以其后代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们所完成的《周易》, 要说其不受龙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鉴于上述原因, 笔者对如下阐释就持理解和认可的态度了: 周文王做殷商的诸侯西伯时, 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 那时候的文王堪称“潜龙勿用”。后来被赎出, 返回西周, 积德累善, 招贤纳良, 使天下归心, 可谓“见龙在田”。文王死后, 武王继位, 积极备战, 堪称“或跃在渊”。牧野一战, 武王终于灭商而登天子之位, 于是, 便“飞龙在天”了。

三. 龙文化的特质使其对易文化精华的容合没有障碍

首先, 龙文化具有“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特质。容合的特质使龙文化成为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系统, 其襟怀宏阔, 功能强大, 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文明成果, 龙文化都可以容而合之。就中华文化而言, 龙文化既可以容合儒文化精华、道文化精华、佛文化精华, 当然也可以容合易文化精华。

其次，龙文化具有“善变”的特质。所谓“善变”，即善于变化、长于变化，以积极的态度应变、求变、行变。易的基本义是变易，即改变、变化。易文化的精华体现在以考察阴阳变化为基础，进而考察世间众多事象的发展变化，探求其内在规律，力图给人们趋吉避凶、纳福禳祸以提醒和指导上，而《周易》正是这样的一部书。

龙之变有两种情形：一是因时空环境变而变，此变以客观因素为诱导，可谓与时俱进，时变我变；二是积极求变导致环境变，此变以主观努力为主因，可谓开拓创新，积极行变。易之变也符合这两种情形，所谓“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

第三，龙文化具有“谐天”的特质。所谓“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自然生态，按自然规律办事。易文化也是谐天的产物。八卦的产生，是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的结果；八卦所代表的天、地、水、火、雷、山、风、泽八种物象，无一不是自然之象。人们利用《周易》搞预测，其众多的参据、变数，绝大部分由自然界展示和提供。而预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追求“谐”的过程。

第四，龙文化具有“福生”的特质。“福生”就是造福众生。伏羲氏、周文王为什么要创卦、演易，其根本目的就是福生，即所谓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后世的人们，之所以要利用《周易》搞预测，其根本目的，依然是福生。

上述特质，使龙文化对易文化精华的容合没有障碍。

（2009年9月9日在“第21届国际易学大会暨第2届全球易文化大会”上宣讲；2012年12月5日修改定稿于西安慧雨庐）

龙的神性

龙的神性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

一、喜水

在龙的诸多品性中，喜水可以排在第一。为什么呢？因为，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容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鳄、鱼、鲵等常年生活在水中；蛇、蜥蜴等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鹿、熊、牛、马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和水关系密切——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能不喜水呢？

龙的喜水的品性，在龙的容合之初就为古人所认知、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画的鱼纹、鲵纹、蛙纹、水纹、旋涡纹、波浪纹是很多的，这些弯转盘旋的纹，似乎就有龙的影子。古籍文献上也都言之凿凿：《左传·昭二十九年》称龙为“水物”；《周易·疏》言“龙是水畜”；《管子·水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管子·形势解》：“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水经注·夷水》记丹水下有深渊，“渊有神龙”。就连诗人陆游也不禁吟诵道：“环漱巨木老不花，渊沦千尺龙所家”。（《剑南诗稿·龙湫歌》）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这是歌曲《大中国》中的歌词。两句歌词说明了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把长江黄河比作龙。当然，不仅是长江黄河，在中国境内，任何一条江河，甚至任何一道溪流，以及任何一处湖、潭、池、泉、井，都可以或比龙、称龙，或藏龙、见龙：可谓有水就有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因为龙有喜水的品性，有司水的天职；龙与水的关系，是象征和被象

征、喻体和主体的关系。



中国比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几千年来都是以农立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民以食为天”，“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用官方语言来讲，就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农不稳”。风调雨顺，谷物有成，老百姓能填饱肚子，国家的安定系数就大一些。反之，大旱或大涝，谷物减产乃至绝收，老百姓忍饥号寒，颠沛流离，国家就往往陷入动乱。水是农业的命脉，无水便无农；而龙则是水之神，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崇龙”实际上是“敬水”，“龙神”很大成分上是“农神”，即农业之神。

有关龙的民俗，几乎都与水相关。

如遍布全国各地的舞龙，其最基本的意蕴之一便是“祈雨”。据董仲舒《春

秋繁露》记载，汉代人春旱求雨舞青龙，炎夏求雨舞赤龙或黄龙，秋季求雨舞白龙，冬天求雨舞黑龙。这些龙长达数丈，每次出动五至九条不等。湖南省湘西山区流行一种龙舞叫“龙头蚕身灯”。该灯由龙的头和蚕的身与尾组成，由三个舞技出众的民间艺人分别持头、腰、尾三个部分执耍。出灯前，每对灯都要下到江边“吸水”。为什么要吸水呢？很好理解，龙吸饱了水，才能保证雨水充足。

这便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抛弃龙的一个原因：要吃饭，就得有农业，有农业就得有水利，有水利就会有水文化，而水文化就是龙文化。

二、好飞

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云、雷电、虹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鹿、马、牛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鹿、马、牛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

第四条或许更重要，这便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对龙之好飞，古人多有论述。《管子·水地》说龙“欲上则凌乎云气”。《扬子法言·问神卷》：“龙必欲飞天乎？曰：时飞则飞，时潜则潜。”诗人的描绘更形象一些：“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努空虚。龟鱼带去半空落，雷訇电走先后驱。”（欧阳修《百子坑赛龙诗》）“明当一跃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鱼。”（虞集《龙卵诗》）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新石器时代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有人乘龙蚌砌图像，战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人物驭龙帛画”，汉代画像砖上有“仙人乘龙图”，北魏墓葬石刻上有“神人御龙图”，敦煌莫高窟有唐代“神人乘龙壁画”。

文献中有关乘龙、驾龙、驭龙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山海经》中所记的夏

后开“乘两龙”，东方句芒“乘两龙”，西方蓐收“乘两龙”，南方祝融“乘两龙”，北方禺强“乘两龙”，等。还有：“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十过》）；“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史记·封禅书》）；“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屈原《九歌》）；等等。

有趣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原龙”没有翅膀，夏商周的“夔龙”也没有翅膀，春秋战国至秦汉，出现了长翅膀的“飞龙”，这翅膀一直长到唐代。宋以后，长翅膀的龙很少见了。原因大概是人们意识到，龙本来就好飞，且能飞，无论有翅或无翅。

三、通天

和“好飞”紧密相连，龙又具备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品性：“通天”。

飞的方向和境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尚书大传》郑玄注：“龙，虫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蛇龙之类也。”《易纬通卦验》：“立夏，清明风至，而暑鵠声蜚，电见早出，龙升天。”《论衡·龙虚篇》：“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黑陶双耳盆上，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画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鱼鸟纹（亦称“龙凤纹”），也将水中游的鱼——龙的容合对象，与天上飞的鸟——凤的容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容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导引升天帛画”，向人们展示了龙的通天的神性。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昂首展翅的凤。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

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君主帝王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四、善变

龙是由众多的对象容合而成的，各容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这是龙之“善变”的天然基础。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雷电、是虹，在地可以是蛇、是猪、是鹿、是熊、是牛、是马，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鲵。换句话说，天上的云、雷电、虹，地上的蛇、猪、鹿、熊、牛、马，水中的鱼、鳄、鲵，以及天地间的龙卷风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对龙的善变的品性，《说文·龙部》概括为“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艺文类聚卷九十八》引《祥瑞部·龙》加了一句“乍存乍亡”。还有《管子·水地》，说得也挺好：“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

在《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中，曹操与刘备有一段关于龙的对话，精彩地描绘了龙之“善变”：“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龙如此“善变”，难怪宋代的王安石要在《龙赋》中感叹一番了：“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唯不可见，所以莫知其向；唯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真是“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呵。

可让龙变化的对象很多。

位于四川省汶川县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这里沟深林密，植被丰厚，是许多珍禽异兽的栖息地。相传当年大禹治水路过这里，有一条神龙欲投效立功。因来得突然，大禹受惊，连呼“蛇！蛇！蛇！”神龙见大禹小眼观它，当即气绝，倒地化为山形，即今天的卧龙。龙的角冠变成了四姑

娘山，龙须变成了松杉柏桧和山涧瀑布，龙鳞变成了平原沃野，就连身上的虱子，也变成了国宝大熊猫。

龙的容合对象多为动物，变动物是龙的拿手好戏。《夷坚志》载，三条龙违天命行雨，为了免遭抓捕，化为獭（tǎ）而藏。《宣室志》载，有人见两条腰长胸凸的白犬在原野上奔驰，后跃然入湫，湫中白浪翻腾，继而有两条龙由湫中升起，顿时云气涌聚，风雷大震。《东坡志林》载，某地修庙，祭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从酒肴上经过，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

龙不仅能变动物、变天象，还能变植物，如黄帝乘龙上天，群臣援拽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古今注·卷下》）；变矿物，如“龙血入地为琥珀”（《酉阳杂俎·广知》）；变人，如变作老头儿，求孙思邈救助；变作牧羊女，托柳毅传书；等等。

深入思考，龙之“善变”的根据、原因，一是来自宇宙自然物本身的变化关系，如云变作雨、雨变作水、水变作云；二是来自人的感悟、认知、神化，和猜想、推测、希望，也就是说，龙的许多变化，是人希望其变、让其变的，如“须坠而生草，曰龙须”、“龙血入地为琥珀”、“龙鳞变成了平原沃野”等。

《周易》是著名的中华元典，号称“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而其第一卦《乾》卦，就是一个以龙取象的、意义深远的“龙卦”，即以“潜龙勿用”“见龙见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六种不同状态之变，反映社会人事吉凶祸福之变，从而给人们趋吉避凶、纳福禳祸以提醒和指导。告诉人们应当与时俱进，因事制宜，相机而动，当守则守，当变则变。

五、显灵

龙具有善变的品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显灵”的品性。

龙的这一品性，很早就进入了古人的视野。《礼记·礼运》就将龙列为“四灵”（也称“四神”“四象”）之一（其它三灵是麟、凤、龟）。并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以龙为畜，水中的鱼类就不会惊走；以凤为畜，空中的鸟类就不会惊飞；以麟为畜，陆地上的兽类就不会惊跑；以龟为畜，人间的情谊就不会丧失。因何这

么解释呢？方氏悫在作注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故谓之四灵。”

龙显灵的传说遗闻很多。

《酉阳杂俎·诺皋记下》载，有位白将军在曲江洗马，马忽然跳起来惊跑，前足裹着衣带状白物，绕了数圈，将军赶快令人解开，于是“血流数升”。将军很惊异，就将此物收藏于衣箱之中。某日将军送客送到河边，拿出来让客人看，客人说可以用水一试。将军即用剑在地上划挖出一个坑儿，将白物放到里边。一会儿就见白物蠕动盘旋，泉水哗然涌出，一股黑气袅袅升空。众人都有些害怕，说：“这肯定是龙。”急忙朝家中赶，未及数里，“风雨忽至，大震数声”。《太平广记·龙六》引《外国事》载，有神龙在米仓中安家，仓中的米若取尽时，只要向龙拜几拜，“仓即盈溢”。

峨眉山神水阁的泉水很有名。相传隋代智者大师客居中峰寺时，特别喜欢饮用此泉。后来他回到家乡江陵，对此泉思念有加，竟想出病来。一位龙女见状，自告奋勇为大师取水。路途如此遥远，大师不免怀疑，就嘱咐龙女将他存放在中峰寺里的钵盂、锡杖一同取来。第二天一早，果见钵杖随水从荆门玉泉洞浮出。从此，便有了“神女通楚”和“龙女取水”之说。明代人还立了一块碑，以感念龙女的灵异。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道士在龙潭边念经，潭中龙王化作老翁上岸，说他的师父才到龙宫，需要安静，请道士暂缓诵读，并承诺每天供献鲜奶二斤。道士答应了龙王。第二天果然有极新洁的鲜奶出现在几案上，小徒一称，果重二斤。此后天天如此。几年后的某一天，鲜奶忽然停止了供应。道士不解，又到潭边念经，龙王再次化作老翁出来，说：你知道鲜奶是怎么来的吗？街市上那个卖鲜奶者，经常在秤杆上做勾当，短斤少两，欺瞒顾客，我就将他多赚的摄取些来给你。现在那个人外出了，接替的人讲诚信，不做短斤少两的缺德事了，鲜奶也就不能再供给了。道士听后，感叹不已。

关于龙显灵的传说遗闻都是人为编造的，其目的是为了神化龙。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之外，还有人与超验的关系，超验即超越人的经验、人的经验达不到。对超验，人总要用想象、猜测、编造来填充，于是就有了龙的神化、龙的显灵。从这个理解上讲，龙的显灵的品性，实质上是人的造灵的

品性。

六、征瑞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容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发明、展现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发明、展现它做什么呢？于是，龙就有了“征瑞”，即征兆祥瑞的品性。

上面讲到的龙的种种品性，都为龙的征兆祥瑞的品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显灵，灵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所秉赋的征兆祥瑞的品性，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太平广记》引《水饰图经》：“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蝎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此类载述，不绝于史书。以至于今天人们在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品上看到的龙，也多是撷取和突出了龙的这种神性。如泰山顶上的青帝宫，供奉的是东方青龙，其解释就是这样的：“青帝主生，坐镇东方；生发万物，吉祥之神”。

民间修庙造殿、起屋盖房，有将龙的形象雕塑、彩绘在屋脊、房梁、厅柱上以“辟邪”“镇宅”的情形。有的地方将不同色彩的龙画在谷仓、米缸、水缸上，有“黄龙盘谷仓、白龙盘米缸，青龙盘水缸，盘得瓶瓶满，缸缸满，吃勿完，用勿完”之说。

农历兔年的秋冬和龙年的新春，举办婚礼者就特别多，为什么呢？为的是赶在龙年生一个“龙子”。还有，培育后代，谓之“望子成龙”；结婚祝福，谓之“龙凤呈祥”；生一对有男有女的双胞胎，谓之“龙凤胎”，等等。

梦龙也是显示龙瑞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的梦典里，梦见龙均为大吉大利的贵梦。有“梦见乘龙上天，三代富贵”、“梦见黑龙者家大富”、“梦见龙子，贵

子大吉”等等说法。

当然，所谓龙的征瑞的品性，以及善变、显灵等品性，都可视作是人们的猜测、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由于造神和敬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赖以活下去的方式之一，那么，人们对龙的猜测、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就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以，可以说，龙的征瑞的品性，实际上是人的征瑞心理的对象化。

七、兆祸

既然龙的征瑞的品性是人们猜测、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的，那么就既可以让它“征瑞”，也可以让它“兆祸”。这倒也符合辩证法：有正就有负，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

相传夏朝末年，有两条龙来到王庭，自称是“褒之二君”，即古褒国的两位君主。夏王后通过占卜得“漦(chí)而藏之吉”。于是，待龙离开后，就将龙遗留的“漦”即口水和唾沫，装在木匣子里收藏起来。这个木匣子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打开观看，一不小心，使龙漦洒流于庭，无法清除，眼看着化为一只“玄鼋”即黑色的鳖，爬到王府里去了。一个童妾恰巧碰上了这只鳖，于是受孕，到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便是以“烽火戏诸侯”而祸亡西周王朝的褒姒。史家评论说，“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故有龙鼋之怪”。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当是比较早的关于龙具“兆祸”品性的记述。

《墨子·非攻》篇载：古时三苗地区曾经大乱，“天命殛之”。于是，“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即属于白天的妖怪晚上出来了，龙在庙里出现了，狗在闹市哭嚎了。刘志雄、杨静荣等学者研究后指出，导致“三苗大乱”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次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变。动物对地震等自然灾变比较敏感，往往在灾变发生之前就表现出异于常态的行为。所谓狗在大街上哭嚎，龙，当然是其容合对象蛇、蜥等，在庙堂上出现等，就是这样的动物前兆。如此看来，龙具备“兆祸”的品性，倒和科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了。

然而，更多的情形则与自然灾变无关。如《汉书·五行志》记汉惠帝二年正月某日，“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温陵井中”，“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像诸侯将

有幽执之祸”。后来果然“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京房《易传》中也有“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和“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之说。这些说法，无疑是建立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判基础上的附会。

说到自然灾变，人们会联想到公元1976年，即中国农历的戊辰龙年。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一年相继去世。是龙年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吗？非也。这只能视作一种巧合。我们可以上溯，1964年，1952年，1940年，也可以下探，1988年、2000年、2012年都是龙年，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灾大难。

龙兆祸的品性，在民间传说中多有表现。《博物汇编·禽虫典·龙部》引《一统志》载，湖南永州府某村民得一白鳝，打算烹而食之，有老人对他讲“此湘江之龙，恐祸及”。此人不听，照食不误。结果第二天，“一村俱陷”。即整个村庄都因地震而陷落了。《北梦琐言》载，某地燃芦荻烧死一龙，只有龙角不化，村民就将其作为宝贝收藏起来。后来一位姓高的官儿出价强取，有人便说，姓高的要招祸了，怎么可以强取不祥之物呢？不久，高果然被诛杀。对这些关于龙兆祸的民间传说，我们只能从巧合、附会的角度来解释。

八、示威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可以概而称之为“示威”。

《太平御览·鳞介部·龙上》引《周史》载：徐州某县井中龙出，有母子三人同时目睹，三人“即时皆卒”。死了三个人还不算，还要“澍雨漂沫”，即暴雨成灾，使城中人不得不“济之以筏，登城以避水”。《夷坚志》载，一龙出现在开封县茶肆，被役卒看见，“杀而分其肉”，十余日后，龙复仇，“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驼冈至万胜门马监，民居尽没”。同书中还记有某人“断蛇龙狱”，引起龙怒，“平江大风驾潮，漂溺数百里，田庐皆被其害”。《朝野金载》载，唐人王景融葬父时挖到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身窥望，忽见一股黑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录异记》载，荆州当阳县某井中有龙窠，某县令到任后，常系马于井旁，并将种种脏秽之物，倾倒于井中。一年后，此县令和他的马全变成了瞎子。

四川四面山上有一片水面，原为小溪，现称“龙潭”。发生于1927年的地面陷塌，使湖泊出高山。而民间却另有说法：这里原来有座寺庙，庙墙上用炭笔画了一条龙。某一天，一个调皮的牧童对着龙身撒了一泡尿，龙不堪其辱，便动怒发威，使雷雨交作，山崩地陷，造成这片湖泊。而那座庙也沉入湖底，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下龙宫。

龙之兆祸与示威，盖源于龙的容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电霹雳殛人，暴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民俗传说中有不少恶龙、孽龙、歹龙发洪施旱、为害一方的文本，反映的也都是龙之兆祸、示威的品性。换句话说，就是兆祸和示威，使龙族中有了恶龙、孽龙和歹龙。恶龙、孽龙、歹龙的出现，反衬出善龙、祥龙、好龙的可贵。

我们讲龙的精神、龙的尊贵、龙的伟力、龙的灵异、龙的嘉瑞、龙的胸怀、龙的情意等等，指的当然是以善龙、祥龙、好龙，或龙之善、龙之祥、龙之好为基准的。这个道理其实是常识，就像我们讲“以人为本”，言下之意，当然指的是以“好人”，即大多数人好的、正的一面为本，而不是以“坏人”，即少数人的坏的、负的一面为本。一些人在龙文化的讨论中，总是用龙之恶、之孽、之歹说事，借以全盘否定龙的中华文化的标志地位，显然是没有顾及这个常识。

换个视角度来看，龙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兆祸和示威的。历史上，在江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的时候，人们就有“龙王爷发怒了”之语。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迷信，但换个角度看，就不是迷信，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作为掌管江河湖海、雨晴涝旱的水神，将龙视作自然界的象征和代表没有什么不可以。龙神发怒，也就是自然界在发怒。无节制的乱砍滥伐，使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水土严重流失，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增高；加之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导致气候异常，降雨集中——龙，作为自然界的一个代表，不发怒，不示威，才是怪事！

（刊于《说古道今》1998·3、4合刊；《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获“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优秀论文奖；收入《中国龙文化与龙舞艺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龙凤配

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爱恋婚配民俗中，要以龙比男、以凤比女？为什么将男女结合称为“龙凤缘”“龙凤配”？为什么将男女携手、夫妻共进称“龙飞凤舞”“龙凤呈祥”？本文就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一. 龙凤同源

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

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是龙的主要容合对象，因此，龙常常被称为“鳞族之长”“众兽之君”。凤是中国古人对鸡、鹰、燕、鸟、鹤、孔雀、鸵鸟等鸟禽，和太阳、风、火等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具有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等神性。长羽毛和翅膀的鸟禽是凤的主要容合对象，因此，凤便登上了“羽族之长”的宝座，有“百鸟之王”之称。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纹”，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最早的“凤纹”出土于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断代约公元前 5800 年；最早的“龙凤纹”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断代约公元前 5000 年。这几件珍贵文物足以说明：龙和凤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且差不多是同步的。



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龙凤纹

二. 龙凤配合

龙凤配合、交融的状况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就是一幅“龙凤配合图”。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欲上。旁边是与它相对应的凤——昂首展翅，飒然飞举。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掌、祈求升天的裙服女子。显然，龙和凤在这里是协同合作的关系，共同承担着导引人们脱离俗尘、升达天堂的重任。

龙凤交融，常常是通过交缠、纠结、合体实现的。

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出土了一件“四龙四凤方案器座”。木质案面已朽损不存，案座为四龙四凤缠绕盘结，四条卧鹿为案足，分列底盘四周沿下。龙为双身三尾，尾梢反挂龙角；龙肩生出双翼，龙翼彼此连接。凤头凤爪从龙尾的连环中探出。龙的鳞片和凤的羽毛清晰可辨。湖北省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曾出土一批丝织品，上面的刺绣纹样都是绚丽秀美的龙和凤，有“蟠龙飞凤纹”“舞凤逐龙纹”“舞凤飞龙纹”“龙凤相蟠纹”，等等。这些纹样上的龙和凤，或翩翩对舞，或逗嬉成趣，或交缠纠结，或连身合体。

那么，龙和凤为什么会相互对应、配合、补充，以至于融合呢？

这得从龙凤各自不同的取材对象来分析。龙的取材对象，主要是蛇、鳄、蜥、鱼、鲵等动物，以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天象，其动物多为喜欢阴凉、潮湿，且善于隐藏的“水物”“水兽”；其天象也是和阴雨有关之象，这就导致了龙在其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属“阴”的，或“阴”气很重的。凤的取材对象主要是鸡、燕、鸟、鹰、孔雀等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有“阳鸟”“阳禽”“火精”之说。这样，从新石器时代到盛行阴阳五行学说的春秋战国时期，龙主要是以“阴物”的形象出现，凤主要是以“阳物”的面貌出现。

从北首岭红山文化“龙凤纹”，到商代的“龙凤同体”，再到战国时的“龙凤交融”，说明中国先民对阴阳的认识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就已产生，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相当丰富且走向成熟。龙和凤的对应、争斗、沟通、和谐、配合、交融，正是古人阴阳观念（相克相生、对立统一、彼此消长，依存共处，互补转化）的形象化或意象化。

三. 龙帝凤妃

说到阴阳，龙凤都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自治系统，一个是作对应的系统。自治系统是有阳有阴、有雄有雌的，所谓雄龙（阳）、雌龙（阴）、凤为雄（阳），凰为雌（阴）。一旦作为对应的系统出现，就发生了一个转化，即龙由整体上呈阴转化为呈阳，凤由整体上呈阳转化为整体上呈阴。这个转化，大约是从秦汉开始的。

秦汉以降，龙的身上开始具有象征君主帝王的神性——其原因，盖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吸纳、综合、演进，到此时，龙的容合过程已初步完成，龙身上所具备的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已经强大且彰显，这些神性和“帝王性”多有吻合之处（比如龙可以“通天”，帝王们也认为自己“受命于天”），龙遂被帝王们看中，拿来做为自己比附、象征的对象。

随着帝王们用龙、比龙、称龙，作为对应，帝后妃嫔们就开始用凤、比凤、称凤了。其起始标志是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让妃嫔戴凤钗、穿凤头鞋。事见《中华古今注》：“钗古之遗像也。至秦穆公以象牙为之，始皇又以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

当暑戴芙蓉冠子，……跋蹲凤头履，以侍从。”其被确认的标志是宋光宗（1147年—1200年）李氏皇后的“黑凤”之瑞征和“凤娘”之称谓。事见《宋史·后妃传下》。

于是，凤便有了一个大的转化：由阳转阴，整体上趋于雌性化。因为，帝王们绝大多数都是男的，手中又掌握着至高无上、威力无边的权力，加上由于容合对象的广泛，龙身上已集纳和具备了众多“阳物”的特性，其呼风唤雨的威力、飞举变化的能量，也和雄壮属阳的男性相吻合；而凤由于其外表美丽，更和喜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属阴的温柔的女性相接近。凤的这个转化过程，历时大约一千多年。

帝王比龙之后，龙的地位日益显赫，至元代和元代以后，竟屡屡出现皇家垄断龙（主要是五爪龙）的情况。

其间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女性主宰朝政，凤的地位就会被抬到一个高度。

武则天，姓武，名曌（zhào），唐高宗皇后、武周开国君主。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名实相符的女性皇帝，武则天有比较深的凤缘和比较浓厚的凤情结。《大唐新语·第二十九章·记异》：“袁天纲，益州人，尤精相术。贞观初，敕召赴京，途经利州。时武士彟（yuē）为刺史，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这是说，武则天幼小时，其父亲武士彟曾让精通相面之术的袁天纲相过面，袁天纲说武则天生着龙的眼睛凤的脖子，尽管是个女孩，也“当为天子”。

武则天主政后，很想改变中国从原始父系社会开始的男性帝王专权、女性后妃从属，即“龙主凤从”“龙正凤偏”“龙上凤下”的历史，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是，“龙”的势力太大，武则天虽是一只“强凤”“威凤”，终归竞争不过。公元705年（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乘机拥戴中宗李显复位，当时给李显上的尊号为“应天神龙皇帝”，选用“神龙”，自然有压倒、替代武则天这只“威凤”之意。武则天心知肚明，却已无可奈何，为了死后的一点体面，她只好“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旧唐书·本纪第六》）。死后葬李家乾陵——归了“龙穴”。而那座著名的无字碑，也和历代男性帝王碑

一样，螭龙盘顶，升龙绕侧。

慈禧太后，是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在龙凤对比中，突出凤，可以说是慈禧一生的追求。清东陵的定东陵是慈禧和慈安的陵寝。这慈禧陵三殿，其耗金之巨，工艺之精，使明清二十四位皇帝的宫殿为之逊色。尤其是隆恩殿正中的丹陛石雕更是别出心裁。采用高浮雕加透视技法雕成，宽1.6米，长3.1米，图案为“凤在上，龙在下”。隆恩殿周围有六十九块汉白玉石栏板，每块栏板上都雕有“凤引龙”图案：一只高高在上的大凤，凌空展翅，穿云俯首；一条出水小龙，曲身扬首，仰望大凤。七十四根望柱头打破历史上一龙一凤的格式，均为“一凤压两龙”，暗示她的两度垂帘听政。这些骄凤，耸冠瞠目，翅翼微张，显得志得意满，简直不可一世！而身居下位的行龙，小头细身，惟骄凤的神采是瞻，实在是一副可怜相！

慈禧这种将凤抬高到龙之上的做法，在漫长的龙凤文化发展史上并不多见。



四. 龙凤呈祥

龙与凤凰配合、对应、互补的情形，广泛地流行于民众之间，反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习俗之中。其寓意，多是阴阳和谐，婚恋美满，求吉祈福。如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的《龙凤呈祥》：龙凤各居一半。龙是飞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民间也

流传不少龙凤配合、结合的传说。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龙和凤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发明、展现的神物，体现着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帝王、帝后自然不能全部垄断。如畲族穿“凤凰装”的习俗，就和帝后比凤无关：传说是古代一家母子，救了一只受伤的凤凰，凤凰伤愈后，将自己头上的头鬃和尾巴，送给这家新娶的姑娘。从此，畲族姑娘就有了凤凰装。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帝王比龙、后妃比凤的讲究，也对民间的世俗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南史·儒林传》引）。如浙江民间讲究新娘出嫁时穿戴凤冠霞帔，其由来据传是南宋时，某村姑救了康王赵构一难，赵构重登皇位后，即赐此村姑可以“娘娘”的名义，在出嫁时享受坐花轿、戴凤冠、着霞帔的殊荣。后来乡村姑娘在出嫁时也都纷纷效仿，遂有此俗。而那些言情小说，如《花龙戏凤》《浪龙戏凤》《侠龙戏凤》《傲龙戏凤》之类，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受帝王比龙、后妃比凤的影响。

到了现当代，龙和凤作为帝王、帝后象征物的年代已成历史，人们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吉祥物”或“吉祥符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民俗事象。如在孔圣人的家乡山东曲阜，随着尼山朱砂石的发现和开掘，兴起了刻送龙凤印章的习俗：小孩出生，是男娃就选龙，寓意“望子成龙”；是女孩就选凤，寓意“望女成凤”。或小伙子选凤章送姑娘，姑娘选龙章送小伙，寓意龙凤良缘，幸福绵长。生产天王表的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也曾专门推出一对“龙凤金表”，作为男女定情互赠的礼物，寓意“龙凤呈祥，百年好合”。至于哪对夫妻喜得有男有女的双胞胎，人们就以“龙凤胎”相称的事情，就多见于传媒了。

2004年12月18日，中华婚礼庆典主题曲在北京揭晓，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曲的《龙凤呈祥》被选中，成为中国第一次有组织地面向社会征集而产生的第一首婚礼庆典主题曲。此后，新婚青年在举行婚礼时，可以无偿使用。此曲长约三分钟，其歌词为：“你是新娘，我是新郎，我们的爱在朝霞中起航；你撑一篙，我划一桨，唱一曲中华《龙凤呈祥》；龙凤呈祥，地久天长。和和美美，喜气洋洋……”国家民政部公布的“全国婚姻登记工作标识”也采用了“龙凤呈祥”图案，相关解释说：标识以圆为外沿，象征婚姻生活圆满和谐。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寓意家庭生活红红火火。标识中间“龙凤呈祥”图案，一龙一凤形影相随，

既相互包容，又相对独立，彰显了夫妻相处的独特哲学，蕴含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法律精神。同时，龙凤图案以变体“m”呈现，暗含“民政”与“婚姻”之意。此外，整个图形兼具公章形状，也体现了婚姻登记工作的法定权威。标识简洁明了，寓意贴切，既富有传统的中华文化特色，又体现了现代婚姻家庭理念，便于理解、记忆和使用。



笔者分析过，龙有种种神性，这些神性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力”，力量的“力”，力度的“力”。凤也有种种神性，这些神性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美”，美好的“美”，美丽的“美”，新美的“美”。于是，不妨这样说：龙是力量的象征，凤是美好的象征。龙和凤的对应，是力和美的对应；龙和凤的互补，是力和美的互补；龙和凤的和谐，是力和美的和谐；而且，世上只要有男女，就会有力和美的对应、互补和和谐，就会有矫健的龙，美丽的凤。

（刊于《说古道今》2001年第1期、2006年3月27日《文汇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20年10月7日修改）



龙爪

有读者咨询龙爪问题，言年年清明节举行的黄帝陵祭祀大典上都要放飞巨龙，而那巨龙却没有爪，“没有爪的龙，还是龙吗？”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在龙的容合对象中，有属于有爪动物的鳄、蜥、鲵、猪、鹿、熊、牛、马、虎、鸟等，也有属于无爪动物的蛇、鱼等，故龙的形象，若多取材于蛇或鱼，就可能无爪。也就是说，龙的队列中，有有爪龙，有无爪龙，以有爪龙为多、为主。

再从龙的发展历程看，由远古至今，龙大体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当代”六个阶段。

新石器时代：时间跨度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其代表性龙形象：
1，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因以石块摆砌而成，其龙爪有无不能认定。
2，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年的凤鸟鱼龙纹蒜头壶——其龙无爪。
3，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蚌砌龙——其龙前足四爪、后足五爪。
4，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属于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年的玉龙——

其龙无爪。5，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蟠龙纹彩陶盘——其龙无爪。

夏商西周：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771 年，其代表性龙形象：1，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约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的绿松石龙形器——其龙似无爪。2，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玉龙、青铜龙——其龙多件，有的四爪，有的三爪、有的一爪（或可称一足）、有的无爪。3，出土于陕西西安、宝鸡周代墓葬，距今约三千年的堪称西周龙纹青铜重器的利簋、何尊、大盂鼎等——其龙有的三爪，有的一爪（或可称一足）。

春秋战国秦汉：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770 年至 220 年，其代表性龙形象：1，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距今约两千五百年的饰有龙形耳、攀缘飞龙、交龙纹的莲鹤方壶——其龙一爪（或可称一足）。2，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距今约两千五百年的《人物龙凤帛画》——其龙一爪（或可称一足）3，出土于陕西咸阳秦二号宫殿遗址，距今两千二百多年的龙纹空心砖——其龙似三爪。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间跨度从 220 年至 1279 年，其代表性龙形象：1，出土于河南邓县南朝墓，距今约一千六百年的龙纹画像砖——其龙三爪。2，镶嵌于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龙纹石栏板——其龙三爪。3，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距今约一千三百年的鎏金走龙——其龙三爪。4，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画家陈容作，距今约八百年的《云龙图》——其龙四爪。

元明清：时间跨度从 1279 年至 1912 年，其代表性龙形象：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窑烧制，距今约七百年的青花云龙纹罐——其龙三爪。2，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六百多年的大同九龙壁——其龙四爪。3，清政府于 1888 年确定的长方形黄龙纹大清国国旗——其龙五爪。

现当代：时间跨度从 1912 年至今，其代表性龙形象：1，1923 年铸造的，采用了鲁迅等人所设计的国徽图案的“龙凤银币”——其龙四爪。2，置于北京天安门城楼正面，衬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金龙和玺”彩画——其龙五爪。3，2015 年，中国向联合国赠送的顶部有龙饰的“和平尊”——其龙五爪。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的龙，有有爪者，有无爪者，以无爪者为多。——轩辕黄帝生存于新石器时代，故黄帝陵祭祀大典上放飞的巨龙可以无爪。夏商西周的龙，有无爪者，有四爪、三爪、一爪（或可称一足）者。春秋战国秦汉的龙，

有一爪（或可称一足）者，有三爪者。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的龙，有三爪者，有四爪者。元明清的龙，有三爪者，有四爪者，有五爪者。

需要指出的是，从元朝开始，皇权对五爪龙纹进行了垄断，明、清两朝沿袭，即在元明清三朝，五爪龙纹，只有皇家可以使用，民间只能使用四爪、三爪龙纹。但实际情形是执行得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纹流行。进入现当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龙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成为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为精神内涵的吉祥符号、文化标志、情感纽带。至于龙爪之数，已无限定。



（2023年11月1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2023年12月14日《西安日报》）



北京奥运： “龙柱”高耸的意义

三十二个“乐台”带着三十二名乐师，神奇地缓缓升起，越升越高，变成了高大巍峨的“龙柱”，擎天竖立，气势恢宏。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颇引人注目的一幕。

对中华龙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人们并不感到震惊。这是因为，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多种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经过长达八千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所蕴涵和展示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正是贯通古今的中华精神。奥运会在我国举办，当然要弘扬中华精神、展示中国元素，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的老谋子和他的编导团队，怎么能放过排在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第一位的龙呢？

我们看到，在奥运开幕式前的暖场演出，即“欢天喜地庆奥运大型文艺晚会”上，龙就登场亮相了。先是来自云南省石屏县的彝族花腰女子舞龙，四条长龙在一百二十位身穿鲜艳服装的彝族姑娘们的舞动下，时而上下翻腾，蜿蜒遨游；时

而腾空夺宝，盘旋仰啸……紧接着，伴随着激昂的交响乐，四条金色巨龙在一百名铜梁龙舞健儿的挥动下，飞到主席台前的表演区，腾挪翻卷、气势非凡地依次完成了“直线行进、四龙会首、碧波荡漾、曲线行进、蛟龙出海、横扫千军、蛟龙戏水、金浪翻腾、翻江倒海、莲花出海、二环映辉、金龙聚首、金光灿烂、出宫造型”等“奥运龙舞十四招”，成为这场晚会最抓人、最让人惊叹的压轴戏，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八万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与龙舞的激越奔放不同，龙柱的出场是舒缓的，是平静中凸显出神奇。龙柱的造型参考了华表——古代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其柱身多雕刻升龙图案，其龙由云海中盘旋而升，表达的是腾飞云天、纵横宇内的意念和愿景。有解释说，“龙柱”的出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国的建筑美学。“实际上是将鸟巢当成了一座宫殿，用夸张的手法，将一座宫殿浓缩于三十二个龙柱，使得置身鸟巢的观众仿佛回到了中国古代那些辉煌的王朝盛世”。“雕梁画柱间，古典舞演员仪态万方款款走来，仿佛行进在一个中国式的长廊中，中国人的礼仪、中国人的传统也逐渐清晰地走入人们的视野”。不仅如此，“三十二”还是“四”与“八”的倍数，而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四”与“八”都是神奇、吉祥的数字。“四”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如“四方”“四极”“四周”“四海”等；“八”字不用多解释，北京奥运会选择在2008年8月8日晚8时开幕就很能说明问题；“四”与“八”的联合组词也有不少，如“四时八节”“四面八方”“四通八达”，等等。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三年前，在本届奥运会吉祥物的选定过程中，尽管龙被大多数国人所看好，且已进入少数的候选对象之列，但最后还是令人意外地落选了。什么原因呢？当时的解释有两条：一是“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二是“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之后，到了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又刮起了一场“弃龙”风波，有几位先生站了出来，声言“弃龙”，其主要观点依然是两条：一是龙在西方世界代表邪恶；二是龙曾是专制皇权的象征。

于是，借助现代化的网络传媒，正反两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经过争论，大家的意见大体上趋于一致，即绝大多数国人都认同、支持正方的观点。

对龙在西方世界代表邪恶的问题，正方的观点认为：这是将中华龙与西方 dragon 相混同所致，而两者无论从起源、形象、文化背景，还是功能、地位，都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象征物，是不可混同的。西方的 dragon 是对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具有喷火、吞人、破坏、护宝等神性；表象丑陋，象征暴力和邪魔，主要代表恶。中华龙是对许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的神物，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表象神奇，主要代表善。中华龙有神圣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可亲的一面。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无足轻重；而中华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其象征性和凝聚力很大且无可取代。

对龙曾是专制皇权的象征的问题，正方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曾是帝王皇权的象征，也的确起过为专制统治壮胆效力的作用，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批判的。然而，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1. 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帝王皇权要走得早。2.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3. 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存了数千年。4. 帝王对龙的垄断，主要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帝王可以称龙、用龙，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称龙、用龙，如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比称“卧龙”，宋时的李公麟别号“龙眠居士”，江南胡某将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见龙”等。5. 元、明、清三朝对龙纹做了垄断，但这样的垄断：第一，只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则没有垄断；第二，即就是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并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第三，真正因龙纹而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6. 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龙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

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对龙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奠定了现在的中国版图，等等。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有扬有弃，即弘扬正面的积极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简单、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经认识清楚的负面的内容不放。

纵观中华龙的发展史，可以说已走过了三个阶段：先是由最初的自然物（众多的动物、天象）崇拜容合、升华为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再由神物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喻比人杰）皇权象征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华）兼备吉祥瑞征。经过这三个阶段之后的中华龙，已容合、集纳，并昭示、表达着中华文化核心的、优秀的、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东西，如由“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到“和谐”、由“福生”到“以人为本”、由“谐天”到“可持续发展”、由“奋进”到“和平崛起”。显然，中华龙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它还体现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以既“承古”又“开新”的姿态，为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提供着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同时，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也再再地为龙文化灌注、增添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新的内容。

随着以上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华龙便成为不可多得的既“古”又“新”的“中国元素”，频频地出现在人们的当下生活之中。就奥运而言，国家相关部门发行的“奥运龙金”上有龙，相关的纪念钞、纪念币、纪念章、宝玺、邮票上有龙，迎奥运的大型活动中有龙，奥运奖牌上有龙，运动员的服饰、战靴上有龙，就连北京奥运村也修成了“龙形建筑”，而奥运主会场“鸟巢”则修建在与天安门处于一线的“龙脉”之上；至于民间以写龙、画龙、雕龙、塑龙、编龙、舞龙、唱龙的方式迎接奥运的事象更是多不胜数，直到8月8日晚开幕式上的龙柱高耸，和烟花放出的“五彩巨龙”。

龙柱高耸，巨龙腾空，既是向国人昭示，也是向世界宣告：从悠悠远古走来的中华龙族已奋然崛起，且巍然屹立于地球之东方，雄伟壮阔，豪气干云，新美奔放……

（刊于2008年8月11日《西安晚报》、2008年8月12日《中国文化报》）

“凤回巢”的文化背景

媒体报道，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火炬台的造型取意“凤回巢”：其台“将会被塑造成一只将头微微伸入鸟巢体育场中的凤凰，而凤凰的嘴将是火炬最终被点燃的地方”。

“凤回巢”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其好在于将全世界人民普遍关注并积极的以不同方式参与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文化”联系在一起，使凤文化的精华，借助奥运会这个巨大的舞台，得以展示和弘扬。

凤是中国古人对多种鸟禽及太阳、火、风等自然现象多元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它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按笔者的考察，凤具有“向阳”“喜火”“自新”“达天”“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成王”的神性；凤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其文化精髓则是“和美”。

在凤所具备的诸多神性中，向阳可排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凤的容合对象主要是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有的鸟禽就直接被古人称为“阳鸟”或“阳禽”。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象牙饰件，饰件的正面阴线雕刻着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炽烈火焰，象征太阳。两侧有两只鸟儿（可视作原始凤凰）昂首欲飞。这个图案可称作“凤凰朝阳图”，它说明在古人眼里，凤和太阳是彼此依恋、依存，相互渗透、对应的。太阳中有凤，太阳喜欢凤，吸引着凤，凤呼唤太阳，飞向太阳，甚至驮载着太阳。凤之“向阳”，使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太阳鸟”。

凤是“凤凰”的简称或统称。它既是“太阳鸟”，也是“火鸟”——古人常常把太阳和火看成一回事，所谓“凤鵄火禽”“火离为凤凰”“凤凰火精”，等等。之所以会如此，盖因为凤的容合对象多为“火鸟”“火精”。如鸟有“赤鸟”“朱

鸟”“火流鸟”之称，鹤“因金气，依火精”，鵠鶡乃“火之禽”，以及“火离为孔雀”，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凤凰生于“丹穴”，所谓“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山海经·南次三经》）。丹、朱，均为赤色，也即火的颜色。

郭沫若先生根据相关资料，将中国的凤凰和古阿拉伯的神鸟“菲尼克司”（Phoenix）嫁接、融会在一起，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章《凤凰涅槃》。据说，“菲尼克司”是天方国的古神鸟，这种神鸟满五百岁后，要集香木自焚，然后再从死灰中复生。恢复生命后的“菲尼克司”就“鲜美异常，不再死”了。于是，中国的神鸟凤凰也要像“菲尼克司”那样，先集香木以“自焚”，然后从烈火中“再生”。据此，中国凤便有了一个新的神性：自新，即自我更新。

凤凰自新的品性，反映在其形象的与时俱进、更新不已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凤凰。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稚拙的“原凤”，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凤”，春秋战国至秦汉有雄健粗犷的“朱凤”，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有刚健与柔和并存的“瑞凤”，元明清有复杂华丽“金凤”……进入现当代后，美丽的凤凰身上又吸取、集纳了人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期望，于是我们看到了“生态凤”“时尚凤”“品牌凤”……

凤凰和人间才俊关系密切。古代的贤明帝王多有凤凰的瑞兆、喻比，甚至化身为凤凰。如，相传黄帝时，曾有凤凰飞落桥山，且吸引来众多的珍鸟灵雀，翩翩环舞。尧帝有“凤中之王”的美喻，有“一凤升天，四凤齐鸣”的传说。舜帝时，曾命人作《九招》等韶乐，“以明帝德”。相传每当他亲自演奏时，常会有五彩的凤凰飞来伴舞伴唱。后来，有恶徒暗地放火，欲置舜于死地，而舜却在大火中化作一只凤凰扶摇飞去。

历代名人中不乏与凤凰有缘者，如先秦的孔子就曾被老子比作凤凰，墨子被认为是“凤凰转世”，孟庙的修建与宋朝皇帝的“凤梦”有关，东周时的王子乔吹笙引凤，战国时的扁鹊被描绘成凤的形状，东汉时的辛鑒隐居获凤，同时代的徐稚弹琴引凤，三国时的庞统有“凤雏”之号，唐代的杜甫自言“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宋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官至翰林，扈蒙赠诗称“五凤齐飞入翰林”，等等。

平民百姓中德才过人者也常有凤凰之比。如《送子来凤桥传奇》：某青年被

朝廷兵将追杀，男艄公及时摆渡相救，自己却被乱箭射死。后某青年做了将军，前来渡口谢恩，欲留百金给女艄公，女艄公坚辞，说若一定要谢，就修一座桥。桥成之日，将军欲以男艄公名字命名，女艄公不同意。此时恰好有五彩鸟飞来，绕桥欢叫，于是起名“来凤桥”。数月后，女艄公生下遗腹子，当地人说，此子因艄公夫妇积德而来，于是又将此桥称为“送子来凤桥”。

许多“凤语典故”都与“昭示德才”相关。如以“凤德”比人之盛德，以“凤穴”喻文才荟萃之所，以“凤藻”言美丽的文辞，以“凤举”颂高尚的举止，以“鸣凤”喻风骨、文采俱备，以“凤毛麟角”说珍贵稀见的人物，以“丹凤朝阳”比喻贤才得天时，以“打凤捞龙”喻寻找、物色难得的人才，等等。而“成龙成凤”“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就更是人们祝辞赞语中常引用的话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凤凰是可以被用来“昭德示才”的，凤凰的这一功能，是中华民族“惜才”的精神品格的反映。奥运会的参加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凤回巢”意味着这些人才汇聚到了能够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地方。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7月14日“文化纵横”版)



北京残奥会：太阳鸟的寓意

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一只红冠高耸的“太阳鸟”，舒展着双翼，翩翩飞来……

为什么要出现太阳鸟？太阳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

太阳鸟是太阳崇拜和鸟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太阳崇拜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可以说阳光照耀到什么地方，太阳崇拜就出现在什么地方。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他每天都架着一辆金色马车穿行于空中，将阳光撒向人间。古埃及人认为日神是创世之神，法老们都称自己是太阳的后裔。印度是崇拜太阳的国度，大乘佛教里的阿弥陀佛就是一尊太阳神。基督教《圣经》称“上帝的荣耀是太阳”，而圣诞节，原本就是太阳神的节日。秘鲁人每年都要庆祝太阳节，他们以太阳花，即向日葵为国花。北美最大的印地安部落阿尔贡魁人认为太阳神创造了所有的生命。东方的日本人认为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是他们的祖先，因而以太阳为国旗，以“日本”（意为“日出之国”）为国名；而朝鲜的意思是“朝日鲜红”……

中国也不乏太阳崇拜。不少古籍文献，如《淮南子》《山海经》《楚辞》《国语》，都有关于太阳神话的记载。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关文物，都证明着中华民族崇拜太阳的历史。一些古代陶器、岩画和青铜器上的图案就反映了这种崇拜。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有日月纹和日月山纹，两幅图案都是将太阳突出地画在月之上和高山之上；而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就有一幅先民双手合掌，举过头顶，对着太阳跪拜的图案。

在远古人的眼里，鸟都是喜欢太阳、向往太阳的，神奇之鸟甚至是太阳的护卫者和运载者。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鸟纹与太阳光芒纹在一起的图案；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两只鸟头相对，供奉着一轮蒸腾着烈焰的太阳；同遗址出土的“双头鸟纹”——两只鸟体相连，

头相背，太阳位居中心；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神鸟驮日图”——一只鸟作飞翔状，背部上方有一轮太阳……

而在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神鸟常常担当太阳的创造者和召唤者的角色。如苗族的《阳雀造日月》：天上的太阳是阳雀用石盘打造成的，也是它射落了八个多余的太阳，并派大公鸡把隐藏不出的一个太阳呼叫了出来。而在流传于浙江的《天和地合》中，是一只火鸟，啄散了云雾，使太阳显出身来；在畲族传说《阳兆鸟》中，是一只阳鸟，用悦耳动听的鸣唱，一次次地唤醒沉睡的太阳，使人间有了明亮的白天……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多既崇拜太阳也崇拜鸟。如炎帝族，就被认为是一个崇拜太阳与火，且善于利用太阳与火的族团。一些古籍就将炎帝说成“火精”“日神”，如《白虎通·五行》：“炎帝者，太阳也。”崇拜太阳也就意味着崇拜与太阳关系密切的鸟。《白虎通·五行》言炎帝的后裔祝融“其精为鸟，离为莺”就是一证；而民间则有丹雀鸟赐炎帝五谷种籽、五色鸟驮炎帝飞至东海蓬莱岛，抱回一轮太阳，从而给大地带来光和热的传说。

太昊和少昊，是传说中的东夷族的首领了。从其称名，就可以看出他们和太阳的关系。“昊”是天上有日，或言头上顶一轮红日（金文中有一昊字，极像人顶日状），对太阳的崇拜意味就在其中了。即就是将“昊”换作“皞”或“皓”，其崇拜太阳的意味也是去不掉的，因为“皞”和“皓”都有明亮的意思，没有太阳怎么明亮呢？还有“金天氏”，也有太阳的金光布满天空之意。古籍言“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太平御览》卷三引《尸子》），其国都，也大概建立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所谓“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山海经·大荒东经》）。而这个“互照穷桑”的“少昊之国”，又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鸟之王国，也即崇拜神鸟之国。所谓“少皞肇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商朝人也是崇拜太阳的，所谓“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帝王世纪》）夏桀不敬太阳，《尚书·汤誓》便言：“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郭沫若曾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殷契粹编》）商人同时又是崇拜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玄鸟》）的传说，将商人的祖先和神鸟联系起来。

2001年，“四鸟绕日”金饰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有关专家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研究家指出，“太阳神鸟”金饰以简练生动的图像语言，透露了有关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和神鸟崇拜相结合的习俗。

太阳鸟不仅是太阳崇拜和鸟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还是热爱光明、追求光明、献身光明的象征。

千百年来，人们都向往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的社会，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于是，“光明的前途”“光辉灿烂的明天”，就成为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理想。而站在中华民族前列的那些仁人志士们，也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成为“热爱光明、追求光明、献身光明”的鼓吹者、启蒙者和践行者。正如一位诗人所言，黑夜给了我们一双黑色的眼睛，我们用它来寻找光明！

那么，如果要给“热爱光明、追求光明、献身光明”的壮举找一个象征物的话，与太阳崇拜关系密切，并以司晨、叫明、向阳为职分的太阳鸟，就是首选了。

2005年8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文物局的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太阳神鸟”金饰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其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太阳鸟的寓意如此之好，难怪被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的编导们所选中！

那么，太阳鸟和凤凰是什么关系呢？“两块牌子，一个单位”，凤凰就是太阳鸟，太阳鸟就是凤凰。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9月8日“文化纵横”版）



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

龙头节又称“龙抬头节”“春龙节”“青龙节”“二月二”“踏青节”等。是汉、满、蒙古、赫哲、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以汉族为主导）的传统节日，时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

关于龙头节的起源，有这样一则传说：一千多年前，玉皇大帝对武则天这位女士穿龙袍坐龙椅看不惯，就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司管天河的白玉龙，即《西游记》中驮唐僧西天取经的那匹白龙马——大概是一路上遍尝了人间疾苦吧，不愿意看到天下百姓因颗粒无收而饿死，就违抗天命行了一场雨，结果被玉帝压在一座山下，并竖碑一通，刻诗云：“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受惠的百姓多么想搭救玉龙啊！可金豆是什么豆呢？一个老婆婆背一袋包谷去街上卖，不小心撒了，看到一地的包谷粒金黄金黄，人们心头忽然亮堂了：这不就是金豆吗？炒一炒不就开花了吗？于是奔走相告，约定二月初二这天，各家各户都炒“金豆”，并将炒开花了的“金豆”，供在当院。镇压玉龙的那座山原是太白金星的拂尘变的，太白金星人老眼花，见遍地金豆开花，就将拂尘收起。于是，玉龙重返蓝天，吸卷天河，普施好雨。玉皇大帝得知后，尽管有些生气，将太白金批评了一番，终究无可奈何。从

此，二月二炒包谷花的习俗便流行开来。有的还一边炒一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从提及《西游记》及白龙马来看，这则传说产生的时间不会太早。其可取之处，是将龙头节与龙联系在一起，意在说明：过此节是为了纪念玉龙，而这条玉龙是不畏强权、造福百姓的善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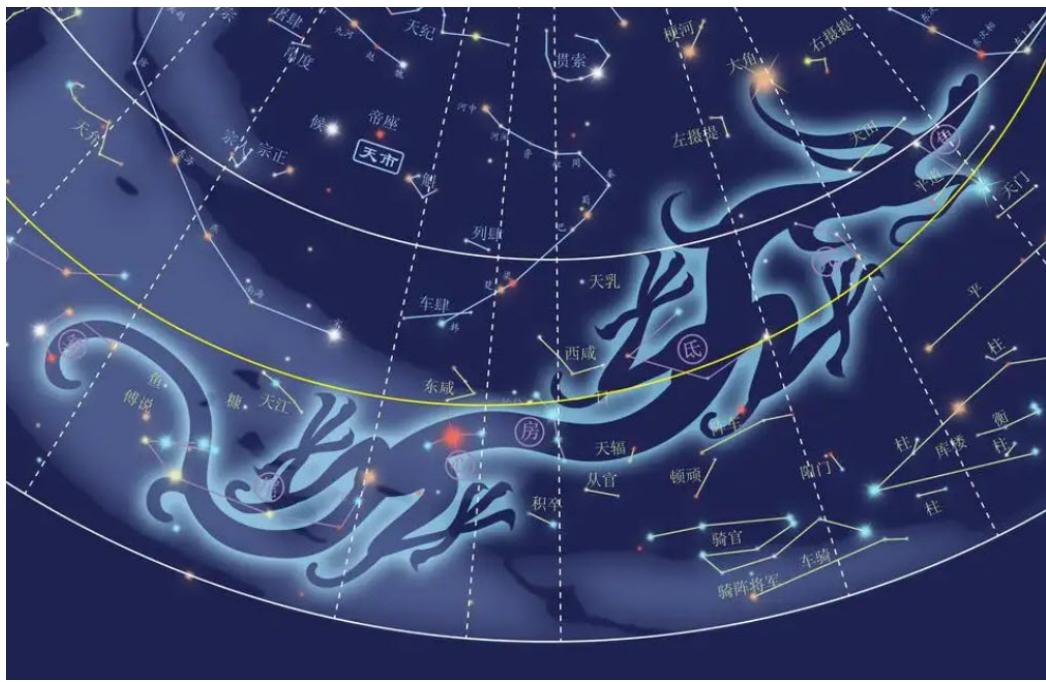
其实，龙头节的起源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有关。“惊蛰”就在农历的二月初二前后。蛰者，动物冬眠也，是动物们对冬季寒冷且食物不足的外部环境的一种适应。春二月，天气转暖，春雷渐渐，蛰居了一冬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及许多哺乳类动物都受到了惊动，要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所言：“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在龙的容合对象中，不少动物都有冬眠的习惯，如蛇、鳄、蜥蜴、熊等。随着春天的来临，它们从昏睡状态苏醒过来，爬出洞穴，开始寻觅食物。我们说龙的容合过程具有模糊性，这个“模糊”，既表现在容合对象的多元，即取材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容合的结果和容合的对象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代。这便是人们既将容合起来的神物称龙，有时又将蛇、鳄、蜥蜴、猪、牛、马称龙的原因。古书上讲的“畜龙”“豢龙”“御龙”“屠龙”“食龙”等，其龙当然不会是成为神物的龙，而是龙的某种取材对象，如鳄、蛇、鱼等等。同理，人们说龙抬头，实际上是说蛇、鳄、蜥蜴等动物抬头；反过来，说这些动物抬头，也就意味着龙抬头。

龙的容合对象，不光有动物，还有天象。云、雷电、虹、龙卷风、星象等，都在龙的取材对象之列。所谓龙抬头，还含有地上的龙和天上的龙相感召、相会合的意思，或可言地上的龙已经昂首起身，就要飞升到天上去了，就要变成滚动的云团、叱咤的雷电、壮丽的彩虹、旋转的龙卷风、璀璨的星宿了。而云团、雷电、彩虹、龙卷风等都是和雨水密切相关的天象，这也就是说，龙一抬头，“贵如油”的春雨就要普降大地，润泽四方了，而春耕生产也由此要全面展开了。

有研究者认为，所谓“龙抬头”，抬的其实是“纵贯东方天宇的龙星”。古代的人们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并以此星宿的轮回来把握季节的变化，以“观天测时”，指导农事。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即角、亢、氐、

房、心、尾、箕之连线有如龙形，其中角宿两星（角宿一和角宿二）恰如龙之双角。在农历二月二之夜，两只“龙角”会从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故称“龙抬头”。



据此，可认为龙头节是农事活动启动的标志；而龙，也由此展示出其作为“农神”的一面。

龙头节起源于何时？人们一般要追溯至唐代的“中和节”。中和节是唐德宗于贞元五年（790 年）颁布推行的，因由是“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故“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

(《旧唐书·德宗本纪》)这个节日里,有些什么活动呢?“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糯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做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

那么，这个中和节与龙头节有关系吗？笔者认为是有的，只是不够直接而已。理由：第一，中和节有除旧、开新、励农之意，龙头节亦有此意。第二，中和节祭祀的是春神勾芒，而这个勾芒，与龙有关。勾芒，亦作“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言：“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五经正义·月令》曰：“是句芒

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这“句屈而有芒角”，也接近于龙的形状。

确切记载龙头节的史籍是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岁纪》：“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这样看来，至晚在元代，过龙头节的民俗就已经形成了。

龙头节起源于何地呢？笔者说过，龙头节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有关，而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生活在地球北半部温带气候（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的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依据地球绕太阳运动时在轨道上的不同位置创造、确立的。据此，可以做出龙头节起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判断。至于南方长江流域和东北辽河流域的龙头节习俗，当是民俗随着民众的脚步迁徙、流传、演化的结果。

龙头节这一天的民俗活动比较多，有：1. 撒灰引龙、汲水引龙；2. 击梁驱虫、燃烛照虫、熏虫；3. 祭祀龙神；4. 祭祀先祖；5. 嫁女住春；6. 吃龙面、龙饼、龙糕；吃炒豆、猪头肉等；7. 剃头理发；8. 童子饰龙；9. 开笔破蒙；10. 禁用针剪；11. 试犁破土；12. 举办庙会，等等。这些民俗活动因地域、生态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北方多吃面食、豆类及猪头肉，南方多吃粽子、糍粑等米食；北方多祭龙神，南方多祭土地神等。

关于龙头节诸多民俗的文化意蕴，可概括出四条：第一，把龙当作水利神、农业神、春之神；第二，把龙当作虫的克星、辟邪神、吉祥神；第三，把龙当做先祖的象征；第四，把人作为龙的化身。每条都可列举例证，如“把龙当做先祖的象征”——相传“二月二”这天也是轩辕黄帝在陕西省黄陵县沮水河畔降龙峽出生的日子，有“轩辕黄龙体”（《史记·天官书》）“遥远的东方一条龙，龙的祖根在黄陵”之说。于是就有了于此日祭祀黄帝的民俗活动。黄帝祭祀分公祭和民祭两种，清明节一般是公祭，龙头节和重阳节一般是民祭。无论公祭还是民祭，都多有打龙旗、击龙鼓、舞龙、巨龙腾空等表演。

（刊于2008年6月16日《西安晚报》）

龙灯的意蕴

每逢节日庆典，人们都能看到欢腾旋跃，让人兴奋不已的龙舞。龙舞也称舞龙、龙灯、耍龙、闹龙灯、盘龙灯、玩龙灯、龙灯会等。那么，为什么要舞龙呢？

舞龙的意蕴，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曰祈雨祈福，二曰娱神娱己，三曰彰力显威，四曰旺丁兴族。

祈雨祈福

祈雨祈福是舞龙最基本的意蕴。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适度的雨水可以说是幸福之源。龙在起源时就和雨水相关，后又成为司理雨水的神灵，祷龙祈雨便成为中国农村常见的“有意味的行动”。其方式有多种，舞龙是其中之一。两湖一带民间传说，战国时的鬼谷子和金角老龙相遇，鬼谷子说：“据我掐算，近日有雨，城内三十六点，城外四十八点。”金角老龙有意让鬼谷子的预言落空，便利用职务之便，让城内下了四十八点，城外下了三十六点，结果城内不少老百姓死于水患。后来玉皇大帝问罪，金角老龙受到贬黜。为了赎罪，金角老龙便在每年的新春到来之际，逐门逐户地向老百姓鞠躬赔礼，并承诺一年的风调雨顺。据此传说，人们便用竹条铁丝、绸缎纱布扎制彩龙，每逢年节舞耍一番，表达欢快喜悦之情，也寓意老龙臣服，天随人愿。重庆铜梁一带的传说与前说异曲同工：东海龙王患腰痛病，变成一个老头上岸求医。大夫通过把脉知其非人，便让其恢复原形，并从其腰间捉出一条蜈蚣。龙王病愈后，以泄露天机为谢：言人们只要照它的样子造一条龙四处舞游，便能保雨水及时，五谷丰收。

舞龙祈雨在先秦时期已开始流行，到汉代已具相当规模，形式也多有讲究。据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汉代人春旱求雨舞青龙，炎夏求雨舞赤龙或黄龙，秋季求雨舞白龙，冬天求雨舞黑龙。这些龙长达数丈，每次出动五至九条不等。

后世的舞龙，大都包含有祈雨祈福的意味。如流行于湖南省湘西山区的龙头蚕身灯。该灯由龙的头和蚕的身与尾组成。制作考究，形体小巧，头尾能曲能伸，宛转灵活。竹圈联成蚕身，绳索系其内，白布蒙其外，外用红绿彩环缠身，由三个舞技出众的民间艺人分别持头、腰、尾三个部分执耍。龙头蚕身灯一般都是成对出行。出灯前，每对灯都要下到江边“吸水”，然后才沿门沿户祝福吉祥。为什么要吸水呢？很好理解，龙吸饱了水，才能保证雨水充足。

南方一些地方流行舞草龙——由柳条、青藤、稻草扎成，夜晚舞耍时，龙身上满插香火，因而又称香龙、香火龙。舞龙结束时，还要在喧天的锣鼓鞭炮声中，恭恭敬敬地将草龙送到江河溪潭之中。其用意也是让龙回龙宫，以保佑一方地面风调雨顺。

舞草龙



娱神娱己

以娱神娱己为目的舞龙可追溯到汉代的“鱼龙曼延”。《汉书·西域传赞》载：“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解释说，“巴俞都卢”“海中砀极”都是歌舞名，而“鱼龙”，则是由人装扮成一种来自西域的巨形珍兽——舍利之兽，先在庭前舞蹈戏乐，然后到殿前激水，于水花飞溅中，化作一条巨大的比目鱼，“跳跃漱水，

作雾障目”。然后，再化作身长八丈的黄龙，“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故又名“黄龙变”。由此看来，鱼龙当是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大型舞蹈。由于巨鱼和巨龙之间有一个“变”的问题，因此在表演时，可能还需要幻术、布景、烟雾等来配合。

那么，“曼延”又作何解释呢？“曼延”也作漫衍、曼衍、蔓延等，是古代一种大兽的名字。据说这种大兽“似狸，长百寻”，可以“仿此演为百戏。”古代八尺为一寻，百寻就是八十丈。因而《西京赋》中有“巨兽百寻，是为曼延”之句，薛综注曰：“作大兽，长八十丈，所谓鱼龙曼延也。”由此推断，“曼延”是“假作兽以戏”，是由人扮演成各种巨兽的舞蹈。“鱼龙”当是其中典型的主要的一种，因而称作“鱼龙曼延”。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李尤在《平乐观赋》中都有对“鱼龙曼延”的生动描述。从中可以看到，作为汉代的大型歌舞，“鱼龙曼延”集合了当时最高水平的演员阵容以及布景、道具和特技，可谓规模宏大、幻象纷呈。除中心节目“巨鱼变巨龙”外，还有由人扮演的熊、虎、猿猴、大象、大雀、大龟、大蟾蜍及其他不知名的奇兽参与演出。

史料之外，还可以从汉代画像石上找到“鱼龙曼延”的影子。如铜山洪楼发现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山东沂南出土的角抵百戏画像石，上面都有鱼龙作舞的图像。



龙戏（汉代画像石）

“鱼龙曼延”从汉至唐，延续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唐以后，整体上逐渐失传，后世传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部分节目。民间的龙舞、狮子舞、麒麟舞等，可视作对“鱼龙曼延”的传承和演变。

灯与龙的结合，大约起始于宋时。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道：“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这样的龙灯，即是我们所说的放置在那里专供人们观赏的龙形灯饰。但龙是一个能行走、善飞腾的神物，总不能呆到那儿不动啊，况且无论宫廷还是民间，自古都有舞龙的传统。既然舞，就不光在白天舞，晚上也要舞，晚上舞就离不开灯，因此凡舞之龙，都通称龙灯。

龙灯会一般在佳节、盛会时举行，场地选在长街广场、村头湾边开阔平坦的地方。龙的品种丰富多彩，有竹龙、木龙、荆龙、草龙、布龙、沙龙、纸龙、醉龙；有由荷花和蝴蝶组成的百叶龙，用刨花扎成的木花龙，用铁皮卷成的铁皮龙，以及扁担龙、滚地龙、七巧龙、夜光龙、焰火龙、组字龙等等。

龙灯各地都有。重庆市铜梁县的龙灯比较出名。共和国五十周年庆典上的金色巨龙，就出自这个县。铜梁龙灯有正龙：头大、胫长、节内点灯，以灯光取代烟火，玩时比较安全。还有用竹编作龙骨，纸扎龙头，布做龙脊，借助灯火而起舞的彩龙；用皮纸或绢绸做皮，彩绘鳞甲，龙身能伸缩转动的肉龙或蠕龙；天旱时求雨，舞时可泼水的黄荆龙；用白花扎成，用来祭祀亡灵的孝龙；用稻草扎成，插入竹竿，执持起来耍舞的草把龙；以及由孩子们耍舞的，用一棵棵大白菜插上竹竿，点燃红烛，中间串以绳索的菜龙，等等。

铜梁人舞龙有不少讲究。过去沿袭汉代的春舞青龙、夏舞赤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的讲究。现在逢年过节舞彩龙，舞到人家门前就暂时停下来，龙头频点向主人拜年祝福，然后再上下翻腾，左盘右旋。这时，主人必须鸣放鞭炮以示欢迎，并用裹着钱的“红包”或糖果香烟等来答谢。

广东佛山人也喜欢舞龙。20世纪40、50年代，佛山龙多是用一把把雨伞连接，再绘上图案的“伞龙”，或是用稻草扎成的“草龙”，做工比较简单。现在的佛山彩龙，用竹篾、铁丝做骨架，龙头、龙尾用纸糊，龙身蒙丝绸，配以金属镜片、铝金纸、剪纸、绒球做装饰，造型美观，色彩艳丽。佛山彩龙的品种多样，有金龙、烟花龙、火龙、彩灯龙、坐龙、卧龙等。近年来，机械龙、电脑龙也走

进佛山彩龙的行列。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龙能喷出水柱和肥皂泡，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佛山彩龙出游时很壮观，旌旗、日月旗前边开路，塔灯、鲤鱼、龙珠作引，然后才是张牙舞爪的龙，龙后面跟着锣鼓音乐。舞龙者在锣鼓音乐的伴奏下，表演盘龙、跳龙、扣龙门、穿龙尾、龙过桥、玉龙盘柱、二龙戏珠、蛟龙漫游、巨龙腾空等舞蹈造型。香港回归期间，九龙各界举办“万尺金龙献瑞祥活动”，其高10米、长9米、宽3米，重一吨多的巨型龙头就是由佛山工艺社承造的。佛山彩龙还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出现在墨尔本、夏威夷、温哥华、伦敦、路易港等地的街头广场上。

陕西省汉中地区的板凳龙也很有特色。此龙源于一个传说：一位以打卖草鞋为生的老人，收养了两女一男三个孙子。某年春节，有钱人家的孩子舞龙灯，欢天喜地。三姊妹十分羡慕。回到家中后，聪明的小弟看到爷爷打草鞋用的长凳子，一端系着未打完的草鞋，活像一只龙头，就高兴地喊：“看这草鞋凳，活像一条龙！”两姊妹一看确实像，三个人就各举起凳子的一条腿舞了起来。他们舞得十分开心，村邻们发现后也觉得有趣，就领他们到街道上去舞。从此，板凳龙这一民间舞蹈便形成和流传开来。

板凳龙制作简单，用一块长凳木板，雕刻成龙的样子，一头为龙头，一头为龙尾。龙鳞是画在色纸或彩绸上贴上去的。三只木腿分别安在龙肚的两端，都可自由活动。舞时挑选两女一男，装成青春男女，身上披红挂绿，男的头上围白毛巾，女的头上插花朵。三个人各握一只板凳腿，两个女的舞龙头，一个男的舞龙尾，三人密切合作，舞出龙翻身、龙滚水等种种花样。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的大家庭，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也都与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动人的关于龙的传说和各种各样的龙舞。如云南彝族的牵手跳龙门，阿昌族的舞白象青龙，苗族的接龙舞，仡佬族的打花龙等。这些龙舞，大多欢快活泼，轻松有趣，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色彩。

彰力显威

除了祈雨祈福，娱神娱己之外，舞龙还有彰力显威的作用。人们相信，歌之唱之，可以召唤龙的神灵；舞之蹈之，可以模仿龙的神态；有歌有舞，既可以使

神龙欢愉喜悦，也可以使自身秉赋龙性。同时，通过舞龙，也使舞龙人的力量和威风得以彰显。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舞龙本身是一个力气活，那些由腾跃、翻滚、盘回、穿插、耸立等构成的诸多套路、造型，不出大力就完不成。二是龙是力量的集合、力量的象征，自然界的诸多动物和天象，都将自己的力量投赋在了龙的身上。舞龙也就是显示天的威力，显示天的威力的同时也显示了人的威力。第三，不排除对龙的调侃和不敬。由于龙既是自然力的象征，也是帝王皇权的象征，常常以张牙舞爪、狰狞踞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使芸芸众生不得不以敬畏的心态相对待。现在好了，机会来了，老百姓可以借助舞龙出出气了，可以按龙头、折龙身、揭龙尾，尽情地把这个帝王之像折腾、戏耍、嘲弄一番了。

重庆铜梁、广东丰顺等地流行的“烧龙”，就含有多重意味。铜梁人认为，烧龙是为了送龙上天，龙上天后才能负起责任，及时地兴云布雨。于是，在龙灯会达到高潮时，狂欢的人们，或点燃鞭炮朝龙身上扔，或释放焰火喷龙，或把熔炉里滚烫的铁水舀出、抛起、打散，让四溅的火花烧龙……丰顺人烧龙源于一则传说：很早以前，一条火龙来到丰顺地面，此龙浑身喷火，致使禾苗焦枯，田地干裂。一对年轻夫妇领着大伙凿山引水，渠成水到之时，火龙赶来破坏，烧死了年轻夫妇，也烧干了水源。年轻夫妇的儿子继承父母遗志，外出学法三年，归来后和火龙苦战三天三夜，终于以毒攻毒，用神火将火龙烧死，自己也力尽而亡。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再也没有闹过旱灾。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当地老百姓便年年举办烧龙活动。所烧之龙一般用竹纸扎成，长15米到20米，龙身扎满鞭炮。经过引龙出海、请龙、戏龙耍龙等程式，直到鞭炮放完，龙体烧尽为止。有的地方做得更干脆更彻底：在龙身里装满土火药、土烟花，耍到最热闹的时候，一把火点着，只听“轰隆”一声响，龙嘴喷火，龙尾冒烟，龙身开裂燃烧——我们的龙神就在震耳的镣铐鞭炮声，和喧天的欢呼惊叹声中渐渐地化为一团团灰烬。

稍稍分析，我们就会明了烧龙是集祈雨祈福、娱神娱己和彰力显威为一体的综合性习俗。因为所烧之龙，既是水神或火神，也是帝王之象，通过烧龙，既能送龙上天，让其负起布雨的责任；也能产生十分壮观的场面，让目睹者喜闻乐见；还能体现一种力量，正胜邪，善胜恶，受压迫的民众反抗、戏弄皇权的力量。



铜梁火龙

旺丁兴族

旺丁兴族是舞龙的深一层寓意，其根据是“灯”与“丁”的谐音象征。中国民间有元宵节做桔灯（谐“吉丁”）、添灯（谐“添丁”）、用面粉捏制十二生肖灯（生肖和生育关系密切）、送灯（谐“送丁”）、偷灯，尤其是偷庙里的“莲灯”（谐“连丁”）、迎花灯（谐“迎花丁”）、接灯、还灯、完灯（小孩长到十二岁时，由舅家送最后一次灯），以及上灯棚、穿灯脚、打点仔灯、挂子孙灯、燃照岁灯等习俗。这些灯俗，都含有繁盛人丁，兴旺家族，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求吉祈福的寓意。

龙灯也是灯，是“灯”就谐“丁”。而且，龙是中华民族的图徽，是力量和智慧的象征，龙灯也就寓意着“龙丁”——谁不希望自己的家里出一个“龙子”呢？这样，在全国各地的舞龙活动中，常有一些和“龙丁”相关的程式、讲究、说词。

浙江奉化流行盘龙灯——龙灯队“盘”到子孙众多的大户人家，放“百子炮”；盘到小户人家，放三只连响炮。放炮者不能将炮蹲在地上放，认为炮一蹲地，就意味着这家子孙是“泥坯子”；要将炮提在手中放，寓意“龙子”一步登天。盘到新屋落成的人家，要让这家的妇女“摸龙须”和“龙角”（象征性地与龙交会），让其小孩“钻龙门”（和“登龙门”意同，认为钻过“龙门”就有了成“龙”的希望）。龙灯不会白舞，钱呀物呀，总是需要的，而且多多益善。平时生活再节

俭的人家，这个时候一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

湖南湖北一些地方，人们相信龙灯对生育有利。在龙灯舞到门前时，那些多年求子不得的妇女，往往加钱加物，让“龙”绕一绕自己的身体，并让一个小男孩骑到龙背上绕着厅堂转一圈，扮演一番“麒麟送子”——麒麟当属龙族神物也。对此，有人还作了这样一首诗：“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安徽黟县流行中秋节小儿舞草龙，有孩子的人家都愿意让娃娃们出来舞一舞，没有孩子的人家怎么办呢？找机会用新灯烛去换插在龙头上的灯烛，据说这样做便能得“龙子”之兆。

浙江东阳、金华、贵州桐梓等地的龙灯会，有分子息（舞完龙灯会分灯或分糖果礼物）、挂红（村主或族长给龙头上披挂红绸被面）、抢红（谁家将此被面抢购到手，谁家就子孙兴旺）、产龙蛋（舞龙者进屋后，将两个红鸡蛋送给主人，让主人放到被窝里）、放圆宝（将逗要龙灯的圆宝在家中存放一年，来年灯会前奉还）等节目。因为人们祈求子息、旺丁兴族的愿望代代传承，这些节目也就常演不衰。



（获“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优秀论文奖；收入《中国龙文化与龙舞艺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舞龙的创造学考察

舞龙是龙的传人们所创造的一种融传承文化、聚合族众、表达祈愿、娱乐生活、强健身体等功能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它以舞蹈者手持龙形道具或以人体组合模仿龙的形态而得名，是龙的精神的形象化和动态化。考古发现和古籍资料说明，舞龙很有可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出现，至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已初具规模。承传发展至今，舞龙活动已遍布全国各个省区、各个民族，及海外所有的华人居住区，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的最鲜明、最具动感的族群标志、文化符号和精神表征。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现象进行了研究，写了一部名为《创造论》的创造学著作，提出了“创造是由创造物参与并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经过创造过程完成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创造物是宇宙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所有的物体和事象的通称”“世界的本来是创造，人的本质是创造；创造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律；创造态是世间万事万物最基本、最普遍的存在方式”（庞进：《创造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版）等系列观点。现在，我就用其中的部分观点，对舞龙这个创造物做一番简略的考察。

一

我们说，创造律是创造物必然进入创造过程，必然要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从而必然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规律。作为内在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重复的和相互制约的联系，创造律决定着一切创造即一切事物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创造律有三条：新异替变律、加减化合律和文明积淀律。

新异替变律可简称新异律，是创造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律，它意味着

任何创造，都必须也必然以追求和出现新异替变为目的，新异替变越多，创造性越大。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这样说，当距今约八千年前，居住在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的先民用褐色的石块摆砌出一条长达 20 米的属于兴隆洼文化的蛇形巨龙时，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创造物便问世了。随后，生活在陕西宝鸡北首岭的先民在一个蒜头壶上，刻画出了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近七千年的鱼形龙；生活在浙江余姚的先民在一块象牙上，刻画出了属于河姆渡文化的距今达七千年的鸟形龙；生活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先民用一枚枚蚌壳，摆砌出了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达六千五百年的鳄形龙；生活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先民在一件陶尊上，绘制出了属于赵宝沟文化的距今达六千八百年的猪形龙、鹿形龙、鸟形龙；生活在浙江余杭的先民在几枚玉琮上，刻画出了属于良渚文化的距今达六千年左右的虎形龙；生活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先民采用一块上好的玉石，雕刻出了属于红山文化的距今达五千年的兽首龙……这些“原龙”的出现，无不符合新异替变的规律，在中华龙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创生和奠基之功。新异替变是没有终点的，新石器时代的简单粗糙的“原龙”之后，出现了商周时期的神秘抽象的“夔龙”，秦汉时期的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威猛与柔和并存的“行龙”，元明清时期的复杂华丽、时作凶恶状的“黄龙”……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看到了种种新颖别致的“祥龙”，如穿福字褂、钱字衫、骑摩托、打手机、用各种卡的“时尚龙”，以绿叶为发、为眉、倡扬绿色理念的“生态龙”，承载和体现着当代科技成果的光缆龙、数码龙、卫星龙、飞船龙……

学者们基本上都同意，将舞龙的创始权归功于商代人，其理由，主要是甲骨卜辞上有祭龙祈雨的记载，而其时的祈祭活动，都要假以巫舞的形式。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考察得再早些：龙在距今八千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既然能在地面上摆砌龙、在陶器上刻画龙、在身体上佩戴龙，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的场合舞蹈龙。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想，有待考古发掘出明显的证据，才能成为确论。相比之下，汉代人的创造力似乎更强盛，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使舞龙跨上了一个台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汉代宫廷，有供娱乐和欣赏的大型舞蹈“鱼龙曼衍”；在民间乡野，有用来祈雨祷神的舞五色之龙。汉代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里，有一大段当时的乡民春旱求雨舞青龙、炎夏求雨舞赤龙或黄龙、秋季求雨舞白龙、冬天求雨舞黑龙，

以及这些龙长达数丈，每次出动五至九条不等的记述。而“舞龙”一词，也最早出现在董氏的这部著作里。

在舞龙的发展史上，唐代人的贡献，是把灯烛与舞龙结合起来，使舞龙活动由白日延伸到夜晚，而且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龙灯”。其情形，可从唐代诗人张说《踏歌词》中的诗句“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中见其端倪。进展到宋代，龙灯似乎已成为民间节庆时不可缺少的主要的娱乐节目。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云：“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一舞就是一整夜，而且“风箫声动，玉壶光转”，可见景况之盛。

千百年来，舞龙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到当代，其品种之丰富、风格之多样，让人有举不胜举、观不胜观之叹。以制作材料分，有布龙、纱龙、绸龙、纸龙、草龙、板龙、柴龙、竹龙、篾龙、钱龙、谷龙、麻龙、板凳龙、扁担龙、稻草龙、棉花龙、百叶龙、蓼叶龙、荷花龙、花环龙、草绳龙、冬瓜龙、鸡毛龙等；以形态特征分，有鳅龙、虫龙、蛤蟆龙、蚕身龙、蝴蝶龙、狗婆龙、青蛙龙、鲤鱼龙、鹅公龙、蜈蚣龙、独角龙、高头龙、矮脚龙、庖颈龙、短尾巴龙等；以结构特点分，有缩龙、节龙、段龙、串龙、片龙、手龙、断头龙、断颈龙、硬颈龙、折鳞龙、筒子龙、脱节龙、袖珍龙等；以动作特点分，有游龙、睡龙、飞龙、醉龙、爬龙、跑龙、跳龙、站龙、滚地龙、滚花龙、走马龙、圈子龙、座仔龙、吊吊龙、拉拉龙、扭扭龙、疙瘩龙、大绞活龙等；以内容特点分，有拼字龙、罗汉龙、故事龙、母子龙、五股龙、云牌龙、高跷龙、顶碗龙、抬阁龙、鱼化龙等；以数目称谓分，有独龙、双龙、单龙戏虎、一龙九柱、二龙戏珠、三龙相会、五龙拱圣、九龙盘鼎、十三太保龙等；以色彩称谓分，有黄龙、白龙、墨龙、黑龙、乌龙、苍龙、青龙、赤龙、红龙、金龙、彩龙、花龙、五色龙、七彩龙、九彩龙等。另外，还有不用道具，以人体接成的人龙和肉龙，专由女子舞耍的女子龙，由儿童玩耍的娃娃龙等。（梁力生、葛树蓉：《中国龙舞》，重庆出版社 2002 年版）而且，即使叫同一名称的龙，舞的方式也多有不同。

舞龙原属于流行于民间的群众性的自发的文体活动，其登堂入室，成为国家重视的竞技性运动，即所谓“由一般的表演活动，发展成为一项集娱乐、喜庆、竞技和健身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体育活动，并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竞

技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事，其标志，便是 1995 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受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成立，和《中国舞龙竞赛规则》的出台。由民间自发而政府重视，由随意尽兴而科学规范，由祈神娱己而比赛竞技，其发展演化，以创造学的观点视之，均为创造律使其然，都可谓“新异替变”的结果。

这期间，供职于中南大学体育部的著名舞龙专家黄益苏先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黄先生从 1994 年开始到 1997 年，组建了中国高校第一支教工舞龙队；1999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舞龙舞狮运动的专著——《龙狮表演与竞赛》；2003 年正式挂牌成立了“中南大学龙狮运动研究所”，首创并先行“百校龙狮进课堂推广计划”，得到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河海大学、东北大学等六十多所大学的加盟和参与；2005 年，黄先生出任湖南省旅游节开幕式“百龙祭祖，万龙归宗——全球华人共祭炎帝始祖大典”舞龙表演的创艺编排和现场指导……

舞龙进大学，在黄益苏先生和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看来已呈方兴未艾之势。那么，能不能让舞龙进中学、进小学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省，舞龙教材已于 1996 年正式列入小学的体育课程，而在之前的 1992 年，位于台湾中北部的苗栗县的中和国小就建立起一支舞龙队，之后，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发展至 2004 年，该县已有包括高中、初中、小学在内有三十五所学校四十四支舞龙队。（廖金文：《苗栗舞龙文化》，台湾苗栗县造桥国民小学 2004 年印行）台湾同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鉴于此，我们在此特向有识之士和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呼吁和建议：大家共同努力，让舞龙活动尽快进入中国的每一所中学和小学。

在中、小学开展舞龙活动，我想至少有三大好处：1.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龙是中华民族的徽标，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其表象瑰丽神奇，其内涵丰富深邃。通过舞龙，可以使青少年对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底蕴有一个形象化的感受和理解，从而热爱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弘扬、发展的责任。2. 培养团结协作精神。舞龙是团结凝聚的产物，是众人合力的结晶，没有团结和协作，任何一条龙都难以舞动；而在舞龙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个体的不配合或出现失误，都会对舞蹈的整体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让青少年学习和练习舞龙，无疑有助于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3. 强健体魄，娱乐身心。舞龙属于大运动量项目，可以强健人的体适能，如心肺耐力、肌力、肌耐力、柔软度、

身体质量指数，及敏捷、平衡、协调、速度、反应时间、瞬发力等等。所以，台湾学者廖金文指出，“发展体适能是舞龙在体育上的重要贡献”。（廖金文：《苗栗舞龙文化》，台湾苗栗县造桥国民小学 2004 年印行）同时，舞龙又称“耍龙”，其参与性和娱乐性都很强，对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好处多多。

二

加减化合律简称化合律，是创造律中的方法律，它意味着一切创造都必须也必然以加减化合的方式进行。没有不以加减化合为手段的创造，加减化合的方法贯彻在任何一个创造过程的始终。加，有两层含义：一是参加，加入；二是增加、添加。减，也有两层意思：一是减去，退出；二是减少，缩小。而化合，则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创造物在一个创造过程内交互作用，从而生成新的创造物。

在石器时代，当某一个地方的原始先民以蛇或鱼为蓝本，加以鳄或蜥蜴的足、牛或鹿的角、龟或兔的眼，等等，用石块在地面上摆置出来，或在陶器上刻画出来，中华第一条蛇形原龙或鱼形原龙便宣告诞生了。之后，各处的先民也纷纷参与，或以猪为蓝本，或以鳄为蓝本，或以蜥为蓝本，或以鲵为蓝本，或以熊为蓝本……加减化合，造出了中华第一批蛇形原龙、鳄形原龙、鲵形原龙、猪形原龙、熊形原龙……

同样的道理，当汉代，或更早些的商代、夏代，某个地方的某位或某几位乡民忽然灵机一动，仿照摆放在地面上的石龙、土龙，或陶器上的画龙的样子，用树枝、竹篾、布帛、线绳等札制成龙的形状，将其举在空中上下来回地舞动时，第一次舞龙活动便开始了，第一条用于舞耍的龙就问世了。这当然是加减化合的产物，参与的创造物至少有被仿照的石龙、土龙、画龙，树枝、竹篾、布帛、线绳，舞龙者的创意、动作、激情，以及当时当地的阳光、云霞、风尘，等等。

之后历朝历代的舞龙尽管式样繁多，千姿百态，层出不穷，考察其形成的方式，也无外乎加减化合四个字。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舞龙，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在前面已经出现过的舞龙的基础上，加点什么，或减点什么，然后化合成一种新的舞龙。

我们不妨以“2005 中国湖南省旅游节开幕式”上的舞龙表演为例：据媒体

报导，参与的节目有：舞龙专家黄益苏先生“十几年来研究的各种经典样式的舞龙形式”“属于国际创新舞龙项目”的“一条女子龙和一条男子龙”——“女子身着红衣寓意火龙，男子身着青衣寓意青龙，行八卦、飞九宫，演绎天圆地方、阴阳搭配，神秘莫测的八八重卦和炎帝组合的六十四卦”“三人布龙”“五人小龙”“人龙”“百草药龙”，等等。这么多“龙”字号的创造物“加减化合”，难怪有“龙文化狂欢”之誉，“不仅在气势上创下了年内舞龙表演之最，而且在表现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从舞龙的意蕴和功能来看，起初主要是“祈雨”，因为雨水，对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来说，那可是太重要了。龙的容合对象，无论蛇、鳄、鱼等动物，还是雷电、云、虹等天象，都和雨水有密切的关系，先民们认为，龙是掌管雨水的神灵，只要向龙祈祷，就能得到想要的雨水。民以食为天。风调雨顺，稼禾丰收，有一口饱饭吃，就是有福的日子了。于是先民们相信，这有福的日子是龙带来的，这样，舞龙，就增添了“求福”的用意。龙降了雨、赐了福，质朴的人们，就要酬谢龙；加之龙是祖先创造并崇拜的神物，舞龙的技艺是先辈们传下来的，于是，舞龙又加上了“感恩”“谢神”“敬祖”的用意。龙灯出现后，舞龙和烟花爆竹相结合，出现了“火龙”“炸龙”“烧龙”。古人认为，火之光焰和热烈、爆竹之声响，是鬼魅邪祟所惧怕的东西，于是，舞龙，尤其是舞火龙，便有了“驱祟”“辟邪”的用意。既能祈雨，又能求福，还能驱祟、辟邪，于是人们便将“旺丁”“兴族”的功能赋予舞龙。舞龙的花样不少，套路很多，加上锣鼓、乐器、观众情绪和掌声、喊声等的配合，是很好玩的、有趣味的，舞好了是很美、很威风的，当然，也是很费力气的。于是，舞龙，便又添加了“游戏”“娱乐”“健身”“彰力”“比美”“显威”等用意。进入现当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舞龙常在大大小小的庆典活动中亮相，于是，便有了“添彩”“欣喜”“助兴”的用意；有的舞龙队还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到全球各地去表演，这样，舞龙又担负起“敦睦”“传情”“示好”，甚至“招商”“引资”的大任……

舞龙的意蕴和功能呈越来越多样、愈来愈丰富的趋势，但并非只“加”不“减”。比如“祈雨”，现在已几乎退出了，尤其在大型表演的场合。

三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积淀和凝结着几十万年来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自身所付出的巨大智慧，标志和显示着人类社会开化、进步、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与程度。文明积淀律可简称文明律，是人类创造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人类的任何创造，都要依循和遵守文明积淀的规律——非人类创造则不受其约束。这里有若干条基本原则，我们略讲三条——

一是滤汰的原则。即在人类的创造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滤筛和淘汰——留下合适的、进步的、优质的，弃掉不合适的、落后的、劣质的。比如龙的“比帝”的神性，即做专制帝王的象征物的神性，在漫长的阶级社会，相对于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或许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在进入以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当代社会，“比帝”就成为需要清理、批判、抛弃的东西。而龙身上所凝结和显示的好飞、通天、显灵、征瑞等神性，所体现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则成了需要保持和发扬的东西。

二是福生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类的任何创造都要以造福于众生为目的。这里的众生，主要指人，即要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有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有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就要受到抑制、惩罚和修正。中国民间流传有不少孽龙、恶龙、毒龙兴风作浪、为害一方，最后被惩处、被斩杀、被降服的故事，就是此原则的体现。当然，众生不光指人，还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

三是守德的原则。即作为创造主体，人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要遵守某些公认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即起码要守住一个普适的道德底线。比如，舞龙本是一项积极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但若用其来强取巧夺谋求私利，性质就变味了。新华社曾发过一条题为《舞龙专家痛斥“乞讨龙”》的消息：湖南平江、衡阳两县，有少数村民于春节期间，在公路上以舞龙为名向过往司机强讨“买路钱”。著名舞龙专家黄益苏先生看到报道后深感愤怒，呼吁执法部门进行干预。他指出：“这种行为简直是明火执仗的打劫，反映出一些人道德品质的低下，不但违背了国家法律，也背离了民俗的范畴，丢了这项运动的颜面。”（刘涛、文远竹：《舞龙专家痛斥平江、衡阳“乞讨龙”》，新华网 2002 年 2 月 22 日）在这里，“乞讨龙”的玩家们，丢弃的是一个“德”字；而黄先生所坚守的，也是一个“德”字。

（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版）



铜梁龙与中华龙渊源研究

一、中华龙文化的六个历史时期

中华龙文化是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密切相关的文化。从远古至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大体经历了起源、初成、成型、强盛、延展、复兴六个历史时期。中华龙文化是这六个时期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标志者、体现者，而且，与这六个时期相对应、相契合，中华龙文化也大体经历了起源、初成、成型、强盛、延展、复兴六个历史时期。其情形大体如下——

(一) 起源期

时间跨度从前 8000 年至前 3000 年，即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距今约 10000 年至距今约 5000 年。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发现于山西吉县柿子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 10000 年，由鹿头鱼尾等元素组合而成，堪称“萌龙”的岩画；有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约 8000 年的石块堆砌龙和两枚龙

纹陶片；有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 7000 年的鱼龙凤鸟纹蒜头壶；有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 6500 年的蚌砌龙；有出土于湖北黄梅白湖乡焦墩大溪文化遗址，距今约 6000 年至距今约 5000 年的河卵石摆砌龙等。起源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

（二）初成期

时间跨度从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即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距今约 5000 年至距今约 4000 年。代表性的龙文物，有被研究者推断，可能出土于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 5000 年的鸟龙纹彩陶盆；有出土于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 5300 年至距今约 4200 年的龙首镯；有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属于红山文化，距今约 5000 年的玉龙；有出土于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 4300 年至距今约 4000 年的蟠龙纹彩陶盘等。初成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初成。

（三）成型期

时间跨度从前 2000 年至 220 年，即历夏、商、周、秦、汉五个朝代，距今约 4000 年至距今约 1800 年。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 3800 年至距今 3500 年的绿松石龙形器等；有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距今约 3200 年的玉雕龙等；有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距今约 3000 年的龙纹青铜立人像等；有出土于陕西西安、宝鸡周代墓葬，距今约 3000 年的利簋、何尊等；有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区，距今 2200 多年的夔龙纹铜车马等；有出土于陕西汉长安城遗址，距今约 2000 年的龙纹瓦当等。这个时期也是舞龙的起源期，在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记述中，舞龙已是其时求雨民俗的组成部分；《汉书·西域传》也载述了其时的大型舞龙表演节目“漫衍鱼龙”。成型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成型。

(四) 强盛期

时间跨度从 220 年至 1279 年，即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三朝，距今约 1800 年至距今约 800 年。代表性的龙文物，有出土于河南邓县南朝墓，距今约 1600 年的奔龙纹画像砖等；有镶嵌于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距今约 1400 年的龙纹石栏板等；有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郊草场坡唐墓，距今约 1300 年的鎏金铜龙等；有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画家陈容作，距今约 800 年的《云龙图》等。强盛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强盛。

(五) 延展期

时间跨度从 1279 年至 1912 年，即历元、明、清三朝，距今约 700 年至距今 100 多年。代表性的龙文物，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窑烧制，距今约 700 年的青花云龙纹罐等；有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 600 多年的大同九龙壁等；有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 250 多年的北京故宫九龙壁等，有清政府于 1888 年确定的大清国长方形黄龙纹国旗等。延展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延展。

(六) 复兴期

时间跨度从 1912 年至今，即由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时 100 多年并继续延伸，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至今。复兴的“复”，是“再次”之意，“复兴期”即“再次兴盛期”。此时期代表性的龙文物，有 1950 年以来，置于北京天安门城楼正面，衬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金龙和玺彩画；有 2015 年 9 月，中国向联合国赠送的顶部有龙饰的“和平尊”（相关报道说，“和平尊”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工艺制成，以“中国红”为主色调，顶部有龙饰，象征守望和平）等。代表性的龙民俗，有重庆铜梁龙舞、广西宾阳炮龙节、多地区都有的

龙舟赛等。复兴期的中华龙文化，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

二、铜梁龙与中华龙的历史分期

(一) 铜梁龙与中华龙的起源期、初成期

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期和初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说。这六大文化区系是：(1)以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区的北方文化区系；(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系；(3)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系；(4)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地带的中原文化区系；(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文化区系；(6)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系。

铜梁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新石器时代，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期和初成期，也即中华龙文化的起源期和初成期，属于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系。

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前五个区系都有被学术界称为“原龙”(即“原始的龙”)的考古文物出土，如属于北方区系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石块摆砌龙及龙纹陶片，属于中原区系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蚌砌龙，属于东方区系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山东临朐朱封遗址龙山文化龙纹玉器，属于东南区系的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龙首镯，属于南方区系的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大溪文化河卵石摆砌龙等，唯有西南文化区系至今还没有“原龙”出土。

显然，要把铜梁龙的起源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华龙文化的起源期与初成期，还有待于西南文化区系有考古学意义的“原龙”出土。也就是说，如果将考古学意义上的是否有“原龙”出土作为标准来判断的话，目前还不能将铜梁龙与中华龙的起源期与初成期相对应。

(二) 铜梁龙与中华龙的成型期

到了承接中华龙文化起源期与初成期的中华龙文化成型期，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秦、汉五个朝代，在考古出土的龙文物方面，西南文化区系就再不是空白了。目前来看，最早填补这个空白的，是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 7 公里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龙文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文物，有青铜龙形饰、青铜龙柱形器、青铜龙虎尊、青铜神树龙纹、青铜立人龙纹、青铜牛头龙身怪兽，及龙纹玉璋、龙纹玉琮等。这些龙文物，反映了很可能来自中原的中华龙文化对三星堆人的影响，和三星堆人对中华龙的认知、喜爱、崇拜。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断代，最新的数据是前 1199 年至前 1017 年，即距今约 3200 年至距今约 3000 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商、西周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些龙文物，地理位置上属于西南文化区系，时间定位上属于中华龙文化成型期，它们与出土于其他文化区系的同时期的龙文物一起，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成型。

位于渝西腹地的铜梁距离四川广汉的直线距离大约 200 公里。那么，生活在商、西周时期的铜梁人，有没有可能受三星堆人影响，对中华龙也有所认知，进而喜爱、崇拜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也就是说，在商、西周时期，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中华龙文化有可能影响到了当时的铜梁人。

铜梁在地理位置上大体上还与古巴国所辖区域重合。古巴国是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周王族诸侯国。该国形成于前 11 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于前 316 年的战国中期，约有 800 年的历史。巴国人的崇拜对象除虎之外，还有蛇、龙。

判断巴国人崇蛇、崇龙的理由至少有四：(1) 巴国是周王朝分封的姬姓周族诸侯国，而姬姓周族是崇龙的部族，《周易》的“乾卦”可谓以“龙”为喻体的“龙卦”，龙纹是西周青铜器主要纹饰。周族人将崇龙文化带到巴国符合情理。(2) “巴”字本义指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蛇。《说文·巴部》：“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蛇是龙的排在前列的取材对象，民间称蛇为“小龙”，崇蛇意味着崇龙。(3) 湖北宜昌长阳香炉石遗址是古巴国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两枚断代为商末周初的陶质椭圆柱形印章，其中一枚的印文呈巨口利齿状，当与水生动物相关，古文字学家夏渌将其断为“蛟”。蛟的本义是鲨鱼，鲨鱼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蛟还通“蛟”，蛟为古代传说中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龙。(4) 巴国为秦人所灭，

而秦人是崇龙的，秦始皇有“祖龙”之称，秦人在灭巴之时、之后，将崇龙文化带到巴地符合情理。

铜梁博物馆藏国家二级文物商代青铜方鼎，1973年出土于铜梁土桥垣坝张蔡蒙墓，通高25.6cm、口径33cm、重5.2kg，做工较为精细，通身以饕餮纹为饰。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最早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考古学家李学勤认为饕餮纹图像“下部的兽很可能是当时龙的形象”（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第90页）。后世将饕餮作为“龙生九子”的“九子”之一。

铜梁境内有永嘉崖墓群，其上刻有双鱼、鱼龙变化等图案；有石鱼田家堡崖墓群，其坡顶东面有鱼及巨蛇造像。两处文物均属汉代。鱼、蛇均为龙的取材对象。

还有，铜梁安居镇民间，有鲁班修庙祭神龙止住涪江水患的传说。鲁班是东周时期鲁国人，其生存年代在前500年前后，距今约2500年。

综上，我们可以有中华龙的成型期是铜梁龙的奠基期的认识，也即，铜梁龙的奠基期可追溯至中华龙的成型期即属于先秦的商、周时代。

（三）铜梁龙与中华龙的强盛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三朝，是中华龙的强盛期，也是铜梁龙的萌发期。

《铜梁龙灯志·大事记》载：704年（唐武周长安四年），铜梁始建县。此前本地已有《夜明珠》《二十四个望娘滩》等有关龙文化的传说。

在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夜明珠》《二十四个望娘滩》都属于“吞珠化龙型”传说故事。其故事梗概大体为：一穷人家孩子割草时发现某处青草特别旺盛，遂在其处刨挖出一枚晶莹明亮的宝珠。此珠放在米缸涨米、放在钱柜涨钱。从此其家不再为吃穿发愁，还可接济乡亲。村中恶霸闻知后率家丁至其家抢珠，情急中孩子把宝珠放进嘴里，吞入肚中。于是口渴难禁，喝干了家中水缸，又冲出家门，将附近江水喝了一半……风雨雷电中，此子长角生鳞，变成了一条龙，掀起波涛洪水，将恶霸一行淹死……

“吞珠化龙型”传说故事，反映、体现了龙的显灵、征瑞、喜水、善变、好

飞、示威等神性；也反映、体现了农耕社会阶级的分化、矛盾、冲突，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龙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对人性贪婪的惩罚，等。

这样的民间传说故事，能在唐代铜梁始建县时就已流传，至少说明唐时的铜梁人已对龙的显灵、征瑞、喜水、善变、好飞、示威等神性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也有了以龙的形象、传说故事，反映、表现其时社会阶级的分化、矛盾、冲突，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龙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对人性贪婪的惩罚等的需要。

铜梁倡俸寺正殿金柱上，刻有龙抱柱图案，断代为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

铜梁巴岳寺内，有属于唐代遗存的斜撑半圆雕，其横梁上有二龙戏珠图案，看枋上有卷草龙纹图案，角花有镂空雕卷草龙。

铜梁安居波伦寺大殿两根柱头上，刻有龙抱柱图案，断代为宋代。

铜梁博物馆藏国家二级文物宋代青铜熏炉，1973 年出土于铜梁土桥垣坝张蔡蒙墓，通长 20cm、宽 35cm、高 51.8cm、重 16.9kg，造型为角（lù）端踩蛇。角端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属于龙族的神物，蛇是龙的主要取材对象。

综上，我们可以有中华龙的强盛期是铜梁龙的萌发期的认识，也即，铜梁龙的萌发期可追溯至中华龙的强盛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

（四）铜梁龙与中华龙的延展期

元、明、清三朝，是中华龙的延展期，也是铜梁龙的成长期。

1588 年（明万历十六年），曾任河南巡抚的铜梁籍名人胡尧臣撰写了一篇《圣水寺灵异记》，记述其耳闻目睹及亲历的老家安居县（今铜梁安居镇）有关龙文化的建筑及事件。据该文所记：

（1）铜梁境内有源自涪江的水潭，临潭的山上有不知创自何时的龙女庙，此龙女庙供祀的龙女是“蜀川重庆路菜州米市坝兜溪龙王敖广仙妹珍淑”，此女因“行雨部解救有功”而被“上帝”“敕封东淮洞达慈孝龙女元君，受兹享祀”。

（2）铜梁境内的安居溪，又名琼江，“系西海龙宫也”，即可通往“西海龙宫”或归“西海龙宫”管辖。

（3）铜梁境内有圣水寺，寺内供奉有龙女像。

（4）明代正统年间，“时有主簿武韬因地方告旱，率彼人民，敬诣灵祠，祈

祷圣水。时即雷雨不停，风波浩荡，果获显验”。之后，“凡四境地方遇旱，不问遐迩，求祷其间……”。“嘉靖三十年，羽士樊性善背剑入水，徇身得雨。”“四十五年，县尹洪一貫亲身投瓶……因得甘雨连宵，以享有年之庆。”“万历元年六月旱，本县官民祈请未应”，胡尧臣遂“偕我二弟及同志诸君”，“谒龙女像位”“遽临江之浒”，采用封瓶投水法求雨，凡十余次，“二三日间，时有霖雨。至十七日，雨大通而西成，沾润殆无遗壤也。”

《铜梁县志·杂记·安居乡附》收录了一则传说：籍贯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的进士文方到安居的兜溪一带游览，遇到一位绝色美女，很大方地和他下棋饮酒，熟悉后才知此女是龙女。文方提出到龙宫拜访一下，龙女就把他带到龙宫并设宴款待，龙宫的玉阶琼室历历在目。文方喝醉了，想回家。见有一只很可爱的金毛小狗，想把它带走。龙女说人间恐难养活，便以一捧红豆相赠，说有红豆或可留住小狗，但一定不要让它见水。龙女派人送他上岸，文方一看离入水处已七十多里远了，赶忙揽起袖子找那只小狗，没想到那小狗一见到江水就消失不见了，再看红豆，全是一颗颗的明珠，因此后人把这个地方叫别狗沱。此传说很可能产生于明代，因为文方是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

按上述记载，明朝时，铜梁境内即建有龙女庙、供奉有龙女像，其时的铜梁人有龙王、龙女信仰，也流行天旱时向龙女祈雨的习俗。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如果祷龙祈雨成功，旱象解除，民众往往要以舞龙、龙灯会的方式庆祝、谢龙。那么，其时铜梁有这样的民俗活动吗？按逻辑和常情推理，应该会有的，只是没有明确记载。

在铜梁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属于明代的，有安居妈祖庙看枋上的草龙图案和宝顶圆雕二龙戏珠，有安居湖广会馆戏台对面看台上的石雕蟠龙，有安居会龙桥上的圆雕双龙，有旧县宋平佛耳岩摩崖造像石窟内的巨大龙头。

在铜梁的可移动文物中，属于明代的，有铜梁博物馆收藏的一枚属于国家三级文物的乳钉龙纹铜镜，通长 12.5cm、宽 12.5cm、厚 1cm、重 0.526kg。造型为正圆形，镜的一面浮雕带爪龙纹及云纹图案。该馆还收藏有从民间征集到的仙客乘龙纹石材、二龙抢宝纹祖宗香火神龛等。

有关铜梁龙的明确记载出现在清代。

清朝道光年间（1820 年至 1850 年），铜梁民间有了“大足朝佛（石刻），铜

梁观灯（龙灯），合川看春”之说，这说明在清代，铜梁龙中的龙灯系列已经出现，且在当地和周边区域有了较大影响。

到了 1875 年（清朝光绪元年），新出版的《铜梁县志》，收录了明代朝廷命官胡尧臣所撰的记述有关铜梁龙的建筑、信仰、民俗等的《圣水寺灵异记》一文，并有了关于铜梁龙灯会盛况的记述：“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阗街市，有月逐人、尘随马之观。”这是明确的、最早记录铜梁龙的文字。

清朝同治年间（1862 年至 1875 年），铜梁人为了向吴春海翰林家作贺，特将十八种鱼灯加以组合，名曰《十八学士》。鱼是龙的重要取材对象之一，民间历来有“鱼跳龙门”“鱼化龙”之说，故“鱼灯”可谓“龙族之灯”即“龙灯”的组成部分。

在铜梁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属于清代的相对较多，有巴川武庙山门口的二龙戏珠石屏和正殿前的九龙捧圣石刻，有狮象桥桥中孔上部的圆雕昂首龙头，有土桥龙神庙内“当今皇帝万万岁”石碑上的浮雕九龙图案，有大庙化龙岩摩崖圆雕龙头，有华兴杰家坟牌楼横梁、柱坊上的二龙抢宝、鱼跃龙门图案，有东城邹明伦墓墓碑牌楼两侧看坊上的浮雕龙纹等，达十六件。

在铜梁的可移动文物中，属于清代的也相对较多，有铜梁博物馆收藏的属于国家二级文物的粉彩九龙瓷缸，缸的壁面饰有九条龙的图案。之外，还有从民间征集来的粉彩龙凤图案瓷茶壶、龙形图案青花瓷碗、粉彩龙纹瓷缸、青花龙纹瓷盘、龙凤呈祥陶质南瓜坛、双龙耳银杯、龙形双耳白玉杯、四爪龙纹织绣补子、刺绣龙纹丝绸、双龙送福木质大窗心、嵌雕龙方桌、楠木龙雕太师床等。

1904 年，据铜梁巴川人沈俊声讲，他的师傅周掘安、胡少良、兰仲田等，大约在这一年从外地学回了五人玩舞的小彩龙。

1911 年，铜梁工商从业者罗夕之，利用自己擅长武功拳术的优势，改制狮灯造型，创编出狮灯套路，使铜梁的亮狮成为铜梁龙灯系列中独特的灯舞品种。狮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中国本土不产。最早可能是在汉朝时期，狮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舞狮活动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舞狮因舞蹈者手持狮形道具模仿狮的形态而得名。千百年来，人们赋予舞狮辟邪、祈福、娱乐等功能，这

些功能也本是舞龙的功能，于是人们往往将舞狮和舞龙相配而舞，狮灯也因之成为龙灯系列的组成部分。

综上，我们可以有中华龙的延展期是铜梁龙的成长期的认识，也即，铜梁龙的成长期可追溯至中华龙的延展期即元、明、清三朝，尤其是明、清二朝。

（五）铜梁龙与中华龙的复兴期

1912 年至今，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是中华龙的复兴期，也是铜梁龙的昌荣期。

1917 年，第二次来到中国的美国摄影家甘博，深入今铜梁的巴川、安居等地考察，沿途拍摄到一座桥孔上方雕有昂首龙头的单孔石桥，在安居拍摄到城隍庙会时街头舞龙舞狮的场面。此为铜梁龙最早的摄影照片。大约在这一年，据老艺人苏治国讲，名为《犀牛望月》的舞蹈节目已在铜梁出现。犀、牛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故《犀牛望月》亦可归入铜梁龙灯舞系列。

1920 年，铜梁土布业在一龙独舞基础上创编出“双龙抢宝”套路，这是后来铜梁龙舞代表作品《二龙戏珠》的雏形。同年，铜梁四合公哥老会参照行灯的制作扎成虎灯，并创编了灯舞《开山虎》，后又将《开山虎》与彩龙配合创编了《龙虎斗》舞蹈品种。

1923 年，时年 13 岁的铜梁巴川人沈俊声跟师傅周掘安、胡少良、兰仲田等学会五人小彩龙玩舞技艺，并逐渐发展成小彩龙三人舞。

1924 年至 1925 年，铜梁藻扎师李杰之、刘连山等在火龙基础上，集正龙、彩龙优点，龙身用竹篾做成一圈圈肋骨（俗称软洞），外用皮纸或绸缎裱糊，扎制成有皮、有骨、有肉的肉龙（即后来的大蟠龙），确立了铜梁大龙 25 人玩舞 24 栋龙身和一个宝珠的规格以及“横 8 字”“睡 8 字”“游龙”“起伏”等基本套路。

1945 年，铜梁扎龙大师蒋玉霖，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赶制出一条昂首长吟、龙口大张、龙身浑圆、龙体较长、龙腹点灯的大龙送进县城，引起全城轰动。

1948 年前后，铜梁屠帮创编了灯舞《猪啃南瓜》。猪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故《猪啃南瓜》亦可归入铜梁龙灯舞系列。

关于民国时期的铜梁龙情况，现任铜梁区文化馆馆长兼铜梁区非遗保护中心、铜梁区龙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的宗和云先生从三个方面做了总结：（1）品种扩展。民间艺人结合火龙、小彩龙、正龙的优点创造了有皮、有肉、有骨架的“肉龙”（即今大蠕龙），后来又相继创编了“板凳龙”“二龙”“草把龙”“柑子龙”“菜龙”“竹梆龙”等，灯舞类发展了“鲤鱼跳龙门”“开山虎”“三条鯵”“泥鳅吃汤圆”“猪啃南瓜”“南瓜棚”等，还从外地学来“雁塔提名”等品种。（2）动作套路多增。确立了25人玩舞24栋龙身和1个宝珠的舞蹈规格，套路上有已有“横8字”“睡8字”“游龙”“起伏”等形式，具备了铜梁现今“大蠕龙”的雏形。经艺人们改造，“小彩龙”由原来只有5人玩舞的范式增加了可以3人玩舞的范式，动作上已发展到缠、藏、砍、跳、钻齐全，套路上有原来仅有的“一、二、三、四、五、六”“地滚子”“磨盘”等基础上，增加了“蛇脱壳”“钻四门”以及上板凳玩耍的“一匹草”“一口井”“横五根”等范式。前期其它龙灯舞蹈的动作套路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升。涌现出了魏洪模、赵海涛、苏治国、罗夕之、唐华煊等一大批民间艺术家。

铜梁博物馆征集、收藏的属于民国时期的龙文物，有青花龙纹瓷缸、二龙戏珠刺绣门楣、二龙戏珠观音瓶、木质抱柱龙一对、紫檀龙凤床等。

1981年农历春节期间，因政治运动停摆了十余年的铜梁龙恢复了活动。之后，与改革开放的国运同步，铜梁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可谓全面升华、活动频繁、成就显著、影响广远。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民间龙舞和竞技舞龙两大领域的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动中，铜梁龙摘得了所有的桂冠。铜梁龙曾于1984年、1999年、2009年和2019年四度晋京参加国庆盛典。1996年，铜梁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龙灯）之乡”。2006年，铜梁龙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铜梁龙参与了北京奥运会。2020年，铜梁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龙灯龙舞文化之乡”。2021年，铜梁龙灯彩扎正式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22年3月，由重庆市铜梁区文化馆组织创编并参演的《铜梁焰火龙》获得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艺术表演舞龙类作品山花奖。铜梁龙灯会、铜梁火龙和铜梁彩灯舞先后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铜梁龙灯会被国家文化部公布为中国特色春节活动，

铜梁中型蟠龙的道具和套路被指定为国家竞技舞龙标准器具和套路，铜梁舞龙队是国家体育总局命名的唯一一支“国家舞龙队”。铜梁龙还先后赴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科威特、澳大利亚、土耳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美国、巴西等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文化品牌、中华龙的杰出代表。

自“铜梁龙舞”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以来，铜梁在上级党委政府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集全区之力，扎实开展“铜梁龙舞”保护工程，在龙舞艺术发掘整理、龙舞档案及数据库建设、龙舞生态保护、龙舞传承人保护与扶助、龙舞艺术全民普及、龙舞品牌打造、龙舞节会赛活动开展、龙文化理论研究、龙舞精品剧目打造、龙舞对外展赛与交流、龙舞产业化发展等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十余年来，铜梁区先后发掘、整理、创编出龙灯舞蹈品种30多个，打造出“二龙戏珠”“铜梁火龙”“铜梁竞技龙”“龙把子”等龙舞品牌4个；公布各级代表性传承人82名，组建舞龙队伍250多支，常年保持龙舞演员2000余名；大力实施全民龙舞艺术普及活动，开展龙舞艺术进机关、进校园和出铜梁、出重庆、出中国等“九进三出”活动，累计普及人数15万余人；坚持开展龙文化理论研讨，举办论坛或研讨会10余次，收集整理理论文章150余篇；积极开展龙舞展演赛活动，坚持举办“春节龙灯会”“中华龙灯文化旅游节”“国际舞龙争霸赛”等节、会、赛系列品牌活动，群众受益率达到95%以上，全面恢复龙舞生态；积极开展龙舞艺术交流活动，每年组织参加国内外展演赛活动20余次；积极推进龙舞进市场，培育民间龙舞艺术表演团队30余支，每年组织商业演出1000多场次，年收入达3000多万元；积极开展龙舞精品剧目打造，先后打造《龙乡放歌》《中华第一龙舞》《龙之传奇》等龙文化主题剧目3个，实现景区定点演出，年受益游客20余万人。

近20年来，铜梁区依托铜梁龙灯会打造节庆旅游项目，先后冠名“重庆·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铜梁中华龙温泉旅游节”“中国铜梁龙灯文化旅游节”“重庆铜梁中华龙灯艺术节”等，灯会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定位上更加准确，提出了“办好一个节会、传承一批技艺、壮大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务实目标。时间上数倍增加，从每年农历腊八到第二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历时近两个月；空间上更加广阔，除了城区公园及主要街道，奇彩梦园景区、玄天湖景区以及安居古城景区都举办了大型灯展，并定点开展龙舞表演；功能上更加完善，保障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服务；效益更加显著，带动龙舞表演、龙灯彩扎、龙灯节会与龙文化旅游四大产业发展，从业人员 3000 多人，年接待游客达 700 万人，年产业及旅游综合收入达 30 亿元，在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多项国家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至 2020 年，经过各方努力，“铜梁龙舞”保护规划目标全面实现。

综上，我们可以有中华龙的复兴期是铜梁龙的昌荣期的认识，也即，铜梁龙的昌盛繁荣期与中华龙的复兴期相一致。中华龙的复兴期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期，故铜梁龙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

总之，铜梁龙从起根发苗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奠基、萌发、成长、昌荣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与中华龙的四个历史分期相对应、相契合：

铜梁龙的奠基期对应、契合中华龙的成型期即属于先秦的商、周时代。

铜梁龙的萌发期对应、契合中华龙的强盛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

铜梁龙的成长期对应、契合中华龙的延展期即元、明、清三朝，尤其是明、清二朝。

铜梁龙的昌荣期对应、契合中华龙的复兴期即 1912 年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铜梁龙是中华龙复兴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标志者、体现者。

三、 铜梁龙对中华龙精神的体现、演绎、发扬

（一）铜梁龙的“容合”

中华龙具有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精神。

铜梁龙了众多的文化元素。

从历史文化上看，铜梁龙容合了新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夏商周至元明清的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

从内容涉及上看，铜梁龙容合了山水、考古、神话、传说、民俗、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传播等文化。如山水文化：铜梁境内有属嘉陵江流域，总属长江流域的涪江、琼江（又名大安溪）、小安溪、平滩河、久远河和淮远河六条主要河流，简称“一江两溪三河”，以及大小支流 245 条。龙与水关系密切，有水就有龙，故铜梁龙必然容合有水文化的元素。水文化又与农耕文化关系密切，所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铜梁是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大豆、高粱、油菜等为主的农业县、区，农业离不开水，龙是司雨理水的神物，故与雨、与水相关的民俗必然会进入铜梁龙的容合过程。如：铜梁民间有彩虹即是龙吸水的传说。铜梁龙舞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种之一的黄荆龙又名“水龙”。遇天旱之年，铜梁巴川、安居、高楼等地的群众，就割取当地黄荆条扎制成龙，舞龙人上身赤膊，着短裤、草鞋，头上戴以黄荆条扎成的圈，玩舞到附近的龙女庙、龙王庙、圣水寺、龙王沱、龙洞等场所，祈祷上天下雨。沿途百姓则在门前用水缸盛水，黄荆龙舞到时，纷纷用瓢舀水泼向龙身，意在引导、促使、激励神龙克尽职守，兴云布雨，解除旱情。

从取材资源上看，铜梁龙容合了蛇、鱼、猪、犀、虎、竹、木、布、纱、铁等文化。铜梁的山丘生长着桉树、柏树、杉树、楠竹、茨竹等；铜梁的水域游憩着鱼、虾、螺、蟹、龟、鳖等；铜梁的天空旋飞着鹰、雁、鸦、雀等；铜梁的地面爬行着蛇、蜥等，铜梁过去还有老虎、豹子、野猪、黄鼠狼等出没；铜梁人饲养的禽畜有鸡、鸭、鹅、猪、牛、羊、狗等。铜梁龙的产生、发展、繁荣，都与这些资源有关。铜梁龙灯品类中的“猪啃南瓜”“犀牛望月”“开山虎”“亮狮”“鲤鱼灯”“大雁灯”“十八学士”等，就是容合这些资源的结果。

从演展形式看，铜梁龙容合了分持龙形道具表演的龙舞，和持非龙形道具表演的灯舞两大系列，总共达 30 多种。龙舞系列有气势恢宏的“铜梁大龙”、高难精美的“竞技龙”、伟岸威严的“正龙”、激越火爆的“火龙”、小巧玲珑的“小彩龙”、朴实豪放的“稻草龙”、典雅灵秀的“荷花龙”、铿锵有声的“竹梆龙”、三脚连环的“板凳龙”、淋漓潇洒的“黄荆龙”、粗大滚行的“滚地龙”、肃穆幽静的“孝龙”、腾飞自如的“夜光龙”等。灯舞系列有儒雅倜傥的“鲤鱼跳龙门”、

悠闲漫游的“十八学士”、灵巧滑溜的“泥鳅吃汤圆”、蹦跳追戏的“三条鲹”、威猛生风的“开山虎”、扑滚绣球的“亮狮”、妙趣横生的“犀牛望月”、憨态可掬的“猪啃南瓜”、幽默风趣的“蚌姑戏沙弥”、催人奋进的“雁塔题名”、乡音袅袅的“南瓜棚”、风味十足的“彩船”等。之外，还有景观龙灯、工艺龙灯等。

从艺术特色上看，铜梁龙容合了道具的匠心独运、套路的丰富多彩、音乐的激越优美和烟火的五光十色。如套路，就有“龙出洞”“龙摆尾”“二吐须”“三点头”“漫游龙”“单侧快舞”“流星赶月”“龙抢宝”“龙戏珠”“梯形龙”“龙跳连环”“高攀龙塔”“龙回官”等 50 多种。

从产业门类上看，铜梁龙容合了龙舞表演业、龙灯彩扎业、龙灯会展业、龙灯旅游业等。

从参与人员看，铜梁龙容合了包括领导组织者、项目传承者、龙具扎制者、创作编导者、表演展示者、文化研究者、产业经营者、传播推广者、节目欣赏者等在内的所有与铜梁龙相关、有缘的人——其数目相当庞大，涉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其活动的区域空间以铜梁、重庆为中心，近则至四川、湖北、陕西、湖南、贵州等周边地区，远则至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

据相关史料，铜梁建县后，巴蜀地区曾有几次大移民，特别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两次“湖广填四川”，使得铜梁的群体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移民是较大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迁出地的文化、民俗，必然随着移民的脚步来到迁入地。于是，铜梁龙的容合内容中就有了由移民带来的来自他乡的文化元素。铜梁龙灯品类中的“雁塔题名”“小花船”“蚌姑戏沙弥”等，就有明显的移民文化色彩。如，“雁塔题名”的典故发生在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蕴涵着科举、人才、帝都、建筑等文化元素，“雁塔题名”成为铜梁龙品类之一，也就意味着铜梁龙容合了这些文化元素。

铜梁龙灯品类中有一种“孝龙”：过去，大户人家的长辈去世后，其晚辈就请工匠用竹篾扎成如正龙或火龙造型的龙头龙尾，龙身用竹圈和绳索连接，不用裱糊和彩绘，只用白纸剪成纸花，缠附在龙的骨架上，这样看上去，龙通体成白色，与丧事的气氛相吻合。在丧事典礼中，孝龙随孝子向逝者祭拜，并按丧事的“科仪”音乐舞蹈，丧事完毕后即予以烧化，谓之送龙升天。孝是中国儒家提倡的基本伦理规范之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学而》讲：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民间亦有“百善孝为先”的经典俗语。铜梁孝龙，是铜梁龙融合儒家文化的结果和体现。



(二) 铜梁龙的“福生”

中华龙具有福生即造福众生的精神。

作为中华传统民俗，舞龙具有祈雨求福、娱神悦人、彰力显威、旺丁兴族、节庆狂欢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实质就是福生，铜梁龙亦然如此。

在铜梁龙舞系列中，偏重祈雨求福功能的，有舞黄荆龙、菜龙、扁担龙、草龙等。黄荆，在南方田边地角是一种常见灌木，取之容易，枝条适中，用之不怕淋水，因而用来扎龙求雨。舞龙求雨的程式有拜龙王庙、晒龙王、龙王巡回、龙王取水、普降甘霖等。其中还有“抬龙女”“捉旱魃”等小插曲。即舞龙过程中，将事先扎制的龙女抬入庙中供奉于龙王像前“娱神”，随后将由人扮演的，预先

躲藏于店铺角落里的“旱魃”捉来，“钉”在庙宇的龙柱上示众，以示惩罚。舞菜龙一般在腊月二十三灶王生日进行，舞之以祭灶。菜龙用材主要是萝卜、白菜，连接成龙。舞扁担龙是寄寓出门平安，下力者（今为打工者）万事顺遂。扁担龙的取材是家家户户常用的扁担，将其两头稍加装饰成龙头、龙尾即成，舞时可随意创造套路，多人连绵、回旋而舞。草龙的取材是稻草、麦草或茅草等。舞草龙主要是为了欢庆丰收，兼祭龙求雨等用途。

在铜梁龙舞系列中，偏重旺丁兴族功能的，有舞橙子龙和抢龙宝等习俗。橙子龙的取材主要是橙子，只因“橙”谐音“呈”，橙子谐音“皇子”即“呈送儿子”。舞橙子龙一般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借其“月儿圆，阴阳合，夫妻美满”意。玩舞时，由院坝舞至家户大门，先敬祖，再进内室。舞蹈中要以龙绕缠求子妇女之身，让其护龙宝、钻龙腹（绝不能跨龙），并由持宝手口颂吉祥祈福语。龙宝亦称龙珠、宝珠。灯谐“丁”音，龙灯谐“龙丁”音，“龙丁”有“强壮、阳刚男子”义。龙宝在龙灯舞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引领和指挥的作用，而且，其形状滚圆，与蛋卵、胎腹接近，故龙宝有“龙丁之宝”“生殖之源”的寓意，抢龙宝也就意味着抢“龙丁”、旺子嗣。每年元宵之夜，铜梁龙灯会在掀起舞龙高潮之后，临结束时有一个“烧龙抢宝”环节。人们爱看舞龙，也爱看烧龙和抢宝。每当用熊熊大火烧龙之时，龙头大爷将龙宝往火焰上空一抛，瞬间就有多人从人丛中蹦出抢宝，其余人众一起鼓劲，为得宝者齐声喝彩。

和人类有好孬善恶一样，龙族也有好孬善恶之分。好龙善龙代表、象征、喻示着人类和自然界福生的正能量，孬龙恶龙代表、象征、喻示着人类和自然界祸生的负能量。战胜、制服、惩罚、管教孬龙恶龙，使其由孬变好、改恶从善，是体现龙的福生精神、展现龙的福生功能的应有内容。铜梁龙中就有这样的内容。铜梁火龙在铜梁龙系列中是最具特色、最为人称道的。铜梁玩火龙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天上蟠桃老祖一次不慎将手镯掉入了瑶池，这手镯变成了一条顽皮龙下界，由东海、长江，一路游玩到铜梁的琼、涪二江兴风作浪，使洪水泛滥成灾，民众深受其害，认为这是恶龙降临，便奋起与之抗争。后来蟠桃老祖来到铜梁，借助雷神烈火和铁水钢花的威力将镯龙收服，从此在倡俸镇留下了雷子塘和雷打石包的遗迹，百姓也获得安居乐业，年年五谷丰登。人们为了纪念这次战胜镯龙的胜利，每年以篾圈扎龙玩舞，并不断地用焰火和铁水花喷龙，意在以火除邪，

避免水患重来。同时也认为，男子汉们经过一场铁水钢花的洗礼，就会烧除身上的晦气，来年必定万事胜意。

铜梁是最具幸福感城市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铜梁区在依托、围绕铜梁龙打造的各种节庆旅游项目时，提出了“办好一个节会、传承一批技艺、壮大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目标定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完善各种设施，对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服务予以保障：这些都是福生精神的体现。

（三）铜梁龙的“谐天”

中华龙具有谐天即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精神。

中华先民将自然界中的生物和天象作为龙的容合对象，意在表达对自然力的理解、敬重，希望自然力与人和谐相处从而造福于自己的生产、生活。铜梁人显然传承、领悟、体会到了这样的意涵。出现在铜梁龙灯舞系列中的“鲤鱼跃龙门”“十八学士”“三条鲹”“泥鳅吃汤圆”之鱼，“猪啃南瓜”之猪，开山虎”之虎，“犀牛望月”之犀、牛，“亮狮”“狮头龙”之狮，以及龙舞系列中的“黄荆龙”之荆、“竹柳龙”之竹、“荷花龙”之荷、“草龙”之草、菜龙之“菜”等，就艺术地体现了这样的意涵。

铜梁龙的“谐天”，还表现在铜梁区有多达五百个以上的以龙命名的山水、建筑、景观、道路、村镇、企业、社团、产品等。如铜梁第二高峰巴岳山因其形如游龙，故有“巴岳游龙”之称，为“重庆小十景”之一。还有盘龙山、双龙井、龙堤春跃、黑龙滩水库、铜梁龙温泉、老龙洞、龙洞石、康龙溪、石龙港、龙堂口、龙凼子、迎龙湾、龙门寨、龙王沱、黑龙嘴、龙家崖、龙家坡、龙桥沟、回龙堡、龙洞门、龙头塘堰、龙井田、化龙岩、龙须堰、龙背脊、龙洞土、龙眼睛、龙洞漕、回龙岗、石龙坎、骑龙穴、黑龙潭、金龙寺、龙王庙、回龙庵、九龙观、白龙大桥、中龙路、龙城大道、云龙巷、龙之谷游乐园、铜梁龙景区、龙兴镇、转龙场、龙水村、龙翔社区、龙都小学、龙文化服务与产品展示中心、金龙体育馆、龙廷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巨龙雕塑、铜梁龙绣、龙腾驾校、龙腾大众汽车修理厂、龙凤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龙城球迷协会、龙脉书院、鑫龙花园、龙腾佳苑、群龙大厦、华龙名居、龙门雅舍、龙轩大酒店、双龙印务、渝龙珠宝、龙

迈家居建材城、金龙大地商业城、飞龙菜市场、清龙鱼府、铜梁龙柚、双龙井酒、铜梁龙雕、铜龙挂面、龙乡三合鱼、龙乡核桃，等等。

铜梁区是国家卫生城市、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国家首批园林县(区)城、国家级卫生县(区)城、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单位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这些称号，都凝结、体现、标志着铜梁龙的“谐天”。

(四) 铜梁龙的“奋进”

中华龙具有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精神。

铜梁龙的“奋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铜梁龙表演项目中有“奋进”的意涵。如：“雁塔题名”，表现的是积极进取、发奋有为、“金榜题名”的主题。“鲤鱼跃龙门”又名“鱼龙变”，以凡鱼经过努力可变成神龙为喻，表现一般人经过奋斗可成为杰人才，即努力拼搏、迈坎过关、超越平凡、实现转变的主题。“十八学士”又名“群鱼灯”，源自十八个栋梁之才辅佐唐王李世民称帝的传说，以鱼喻才，鼓励才尽其用、建功立业。龙舞项目中，也有直接表现“奋进”的套路，如“飞龙追珠”“猛龙过江”“腾身穿尾”“火阵飞龙”等。

二是铜梁龙的发展历程是不断“奋进”历程。远的不说，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始，铜梁龙就经过了“传统的恢复”“关键的提升”“精彩的定型”“极致的发挥”“系列的升华”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在传承的基础上，都有发展、提高、增添、创新。如“关键的提升”阶段，把戏剧舞蹈的基本功也熔铸在龙舞中，增加了“三环套”“龙摆尾”“舞天花”“双起搭”“马步回宫”等新套路；“精彩的定型”阶段，排出、增加了“双龙出洞”“双拜四方”“双龙戏珠”“黄龙滚浪”“双龙献瑞”“双龙连环”“如意穿梭”“翻江倒海”等套路；“极致的发挥”阶段，新增了“高低步”“矮子步”“太极行”“侧身翻”“悬空翻”“大劈叉”“摇船式”“立卧式”“叠坐式”“单跪式”“靠背式”“平盘”“斜盘”“高尾盘”“龙旋风”“翻梅花”“直躺式”“扯旗式”“蹲躺式”“膝进式”“站腿式”“螺旋跳”“车轮转”“固长城”“高翘尾”“飞龙追珠”“猛龙过江”“腾身穿尾”“金龙绞柱”“大

立圆”“二叠盘”“三叠盘”“龙菊开屏”等动作、套路；“系列的升华”阶段，编创了由“金龙吐火”“火龙现形”“吞吐云雾”“上下回旋”“左右连环”“前后穿身”“内外翻花”“火阵飞龙”“火龙升天”等套路构成的“双龙火阵十八式”。与这几个阶段同时并进的还有龙灯彩扎的包括竹铝兼作、真丝裱皮、复色描金、组装龙头、金片点睛、口中含宝、曲唇翘颤、立体成腮、充填脊尾、美饰龙腹、新法制鳞、龙身曾肉、通篾作脊、鲤鳌促活、软化鱼鳍、强筋固缝、电光照明、螺钉固柄、云水合牌等20余项改进，及小蟠龙、小手狮、小龙舟、小麒麟、小鳌鱼等数十种各式彩灯的创新品种。总之，龙舞道具的不断创新、龙舞技艺的不断提升、舞台艺术的不断融合，使铜梁龙与时俱进，出类拔萃，享誉国内外。

三是铜梁人对铜梁龙精神的概括、阐释与培育。铜梁人将铜梁龙精神概括、总结为“脊梁”精神，并用“靠得住”“顶得起”“过得硬”“容得下”四个词语来阐释“脊梁”精神。“靠得住”，是指个人或集体在政治上能够做到忠诚不二，能够做到言行一致，也就是忠诚和诚信。“顶得起”，是指个人或集体在能力上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关键时刻敢于挑大梁，在任何环境都能够做出优秀的业绩，也就是担当和作为。“过得硬”，指个人或集体在作风上能做到严于律己，能够做到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能经受住金钱、名利等各种诱惑和考验，也就是干净和自律。“容得下”，指个人或集体在修养上胸襟宽广，能很好地协调上下、左右、前后各方关系，能够接纳新生事物和不同意见，也就是包容和团结。认为，这样的铜梁龙精神，是铜梁传统龙文化的沉淀和升华。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铜梁人在这种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踔厉奋发，以钢铁般的脊梁，担负起了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谱写了一曲曲时代颂歌。铜梁龙精神是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铜梁表达。

显然，铜梁龙精神的总结和表述，是铜梁人“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产物。其内容，除“容得下”可归入龙的“容合”精神外，“靠得住”“顶得起”“过得硬”都可归入龙的“奋进”精神，都是龙的“奋进”精神的具体化、铜梁化。而那些为铜梁龙的昌盛繁荣付出心血汗水、做出贡献的领导组织者、项目传承者、龙具扎制者、创作编导者、表演展示者、文化研究者、产业经营者、传播推广者，都可谓“以龙的精神做龙的事业”的“奋进”者。

综上所述，铜梁龙从奠基、萌发、成长到昌荣，都体现、演绎、发扬了中华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铜梁龙是中华龙精神的继承者、体现者、演绎者、发扬者、创新者和标志者。中华龙的成就和辉煌，有铜梁龙杰出的、卓越的贡献，铜梁龙是中华龙的代表性项目、品牌、文化符号。

四、铜梁龙的本质特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铜梁龙的本质特征，可用“和”“强”“美”“善”四个字来概括。

先说“和”。前面讲过，铜梁龙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了众多的文化元素，铜梁龙奠基、萌发、成长、昌荣的历程，就是不断容合的过程，即铜梁人讲的“容得下”的过程，也即“和”的过程。因为，容合意味着“和”，“和”由容合而来，是容合形成的局面、状态。“团结合力”“协同合作”“集体主义”“共同体”等，都是“和”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和”是总说，具体讲，有“天和”，即人与自然界和谐；“人和”，即人与人和谐；“内和”，即区域、团队内部和谐；“外和”，即区域、团队与外界和谐；等等。铜梁龙体现、彰显、弘扬着这样的“和”。“和”使铜梁龙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体系完备、规模宏大、参与者众多、影响广远。

再说“强”。“和”意味着“强”，容合就有力量，合力就是强力。铜梁龙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体系完备、规模宏大、参与者众多、影响广远都是“强”的成果、“强”的体现。铜梁人讲的铜梁龙精神之“靠得住”“顶得起”“过得硬”，皆可用“强”字来概括和注解。铜梁龙成长、昌荣的历史，就是追高图强、以新增强、以强为范、以强为荣的历史。中国文化中，有“强者为王”一说，铜梁龙在相关的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动中，摘得了所有的桂冠，获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行业之“王”，其辉煌的成就和荣誉，也证明了铜梁龙之强。

再说“美”。大凡观看、欣赏过铜梁龙表演的人士，无不为其美而震撼、而击掌、而赞叹。“铜梁大龙”之恢宏、“竞技龙”之高难、“正龙”之伟岸、“小彩龙”之玲珑、“稻草龙”之朴放、“荷花龙”之秀丽、“竹梆龙”之铿锵、“黄荆龙”之潇洒、“孝龙”之肃穆、“夜光龙”之炫目，尤其是“火龙”之激越爆烈、豪壮奔放，人在龙中舞，龙在火中飞，堪称“龙中极品”；还有“鲤鱼跳龙门”之儒

雅、“十八学士”之悠闲、“泥鳅吃汤圆”之灵巧、“三条鲹”之蹦跳、“亮狮”之扑滚、“开山虎”之威猛、“犀牛望月”之妙趣、“猪啃南瓜”之憨态、“蚌姑戏沙弥”之幽默、“雁塔题名”之励志、南瓜棚”之乡情……铜梁龙有匠心独运的道具、有丰富多彩的套路、有激越优美的音乐、有五光十色的烟火。在造型方面，铜梁龙龙头威严大气、龙身浑圆壮实、龙尾美感突出、彩绘鲜艳夺目、整体轻巧耐用。总之，铜梁龙美在有源远流长的古韵，美在能够与时代共进、不断开拓增改的创新，美在道具、音乐、舞蹈、焰火等等的巧妙结合，美在精益求精的表演、展现，可谓美不胜收、美美益美。

再说“善”。前面说过，铜梁龙是具有祈雨求福、娱神悦人、彰力显威、旺丁兴族、节庆狂欢功能的福生的龙，福生就是善。铜梁龙是“意善”与“果善”的统一。所谓“意善”，是说铜梁龙寄托着、蕴涵着铜梁人造福大众的意愿；所谓“果善”，是说铜梁龙达到了、实现了造福大众的效果。铜梁龙还是“区域善”与“普惠善”的统一。所谓“区域善”，是说铜梁龙给铜梁区、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带来了祥瑞、福利、快乐；所谓“普惠善”，是说铜梁龙不但给铜梁区、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带来祥瑞、福利、快乐，也给铜梁区、重庆市之外的全国的、国外的一切与铜梁龙有缘的人民群众带来了祥瑞、福利、快乐。

当前和今后的几十年，是中国人民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特征也可用“和”“强”“美”“善”四个字来概括。“和”，意味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意味着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发展、文明互鉴、命运与共。“强”，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美”，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繁荣，和美丽中国的建成。“善”，意味着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完善、弘扬，意味着民生的改善和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不断提升，意味着中国人民以现代化的富强、文明，福利世界、惠及全球众生。显然，“和”“强”“美”“善”，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方向。

铜梁龙的本质特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特征相契合、相一致，铜梁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标志者、体现者。



[注：1. 本文是作者庞进应重庆市铜梁区政府聘请作的专题研究之成果。文中的铜梁龙，指的是发生在重庆市铜梁区的所有龙文化的总称。文中参考、引用的有关铜梁龙的资料，均据《铜梁龙灯志》（宗和云先生提供）。2. 在 2023 年 6 月 4 日举行的“铜梁龙·中华龙渊源研究学术交流会”上，庞进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本文内容作了演讲。]



秦岭龙文化及谐天内涵

一. 秦岭龙文化

作为横贯中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素有“中华龙脉”之称。

脉的本义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贯的东西。龙的身躯多取材于蛇，可谓以绵长为特征，因而，大凡绵长连贯的东西，都可以谓之龙脉，反过来说，龙脉可以象征那些绵长连贯的东西。

中国风水学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所谓“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阳宅全书·龙说》）。而且认为，中国的龙脉由西北的昆仑山发源，向东南延伸出三条：北龙脉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脉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脉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秦岭属于中龙脉。

不仅如此，秦岭还是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又因其对气流的阻挡作用，成为北方地区的天然集雨场。龙乃雨水之神，司水布雨，正是龙的神职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将秦岭喻为龙，也是恰当的。

1. 龙山水

秦岭由众多的山岭、沟峪、洞窟、溪流、潭瀑构成，其中以龙为名者有一——
龙门山：在陇县境内，以山形似门阙而得名。山上有二十四潭，其中十潭以
龙为名，即八龙潭、黑龙潭、黄龙潭、青龙潭、双龙潭、金龙潭、蛰龙潭、蛟龙
潭，乌龙潭、卧龙潭。元代高道丘处机于此山隐修七年，开创了道教全真龙门派。

龙山：在商洛市内。“龙山晓日”为明清商州八景之一。乾隆《直隶商州总
志·疆域·八景》：“州东五里许，有山耸拔，起伏趋江，如龙吸水，故曰龙山。
每当海日初升，曜若金鳞，盖不同于凡岭云。”

五龙山：在少华山少华峰以西，由并连的五峰组成，故名。山上的风伯雨师
祠、雷神洞、虫王庙等，与龙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苍龙岭：华山救苦台南、五云峰下的一条刃形山脊，属华山著名险道之一。
因岭呈苍黑色，势若游龙而得名。“苍龙铁锁”为明清华岳八景之一。民国《华
阴县续志·艺文志·华岳八景》引史纪《苍龙铁锁》诗云：“峻岭横斜势自翘，
如龙蟠曲远迢遥。烟霞一径通霄汉，组索千年锁沵寥。渐近天门神转迈，回看人
世骨应消。悠然忽听长松下，白发黄冠吹洞箫。”又明人袁宏道《苍龙岭》诗云：
“瑟瑟秋涛谷底鸣，扶摇风里一毛轻。半生始得惊人事，撒手苍龙岭上行。”

石龙洞：在商州东北四十里处，洞有天成石龙，水自龙口溢出。乾隆《直隶
商州总志·疆域·十观》：“在州东北四十里。由十九河溯流而上，有山嵯峨，下
嵌一洞，方广约五六丈，中有石龙十数头，奇巧天成，鳞角爪牙宛出人工。有伏
而寝者，偃而舒者，俯而饮者，仰而吸者，斗者，舞者，蟠曲似蛰者，独一龙昂
首欲飞，口中有液，滴成小湫。”

另外，还有华山小苍龙岭、五龙潭、黑龙潭，沣峪龙山、抱龙峪、龙窝，柞
水乌龙谷、龙潭沟、见龙古潭，宁陕青龙洞，太平峪龙口瀑布等。

2. 龙庙寺

华山苍龙岭下有都龙庙。“都”有“汇聚”“聚集”意，《广雅·释诂三》：“都，
聚也。”又有“总”“总共”意，《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都犹总也。”都龙

庙，可理解为“汇聚众龙的总庙”。其庙的楹联为：“持节云霓万斛携西天云雨，垂旒琼庭一朝构东西波臣”。

名称中有龙的庙、寺还有——

龙王庙：位于终南山南麓柞水县高碥沟沟口，内祀黑龙将军。

龙王庙：位于户县境内东甘峪，附近还有龙王坪、龙王泉等景观。

龙王庙：位于长安区境内终南人头山上。

兴龙寺：终南山古寺之一。位于南五台三天门上，建于汉时。

会龙寺：位于镇安县东南高峰寨石尖山。建置无考，明清犹存。

黄龙寺：位于洛南县西四十五里南山上，相传为黄龙禅师驻锡处。

藏龙寺：位于洛南县东三十里野里堡。

九龙茅篷：又称狮子茅篷，位于终南山南五台。

更多的庙、寺、观等虽不以龙为名，但多有龙的形象出现。如始建于汉代，后成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场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岳庙，其棂星门上斗拱勾连，精雕有九个伸凸的龙头，其中七个口张，两个口闭，以“明七暗九”的规制，寓意其庙等级之高，仅次于皇宫。

3. 龙传说

龙首原：位于西安北部。相传秦时，有一条黑龙从秦岭来到渭河饮水，其经过的地方形成一条土山，形状如龙，龙首原就是由这条龙所变，并由此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作有《黑龙饮渭赋》：“龙为四灵之长，渭居八水之一。饮亹之清流，落彬彬之元质。忽兮下降，贲然跃出。首蜿蜒以涌烟，鳞错落而点漆。动而无悔，爰作瑞于秦川；应必有征，乃效灵于汉日。观其攸止，察其所为。行藏不忒，动静有仪。睛眸炫耀，文彩陆离。跃于泉于焉表异，守其黑所以标奇。或隐或见，时行时止。顺冬夏而无乖，应昏明而有以。于是稽《大易》，按前史。叶圣人之昌运，飞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征，下而饮水。尔乃降长川，俯高岸。气默默以黯黯，光灿灿而烂烂。闻之者心骇而屏息，睹之者目眙而改观。一呼一吸，而声起风雷；或跃或腾，而势超云汉。睹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于南面，合正色于北方。拖尾回翔，擘波腾骧。饮清澜之浩浩，动素浪之汤汤。顿领而碎珠迸

落，奋髯而细雨飞扬。警水府兮鳣鲔奔走，骇泉室兮蛟鼍伏藏。元云从而浅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时出处，凭虚上下。度弱水而斯驭，去鼎湖而是驾。闻茂先之剑飞，是长房之杖化。岂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潜稟。元甲黯以凝黛，文章斐兮摛锦。逼而察也，类天马出水而游；远而望之，疑晴虹截涧而饮。已而负苍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气。则知水物之灵，鳞虫之贵。盛矣哉！抑斯龙之所谓。”

白龙沟：相传很早以前，渭河南岸有条青龙，渭河北岸有条白龙。两龙比赛谁长得快、长得高。白龙因破坏了田野而被人们挖斩，留下深沟一条，青龙则长成了青秀的骊山。此传说将骊山说成是青龙所变。

华山五龙：道教著名神仙陈抟来华山之前，曾在湖北武当山隐居、修炼了二十余年。相传有金木水火土五条神龙，常化为五位老人到武当山听陈抟讲解易学。五龙见陈抟才华横溢、气度不凡，便有意指点迷津，言武当山不是陈抟的栖居之地，陈抟修成正果的地方是西岳华山。陈抟接受了五位老人的指点，收拾行装，准备随其移居华山，其中一位老人让陈抟闭上眼睛，负在自己背上，陈抟便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待睁开眼睛，已到了华山。今华山五龙桥附近的五龙潭，相传即为五龙驮陈抟来华山之后的栖隐之所。又传说，陈抟睡觉的本领就是龙教的，因为龙善于睡觉。

苍龙岭：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开凿苍龙岭，毕沅让石工凿岭时，长安城里下了三天血雨，人们相传苍龙岭原来是条活龙，被毕大人凿死，从此华山断了龙脉，再不会像杨震、杨坚这样的大人物出现。

赵匡胤卖华山：相传华山道士陈抟在华阴道上遇挑筐老人，发现其筐内盘着一条龙——少年赵匡胤。于是化作卖桃人与赵相识，指点其吃粮当兵。赵发迹后到华山谢陈，在华山之巅与陈下棋，连输数盘，遂以华山为赌，又输。后赵匡胤成为宋太祖，召陈抟直京辅政，陈辞而不就，并写一道表章：“一片野心，全被白云留住；九重龙诏，休教丹凤衔来。”由于当年下棋时，赵匡胤曾将华山输给陈抟，且写有文约，盖有手印，故有“华山自古不纳粮”之说。

4. 龙人物

秦岭西部北麓周至县境内有楼观台，是老子讲授《道德经》的地方。属于秦岭脉系的华山上有“老君洞”“卧牛台”等，骊山上亦有“老君殿”，又称“朝元阁”，祭祀的也是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子。

老子“犹龙”。《庄子·天运》载：“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嚬（xie），予又何规老聃哉！’”《史记·老子列传》亦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归后对弟子言：“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用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便是有名的孔子称老子为龙的典故。

骊山北麓有秦陵，是埋藏秦始皇的地方。

秦始皇有“祖龙”之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11年，秋，有使者赶往咸阳，从华山脚下经过，突然有人挡住了他，将一块玉璧奉上，说：“为吾遗滻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正要问清来由，其人忽然不见。使者将璧带回咸阳，交给秦始皇，并转告了送璧人的话。秦始皇让御府鉴定此璧，原来是他八年前南巡时沉到长江中的那块玉璧，于是“默然良久”。这里的“祖龙”，指的便是秦始皇，因为“祖”是“始”的意思，“龙”为人君之象。

陈抟自称“人中龙”，所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陈抟自题联）。他将自己以近四十年时间修炼成的道家“内家功夫独特之术”——“睡功”，即可以不吃不喝、不盖被子、不活动，能睡百天左右；“修炼时呼吸达到似有似无、六脉俱无”的功法，称为“蛰龙法”。还撰有三十二字的《蛰龙法诀》：“龙归元海，阳潜于阴。人曰蛰龙，我却蛰心。默藏其用，息之深深。白云高卧，世无知音。”（见《吕祖全书》）

综上所述，秦岭龙文化涉及到龙文化的各个方面——

山水龙，即以山形水势有似龙形而称龙，如龙门山、苍龙岭。

神话龙，即流传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如秦岭黑龙饮于渭水、骊山为青龙所变、龙驮陈抟来华山。

人杰龙，即将杰出人物比龙、称龙，如老子“犹龙”、陈抟“人中龙”。

帝王龙，即将帝王君主比龙、称龙，如将秦始皇、宋太祖比龙。

二. 秦岭龙文化的谐天内涵

龙的精神内涵可以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来概括。这四种精神内涵在秦岭龙文化中都有反映。

我们重点谈“谐天”。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地、持续地发展。秦岭龙文化中的谐天内涵，可以从思想、践行两个方面来谈。

思想方面可以“犹龙”老子为例。

《道德经》五千言，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平常讲的道路的“道”或道理的“道”，而是“可以为天地母”的“道”，即宇宙万象的根本。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这个“道”又从何而来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说到底，“道”本来的样子就是自然，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在人、地、天、道“四大”中，人的构成性地位最低；这就决定了人与大自然只能是顺应、效法的关系，而不是违背、对立的关系。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自然界的生态是循环往复的，人按生态规律生活，便是“知常”。老子认为，“知常”就是明白人，而“不知常，凶”。这个凶，就是我们讲的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于是老子警告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人放任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这当然是“失道”的行为，“失道”，自然要承受“失道”带来的后果，即领受大自然的惩罚。

老子的上述思想，是古老中国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可称为“龙的智慧”。

践行方面可以“祖龙”秦始皇当政时颁布的《田律》为例。

《田律》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卵）蠹，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麝时毋敢将犬以之田。”译成白话，即：“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

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只有因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才不受季节限制。居邑靠近牛马的皂和其它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

秦岭龙文化的谐天内涵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

1. “谐天”很重要。如果不谐天，即对自然界的生物、非生物不充分尊重，不按自然规律做事，即逆天、害天，就必然全遭到天，也就是自然界的惩罚。这个问题，先哲老子已讲得相当明白；而各种样式的教训已经很普遍、很严重、很深刻，很惨痛。
2. 以法律形式保证“谐天”很有必要。这方面，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已经实践；当今国家也出台有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可谓一脉相承。我的意见是，法律、法规应当制订得再全面、再细致些，执行得应当再严格些，处罚得应当再严厉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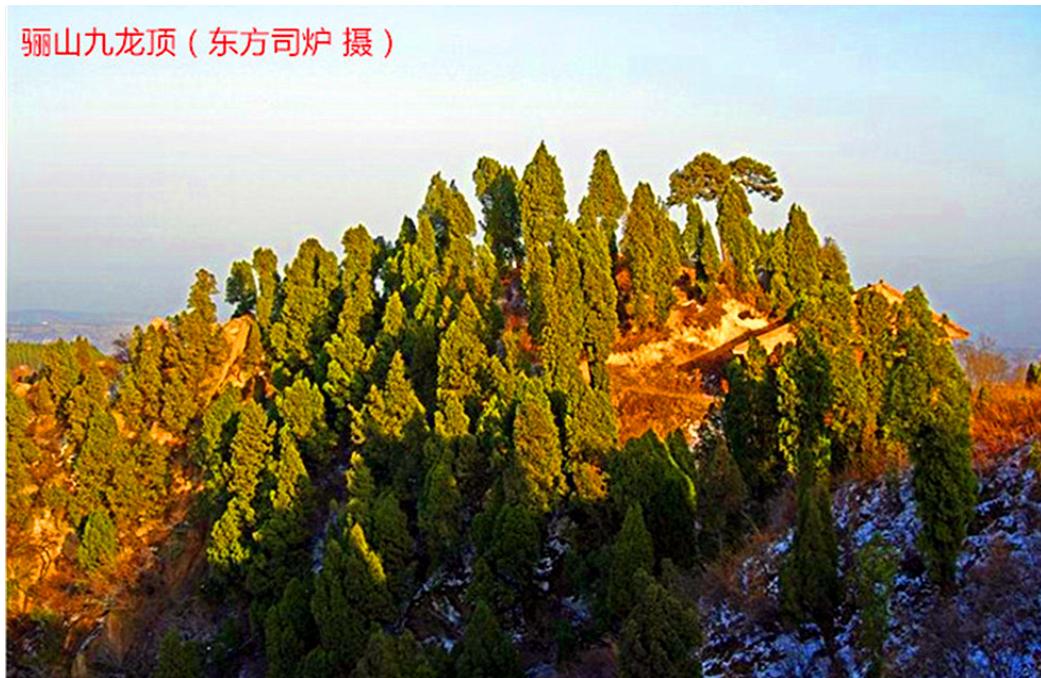
三. “谐天之度”与“适度为善”

倡扬“谐天”，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即如何处理、协调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以人为本与兼顾众生的关系。开发建设不能不搞，生态环境也不能不保护；不能不强调以人为本，又不能置人之外的众生于不顾；如果发生了矛盾、冲突的情况，怎么处理？

所以，就有一个“谐天之度”的问题。度在哲学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所谓“谐天之度”，即“人与大自然相和谐”要有一个恰当的尺度、一个合理合情合规的界限。这个度的把握比较难，牵扯到时间、地点、人、物、历史、现在、将来等诸多要素，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原则：“适度为善”，即统筹兼顾，把各种要素都协调、把握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把握适当了，就是“善”。

（2010年8月至9月于西安慧雨庐；刊于《西安晚报》2010年10月24日
“文化纵横”版）

骊山九龙顶（东方司炉 摄）



骊山龙凤文化考察

骊山属于秦岭支脉，并不高峻，却是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座名山。骊山之所以出名，除了峰峦秀丽、山北麓涌流着一脉温泉外，还因为它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诸多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龙凤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文化，那么，考察一下骊山上下方圆的龙凤文化积淀，对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骊山，对龙凤文化的传播、龙凤精神的弘扬，都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1. 自然龙凤

所谓自然龙凤，就是将自然山水、树木等称龙比凤，其一般根据，是自然山水、树木的走势、形状等有如龙凤之形，也有因某特殊事件而得名者。

骊山海拔 1302 米，顶峰有“九龙头”之称。“九峰环峙其下，形如九龙之首，故名”（《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26 页）顶峰东侧崖边曾生有一棵“龙槐”，其树身盘旋弯曲好似龙身。“其树冠顶部有一团枝叶上翘，直径不过两米，好像龙尾摆动。树身上下分别左右大致对生四枝，形成巨龙四爪。站立树下，抬头仰望，好似一条巨龙从天外飞来，一头扎进骊山之巅。”（焦生全：《骊山人祖庙考察手记》，《骊山女娲文化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 页）可惜此树在“文革”浩劫中，被人炸毁。

骊山西麓有“凤凰原”，因东汉延光三年冬，“新丰上言凤凰集西界亭”（《后汉书·孝安帝纪》）而得名。

2. 建筑龙凤

所谓建筑龙凤，是说某建筑以龙凤为名称，或雕塑、彩画龙凤以为主要装饰。

唐代的华清宫位于骊山北麓，宫内有“御汤九龙殿”。《长安志》载：“元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石梁、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乃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水际，上因幸解衣将入，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去。”《贾氏谈录》载：“汤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澈如玉，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四面石坐阶级而下，中有双白石莲，泉眼自瓮口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

1959 年，人民政府在原“御汤九龙殿”基础上修建“九龙宫”。这个九龙宫以九龙湖为中心，九龙湖分上下两湖，上湖南岸有龙吟榭。榭下镶一大石雕龙头，龙口吐水泻入湖内。上下湖之间有九龙长堤，堤壁间镶八个石雕龙头，与上面的大龙头合为九龙之数，其龙口亦作吐水之状。下湖西南角置一大型双龙首石舫，其龙首汉白玉雕成，扬角张口，游人多在此处留影。石舫上有九龙汤，可供沐浴。

“九”为阳数之最，有“多”“聚”“盛”等意，又与“久”同音，故“九龙”，便是象征着团聚、昌盛、久远的龙。

在历次整修、扩建和考古发掘中，采集到的属于唐华清宫遗物者，尚有盘龙纹瓦当、凤纹滴水、三彩龙首等。

另据康熙本《临潼县志》载，临潼县城东北有“集凤门”；据乾隆本《临潼县志》载，“龙台宫西汉建，在新丰”。

3. 文物龙凤

所谓文物龙凤，是指雕塑、刻绘有龙凤形象的出土文物。

骊山之东，零口西段村出土窖藏西周青铜器若干件。这些青铜器上多饰有夔龙纹，如“利簋”，腹与方座四面均饰有夔龙纹；“陈侯簋”，颈上饰 S 形夔龙，腹与方座饰两头夔龙；“王盃”，盖和四腿作夔龙形。

骊山东北戏河出土东周“铜门楣”一件，上饰夔凤纹。

骊山秦始皇陵园出土秦代“夔龙纹大瓦当”一件，为大半圆形，高 48 厘米，宽 61 厘米，背有筒瓦相接。瓦面硕大，纹饰苍劲，刀法简练，线条圆滑，有“瓦当王”之称。

骊山北新丰庆山寺遗址出土唐代“凤头人面壶”一件，铜质，壶口一侧作流，另一侧连接凤首龙形盖。腹上高浮雕六个人头，其面相具天竺(今印度)人特征。据此可判断此壶可能来至天竺，是唐王朝与天竺国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上述之外，还有战国夔龙纹鼎、夔龙纹孟、凤纹孟，汉代蟠夔纹镜，唐代凤翅冠天王俑、鸾凤纹镜，元代龙纹绿釉陶鼎，明代龙纹宣德炉、龙泉剑，等。

以上文物均收藏于临潼博物馆。

四. 人物龙凤

所谓人物龙凤，是指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龙凤之称、之比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分为三类：人文先祖、帝王、帝王之外的人杰。三类人物骊山文化中都有。

人文先祖有伏羲、女娲和大禹。

骊山之巅“九龙头”有“仁宗庙”，亦称“仁祖庙”“人祖庙”“仁种庙”“人种庙”，祭祀的便是伏羲和女娲。

伏羲是传说中的远古氏族部落首领，位列三皇，有“龙祖”之称。《帝王世纪》、《诗含神雾》等典籍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于是可以这样推理：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三皇本纪》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此说来自《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话：“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及杜预注：“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孔颖达为郯子的话作疏曰：“太昊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三坟》则称伏羲任命“飞龙氏造六书”“潜龙氏做甲历”“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降龙氏倡率万民”。后世称伏羲首创龙图腾，主要根据便是这“以龙命官”“为龙师而龙名”。

女娲也是传说中的远古氏族部落首领，三皇之一。汉代的王逸在为《楚辞·天问》中“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一句作注时讲“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亦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还有，《帝王世纪》讲女娲氏“蛇身人首”，《列子·黄帝篇》言女娲氏“蛇身人面”，曹植《女娲画赞》云伏羲女娲“人首蛇形”，等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女娲像，山东武梁、河南南阳、山东沂南等地汉墓出土的女娲像，都是人面蛇身。蛇是龙的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容合对象，说女娲“蛇身”“蛇躯”“蛇形”，也就等于说女娲“龙身”“龙躯”“龙形”。

女娲不但与龙有关，还与凤有关。《帝王世纪》等古籍言女娲风姓，《甘肃敕封修通志》亦载“相传女娲氏风姓，生于风台，长于风谷，葬于风莹”。骊山有风王谷。陕西潼关风陵渡附近有风后陵，俗称“风陵堆”，相传即是安葬女娲的地方。古时“风”与“凤”同，风姓即凤姓。尽管凤在初成神物时为阳性、雄性，但在秦汉及以后，因为要与象征男性帝王的龙对应，凤整体上雌化，成为女性的象征。鉴于此，似乎也可以将女娲尊为凤母，即女性之母。

华清池内有“禹王庙”，祭祀的是大禹。

大禹亦称夏禹，是炎黄部落联盟最后一位首领。相传其父鲧治水失败，被天帝殛杀于羽山之野。鲧死后，精魂不散，尸体三年不腐。天帝派神人用“吴刀”剖鲧腹，其尸体遂化为黄龙，潜入羽渊。而在鲧腹剖开之际，一条无角虬龙蹦了

出来，这便是大禹最初的形象。相传大禹在治水之前，曾与“蛇身人面”的伏羲相遇，伏羲曾把一把玉简授予夏禹，禹就拿着这把玉简“度量天地”“平定水土”（《拾遗记》）。而在其治水的过程中，应龙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加上其它神龙的帮助，大禹终于平定了漫漶天下的水患。

闻一多先生曾从“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归藏·启噬》）的神话中，推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是夏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闻一多全集》第1卷《龙凤》，三联书店，1982年版）

帝王主要有三位：秦始皇、汉高祖、唐明皇。

秦始皇有“祖龙”之称，其死后，葬于骊山陵园。

汉高祖刘邦开“真龙天子”先河。楚汉相争时，刘邦曾在骊山北鸿门坂赴宴并脱险，登基后修建新丰以安置其父。

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前，李隆基曾以皇侄身份出任潞州太守，其时该州境内曾报称“有黄龙白日升天”（《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继位后，李隆基将其住过的隆庆坊内的隆庆池更名为“龙池”。在位期间，曾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创“开元盛世”。后怠于政事，听任佞臣，宠杨氏贵妃，常年游冶、欢宴于骊山华清宫，导致“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白居易《长恨歌》）。

帝王之外的人杰有“犹龙”老子。

骊山上有“老君殿”，亦称“朝元阁”，祭祀的便是老子。

五. 传说龙凤

所谓传说龙凤，指的是民间传说中，以龙凤为主题、为内容者。这样的传说，目前搜集并发表的有十余篇。举例如下——

《白龙沟》：传说很早以前，渭河南岸有条青龙，渭河北岸有条白龙。两龙比赛谁长得快、长得高。白龙因破坏了田野而被人们挖斩，留下深沟一条，青龙则长成了青秀的骊山。此传说将骊山说成是青龙所变。

《龙吟榭》：华清宫九龍湖南岸有吐水石龙。相传此龙起初吐的是珍珠米，且入碗成饭。而每日所吐，刚够附近庙中的和尚食用。有小和尚欲多得米，就用

竹竿捅龙口，结果龙口不再吐米，只留涎水。此传说有规诫贪婪之意。

《照人碑》：早年，人们都传渭北栎阳知县是个清官，县北清河龙王欲试其真假，就让青龙、云龙二子化作平民打架生事至县衙，知县详细审理，秉公而断。龙王确信传言不虚，便赠知县照人碑一通。此碑可照来人：坏者横卧，好者端立。

《凤凰柏》：早年，渭北栎阳古城南有一棵高大苍翠的柏树。相传当年秦献公的一位外甥欲霸民女凤仙，杀害了其父母丈夫，凤仙将计就计报仇后，一头碰死在栎阳城南一棵柏树上，此树便长成凤凰形状。

《莲花井》：穷小伙德生路见鹰蛇相斗，便赶鹰救蛇。几天后，清河龙王设宴谢他，原来那蛇是清河龙女所变。宴毕，龙王送德生一株水浮莲。此后德生回家，总有好饭在桌。某日德生出门后又悄然潜回，发现水浮莲变作美女，便入屋紧抱不放，于是二人成亲，幸福度日。有富人闻知此事，设计害死德生，强抢莲花女欲为妻室。莲花女趁其不防，一头栽进一口井中。自此以后，此井水映莲花，水质甘冽。

五. 诗词龙凤

所谓诗词龙凤，即在歌咏骊山及临潼境内景观的诗词中，出现有龙凤二字的句子。这样的句子比较多，分别指称不同的对象，或描写不同的景观。

指称帝王者有：“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唐章碣《焚书坑》）“可怜辒辌夜半发，祖龙今年竟不活”（清钱维乔《始皇陵咏》），其“祖龙”，指称秦始皇。“蛟龙徒恃关中险，枭獍还从蓟北来”（宋丰翔《温泉》）“夜浴汤池邀凤侣，晨趋水殿候龙颜”（明杨守谦《温泉》），其“蛟龙”“龙颜”，指称唐明皇。“鱼虾舞浪狂鯢鲲，龙蛇胆战登鸿门”（唐张碧《鸿门行》）“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元杨维贞《鸿门宴》），其“龙”指称汉高祖刘邦。

明指皇家车辇，暗指帝王者有：“中原无鹿海无波，凤辇鸾旗出幸多”（唐吴融《华清宫》）“林深雾暗迷八骏，朝东暮西劳六龙；六龙西幸峨嵋栈，悲风便入华清院”（宋苏轼《骊山绝句》）“六龙从此逐婵娟，赐浴华清更赐钱”（清许孙荃《骊山怀古》）。

指称人杰者有：“江山河岳开王霸，驽马神龙铸铁身”（曹印侯《题小照赠友》）

“使君如虎复如龙，游戏人间久绝踪”（景梅九《哭印侯》）“已驱硕鼠歌麟凤，定复台澎系犬羊”（郭沫若《游华清池》）。

指称美女者有：“镜前鸾对舞，琴里凤传歌”（唐张悦《温泉冯刘二监客舍观妓》）。

指称骏马者有：“幸陪銮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唐李白《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唐上官昭荣《驾幸新丰温泉宫》）。

指称建筑物者有：“云披丹凤阙，日下黑龙川”（唐武平一《奉和圣制登骊山高顶寓目应制》）“绛阙犹栖凤，雕梁常带虹”（唐皇甫冉《华清宫》）“紫凤真人府，斑龙太上家”（唐沈佺其《幸白鹿观应制》）“芳池漾碧春溶溶，龙楼凤阁层云中”（明李玑《过骊山》）“长生殿迹已无存，玉蕊峰连集凤门”（清金世扬《骊山怀古》）“红衣落尽暗香残，丹凤楼前驻马看”（明履素《温泉集古绝句》）。

描写景观者有：“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唐李商隐《骊山有感》）“龙蟠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唐浑《途经始皇墓》）“有时浴日起风雨，石龙鳞奋惊难逐”（清钱维乔《华清宫咏》）“凤凰原下鹿槽旁，虢国夫人有赐庄”（清王士祯《骊山怀古》）“环坟古柏耸空翠，怒欲撑天张龙臂”（张瑞玑《始皇陵醉歌》）。

指称温泉者有：“宫树深中浴殿开，玉龙暖水净尘埃”（明保安王《题华清宫汤泉》）“似有火龙衔赤日，真从丹灶吐青烟”（明邢云路《温泉》）“清沁云根吐玉泉，骊龙应抱火珠眠”（明范守己《温泉》）。其“玉龙”“火龙”“骊龙”指的都是温泉。

指称用具、书法者有：“日南龙脑争馥郁，无由更致明驼足”“大复山人曾此来，笔锋挥洒虬龙势”（清孙尔思《华清宫歌》）。

（2011年9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

佳县的龙文化资源及现实意义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参加白云山论道系列活动。

我是第二次来佳县了，1994年，佳县举办红枣节，我有幸第一次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那次活动，有许多场面，让我难以忘怀，比如红枣宴，比如扇鼓舞，尤其是时任县委书记许浚的一席话，甚是感人，他是这样讲的：“佳县人苦命，但佳县人人好，心诚。为了办红枣节，我们把办法想尽了，总共才筹集到五万元。钱少，事就办得粗糙、寒酸。但我们的决心真哪！我们的职工、教师，工资发到6月份、8月份，而他们照样上街扭秧歌！大家把精神当钱花了呀。战争年代，佳县人民曾全力以赴，支持过中国革命；如今全国都在改革开放中进步，佳县又怎么能永远落后、永远贫穷呢？！”回到西安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佳县红枣节》的文章，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文章末尾，我是这样讲的：“红枣是滋血养神补中益气的物什，而红枣的事业，必定是要红火起来的事业啊！”

十四年后，我再次来到佳县。这次来，我发现佳县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比如交通，比如通讯，比如红枣加工企业，比如举办白云山论道这样的高水准的文化论坛。文化也是生产力。我相信，这样的文化活动，会对佳县的各项工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龙文化研究，所以，我就以《佳县的龙文化资源及现实意义》为题作以下发言。

我们先来看看佳县有哪些龙文化资源。

一. 自然山水龙

所谓自然山水龙，就是将自然山水称作龙，其一般根据，是自然山水的形状、走势，绵延起伏有如龙形。

“我们都还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这是歌曲《大中国》里的歌词。两句歌词说明了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把长江和黄河比作龙。于是，黄河就成为佳县的排在首位的自然山水龙。黄河流经佳县长达 73 公里，佳县人民世世代代与这条奔腾不息的巨龙为伴。黄河之外，佳县境内还有佳芦河、秃尾河、车会河、五女河等十一条河流，这些河流堪称小龙，小龙们都投入到了巨龙的怀抱。

水龙之外还有山龙。佳县白云山山势崛然，如两条龙卧于黄河之滨，作汲水之状，故又有双龙岭之名。

二. 神话传说龙

所谓神话传说龙，是说某景观、某名胜因神话传说而得龙名，或与龙有所关联。

佳县白云观内的底层建筑为五龙宫。此宫也称“五龙捧圣宫”，是道教追溯真武大帝脱胎成仙的宫殿。殿内供奉着黑、白、红、黄、绿五条龙，象征五龙捧圣。传说当年真武修炼成仙，天尊为了试其诚心，派遣神仙下凡，变成美女，戏弄真武，真武大怒，挥剑驱赶女子，一直驱至悬崖下，仙女投河而没。真武见状，想自己修炼多年，今朝却追杀生灵，岂不前功尽弃，思来想去，后悔不已，便毅然跳下悬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出现了五条巨龙盘舞，将真武捧在太空，从此真武超凡入圣，修成正果。五龙宫正殿两壁及后墙上，有百余幅壁画，讲述的便是“五龙捧圣”及真武降生和修炼成仙的故事。

而真武大帝与龙也有密切的关系。

真武原名玄武，因避赵宋“圣祖”赵玄朗的讳而改称真武。“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龟蛇都是龙的容合对象。尤其蛇，是龙的主要的取材对象，蛇不仅把绵长的身躯和弯转的形态贡献给了龙，还把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因时空不同而调整自身的变通功能贡献给了龙。龙的家族中有蛇形龙、龟形龙，“龙生九子”中的赑屃，即驮石碑的龟趺，就直接取材于龟。



真武大帝是“北方之神”。《楚辞·远游》注云：“玄武，北方神名。”《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而这个“北方之神”又是位“水神”。因为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北方属水。“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后汉书·王梁传》）“北方七神之宿，实始于斗，镇北方，主风雨。”（《重修纬书集成·河图》）而龙也是水神，司水理水、兴云布雨，乃龙之天职。据此，可以说真武大帝与龙就神职而言具有同一性。

三. 帝王人杰龙

所谓帝王人杰龙，是说某些地方、景观，与帝王、人杰有了这样那样的瓜葛，因而或有了传说，或得了龙名。中国古代有将帝王和人杰称龙、比龙的传统，如将秦始皇嬴政称“祖龙”，将汉高祖刘邦称“龙子”，将三国蜀丞相诸葛亮称“卧龙”等等。

佳县中部有一个坐落在高高的陡坡上的小山村叫白龙庙。据说，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时，一听说这个村子叫白龙庙时，就毅然决定住下来，并

坐在村前的一块大青石上，远眺黄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据毛泽东的警卫李银桥回忆：“白龙庙是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树及少，缺水，老百姓为了求雨祈水，便在村里盖了一座白龙庙，村庄因此而得名。就在毛泽东进村后不久，天下起了雨来，老百姓纷纷传说这是‘真龙下界’，给他们带来了雨水。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据村民李巧霞回忆：当年，村里的老百姓听说毛主席来了，一个个奔走相告、一户户竞相神秘地传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是真龙天子、真龙下界，龙走行云、风调雨顺，白龙庙的小龙摆雨接驾呢！（据《〈东方红〉系列报道三·白龙庙》，载“陕北网：魅力陕北论坛”）

这段记载不无迷信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有自比为龙的意思，至少对龙持喜欢、肯定的态度。第二，老百姓将毛泽东比为龙，所谓“真龙下界”。第三，龙作为雨水之神已被老百姓所认知。

四. 考古文物龙

所谓考古文物龙，是说在考古发掘或民间征集的文物中有龙。

根据王富春、张飞荣编著的《中国佳县文物精华》（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所集录，佳县考古文物龙主要有以下五件（组）——

1. 汉代龙虎镜。此镜为照容用具，上有两组羽人戏龙纹：羽人一手持物前伸，一腿前弓，一腿跪地；双龙一条曲颈回首张嘴向着羽人，一条曲颈昂首面对羽人。
2. 汉代龙首铜梳刷。此刷是用来清除梳子上的垢腻的工具，呈烟斗状，长柄，柄端铸成龙首状。
3. 金代龙纹镜。此镜上的龙身躯绵长，绕镜纽而盘，龙须前扬，前肢伸张，一后肢做腿尾缠绕状。腿尾缠绕状是唐代龙的典型造型，此镜龙纹显然受其影响。

4. 清代青花龙纹盘。这是由江西景德镇民间瓷窑烧制的一个敞口、浅腹、平底、圈足的青花盘，盘内外绘龙纹。其龙瞪目挺胸，张牙舞爪，甩尾过墙，姿态矫健。

以上四件，两镜一刷一碗，都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具，说明至晚从汉代起，龙文化就进入了佳县人民的生活领域，成为民间习俗的组成部分。

5. 清代《五龙王画》小样。共五幅，分别为《青龙大王》《红龙大王》《白龙大王》《黑龙大王》和《黄龙大王》，由佳县兴隆寺收藏。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本土有龙神但没有龙王，龙王名号的出现与佛经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佛经的广泛传布，与中国人崇龙、尊王心理的交融互渗，尤其是宋代及之后帝王的封号，共同导致了龙王在中华大地上的滥觞和兴盛。龙王名号的出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佛经中有不少龙王。后来道教效法佛教，创造出一批中国式龙王，如四海龙王、五方龙王、诸天龙王，等等。

《五龙王画》画的是东南西北中五方龙王。这些龙王看上去已没有龙的形态，全然是人间王者的形像，说明在清代人们的心目中，龙、王、人三者已成为一体。

五. 建筑装饰龙

所谓建筑装饰龙，是说某建筑以龙为醒目的装饰，或雕塑，或彩画。

在佳县，这样的建筑装饰龙很多，如——

1. 四神祠。白云观有四神祠，供奉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神也称四灵，是季节和方位的代表。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在道教中，四神是护卫之神。《抱朴子内篇·杂应》称老子李聃：“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

2. 双龙螭吻。螭吻也叫鸱吻、鸱尾、好望等，系“龙生九子”之一，有吞火、消灾的功能。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疏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鸱鸟，也就是鸱鸺，能喷浪降雨，可以用来厌辟火灾，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

殿脊、屋顶之上。和一般常见的螭吻不同，佳县白云观大殿正脊上的螭吻是上下两条龙，比较特别，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增强其吞火、消灾的功能吧。

3. 龙戏珠。白云观有多处二龙戏珠石雕和一处三龙戏珠石雕。对龙珠的解释，有龙涎结晶、动物卵、太阳、球状闪电等。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4. 九龙壁。佳县白云观和白云山天一广场都有九龙壁。九龙壁指的是用雕塑、拼砌、彩绘等方式建造的有九条龙的壁墙。中国现存最早的九龙壁是山西省大同市内东街路南的九龙壁，此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王府门前照壁。之后，有属于清代的北京北海九龙壁和北京故宫九龙壁。北海九龙壁以气势取胜，故宫九龙壁以精美称誉，两壁上的龙皆身躯矫健，腾跃自如，色彩华丽，呈戏珠状于澎湃的海浪、云气之间。佳县白云观和天一广场的九龙壁，参考了北海九龙壁和故宫九龙壁的式样。



壁龙为何用九？因为，“九”在个位数中是最大的数值，又与“久”同音，因而有“至高无上”“天长地久”的意思。另有民间传说：很早以前，呼风唤雨全靠一条龙承担。这条龙一年四季奔走不歇，虽然日夜辛苦，毕竟力量有限，不能满足天下所有地方所有人要求风调雨顺的愿望。于是，此龙就向玉皇大帝启奏，要求多派几条龙帮助其行雨。玉帝准奏，调遣了八条巨龙归它指挥。天下百姓无不欢呼，便在龙王庙摆下好酒好菜，让九条龙享用。九条龙吃得大醉，醉后失控，行下倾盆大雨，大地上洪水泛滥，老百姓叫苦不迭。大雨过后，又一连数月干旱，

河干井枯庄稼死，老百姓怨声载道，哀呼：“一龙治水风调雨顺，九龙治水旱涝不匀。”呼声惊动天廷，玉帝便传旨将八条龙分到了东南西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将头龙封在中土，让其监望八方，各龙负责各方行雨事宜，谁渎职，就惩罚谁。——这样看来，九龙壁还有昭示和提醒尽职公事和惩戒渎职的用意。

5. 九龙浴太子。佳县寺庙、道观壁画中有“九龙浴太子”图。佛经记云：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也就是还未觉悟成佛，仅仅是刚做上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就有龙王口吐净水，为其沐浴。“九龙浴太子”就取此意，它反映了龙与佛的关系。有趣的是，佛寺里的“九龙浴太子”到了道观里就发生了变化，比如真武大殿里的“九龙浴太子”壁画，所画“太子”就变成了真武大帝。由此可见道教对佛教的借鉴和两教的容合。

上述之外，还有“龙凤呈祥”“龙凤双喜”“螭龙盘顶”“云气龙”“海水龙”“穿花龙”等雕塑或图案。

在对佳县的龙文化资源做了一番大略的考察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些资源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些资源是佳县自然景观、风景名胜、出土文物、民间俗信等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佳县的文化渊源，要发展佳县的文化产业，就一定会接触、涉猎到这些资源，也一定会利用、弘扬这些资源。

其次，这些资源有欣赏的、审美的意义。龙的造型、形象，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大都符合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其线条是流畅的，其色彩是鲜丽的，其形状是悦目的，其姿态是雅致的——或活泼、轻灵、奔放，或雄健、浑朴、昂扬。通过观摩这些龙雕龙画，人们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

第三，这些资源所蕴含的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基本精神，对现实中的经济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启示和指导的意义。比如福生，即造福众生——

终南山道士李玉风是修建白云观的第一功臣。据《佳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李玉风游四方，来到白云山，观其山景峻秀，便结庐



而居，采药治病，设化教民，普济众生，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一时间名扬四方，被老百姓尊为“玉凤真人”。在李玉风的主持下，白云观动工修建。李玉风的所作所为便是福生。

1947年，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曾为中共佳县县委题写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题词，这个题词所表达和体现的也是福生。毛泽东在白云山看戏，坚持站在一边，拒绝去前排，说他个子高，站在前边会挡了老乡们的视线。在这里，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还是福生。

佳县的历届领导班子率领全县人民，修路，造桥，通电，铺网，开发和拓展红枣、旅游、草畜、岩盐等产业，其所作所为也都是福生。

希望并相信龙文化的精神蕴含，能够为佳县的执政者和各界人士所领会和秉持，从而有益于佳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造福于佳县人民。

（此文为作者2008年12月18日在“2008白云山论道·中国佳县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梅山龙文化考析

梅山，在湖南省新化县境内，一名上梅山，有说因春秋战国时期，此地为楚王部众居住地，楚为芈（Mi）姓，Mi 与“梅”谐音，故名；有说是因汉初梅鋗封侯于此而得名。作为文化区域的梅山，大体上指的是湖南省境内“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东接益阳、宁乡、湘乡，西抵溆浦、辰溪，南到邵阳，北达桃源，方圆近一万余平方公里的这一古属梅山的地域”[1]。这个区域是古代“梅山蛮”居住、生活的地方，其所产生和流传的以原始渔猎、稻作文化和巫傩文化为内容的文化现象，被称为“梅山文化”。

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熊、牛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经过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容合、演进和升华，龙事实上已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文化也广泛地传播、渗透于祖国各地、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并与众多的文化现象交融互渗。

那么，考察一下龙文化与梅山文化的关系，当属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笔者的考察从“山水龙”“民俗龙”“精神龙”三个方面入手。

一

所谓“山水龙”，即以山脉峰岩、河流池泉等比龙、称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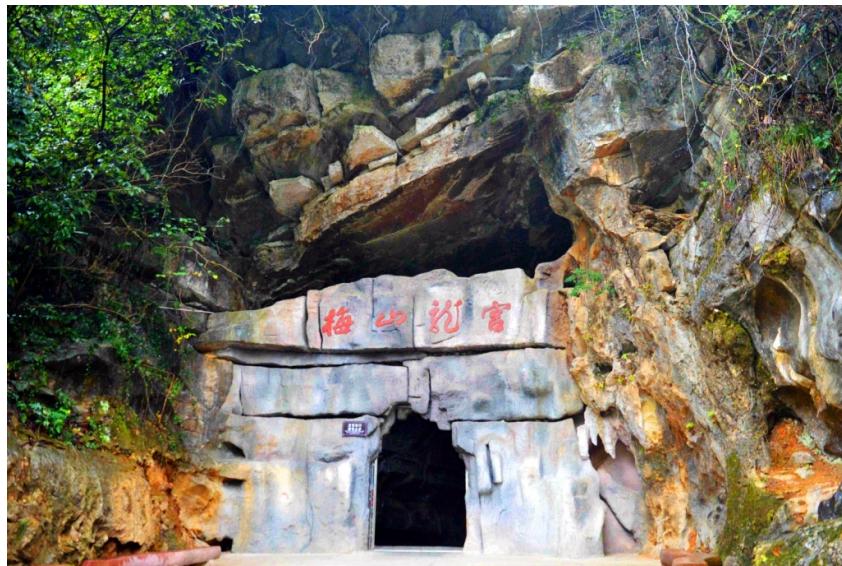
这里又有三种情形：“形状龙”“传说龙”和“帝王龙”。

所谓“形状龙”，即山水的形状像龙。绵长起伏、盘绕曲折是龙的形状特征，因而人们常把绵长起伏、盘绕曲折的物象比龙、称龙。

位于新化县柘溪库区油溪乡高桥村、有“亚洲最美的洞穴博物馆”之称的梅山龙宫，其得名的一个原因，就是洞道内多有由山石、流水等组合而成的像龙的

景观。如龙宫之门被称为“龙门”，门中央有从水中冒出来作抱拳拱手状，似在欢迎参观者的“龙太子”；转过门来，有一尾鲤鱼活蹦乱跳，想要跃过龙门，于是便以“鲤鱼跃龙门”命名。接下来，有“龙女浣纱”——由石灰岩水流淌下来逐渐沉积所形成的石瀑布像龙女刚刚浣洗完的轻纱；有“龙鹤亲吻”——一条龙从水中勃然而立，它的上方一只仙鹤翩翩降落，它们似乎想要亲吻；有上下交错、十分壮观的“双龙飞天”；有头、颈、脚、尾栩栩如生的“远古恐龙”——恐龙化石也是龙的容合对象；有“麒麟靠玉树”——麒麟为吉祥瑞兽，属于龙族神物。

另外，梅山龙宫洞穴阴河出口处有“盘龙湾”，湾口水质清澈，蜿蜒曲折，似神龙盘绕；而龙宫洞口两山夹一幽谷，称“藏龙谷”，谷两麓多台地，村落、农田、果园，错落有致，给人“龙鳞”比比之感。



所谓“传说龙”，即山水景地流传有关于龙的传说，因而得名。

所谓“帝王龙”，是说有古代帝王到过此山此水，留下了种种佳话。帝王为龙，其山水也就有了龙之名。

在梅山地区，“传说龙”与“帝王龙”是交织在一起的。

“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据考证，“熊湘”即指今新化县境内的大熊山。在南宋祝穆所著的《方舆胜览》中，也有“山川熊山，已昔黄帝登熊山，意其此也”之说。近年该山古寺遗

址发现有“轩辕黄帝游此山”的碑记。当地民间传说，黄帝南巡，有大熊引导至此，故名熊山。

大熊山最高峰名九龙峰。为什么叫九龙峰呢？相传黄帝登大熊山，曾将葱笼秀美的九龙峰点化成九条青龙，故名。峰顶有一池，池中有九股清泉涌出，谓之九龙池。相传九条青龙可以由此池游向四海龙宫。又说，九条青龙游入资水后，被油溪石竹湾的风光所吸引，久久不愿离去，一住就是几千年：此为梅山龙宫得名的又一个原由。

以上传说，将黄帝、熊、龙三者联系在一起。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言：“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受国于有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据此，不少学者认为，黄帝族曾以熊为图腾。古代典籍又多有黄帝为龙之说，如“黄帝龙颜”（《论衡·骨相》）、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列仙传》）、黄帝“日角龙颜”（《路史》）等。那么，黄帝族是以熊为图腾，还是以龙为图腾？我的观点是二者并不矛盾：黄帝在统一炎帝、蚩尤部族后，可能以龙为图腾，这之前，可能曾以熊为图腾（或某世、某支曾以熊为图腾）。而熊，也是龙的容合对象。辽宁省建平县曾征集到距今五千年，属于红山文化的熊首龙（也称“熊形原龙”）。说明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梅山地区流传的大熊引黄帝登山、黄帝又点化山峰为龙的传说，和这些传说所蕴涵的人（黄帝）、动物（熊）、神物（龙）三者之间密切关系。

二

“民俗龙”指的是有关龙的民俗信仰、民俗事象。

历史上，人们把居住、生活在梅山地区的群众统称为梅山蛮。“蛮”字在《说文》中归于《虫部》，解释为：“蛮，南蛮，蛇种。”“蛇种”的意思是蛇的后代。蛇是龙的主要的容合对象，龙的绵长弯转的身躯多取材于蛇，所以，可以说，蛇种即是龙种。事实上，所谓南蛮，即生活在南方的少数民族都是崇拜蛇和龙的，梅山蛮也不例外。

梅山蛮以盘古为祖先，并奉盘古为梅山教教主。而盘古，按明代董斯张著《广博物志》卷九引三国吴人徐整著《五运历年纪》中的描述，为“龙头蛇身，嘘为

风雨，吹为雷电……”这是说以开天辟地著称的盘古是一条龙，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龙，因为他不仅生着一个龙头，还是“蛇身”，蛇身即是龙身。

据民俗文化研究专家黄镇考察，梅山教是由越王后裔梅鋗创立的，其经典《盘道经》以问答形式言“新坛弟子”要向“太上老君”“拜助国救民之法”，而太上老君是“龙汉元年三月初六午时生，满天云雾盖其身，以果为食，故曰李老君”。关于“龙汉”，黄先生采纳、同意胡建国先生在《巫傩与巫术》一书中的解释：

“联系刘询（西汉皇帝）登基国号为“黄龙”，又是汉朝，巫者尊刘询为主。即取其国号“黄龙”之‘龙’配以汉朝之‘汉’为巫教之年号亦未可知。”看来，梅鋗是既崇拜老君（即老子），也崇拜龙的，所以通过《盘道经》，将老子与龙联系了起来。梅鋗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孔子就曾将老子比作龙。有“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史记·老子与韩非列传》）之说。梅山教还有坛主张五郎曾独自过海向老君拜法，老君特意传授给张五郎真法的说法，据此，我们可以说，张五郎是龙的一个徒弟，身上多少也有些龙性。

在梅山的节日风俗中，有“旧年三十，不去井里挑水，谓之龙王爷辛苦了一年，理应休息一天”的讲究，显示出对龙王的尊重。龙王崇拜是龙崇拜的重要内容，既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神龙崇拜有关，也与佛教东传有关，是崇龙、尊王、敬佛三者的结合。龙王之名来自佛经，是中国龙文化先传至印度，被印度佛教采纳，加上“王”的名号，又传回中土的。由此俗也可见佛教文化对梅山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崇拜龙王之外，梅山地区还有春节期间“舞龙”的习俗；有修房竖屋时请风水先生，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讲究，选“龙盘虎踞之地”的习俗；有家家户户敬奉祖先家神及“安神”的习俗。安的什么神呢？龙神。因为只有龙神安定，家事才能顺昌。据说，安神一要选好龙神在家的日子，一般在庚午日后的，“龙神接连有八天在家”。还要选好安神之人，“恐防不尽心”。[2]

三

所谓“精神龙”，指的是龙的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讲“龙的传人”，就主要指龙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

因遗传。关于龙的精神，笔者曾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来概括，其中“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龙的容合精神，也反映在梅山文化中。梅山文化无疑是一种容合文化，其容合的成分至少有：原始的农耕、狩猎、渔罟文化，巫风炽烈的傩文化，风情别具的民间习俗文化，博大厚重的中原文化，灵秀飘逸的荆楚文化，等等。若具体分析，可以梅山武术为例。梅山武术源自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培养出来猎捕技能，后又因与不断迁入的汉民杂居，在争斗中容合进汉民中流行的种种武术。其中朝廷武官、江湖侠客都发挥着作用。从风格上讲，讲究“神、气、意”三者容合，所谓“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融“手眼身法步法”于一体，“拳法刚柔相济”。

再如奋进的精神。有论家称，梅山人具有“刚烈坚忍、宁死不屈的剽悍尚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在长期的刀光剑影和残酷的血腥统治之中磨砺出来的。“梅山人的‘蛮’非‘横蛮’‘野蛮’之意，而是‘刚’‘勇’等义，‘勇’字当头，‘蛮’‘义’兼重，‘义薄云天’、‘蛮’‘智’和谐，‘蛮’中有智，‘蛮’‘勤’互彰，以勤补拙。这是对梅山人固有性格和内在性格的辩证认识。是传统文化积极入世，刚毅进取，艰苦奋斗精神的有机细胞。”

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与龙的奋进的精神具有同一性。

综上所述，可初步获得这样的认识：第一，龙文化多方面、多层次地渗入并影响了梅山文化；第二，龙的基本精神与梅山人的精神具有同一性；第三，龙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合梅山文化。

注：[1] 此说见《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第137页。另据《宋文·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按此说，梅山当指东至今湖南长沙，南到今湖南邵阳，北至今湖南沅陵，北到今湖南常德之间的达五万平方公里的区域。[2] 此处所引的民俗资料，采引自黄镇《巫术流传与民俗信仰初探》。

（本文发表于2003年10月在湖南省隆回县召开的“中国第三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版）

龙文化与城隍文化

龙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龙文化指的是有关龙这个神物的文化，包括龙的起源、发展、演变、传播、文物、民俗、精神蕴涵、现实意义、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互渗，等等。广义龙文化指的是古往今来的以龙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文化，即中国文化。通常人们讲的龙文化主要指狭义龙文化，但也涉及广义龙文化。

城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广义龙文化的一部分。

从狭义龙文化的视角看，城隍文化与龙文化也有关联。主要表现在：城隍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底蕴有一致之处。

龙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精神是福生，即造福众生。龙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古往今来，无论是作为水神、动物神，还是作为祖先神、人杰神、民族神，龙都以福生为目的。

城隍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精神也是造福众生，即福生。老百姓创造城隍、敬祀城隍，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福佑自己。道教把城隍当做“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言其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体现的就是福生的精神。

因龙的根本精神是福生，故龙有兴云布雨、除涝放雾的神职。遇到久旱不雨的岁月，人们往往要到龙王庙去向龙王求雨。有些地方没有龙王庙，或距离龙王庙较远，人们就到附近的城隍庙向城隍求雨。这时候的城隍就代替了龙王的职能，成了兴云布雨的神灵。换句话说就是，龙王可以城隍的面目出现，城隍也可以变化为龙王，这里的关键，是看老百姓需要不需要。

资料记载，城隍文化源于周朝；三国时，民间有了城隍祠；唐朝时，城隍信仰已相当普遍，杜甫、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文化名人都撰有祭祀城隍的诗文。宋以后，人民把那些生前造福一方、品德高尚、功业突出的英杰做为城隍神供奉，如上海祀霍光、陈化成、秦裕伯，北京祀杨椒山，福州祀陈文龙，泉

州祀韩琦，苏州祀春申君，杭州祀文天祥，桂林祀苏缄，柳州祀柳宗元、南昌祀灌婴、绍兴祀庞玉、曲沃祀申生、济南祀铁铉，郑州、西安祀纪信等等。

综观龙文化的发展史，可以说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1. 创生阶段，即由自然物容合、升华为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2. 发展阶段，即由神物发展至人杰喻体（喻比才俊、指代帝王）、皇权象征和吉祥瑞符；3. 升华阶段，即进一步升华为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吉祥瑞符。

这样看来，龙的历史职能至少有这么六项：司水灵物、通天神兽、人杰喻体、皇权象征、吉祥瑞符、民族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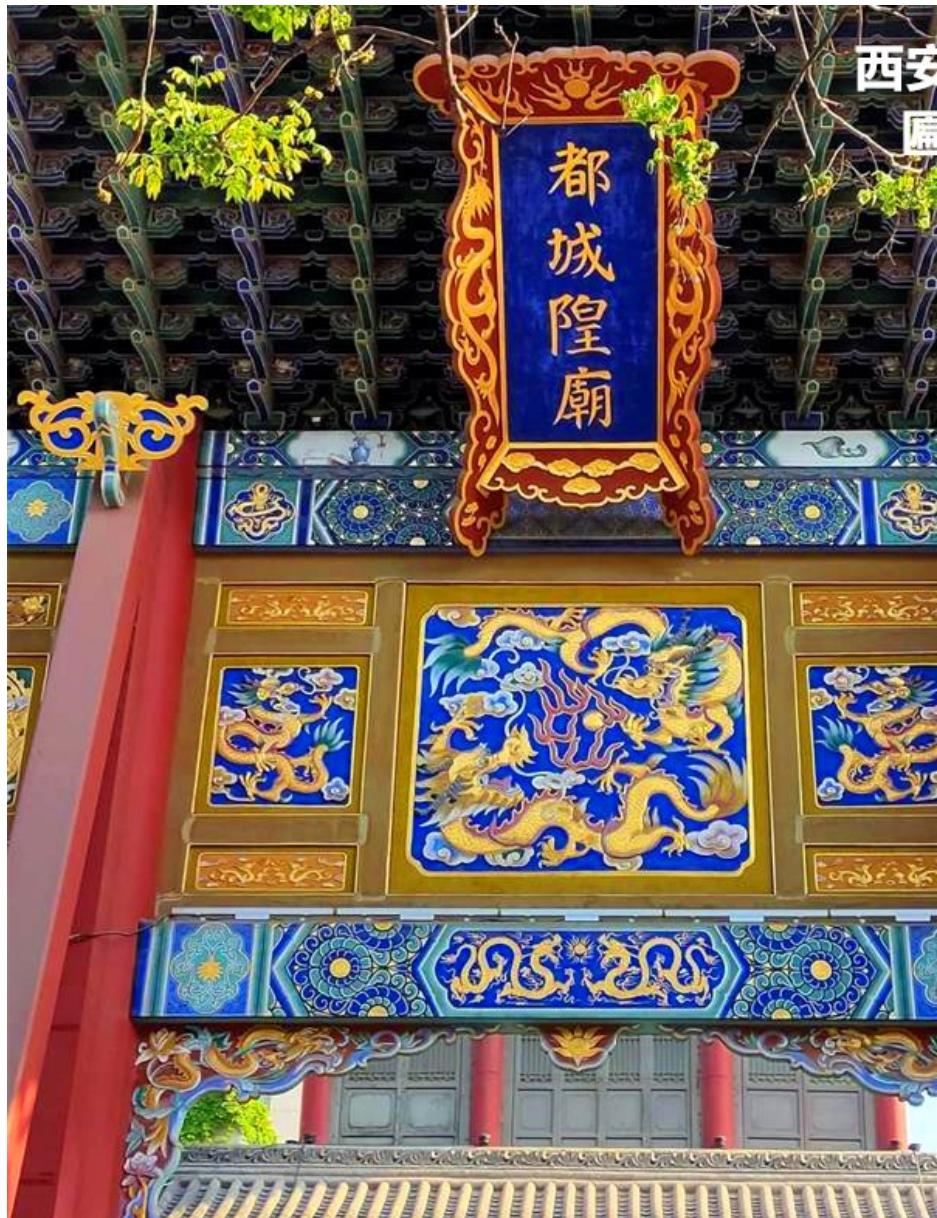
龙是先民对自然力神化的产物，其身上容合、集纳了诸多动物和天象的特性和力量，如果要对人间的杰出人物找喻体的话，龙当然是很理想而且不可多得的。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言：“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于是，一些杰出人才就有了龙的称谓，如春秋战国时孔子称老子为龙，即“老子犹龙”；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被称为“卧龙”……直到今天，“望子成龙”说依然在民间流行。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被尊为城隍神的英雄人物，都可以称为“龙”，即“人间杰龙”。换句话说就是，城隍庙里所供奉的、供人们敬祀的都是一些具有龙性的人物，都堪称“龙”、人形化了的“龙”。

龙文化与城隍文化的关联，还表现在龙的图案，大量地或者说较多地出现在城隍庙的建筑上，可以这样讲，在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座城隍庙，都能看到龙的形象，没有哪一座城隍庙没有龙在盘旋、在飞舞。

就说西安的都城隍庙吧：耸立在西大街北侧的牌坊楼和过街楼高大醒目，牌楼的正、背两面的正间是孔雀蓝衬底的“二龙戏珠”，两边分别有一条“坐龙”，四角上还分别刻着两条“行龙”。正间的两边分别是东、西侧间，每个侧间上各有一幅石绿色衬底的“龙凤呈祥”木雕彩画。据说，牌楼和紧挨的骑楼上的所有龙、凤以及牡丹花等纹饰，共使用了南京“御用”贴金五万多张。可以这样说，是龙，当然还有龙的伴侣凤，将西安都城隍庙的牌坊楼和过街楼装饰、烘托得壮丽夺目、美轮美奂。



不光是牌坊楼和过街楼，都城隍庙里的所有的阁、楼、殿、房、碑，其屋顶上、门楣上、梁柱上、牌匾上、碑座上、香炉上，处处都能看到龙的形象。如乐舞楼，其斗拱耍头为木雕龙首，额枋上雕五龙腾云，檐柱头上贴龙首雕花板……这些龙，大都扬首张口，瞠目振鳞，腾云驾雾，气势不凡。可以说，进了都城隍庙，就进了龙的世界；都城隍庙的文化氛围，就是龙文化的氛围。

(2013年10月21日于西安龙凤堂)

龙企业、龙产品与龙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图徽标志和文化象征，龙在企业、产品中有广泛、丰富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以龙为名的企业、产品，时时可见，处处可见；从国防科技、机电设备、交通能源……直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有龙字号企业、龙字号产品。这些龙企业、龙产品，渗透、承载、寄寓着龙的文化，同时也体现、昭彰、弘扬着龙的文化。

遍览这些龙企业、龙产品，我们会发现以下特点——

一. 广泛性

1. 遍布华夏

龙是中华民族的族徽，是华夏中国的代表，于是便有了直接冠以中国、中华、中、华、华夏、九州等的龙企业、龙产品，如——

中国龙网、中国龙族网、中国龙情网、中国龙志网、中国龙投资网、中国龙棋网、中国龙客联盟、中国龙软件技术公司、中国龙素质拓展培训中心、中国龙订房中心、中国龙芯、中国龙软件、中国龙吟刀、中国龙吟剑、《中国龙》纯金（银）珍藏版邮票。

中华龙网、中华龙凤文化网、中华龙信息网、中华龙园、铜梁中华龙温泉旅游开发区、中华龙腾基金、中华龙国宴用瓷、中华龙世纪瓶、中华龙提梁大壶、中华龙卷烟、中华龙油精、中华龙精品读书屋、《中华龙》大型画册。

中龙网、中龙数码影像世界、黑龙江中龙集团、中龙检验认证（香港）公司、北京中龙科创科技公司、广东顺德中龙木业、浙江中龙电机股份公司、巩义市中龙高岭土公司、上海中龙商行、上海中龙液压滤油器。

华龙网、华龙集团、华龙证券、华龙股份、华龙药业、华龙特钢、中影集团华龙电影数字制作公司、山西华龙塑料公司、河北华龙橡塑制品公司、深圳华龙重庆火锅城、自贡华龙艺术公司、西安华龙医院、保定华龙玻璃制品公司。

安徽华夏龙电梯公司、河北魏县华夏龙乡旅游开发公司、浙江上虞华夏龙伞厂、青岛华夏龙物流公司、鄂尔多斯华夏龙广告公司。

济南九州龙源水技术公司、陕西铜川九州龙苹果。

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加在一起共三十四个，每个省、市、区，都有以其名称或简称加以“龙”字的企业、产品。如——

北京市京龙商贸总公司、京龙华佳科发展公司、京龙人人网络技术服务公司、京龙科技、京龙陶瓷、京龙系统优化王、京龙热卡通、京龙市场、京龙大厦、京龙酒家。

天津市津龙五金建材公司、津龙天然保健制品公司、津龙航空、津龙饭店、津龙公寓、梅津龙羽毛球运动鞋、津龙茶多酚、津龙保柔液。

河北省冀龙橡胶制品公司、石家庄冀龙计算机网络公司、邯郸市冀龙包装机械公司、沧州市冀龙塑料彩印分公司、“冀龙牌”阴阳离子交换树脂。

山西省汾阳市晋龙优质核桃苗木基地、核桃品种晋龙一号晋龙二号、晋龙热线、太原晋龙涂料厂、运城晋龙饲料厂、晋龙铸锻铁艺、晋龙号“子弹头”列车。

内蒙古龙之旅旅行社、内蒙古龙源风能开发公司。

辽宁龙网科技开发公司、辽宁龙人通讯公司、辽龙牌水稻壮秧剂、营口营龙公司。

吉林省吉龙粮油开发公司、吉龙广告信息技术公司、吉龙投资咨询公司、吉龙律师事务所、吉龙稻米加工厂、吉龙碳素。

黑龙江黑龙股份公司、黑龙制药公司、黑龙电子系统工程公司、黑龙冰雪运动器材厂、绥化市黑龙粉米公司、黑龙茶。

上海龙网信息科技公司、上海龙洲经济城、上海龙试玩版、上海龙啤酒。

江苏苏龙绢纺集团、吴江市苏龙绢麻染织公司、江阴苏龙发电公司。

浙江龙网、浙龙电子、杭州浙龙房地产策划咨询中心、西陂浙龙酱菜厂、浙江龙铜元珍品。

安徽省皖龙兽药厂、合肥皖龙商贸公司、肥皖龙新型建筑材料联营公司、淮南皖龙鳝业公司、皖龙牌水性带锈防锈系列漆、皖龙一号杀虫剂。

福建惠安闽龙石材工贸公司、闽龙渔业、闽龙机械、龙海市闽龙电线电缆厂、甘蔗良种“闽龙 57/418”。

赣龙铁路、赣龙高速公路、赣龙大酒店、赣州赣龙旅行社。

山东鲁龙机械工业公司、鲁龙渔业、鲁龙乐园牌粉丝、潍坊坊龙酒业；

郑州大学豫龙信息技术工程公司、焦作市豫龙纸面石膏板厂、安阳县豫龙煤炭焦化公司、柘城豫龙清真食品总厂、郑州豫龙观赏鱼养殖场。

湖北楚天龙实业公司、湖北龙铜元珍品、“湖北龙一刀”。

湖南省湘龙实业总公司、湖南湘龙堂制药公司、长沙湘龙大市场、湘龙房地产。

广东粤龙工业公司、粤龙实业公司、粤龙电子科技公司、新粤龙五金电器厂、粤龙环球光学制品厂、粤龙特种养殖场、粤龙橡胶制品、粤龙服装玩具、粤龙购物袋。

广西桂龙新闻网、桂龙石材厂、桂龙竹材人造板厂、桂龙药膏。

海南龙行天下旅游公司、琼龙鸳鸯燕、南海龙王别院。

中美合资重庆渝龙食品饮料公司、重庆渝龙律师事务所、渝龙机械厂、渝龙专用肥料厂、渝龙房地产、渝龙牧业、渝龙牌建曲、渝龙牌白酒。

四川绵阳川龙实业、“川龙-18SD”小四轮拖拉机、川龙特色山水茶、蜀龙种业、蜀龙泵业、蜀龙印刷厂、蜀龙刺绣品、蜀龙花卉园区。

黔龙实业发展公司、黔龙蒜业、黔龙组合磷业、黔龙铁厂、黔龙酒家、黔龙大厦、黔龙加油站、贵龙饭店、贵龙啤酒。

云南滇龙畜产开发公司、滇龙玻璃钢厂、云龙广告装饰、云龙天池省级自然保护区、云龙磷化学工业公司、云龙黄金矿业、云龙交友中心。

拉萨市藏龙公司、藏龙家俱厂、藏龙物资贸易中心。

陕西秦龙绿色种业公司、秦龙九号玉米良种、秦龙电力股份公、秦龙泵业、秦龙兔业、秦龙彩石厂、秦龙保安电子器材、秦龙矿泉水、秦龙牌香烟。

甘肃龙氏智业、兰州龙源泉公园。

青海龙氏锑品公司、青海龙的青稞酒公司、青龙山金矿。

宁夏龙源公司、宁夏龙洲兽药公司、银川龙网吧。

新疆龙之源制药公司、新疆龙行天下游戏资料、吉木萨尔县萨龙蒜业。

香港港龙航空、港龙贴士网、港龙足球资讯公司、港龙酒店。

澳门龙恒投资公司、澳门龙环葡韵、澳门龙记酒家。

台湾台龙公司、台湾龙摄影、台湾龙族电视广告、台湾龙众出版。

2. 现身众业

华夏九州，各行各业、各种产品，冠以龙名者不计其数，真可谓龙的企业千千万、龙的产品万万千。我们不妨形象化地以一个人一天的生活经历为例——

此人姓龙，也属龙，叫爱龙，住在龙城市郊龙眠公寓。上午龙时，被源龙石英钟叫醒。他睁开龙目，揉揉龙鼻，穿上台湾龙哥牌牛仔服、佛山博思龙袜，趿上泉州华龙拖鞋，然后去“龙洗共振盆”前洗漱。他拿起中国龙防滑牙刷刷牙，用的是龙大夫牙膏，用菌克龙毛巾、龙化香皂洗了脸。接下来他打开科龙冰箱，取出龙丹豆奶、马卡龙饼和龙涓咸菜，将奶和饼分别在灵龙炉具上加热，放入九龙盘，端到莲花圆龙桌上，龙吞虎咽了一番。然后换上琦角龙皮鞋，关了销颜龙防盗门，乘申龙电梯下楼，驾驶神龙福康轿车去上班。

他来到龙会大厦龙奋公司，打开桌上的海尔丽龙电脑，开始编他的快活龙系列软件。他到网龙、亿龙、赛龙、傲龙等多家龙网查寻资料，还到慧龙电脑学校、威龙电脑超市、老龙巢穴动态图库转了一圈。休息时他抽了一支白金龙香烟，喝了一杯西拉龙矿泉水，玩了一会《勇者斗恶龙》游戏。接着，他访问了“中华龙凤文化”网站，把《铜梁龙灯发展寻踪》系列文章读完，还给有关龙专家发了个帖子。中午大龙、小龙和胖龙三个同事邀他共进龙餐。他们来到聚龙酒家，爱龙说“龙虎斗”“菊花龙虎凤”等是以蛇、猫、狸、田鸡等为原料的，咱就不吃这些“龙虎大菜”了吧，龙友们齐声说好。于是点了“莲花龙卷”“辣油龙豆”“龙子芹菜”“盘龙大虾”几样菜，要了东方龙酒和贵龙啤酒。大家边吃边喝边听爱龙讲龙的故事，他讲得龙飞凤舞，众人听得龙心荡漾、龙颜大悦。

下午公司在龙视大剧院包了电影，放的是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和成龙的

《飞龙再生》，那可真是蛟龙出海、龙争虎斗、龙魂激荡、龙气冲天。看罢二“龙”的佳作，爱龙顺便到龙人美容美发厅，让那个叫龙妹的姑娘理了发。又到龙康大药房买了些琥珀抱龙丸、补肾斑龙片和金龙护宝液。接下来到龙人乐大饭堂吃晚饭，点了一笼开封小龙虾、一碗成都龙抄手、一杯烟台裕龙葡萄酒。吃罢哼唱着《龙的传人》开车回家。存了龙车，放了龙药，又沿着行龙大道散步至力龙健身中心，蹬了一通威龙跑步机，打了一套火龙拳，舞了一阵青龙刀，才返回他的卧龙居。

他换了一身安利龙休闲服，将一盘龙音碟，放进时尚霸龙音响，在荡气回肠的《龙吟》曲中，他铺开太仓玖龙纸，摆好青溪龙砚，从双龙笔架上拿起象牙雕龙毛笔，饱蘸乾隆宝龙墨，开始每天例行的书龙——临摹古今一百个不同书体的龙字。从甲骨文上的龙、秦汉刻石上的龙、晋代王羲之的龙、唐代颜真卿的龙，直到郭沫若、舒同、赵朴初、启功的龙。练罢龙书，他沏一杯浓浓的乌龙茶，打开SONY特丽龙电视机，看了两集《卧虎藏龙》、一集《龙年档案》，还有一集《小龙女》。

他有睡觉前读龙书的习惯，案头放着《文心雕龙》《龙凤文化源流》《龙与中国文化》《龙起东方》《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国崇龙习俗》等论著，和金庸的《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古龙的《七星龙王》《白玉雕龙》，以及《龙的传说》《龙族》《龙应台文集》等文学作品。他揿亮仿古龙形灯，先坐在紫檀龙椅上读了一阵，后又躺在星龙床垫上、靠着智能型健龙健康枕读到困意袭来。然后盖着刺绣龙被入睡，他做了一个漫长曲折的龙之梦：先梦见自己去辽宁、陕西、河南等地看出土的文物龙，后又去香港、广州看龙舟竞渡，接着又到重庆铜梁看火龙表演，最后他竟乘一条五彩的巨龙腾空而起，飞向蓝悠悠、深渺渺的天空……

一些企业、产品在取名时，很注意将龙文化与行业特点相结合，这是龙在“现身众业”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鲜明有趣，且透示着智慧灵光的事象。如——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成都公司将其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歼击机命名为“枭龙”。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其负责人解释说：“‘枭’是一种猛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成飞为中国航空航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一直默默无闻。现在已不忌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在取名时选了‘枭龙’，喻意成飞与新型歼击机一道横空出世。”

几家带龙字的上市公司，大都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其主营业务。如铁龙股份，主营铁路运输；龙电股份，主营电厂的建设、经营、维修和电力的生产销售；龙涤股份，主营涤纶化纤生产；龙净环保，主营除尘装置和烟气脱硫装置……还有，搞网络远程教育者，将其公司命名为慧龙、启龙、育龙、望子龙；从事建筑材料生产者，叫固龙；专门生产照明器材者，叫火金龙；从事电信运营者，叫迅龙；经营音响器材者，叫雷龙；经营警用器材者，叫警龙；北京一个搞工艺美术用品的公司叫艺龙，台湾某实业将其生产的防锈产品、排水器材分别称为防锈龙、速排龙；山东有水龙王牌生活、消防、供水设备，浙江有楼龙牌防盗门；降血压，不少人都喝龙涎降压茶；防“非典”，龙安牌84消毒液派上了大用场……

服装上的龙也很有意思，如陕西伟志集团的火龙棉保暖内衣、武汉的大器龙服饰，浙江的太子龙服饰，福建石狮的变色龙制衣，上海的龙之步鞋业，深圳的龙之辉服装辅料，等等。

3. 辐射全球

所谓辐射全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龙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全世界，哪里有龙的传人，哪里就有龙的企业、龙的产品；另一层意思是，外国也有以龙为名的企业和产品（尽管多属音译，但在众多的同音、谐音汉字如“隆”“笼”“农”等中，选中了“龙”，即可见中国龙的影响力），这些企业和产品也多与中国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前者如承办全球华人赴新加坡商务、旅游、移民等事务的新加坡易龙公司；生产旅行箱、皮包的泰国龙亿企业股份公司，从事医疗保健业的泰国龙慈院；马来西亚龙冈亲义总会、龙狮总会、龙岩会馆联合会、龙鱼繁殖场，美国芝加哥美龙网、美国千禧龙年生肖邮票，加拿大亚太龙公司、亚太龙数码家庭影院，肯尼亚龙人贸易公司，等。

后者如全球知名的自动化控制及电子设备制造厂商——日本欧姆龙(OMRON)公司。欧姆龙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公司创始人立石一真先生曾担

任国贸促京都总局副会长，上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经济界代表，就开始了与中国各界的交流与合作。从 1980 年继电器的委托加工贸易开始，欧姆龙公司先后在中国大连、上海等地开办独资、合资的工厂、公司达十八家。还设立了“欧姆龙中国教育基金”，积极参与中国的人才培养。该公司以实现“在中国创建第二个欧姆龙”为战略目标，研发、生产、人才的本地化都正在加速和扩大。

类似的还有关心中国绿色事业的丹麦斯堪龙公司 (SKANLONG DENMARK CO)，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连锁企业”德国麦德龙公司 (METRO)，和东风汽车公司合作，打造中国“神龙”的法国雪铁龙公司 (CITROEN)，重视中国市场，曾推出“2001 千禧金龙年限量墨水笔”、“2002 龙腾盛世玉龙笔”的德国万宝龙公司 (MONT BLANC)，以及美国的奥立龙公司 (THERMO ORION)、狮龙 (SHERWOOD) 音响，日本的特美龙 (TEVIRON) 纤维产品，等。

二. 时代性

中国龙是“与时俱进”的，从新石器时代的“原龙”开始，夏商周有“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有“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有“行龙”，元明清有“黄龙”，当代有“祥龙”。

时序进入 21 世纪，又恰逢三千年一遇的“千禧龙年”，于是以“千禧龙”“世纪龙”为名的企业、产品，可谓遍地开花，多不胜数。如千禧龙收藏网、成都千禧龙网、江苏千禧龙药业、无锡市千禧龙商贸公司、重庆千禧龙音像电子连锁经营公司、章丘千禧大酒店、北京千禧龙酱骨炖菜馆、富邦千禧龙基金、千禧龙花园、千禧龙漫画光盘、千禧龙服饰、千禧龙年卡片、千禧龙典；世纪龙网、世纪龙证券网、世纪龙汽车网、贵州世纪龙酒业、北京世纪龙调味、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北京世纪龙鼎楼盘、济南世纪龙策划设计公司、广东世纪龙信息网络责任公司、十堰市世纪龙机电公司、一汽世纪龙农用车、世纪龙中视天运卡、世纪龙广明星卡，等等。

从 20 世纪中叶至今，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有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E 时代、数码时代、纳米时代种种提法。龙的企业和产品对此有突出的表现，如广州科龙集团、科龙电器、福建科立龙公司、深圳亚飞龙科技发展

公司、科信龙电脑网络公司、QQ 龙笔记本电脑、北京睿信龙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艺龙信息技术公司、信息龙在线、腾龙信息港、中国网龙公司、e 龙公司、中信 e 龙银行卡、深圳市数码龙网络科技公司、三诺数码龙、德赛数码龙软件系列产品、德赛数码龙相机、奥迈数码龙三代电视盒、天亿数码龙排队管理系统、南宁纳米龙公司、广东卡通龙毛布绒玩具，等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于是，也出现了许多从名称上就与商品、与市场挂钩的龙企业、龙产品。如金龙地产、金龙股市分析软件、金龙数码网、鑫龙办公设备、银龙专利代理、银龙食品、银龙纽扣、世纪商龙商业管理系統軟件、商龙皮革服饰、绍兴商龙麻棉纺织公司、济南历下商龙驴皮食品、钱龙信息网、钱龙股票分析系统、深圳钱龙印务、温州钱龙包装、水晶招财龙薰香台、财龙即时报价软件、发财龙即时看盘软件、联想天玑股龙、双飞龙期货、龙之物語专卖，等等。

有些龙企业、龙产品的名称，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能出现，而且，大都出现在开放度比较大的沿海城市。如深圳的风暴龙数码科技公司、视觉龙科技公司，上海的以计算机软件开发、多媒体动画制作、网站建设为主要业务的狂龙公司。当然，香港也有一个狂龙出版公司、澳门也有一个金剑狂龙足球吧——敢称“狂龙”，这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三. 文化性

所谓文化性，是说龙的企业、龙的产品凝结着、表现着、弘扬着龙的文化。我曾将龙的精神总结概括为八个字：容合、奋进、福生、谐天。这四种精神在龙企业、龙产品的名称上就表达得丰富而充分。

体现容合精神者，如聚龙集团、聚龙电力、聚龙机械、聚龙工业区、聚龙花园、聚龙牌香烟、龙聚建材市场、龙聚兴投资顾问公司、龙聚山庄、龙聚保健酒等。之外，还有汇龙燃具、团龙工艺品、宇龙计算机、亿龙集团、万龙软件、千龙新闻网、百龙塑料门窗异型材、龙二十一实业发展公司、九龙电力、八龙化肥、七龙成人用品网上超市、六龙生态茶、五龙蛇业、四龙蜜蜂产品、三龙经贸、双龙饭店、二龙戏珠造型菜、龙凤汤圆、龙圆酒店、龙盟企业邮箱、龙多多食品、

龙宇果酒饮料、龙世界矿泉水，等等。

体现奋进精神者，如飞龙实业、高飞龙公司、力龙实业、实龙力神、成龙集团、兴龙建筑、威龙药业、巨龙通讯、大龙电器、升龙建材、鹏龙鞋服、鹏龙达科技、腾龙电话、翔龙大酒店、翼龙高级润滑油、超龙美容整形外科医院、拓龙食品、宣龙火腿、永龙集团、恒龙工贸、尚龙酒业、鼎龙包装机械、旭龙实业、曦龙山庄、骥龙食品、骏龙石英钟、绵龙酒业、新龙茶叶、胜龙西服、隆龙饮料、劲龙照明电器、力杰龙工贸、世龙达文具、佳佳龙电动玩具、龙头股份、石油龙昌、龙发集团、龙生集团、龙大集团、龙丰集团、龙盛实业、龙腾家园、龙马电器、龙伟印务、龙飞食品、龙旺食品、龙胜酒家、龙信科技、龙奇精细化工、龙豪大酒店、龙阳胶囊、龙加龙服装洗染、辈辈龙蔬菜食品饮料，等等。

体现福生精神者，如富龙热力、富龙力电缆电线、嘉龙德科技、吉龙经贸、惠龙医用卫生材料、瑞龙波营养食品、福利龙肥料、愈肝龙胶囊、润龙通讯设备、维龙卫生用品、幸龙工艺品、裕龙食品、荣龙商贸、佳龙工贸、福龙食品、泰龙肉类食品、健龙矿泉酒业、康龙保健品、红冠龙西瓜、一条龙雪糕、泉龙风痛酒、太龙舒脂康、龙发股份、龙康实业、龙赐酒业、龙人造革、龙津酿造、龙德医用器械、龙泰葡萄酒、龙福果蔬饮料、龙引泉饮料、龙民福涂料、龙祥食品、龙仁食品、龙泽食品、龙香大康食品、康得龙糖酒食品、龙口粉丝，等等，就体现着这种精神。

体现谐天精神者，如蓝天龙实业、大天龙日化、中天龙广告、天龙服饰、龙在天纸业、云龙保健品、盘龙云海药业、太阳龙海洋食品、顺龙饰品、辰龙股份、兆龙食品、兆龙泰科贸、圣龙香油、正龙花生制品、喜龙食品、山东海龙、海龙酒楼、雷龙精品、神龙制药、龙雨食品、雪龙面粉、青龙大蒜、绿德龙食品、绿龙茶叶、仙龙茶庄、龙净环保、功龙环保、龙安实业、龙叶绿蔬、龙山酿造、龙湖食品、龙河食品、龙江乳品、龙潭酒业、龙泉面粉、龙珠广场、龙州啤酒、龙川酒业、龙脉房地产、龙脉颐天饮料、龙利通实业、龙井天然矿泉、龙头泉实业、龙怀养殖中心、龙眼山泉离子水饮品、龙山墓园，等等。

龙的精神、龙的文化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企业、产品的名称上，他还渗透、凝结、体现在许多企业的宗旨、方针、理念、口号中。如——

辽宁科大聚龙集团的企业宗旨为“规模化，多元化，集团化”，信用理念为

“中国人面前我代表聚龙，外国人面前我代表中国”，文化理念为“团结协作，公平竞争，凝聚团队，创新增值”。

山西辈辈龙蔬菜食品饮料公司声明其公司，“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综合素质为奋斗目标”，“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民族凝聚力为宗旨”。

深圳脉山龙（Bay Lab）科技公司对其名称的诠释是：脉：脉络、脉搏。喻示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山：深邃、朴实、屹立。喻示有容乃大，壮健挺拔；龙：睿智、尊祥。喻示龙图纪河，志存高远。Bay：海湾。山海交汇，可贯惊涛搏岸之势；龙绕脉山，可展云涌风啸之景。Lab：实验室。源发科技，创新思维。BayLab：创新的宝地，求索者实现理想的天堂。声言要“挟龙之灵气，倚山之稳重，驰脉之川流；隐则存刚存柔，显则气势磅礴”。

“研究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结龙凤传人，昌盛龙凤故乡”是“中华龙凤文化”网站的办站宗旨，而龙族论坛的口号则是：“挺起民族的脊梁，重振龙族的尊严”。

（2003年9月25日在“重庆·铜梁中华龙文化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宣讲；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水龙腾空 彩凤展翅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的龙凤文化

湖边水龙

在西安世园的诸多漂亮景观中，一座银白色的水龙雕塑引人注目。它于长安塔斜对面的锦绣湖边腾空而起，在阳光下熠熠闪亮。这是一条钢结构的总重280吨、扭力承载达700吨的巨龙，不锈钢镜面是其闪光的物理原因，而其形状，却又似砰然溅起的一簇硕大的水花。将水花和龙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龙的雕塑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刷新了人们司空见惯的龙的形象，为泱泱龙族增添了新的成员，启迪、丰富着人们的想象力，而且将水与龙的关系凸显出来，引发人们对自然与人，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自信心的回归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龙与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水是龙的自然源，龙是水的神物化。作为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龙的诸多容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鲵常年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鹿、牛、马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龙来自于“水物”和“水相”，是“水物”和“水相”的代表和领袖。

于是，龙成为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水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神就是农业神。中国是农业大国，是需水、用水、敬水大国，于是，对龙的崇拜便由来已久且相当普遍，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龙王庙多不胜数，而那些丰富多彩的有关龙的民俗，也大多与水有关。

龙与水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将水比作龙。“我们都只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这是歌曲《大中国》中的歌词。不仅长江黄河，中国境内，任何一条江河，都有龙之比，灞河、浐河也不例外。

龙首原是浐灞地区著名的黄土台原，它“起南山义谷浐水西岸，至长乐坡西北，屈曲至长乐古城六七十里，隋唐宫殿皆依此原而建”（《三秦记》）。相传，秦时，有一条龙从秦岭来到渭河饮水，其经过的地方形成一条土山，形状如龙，龙首原就是由这条龙所变，并由此得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专门作了一篇《黑龙饮渭赋》，言其“忽兮下降，贲然跃出。首蜿蜒以涌烟，鳞错落而点漆。动而无悔，爰作瑞于秦川……降长川，俯高岸。气默默以黯黯，光灿灿而烂烂。……一呼一吸，而声起风雷；或跃或腾，而势超云汉。……拖尾回翔，擘波腾骧。饮清澜之浩浩，动素浪之汤汤。顿倾而碎珠迸落，奋髯而细雨飞扬……”

依我看，龙首原之得名，是古人因其曲折绵长的形态似龙而附会以传说。同理，我们也可将灞河比龙，即将那条民间相传的龙说成灞河也未尝不可：一是灞河源于秦岭，接纳浐河后入于渭水——与“从秦岭来到渭河饮水”相符；二是灞河曲折蜿蜒具龙之形态——如果从高空俯瞰，或看地形图就很明显；而白居易先生那些华美的辞句，用来描绘和形容灞河也完全合适。灞河为龙，那么，西安世园里来自灞河，注入灞河，面积达188公顷的水，就堪称婉转流动、活泼生动的一脉“龙水”。这样，在碧波荡漾的天然“龙水”之上，出现一条熠熠生辉的艺术“水龙”，就成为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巧的是，“水龙”正好位于天人长安塔的西北，而西北属“乾”位。“乾卦”是《周易》中的第一卦，也是一个以龙的六种时态为喻的“龙卦”。于是，我们看到了“龙跃于渊”，看到了“飞龙在天”……

“水龙”的创作者、雕塑家任军先生告诉我，三年前，在北京他的工作室，世园会的领导与他有过一次难忘的长谈，谈生态文明观，谈以水为核心创作雕塑，谈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谈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民族自信心的回归。这次交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因为双方的许多认识都是一致的。交谈的过程中，他就想到了龙，心胸中就涌动起创作的激情。作为一位对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有着敏锐、独到体悟的艺术家，任军先生关注水，认为水是生命之源，是自然生态的代表，于是创作出“上善若水”系列水形巨幅雕塑，其中的“水七号”和“水十号”被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选中，耸立于运动场馆的门口；他崇尚中国的道家思想，认为“天人合一”是终极哲学，于是努力运用国际化的时尚的艺术手段，表达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恒久价值；他认为艺术家的心脏要随着时代

的脉搏而跳动，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时代意志的产物；认为当今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于是精心打造“水龙”，使其以令世人震撼的态势，腾跃于西安世园。



我为任军先生的追求和主张而鼓掌。作为对包括水在内的自然力的神化和升华，龙的身上深刻地蕴涵和体现着“谐天”，即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精神。任军先生崇尚的道家思想的根本点、“天人合一”哲学的根本点，以及当今世人主张和强调的生态文明观的根本点，都可以归结为“谐天”。西安世园会以浐灞生态区为举办地，以“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以“绿色引领时尚”为理念，列出“节能减排、低碳出行”“惜水节水、循环利用”“植树种花、美化生活”等“绿十条”向世人推荐：这一切，都与龙的“谐天”精神相吻合。于是，我们可以说，水龙腾空，是西安世园彰显和践行“谐天”精神，即生态文明观的一个标志、一个亮点。

在与任军先生交谈时，我还提出了“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思想。在我看来，在中国先哲的思想体系中，道家偏重于“自然化人”，儒家偏重于“人化自然”。“自然化人”具有原初的根本的性质，人类是自然所“化”的结晶，

最终也必然被自然“化”去；但人类所具备的智慧的创造性的本质，又决定其在自然面前，并非完全消极被动，也有积极主动的一面，这便是“人化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处理“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关系方面，教训不少，但也积累了深刻的经验，这便是“适度为善”，即因时因地因事地找到“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最佳结合点。今天，我们讲民族文化的复兴，讲民族自信心的回归，复兴什么？回归到哪里？在我看来，就是以道家、儒家及佛家提供的文化资源为本，借鉴和采纳世界各种文明成果，治古炼今、精中粹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三个基本面上，努力达到“适度为善”。“适度为善”意味着“适度为美”。从这个角度讲，世园“水龙”的成功，就在于它的“适度”。

这样，就不得不谈谈龙的“容合”精神了。“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容合”。“容合”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和绵延不绝，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容合”；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事业，无不是“容合”的结果。比如西安世园，就“容合”了世界各地的参展城市、组织和企业；“容合”了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地的九个世界级景观园艺大师和十个世界著名园艺学院师生奉献的作品；

“容合”了包括热带雨林植物、极冷植物和特有珍稀植物在内的四万多种植物花卉；“容合”了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秦岭四宝”，“容合”了中华文化传统、现代文明时尚、城市园艺景观、环保生态科技等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文化元素……

不仅如此，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以其根系之深、内涵之丰、时间之久、传衍之广、容合性之大、凝聚力之强，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作为全时态象征，龙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它一直伴随着也必将继续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寄托、凝结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也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激励、鼓舞着亿万中国人齐心协力、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是需要象征标志的，这个象征标志非龙莫属。那么，作为一届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一个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城市举办的跨越经济、文化、科技等领

域的多元化、综合性、世界级的博览盛会，怎么可能会没有龙呢？从这个角度讲，水龙的价值，已非简单的“艺术”二字可以尽括，它引发着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考，堪称超形拔群的“灵魂”之作。

花谷彩凤

有龙就有凤，所谓龙飞凤舞、龙凤呈祥。

世园里的凤，是长安花谷的造型。长安花谷是西安世园会五大园艺景点之一，它“用不同色彩的花卉描绘出‘天上’景观，展示从古至今人们对‘天’的认识和想象，在一百七十八天的会期内，将进行多次样式和花卉的更换”（《西安·花季》）。而整个花谷，若从空中俯瞰，竟恰似一只展开双翅的彩凤。位于园区东北部的世园会主入口广运门，构成了彩凤的头部，若仔细看，你还能找到凤的尖喙和长眼；凤的双翅大得气势磅礴，上面分布着纵纵横横的绿树，和不规则的一块块花田，堪称七彩斑斓；位于世园会主轴线上的建筑布局呈“王”字形的创意馆，正好构成了凤的尾翼，和创意馆相连的伸向水中的几个码头，像凤的足爪，蓝绿色的湖水，将其映衬得十分明显。

彩凤出现于世园，看似偶然，却也必然。因为凤和西安，有着深远的渊源。《列仙传》载，有一个俊小伙叫萧史，箫吹得棒极了，能作凤鸣之声。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也好吹箫，穆公就将她许配给萧史，并修筑一座凤台让他们居住。数年后的某一日，天上的凤凰被二人的箫声引来，萧史和弄玉便驾着凤凰飞去了。这便是流传久远的“吹箫引凤”的“神话”。这则神话的一个人文效应，便是将帝王的居住之城称为“凤城”。帝王的居住之城是当然的京都之城，因而“凤城”也就成了京都的一个别称。古长安作京都历十三个王朝、长达一千一百多年，于是顺理成章，也就别称“凤城”了。杜甫诗句“步蟾倚仗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章八元诗句“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中的“凤城”，指的都是长安。

据此，我们可以把“凤城”的得名途径称为“神话凤”。“神话凤”之外，还有“建筑凤”。据《史记·孝武本纪》载：汉代的京城长安曾“作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造如此高的凤阙干什么用呢？《索隐》引《关中记》

云：“一名别风阙，以言别四方之风。”噢，原来是用来测风向的。那为什么叫凤阙呢？《索隐》再引《三辅故事》云：“……上有铜凤凰，故曰凤阙也。”这就说明白了。难怪东汉的张衡在《西京赋》里有“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之语。因凤阙修在皇宫门前，因而后人就以凤阙指代皇宫。皇宫称凤阙，皇宫所在的城市称凤城，也就说得过去了。

在西安市的地图上，你能找到“凤城”的字样，北二环和绕城高速之间，有“凤城一路”到“凤城十二路”。2011年2月，中共西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都从城中原址搬到了凤城八路新址。从此，凤与西安一同出现的频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如此自然、巧妙、大气地出现于世园，也令人欣赏和感叹。

我曾用“和美”二字来概括凤文化的精髓。凤是“和”的产物，也是“和”的表征。凤的出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种种生物理解、尊重、敬畏、爱恋、审美的结果，这便与道家强调的“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相一致；凤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将自己的种种道德理想付于其身，比如舍己献身，比如崇尚高洁，比如百鸟朝凤，等等，这当然与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有一致之处；凤源于鸟禽又高于鸟禽，既能在红尘中立足，又能飞至红尘之外，其能量和本领，来自人们解脱困惑、放飞心灵的愿望，这便与佛家，尤其是禅宗所追求的是“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相吻合。

不仅如此，凤还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从发生美的角度看，凤的容合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审美的过程。从艺术美的角度看，凤具有形象性、感染性和典型性，而且与真、与善相统一。从形式美的角度看，凤符合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其线条是流畅的，其色彩是鲜丽的，其声音是乐耳的，其形状是悦目的，其姿态是雅致的——或活泼、轻灵、奔放，或雄健、浑朴、昂扬。从内涵美的角度看，凤至少具备祥瑞美、新异美和崇高美。

上述这些说法，我们在西安世园都能找到对应。比如，为了保证园艺展的水准，西安世园会聘请了九位世界级的景观园艺大师，这些大师来自不同的国家，设计理念和造型风格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设

计的“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极富想象力的创意视角”，成为西安世园会标志性建筑的“长安塔”，英国普拉斯马公司首席设计师伊娃设计的“广运门”“创意馆”“自然馆”，著名美籍华裔女雕塑家盛珊珊设计的“梦幻森林”景观，著名西安籍雕塑家任军的“水龙”等等，全都和谐互补、同生共靓地处于一园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和美”的精神理念，已渗透、充盈在这些大师们的脑细胞之中，和风的创造一样，出现在世园中的作品，集纳着和美的元素，表达着和美的诉求、展示着和美的理想，符合着和美的规律。籍于此，我们可以说，西安世园是充分体现凤文化精髓之园，即“和美”之园。



（刊于 2011 年 4 月 9 日《西安日报》、2011 年 4 月 9 日《西安晚报》）

凤凰博物馆的主题策划与展示方式

凤凰博物馆是香港启盛集团在湖南省凤凰县南华山景区投资修建的一个文化旅游项目。2010年1月，笔者接受聘请，出任凤凰博物馆首席专家、名誉馆长和总策划。

一. 凤凰博物馆的定位

凤凰，简称凤，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鸟禽，和太阳、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向阳、喜火、达天、秉德、兆瑞、高洁、喻情、成王等品性的神物。

经过至少八千年的演进和升华，凤凰与龙一起，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凤传人”。

在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系列中，就内涵之丰富、功能之大小、影响之深远论，龙可以排在首位；接下来就是凤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持续升温，龙文化的展示项目，已在浙江、甘肃、广东、广西、河南等地出现或正在修建之中，凤凰文化的展示项目却一直空缺。据此可以说，凤凰博物馆的投资修建，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把“和”作为做人的基本、立论的基础和理想社会的至高境界。而凤凰，正是“和”的产物，也是“和”的表征。道、儒、佛是中华文化的三根支柱。凤凰的容合对象大都是自然界中的生物，凤凰的出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种种动物和天象理解、尊重、敬畏、审美的结果，这便与道家强调的“天和”相一致；凤凰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身上就承膺着种种道德理想，如舍己献身、崇高尚洁等等，这便与儒家强调的“人和”

相一致；凤凰源于鸟禽又高于鸟禽，既能在红尘中立足，又能飞至红尘之外，其能量和本领，来自人们解脱困惑、放飞心灵的愿望，这便与佛家，尤其是禅宗所追求的“心和”相吻合。

所以，可以说，凤凰博物馆，是中华和谐文化形象展示地。

不仅如此，凤凰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凤凰的容合过程，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即审美的过程。锦鸡的彩羽、鹰雕的巨翅、孔雀的靓翎、鹤鹳的长足、鸵鸟的高大，以及燕子的知春、天鹅的高洁、乌鸦的反哺、鸳鸯的匹俦……一个个美的因子、美的质素、美的单元，走出了它们的原本所属，走向了一个新的集体。

从形式美的角度看，凤凰符合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其线条是流畅的，其色彩是鲜丽的，其声音是乐耳的，其形状是悦目的，其姿态是雅致的——或活泼、轻灵、奔放，或雄健、浑朴、昂扬。从内涵美的角度看，凤凰至少具备祥瑞美、新异美和崇高美。凤凰是形式美与内涵美的统一。

所以，可以说，凤凰博物馆，是中华审美文化的欣赏体验地。

这样，对凤凰博物馆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世界首座凤凰文化展示馆、中国首席凤凰文化体验馆。

二. 凤凰博物馆的主要内容

凤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涉及神话传说、文物考古、历史政治、民间习俗、文学艺术、建筑名胜等众多领域，其丰富多彩的程度，远在龙之外的其他象征物之上。作为专题性博物馆，在全面展示凤凰文化各个方面的基础上，力求重点突出。

笔者按“起首篇：金凤来仪，天下和美；第一展：凤起东方——凤凰的起源，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关系；第二展：沧桑凤颜——凤凰的演变、发展、向域外的播迁；第三展：凤舞楚湘——凤凰与楚、湘文化的关系；第四展：百鸟朝凤——凤凰的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第五展：七彩凤凰——凤凰与百姓生活，相关民俗、艺术；第六展：凤翥龙飞——凤凰与龙相伴共生、吉祥同福；不

了篇：凤凰涅槃，新新不已——凤凰对 phoenix 的借鉴，中华文明在炼吉、容合中创新”的方案进行了策划。

在“起首篇”中，对凤凰文化的精髓做了揭示和强调。指出：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和美”的凤凰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既是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和美”的凤凰文化可以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为百姓生活增添福乐、为民族团结举起旗帜、为世界和平昭彰公理、为人类文明奉献智慧。

在“第一展：凤起东方”中，首先对凤凰的起源进行了分析。指出：凤凰的起源与自然崇拜有关，是自然崇拜的升华。动物崇拜和天象崇拜是自然崇拜的组成部分。凤凰崇拜主要以动物崇拜和天象崇拜为基础，它来自动物崇拜和天象崇拜，却比动物崇拜和天象崇拜更集中、更神奇、更灵异，内涵也更丰富、更艺术、更审美、更富有象征意味。事实上，在凤凰形成之前，先民就开始了对鸡、鹰、燕、鹤、乌鸦、鹌鹑、孔雀、鸳鸯、天鹅、蛇、虎、龟、鱼等动物的崇拜，和对太阳、风、火等天象的崇拜。凤凰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将这些崇拜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在一起的过程。

接着，分析介绍了凤凰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指出：按通常的说法，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是生活于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部落集团容合东方东夷部落集团和南方苗蛮部落集团的结果。伏羲、女娲是炎黄部落和苗蛮部落的远祖，炎帝、黄帝、虞舜是炎黄部落集团的首领，少昊是东夷部落集团的首领，而凤凰与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虞舜关系密切（如伏羲、女娲风姓，古时“风”与“凤”同，风姓即凤姓；炎帝是太阳神、凤凰是太阳鸟；舜帝曾化身为凤鸟等），又是东夷集团的图腾标志（少昊氏崇拜太阳、以鸟名官等），故可以说：凤凰和龙一样，是华夏族形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

再下来，以考古文物为证据，阐明凤凰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形成期，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考古类型文化是文明起源的重要依据，而在新石器时代的各个考古类型文化中，几乎都发现有原始的凤凰，说明凤凰伴随、参与、见证、标志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涉及的重要文物有：距今达七千八百年的湖南高庙文化凤鸟纹陶片、陶器；距今近七千年的内蒙

古赵宝沟文化凤型陶杯、陶尊凤鸟纹；距今达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凤凰纹器物；距今五千年以上的河南、陕西、甘肃仰韶文化凤纹彩陶；距今达五千年的内蒙古、辽宁红山文化凤形玉；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凤形鬶；距今四千多年的山东龙山文化骨刻凤字。

在“第二展：沧桑凤颜”中，首先按时间顺序，介绍、展示了自夏以来，历朝历代凤凰的演变和发展，说明生活在地球东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将自己对身外世界的理解和体验、希望和期待、智慧和情感等等投注在了凤凰的身上。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凤凰，与中华文明的雏型期相对应；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凤凰，与中华文明的基本成型期相对应；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凤凰，与中华文明的鼎盛期相对应；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凤凰，与中华文明的延展期相对应；近当代，尤其是当代的凤凰，则与中华文明再次走向兴盛相对应。凤凰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动态系统，它总是和中华民族前行的步伐相一致：秉赋时代特色，向着未来飞翔。

接着，介绍、展示了凤凰向域外播迁的情况。指出，凤凰文化是以两种途径传播到境外的：一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将凤凰带回他们国家；二是中国人到外国去，将凤凰带向世界各地。前者如丝绸之路开通后，来大汉帝国交往、通商、传教的波斯（今伊朗）、罗马、印度等国的使节、商贾、僧人；唐时的日本遣唐史，后世各代的商人、传教士、留学生等。后者如先秦时期江南的部分苗蛮人、百越人辗转南迁至今天的越南、泰国，有的还渡海到了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如秦时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到达日本岛的徐福，还有出使西域的汉臣张骞、班超、甘英，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清代始有的驻外使节、留学生、漂洋过海艰辛谋生的中国劳工，以及近、当代的各种移民，等等。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韩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周边国家，自古以来和中国交往密切，中华凤凰文化也广泛地影响、渗透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艺术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第三展：凤舞楚湘”中，着重揭示了凤凰与楚、湘文化的关系。指出：壮丽秀美的自然山水，艰苦荒蛮的生活环境，昌炽狂迷的鬼神俗信，漫漶盛行的巫觋风尚，使楚文化具有神谲、瑰奇、灵秀、浪漫、崇高、霸烈等特点，这些特点与凤凰的内在品性多有吻合，故楚人崇凤。

因古代湖南几乎一半都属楚地，故有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之说。但也有“湖湘文化”的概念被学界提出。有人认为湖湘文化具有“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地域特征；有人说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盘得活，霸得蛮”。综合各家观点，似可用“广汇百家，多元包容”、“不囿陈见，卓励敢为”、“经世致用，文野并举”来总结和概括湖湘文化。

无论怎么概括，凤凰都可以作为湖湘文化的象征：凤凰的取材对象是多元的，容合后却是有序的；凤凰可飞于天，可行于地，既可浪漫也能实际；凤凰具自新的品性，在需要献身的关头，壮烈敢为；凤凰起于草莽，却文彩焕然，抱济世之大愿，造福瑞于人间……

在“第四展：百鸟朝凤”中，着重揭示、阐发了凤凰的神性，以及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凤凰的神性可以用向阳、喜火、达天、秉德、兆瑞、高洁、喻情、成王来概括，这些神性，体现和反映了国人向往光明、追求兴旺、渴望超脱、敬重德贤、企盼吉祥、崇尚高洁、希冀爱情、赞慕卓越的心理。

如“秉德”：相传黄帝即位后，推行仁政，施恩于民，遂使天下归心，宇内和平，于是，凤凰成群飞来，落在帝宫东园的梧桐树上，久久不去。又传老子曾见孔子带着五大弟子在前面走，就问身边人：“前面是谁呀？”回答说：“紧跟在孔子后面的是子路，勇敢有力量；下来是子贡，有智慧；再下来是曾子，以孝出名；再下来是颜回，最讲仁义；走在最后的是子张，有武功。”于是，老子感叹道：“我听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凤凰。凤凰很有文采，爱戴圣洁，秉膺仁义，右边是有智的人，左边是贤明的人。”这是有名的老子以凤凰比孔子的典故。

凤凰之秉德，和人们对理想帝王、理想人杰的期待、褒赞、肯定相吻合，是人们敬德心理的反映。天上的百鸟之王是很好的，人间的帝王、圣人也应该是很好的。反过来，人间的帝王、圣人只要有德于众生，天上的神鸟就会喜欢他、追随他，特别眷顾他、保佑他，所谓“德至鸟兽凤凰翔（《易经·系辞》）”“恩及羽虫凤凰翔（《春秋繁露》）”“上感皇天则鸾凤至（《春秋感精符》）”“天枢得则凤凰翔”（《春秋运斗枢》）“国泰民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宋书·符瑞》）”，等等。

再如“兆瑞”：作为“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的“鸟禽之长”，凤凰“五色备举”，

戴德膺仁，品性高洁，因此，就有了兆示祥瑞的神性，“见则天下安宁”“有明王太平乃来”“鸣于有道国，出则天下平”。古籍上多有“其政太平，凤凰集于苑林”之类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反过来理解：“凤凰集于苑林”就兆示着、昭应着“其政太平”。

相传西周末年，幽王无道，民不聊生，陕西关中一带遭旱魔肆虐，烈日当空，田地龟裂，老百姓呼天抢地，苦苦挣扎。一对凤凰飞过此地，眼见世间凄惨景况，仁心大动，决心寻觅一眼甘泉，为老百姓解脱苦难。它们在一个荒坡上，发现了一团湿润的泥土，就落下来，爪刨嘴啄，湿土揭去，清泉涌出，尝一尝，甘醇甜美，竟如醴酒一般。甘露般的泉水挽救了众人的生命，流进了众人的心田，大家感念凤凰的恩德，就将此泉起名为“醴泉”。这就是“礼泉”县名的来历。现在的陕西省礼泉县西北方向，有一座凤凰山，据说就是凤凰当年落脚憩息的地方。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区府银川又称“凤凰城”。相传古时有一只美丽的凤凰从南方飞来，使六盘山披上了绿装，使贺兰山变成了青山。从此，居住在黄河两岸的各族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宁夏川变成了鱼米之乡、塞上江南。后来异族入侵，为了保护广大的老百姓，凤凰变成了一座城：银川老城古楼，是凤凰的头；西塔和北塔是凤凰的两条腿；而从新老城之间穿过的尹家渠，则是由凤凰的血冲出来的。古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山西的大同，广东的顺德、连江，辽宁的凤城等，都有“凤城”“凤凰城”之称，其得名的原因，与银川类似。

凤凰之兆瑞，显然是国人求吉祥、求幸福、求安康、求顺遂、求兴旺的心理的反映。

在“第五展：七彩凤凰”中，通过对凤姓名、凤饮食、凤歌、凤舞、凤剧、凤舟赛、凤画、凤诗、凤词、凤语、凤书等的介绍，着重说明凤凰与百姓生活的关系，指出，凤凰文化广泛深入、丰富多彩地渗透、体现于各个领域、各种场合，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第六展：凤翥龙飞”中，从龙凤同源、龙凤配合、龙帝凤妃、龙凤呈祥四个方面，揭示了凤凰与龙相伴共生、吉祥同福的关系。

所谓龙凤同源，是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纹”，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约八千年；最早的“凤纹”，出土于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八年；最早的“龙凤纹”，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仰韶

文化遗址，距今近七千年。这几件珍贵文物足以说明：龙和凤都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且差不多是同步的。

所谓龙凤配合，是说从新石器时代起，龙凤就呈现着互相对应、彼此配合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至今依然。指出，龙凤的对应、配合，是古人阴阳观念（相克相生、对立统一、彼此消长，依存共处，互补转化）的形象化或意象化。

所谓龙帝凤妃，是说龙凤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自治系统，一个是作对应的系统。自治系统是有阳有阴、有雄有雌的，所谓雄龙（阳）、雌龙（阴）、凤为雄（阳），凰为雌（阴）。

一旦作为对应的系统出现，就发生了一个转化，即龙由原来整体上呈阴（龙的容合对象主要是蛇、鳄、鱼、蜥等动物，及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其动物多为喜欢阴凉、潮湿，且善于隐藏的“水物”“水兽”；其天象也是和阴雨有关之象，这就导致了龙在其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属“阴”或“阴”气很重的）转化为呈阳，凤由原来整体上呈阳（凤的容合对象主要是鸡、燕、鸟、孔雀等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故有“阳鸟”“阳禽”之说）转化为整体上呈阴。这个转化，大约是从秦汉时期，龙具备象征君主帝王的神性开始的。其起始标志是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公元前 259 年至公元前 210 年）让妃嫔戴凤钗、穿凤头鞋；其被确认的标志是宋光宗（公元 1147 年至公元 1200 年）李氏皇后的“黑凤”之瑞征和“凤娘”之称谓。

期间，公元前 80 年，汉昭帝刘弗陵以“元凤”为年号，这是凤文化由民间文化上升为官方文化的标志；公元前 49 年，汉宣帝刘询以“黄龙”为年号，这是龙文化由民间文化上升为官方文化的标志。

帝王比龙之后，龙的地位日益显赫，至宋以后，竟屡屡出现皇家垄断龙，尤其是“五爪大龙”的情况。相比龙之盛荣，凤的光彩差一些，使用的数量，出场的机会，被垄断、被神秘化的程度，都比龙少得多、小得多。这种情况从秦汉开始，至明清为盛，以至于辛亥革命后仍余续不断。其间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女性主宰朝政，凤的地位就会被抬到一个高度。如唐代武则天主政时期，和清代慈禧太后主政时期。

所谓龙凤呈祥，是说龙凤对应、配合的情形，广泛地流行于民间，反映在不

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习俗之中。其寓意，多是阴阳和谐、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尤其近当代，龙和凤作为帝王、帝后象征物的年代已成历史，人们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吉祥物”或“吉祥符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民俗事象。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龙凤胎”“龙凤婚宴”等。

在“不了篇：凤凰涅槃，新新不已”中，首先对阿拉伯传说中的神鸟——phoenix（可音译为“飞尼可思”），和西方文化普遍接受和欣赏 phoenix，认为 phoenix 是不朽和再生的象征的情况作了介绍；接着，介绍了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根据相关资料，将中国的凤凰和 phoenix 嫁接、融会在一起，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章《凤凰涅槃》的情况。指出：中国凤凰与 phoenix 的结合，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传承、锤炼、弘扬中国文化精华；兼容、吸纳、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不断地自我更新、自主创新。简言之：炼古、容合、创新。强调：炼古、容合、创新是凤凰的功能，也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功能。和美的中国凤凰在炼古、容合、创新中继往开来，飞向世界；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炼古、容合、创新中千秋永续，新新不已。

三. 凤凰博物馆的展示方式

对凤凰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将会产生的效果，笔者提出了“图文物影景，声光电动控，视听触参拟，感理碰交升”四句话。

所谓“图文物影景”，是说有图片展示（五百多幅），有文字说明（六万七千多字），有实物陈列（一千多件），有影像放映，有景观设置。所谓“声光电动控”，是说有声音传响，有光线照射，有电子设备，有运动装置，有数字控制。所谓“视听触参拟”，是说充分调动参观者的视觉、听觉、触觉，使参观者可以参与，可以模拟。所谓“感理碰交升”，是说通过上述方式，使观众的知识视野、审美意识、文化精神，在感性和理性的碰撞、交融中，得到拓展和升华。

在凤凰博物馆中，有多个项目，体现了上述要求，如——

1. 百鸟朝凤：用虚拟现实、三维仿真、影像合成、多媒体展示等技术手段，置超宽大屏幕，播放专门制作的《百鸟朝凤》等影片，在亦真亦幻中展现凤凰的诱人魅力，给观众以强烈的视、听觉震撼。

-
2. 画凤点睛：游客可通过多媒体触摸屏，为三维立体的凤凰点睛，点睛后，凤凰在美妙的音乐声中飞翔于天，并能开口说话、唱歌，与游客交流。
 3. 吹箫引凤：采用电子声控、数控技术，置一洞箫，参观者可上前吹奏，若吹出声来，旁边即有一对美丽的凤凰即席跳舞，吹得越动听，凤凰的舞姿越优美。
 4. 乘凤凰，游天堂：采用先进的电子飞毯技术，设计、安装多媒体合成表演系统，让参观者体会乘凤凰，游天堂的美妙意境。

（刊于《文博》（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0年第4期）



中国古代文化的八大创造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然而，这四大发明多属于或偏重于科学技术领域。那么，中国古代在精神文化领域和日常应用领域有没有巨大的发明创造需要总结、弘扬呢？

回答是肯定的。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在精神文化领域和日常应用领域都各有四大创造，合起来可称作“中国古代文化的八大创造”。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四大创造为：一，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学说；二，以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唐诗宋词；三，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为代表的明清小说；四，以龙、凤、太极八卦等为代表的象征系统。

中国古代日常应用文化四大创造为：汉字；中医；丝绸；瓷器。

之所以提出上述八项，是笔者从时间延续，空间普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等三个维度考察的结果。

从时间延续看——

精神文化四项：先秦诸子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唐诗宋词产生于唐代和宋代，距今在千年以上；几部著名的明清小说成书年代距今六百年至二百年；龙、凤和太极八卦初创年代更早，龙、凤初创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千年左右；太极图有学者追溯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达五千多年；八卦若以伏羲画卦算，距今在六千岁以上，若以周文王画卦计，距今也有三千多年。

日常应用文化四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证据，汉字起源，目前已可追溯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中医，若从神农炎帝、

轩辕黄帝时代算起，距今不少于五千年；丝绸，考古提供的证据是产生于距今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与传说中的黄帝元妃嫫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相吻合；到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的丝绸生产已初具规模，具有了复杂的织机和较高的织造手艺。瓷器，“原始瓷”可以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余年；“真瓷”出现于汉晋时期，距今一千五百年以上。

从空间普及看——

精神文化四项：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了中华元典思想的基本内容，尤其是由孔子、孟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因了统治阶级的尊奉、推广和历代士人的倡扬、践行，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不能排除儒家思想的文化基因。这样，随着中国人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繁衍生息，先秦诸子学说在空间的普及，可以说是传而衍之、广而大之。同样，其他三项，也因与中国人相融相伴、风雨同行而在空间上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比如，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他生活在亚洲、欧洲、美洲还是大洋洲，一般都知道李白、杜甫、苏东坡，能背几首唐诗宋词；也都读过那几部著名的明清小说或看过以这几部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剧，知道曹操、诸葛亮、关云长、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武松、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等人物。至于龙、凤、太极图等中国符号，只要你走进华人开的公司、店堂，就多有所见。

日常应用文化四项：汉字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使用和影响的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东南亚各国，日本，朝鲜及世界各地有华人生活的地方。中医、丝绸、瓷器的空间普及程度不但含括了汉字使用和影响的范围，而且有所扩大，因为不光中国人、亚洲人运用中医的方法、服用中药防病治病，穿中国生产的丝绸，用中国出产的瓷器，生活在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的人们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中医的方法、服用中药防病治病，穿中国生产的丝绸，用中国出产的瓷器。

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看——

精神文化四项——

先秦诸子学说，尤其是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渗透、滋润、作用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规范、审美活动及话语系统、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同时也传播、影响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可以说整个东方，

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辐射和浸润。我们看当今国内外学界对人类文明的划分，无论是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三分法，还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的八分法，儒教文明都是重要的、排在前面的文明。

先秦诸子学说之外的其他三项，都不仅对亚洲文明产生了影响，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在日本、朝鲜、韩国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如龙、凤、太极八卦文化在亚洲各国的流传、运用，还在现当代世界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电子计算机采用的二进位制，就受到了太极八卦文化的启发。

日常应用文化四项——

汉字的使用人口目前已超过了十四亿，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在电子计算机发明初期，有人曾对汉字能否适应电脑时代而产生疑虑，随着各种中文输入法的出现，汉字的计算机输入、存储、输出技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不但大大提高了中文写作、出版、信息检索等等的效率，而且因其信息量大、易于辨别而优势明显。据悉，新一代计算机将彻底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普遍采用声控系统，那么，汉语的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一位英国专家预言：将来全世界更多的人都要学习汉字，因为“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

中医目前的受益人口起码在十五亿以上，可以说，中医不但在保障亚洲人民的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贡献着力量。近年来，随着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回归自然，也由于西医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医药在西方各国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可了中医。如在美国，目前有二十多个针灸医疗中心，从事针灸研究和治疗、研究的项目有二百多项，所治疾病达数十种，包括颇受关注的艾滋病。在欧洲，保险业开始将针灸治疗纳入保险范围，欧盟中也有了中国医学联盟。至于中医的“申遗”问题，多年前就列入了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议事日程。

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经中亚、西亚，大批量地被运到西方各国，欧洲宫廷里的王公皇妃和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多以穿用中国丝绸为荣。从那时起，丝绸就担当起了传播和象征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角色；“丝绸之路”也就成了文化交流之路和文明传播之路。

汉语 · 汉字 · 汉文化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西方人的眼中，瓷器代表着中国，英语“china”一词，其 c 小写，意为瓷器；其 C 大写，意为中国。唐代中后期及宋代，或含蓄典雅，或庄重浑朴，或精巧华丽的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亦称“陶瓷之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各地，成为其时中国出口的主要的代表性物品，为中华文明的播扬，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刊于《西安晚报》2009年3月6日“文化纵横”版）

中华之根及陕西的贡献

在浩茫的宇宙太阳系中，旋转着一个已知的惟一有生命的蓝色星球——地球。在地球的东方，生存、繁衍、屹立着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本文题目之“中华”，指的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和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由起源到形成的发展主线，是由炎黄族团联盟到华夏族，由华夏族到汉族，由汉族到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汉族；汉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华夏族；而华夏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炎黄族团联盟。炎黄族团联盟再朝上追溯，就是传说中的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原始部落了。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历史，有一个大体上的时序框架——约公元前 8000 年至约公元前 3000 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约公元前 3000 年至约公元前 2070 年（夏朝之前），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初成期；约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 589 年，即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成型期；公元 589 年至公元 1279 年，即隋、唐、宋三朝，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强盛期；公元 1279 年至公元 1949 年，即元、明、清至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延展期；公元 1949 年之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进入复兴期。

显然，追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根，就要追溯至由伏羲、女娲开创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和由炎帝、黄帝开创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初成期，及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成型期和强盛期。

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是炎帝、黄帝的远古直系祖先，因其代表着中华农耕文明之前、长达五千年的渔猎采食时代和渔猎采食时代向农耕文明过渡的

时代，故伏羲、女娲既可视作具体的人，也可视作原始氏族部落分支蔓延、世代相传的名号。归在伏羲名下的文化创造，有结网罟、养牺牲、作甲历、造琴瑟、画八卦、造书契、正姓氏、建屋庐等。尤其重要的是，伏羲“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成为后世敬仰的“龙祖”，为中华儿女“龙的传人”说之源头根据；归在女娲名下的文化创造，有炼石补天（可视作率领族众战胜自然灾害）、抟土造人（寓意中华先民对人类起源的探猜和原始制陶业的起始）、置婚姻、造笙簧，以及与伏羲结合（可视作不同氏族部落间的通婚），从而繁衍人类等。

炎帝是“三皇”之一，属于炎帝族团文化创造的有，造耒耜、种五谷；制陶为器；治麻为布；削桐为琴、结丝为弦；削木为弓；立廛（chán）为市等。黄帝是“五帝”之首，属于黄帝族团文化创造的有，统部族、立古国、建宫室、拓疆土；开井田、治洪水、造车船、启纺织、作彩陶、雕玉器；创文字、音律、历数等。而且，炎帝、黄帝，都继承了伏羲、女娲时代兴起的崇龙传统，龙遂成为炎黄族团联盟及其文化创造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上述文化创造，成就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和初成期，也熔铸、体现、昭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伏羲、女娲等不同部族间的通婚是容合；炎黄族团联盟的形成是容合；黄帝族团统一各部族是容合；先民们集取多种动物和天象，发明、展现出可供崇拜的神物——龙，形象地体现他们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也是容合。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容合是世界观、方法论。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的发明创造、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福生，也都体现着福生精神；而先民们发明、展现龙，使其具有通天、司雨、理水、显瑞等功能，也是为了福生。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福生是价值观、目的论。

谐天是与天即自然界和谐的简称。伏羲观天察地、始作八卦是谐天；女娲炼石补天是谐天；炎帝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是谐天；黄帝开井田、启纺织、作彩陶是谐天。龙更是谐天的产物，其形象和功能都取材于天。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谐天是天人观、生态论。

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

人文先祖，都是奋进的典范。他们筚路蓝缕，启山林，开阡陌，教稼穑，度四方，抚万民。他们敬天、谐天但不靠天，灾难来临时，率领族众，团结协力、自强克难。而龙，也因其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给人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从而成为人文先祖及后世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象征。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奋进是发展观、强盛论。

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处于黄河中游、现今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陕西，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辉煌史上至关重要，其贡献无可替代、厥功至伟。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是由伏羲、女娲开创的，而陕西，当是第一世伏羲、女娲的出生地和最早活动地。华胥是伏羲、女娲的母亲或母族，中华之“华”可溯源至华胥之“华”。陕西蓝田有华胥陵，华胥陵附近的女娲氏庄（今阿氏庄），相传是华胥生女娲之地。临近的骊山上，有祭祀、纪念伏羲、女娲的人祖庙。方圆百里内，有半坡、姜寨、孟家岩等数十处属于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考古遗址。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初成期，是由炎帝、黄帝开创的。“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国语·晋语》）姬水、姜水都在陕西。陕西是炎帝、黄帝伟大功业的启动、初兴之地。陕西宝鸡市，有炎帝神农氏的陵寝。陕西黄陵县，有黄帝轩辕氏的陵寝。陕西黄帝陵，是历代官方和民间祭祀黄帝的场所，如今，于每年清明节隆重举行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典。

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成型期和强盛期，陕西涌现、吸引、成就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博望侯张骞、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政治人物，和老子、董仲舒、司马迁、玄奘、李白、杜甫、白居易、张载等文化巨擘，他们以划时代的卓越贡献彪炳史册。其间，尤以下列人事，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理念并制礼作乐，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重伦理”为特性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文化从根本上与以“神为本”“重个权”为特性的西方文化。

秦始皇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尤其是推行权力层层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体制”，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一以贯之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从此，“大一统”观念得到强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贸易往来、友好交往以国家主导的方式启动。

汉武帝刘彻采纳并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主流思想。

“史圣”司马迁撰写出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誉的巨著《史记》，中华民族以人物为中心、文史兼重的纪传体通史的撰修由此开启。

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使唐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王冠上巨大而璀璨的明珠，耸立起中华文化史上极为壮丽的丰碑。

张载创立了由使命意识、天下情怀、有为主义、精深理论、笃行功夫支撑的关学，其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奋斗纲领。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根源地，陕西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具有久远性、开创性、全面性、高端性和辐射性的特色——

久远性：陕西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若从伏羲、女娲算起，距今约达六千年到一万年；若从炎帝、黄帝算起，距今已逾五千年；若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算起，至今已逾三千年。

开创性：上述无论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起源期的伏羲、女娲，初成期的炎帝、黄帝的丰功伟绩，还是成型期、强盛期的政治领袖、文化巨擘们的卓越贡献，都具有开创、奠基的性质。

全面性：“先祖文化”“帝都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山水文化”“艺术文化”等等，使陕西的历史文化贡献全面、丰富、多样化。

高端性：伏羲、女娲是远古原始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黄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关中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帝都所在之地，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是国家元首；周公旦、司马迁、玄奘、李白、杜甫、张载等，是划时代的顶级文化名人，如此种种，决定了陕西历史文化贡献的高端性，即处于全国文化的高峰位置。高端性意味着标志性、代表

性。

辐射性：关中西安曾长期为国家首都，陕北延安曾是中国革命的“红都”，这便使陕西的历史文化贡献具有了辐射性，即以陕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辐射传播。

（刊于《西安晚报》2021年12月26日“文化纵横”版）



西安的历史文化及特色

西安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先祖文化；帝都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革命文化；开放文化；艺杰文化。

一. 先祖文化

西安的人文先祖文化包括华胥氏文化、伏羲女娲文化、黄帝文化。

华胥氏是伏羲、女娲的母亲。蓝田县有华胥陵，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头节，华胥陵都要举行祭祀活动。

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临潼区骊山上有纪念伏羲、女娲的人祖庙，民间有相关传说。半坡、姜寨有远古母系氏族社会遗址。

黄帝是“五帝”之首，每年的清明节，国家级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都要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而西安则是参加祭祀典礼的海内外华人代表的下榻之地。另据相关专家研究考证，史书所记的黄帝铸鼎地，有可能在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

二. 帝都文化

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作为国都的时间长达一千一百多年，是统一六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实现地，是丝绸之路的始发地；留下了周沣镐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汉长安城遗址、汉阳陵、未央宫，唐大雁塔、小雁塔、大明宫、华清池、曲江池、芙蓉园，明古城墙、钟楼、鼓楼、碑林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商鞅、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董仲舒、张骞、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一系列彪

炳史册的政治人物。

西安现有各种主题的博物馆一百一十多座，这些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多与西安的帝都文化有关。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秦砖汉瓦博物馆、曲江艺术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大唐青铜镜博物馆等。

三. 信仰文化

西安是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发祥、荟萃之地。

儒家文化，西安有关中书院；有创制《吕氏乡约》的蓝田吕氏兄弟，有关学大儒冯从吾、李二曲、牛兆濂等儒家代表人物。

道家文化，西安有先哲老子讲经的周至楼观台，有八仙庵、湘子庙、重阳宫、朝元阁、老母殿等道观。有老子、吕重阳、闵智亭、任法融等道家代表人物。

佛家文化，西安是六大汉传佛教祖庭所在之地，分别为：法相宗的大慈恩寺；密宗的大兴善寺；三论宗的草堂寺；华严宗的华严寺；律宗的净业寺；净土宗的香积寺。有玄奘、鸠摩罗什、善导等佛家代表人物。

四. 民俗文化

西安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建筑民俗有书院门、高家大院、关中民俗博物院；饮食民俗有同盛祥、老孙家的牛羊肉泡馍，樊家肉夹馍，贾三灌汤包子，以及葫芦头泡馍、凉皮、黄桂柿子饼、biangbiang 面等；音乐、曲艺民俗有长安古乐、长安道情、户县曲子、周至集闲鼓乐、高陵曲子等。

五. 革命文化

西安是率先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省城，涌现了井勿幕、于右任、钱鼎、张钫、胡景翼等辛亥革命的精英人物，有勿幕门（小南门）、玉祥门等纪念址。

西安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有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纪念馆、新城黄楼、华清池五间厅、骊山兵谏亭等旧址。

西安有八路军军驻陕办事处，其前身是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是全国十五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在西安工作、居住之处。

六. 开放文化

西安的开放文化可追溯至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安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与桥梁。盛唐时的西安，具有“包容之量，消化之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波斯、印度、日本等外国商人和留学生长期在西安经商求学。改革开放以来，西安以创新驱动，建设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城、浐灞生态区和国际港务区等，展现出现代、时尚、多元的城市魅力，迈出了向国际化大都市前进的铿锵脚步，成为“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新高地，形成了新时期的西安开放文化。

七. 艺杰文化

古往今来，西安的文化艺术界群星灿烂，涌现了一系列名闻遐迩，对中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或一定影响的杰出人物。如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颜真卿、柳公权、怀素；近现代的于右任、孙仁玉、任哲中、赵望云；当代的柳青、石鲁、刘文西、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艺谋、赵季平、肖云儒……由这些杰出人物构成的“艺杰文化”，已是或将是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的历史文化具有久远性、全面性、高端性、辐射性的特色。

1. 久远性。西安的历史文化若从伏羲、女娲算起，距今至少六千年；若从黄帝算起，至今已达五千年；若从西周算起，至今已达三千年，可谓：“五千年文明看陕西，三千年文明看西安。”

2. 全面性。西安的历史文化有“先祖文化”“帝都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革命文化”“开放文化”“艺杰文化”，以及“山水文化”“科技文化”等等，全面、丰富、多样化。



3. 高端性。伏羲、女娲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的首领，位列“三皇”；黄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位列“五帝”之首；西安是十三朝帝都所在之地，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是一国之君；周公旦、李斯、司马迁、班固、玄奘、鸠摩罗什、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其时代顶级的文化人：这些便决定了西安历史文化的高端性，即处于全国文化的高峰位置。高端性意味着标志性、代表性。

4. 辐射性。因西安长期为国家首都，具有高端性、标志性、代表性的西安历史文化也就有了辐射性，即以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传播。

（2016年12月21日于西安龙凤院）



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的特点

肖云儒

庞进是从龙的土地上走出去，以对龙凤文化的研究而蜚声全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的学者。是我们这块土地的骄傲，是龙的子孙的骄傲。庞进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创造性，他整个的思维结构带有开放性，研究带有强烈的资料文献的色彩、民俗文化的色彩和适度的向现代旅游市场倾斜的色彩。这样一些特点，使他的研究不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多少带有普及性质。既对传统做认真的、力求准确的梳理，又力图面向现代。研究思维既多元合一，基本观点又一元执守。这些，都构成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的特点。在他的研究中，流贯着一种自豪，那是龙的子孙的自豪、中华民族的自豪；凝聚着一种担当，这个担当就是作为我们民族的一员，有责任要对自己民族最源初的图腾和符号作出解读。这种情绪和担当，是一个学者极为可贵的感情倾向和文化品格。

龙和凤，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母题、精神图腾、人格模板、心理“觅母”（这个词来自法语，类似于“文化基因”）。是中国名片、中国芯片、中国密码、中

华文化的符号、中华民族的 DNA。中华民族的生成，民族文化人格的生成，都可以追溯到龙和凤两个图腾符号中去。它们是了解我们民族和合生成过程，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状态和人格状态的钥匙。庞进以艰辛的研究，在这个领域提出了带有贡献性的见解，将龙凤图腾推向现代民众。

我认为，龙凤文化贯穿着我们民族最早生成的三个母题：

一是和合精神。龙凤都是和合的产物。以龙而言，就是远古各个部族、各个部落的图腾的在轩辕时代的和谐组合，是蛇、鱼、牛、鹿、朱雀等众多的具象合成的一个共象。从符号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先民各个部族支系，在交往、交流和交战中逐步形成整体中华民族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标志，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大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自己共祖的民族。几十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是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国家所没有的现象。还有，轩辕时代的和合，除了图腾和合之外，还有分封和合，黄帝的若干个子孙，分封各地，为以后的封建制度提供了最早的雏形和因子。庞进对这样一些文化现象给予了解读。

二是创造精神。龙凤图腾在形成和流布过程中的多维创造，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表现。龙凤图腾的融合是一种创造，它的流布过程也是一种创造。轩辕之后每个时代、每个地域关于龙凤的伸延性传说，都给龙凤图腾不断增值。这是一个文化增值、精神增值的过程。各个地域、各个族群，都把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底蕴，揉进龙凤图腾，揉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民族能够在各种具像图腾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抽象的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一种智慧的、形而上的创造。龙凤是创造精神的标志。

三是有为主义的精神。它反映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成果交流共享、有为实践的精神，这是一种卓具作为的社会共同建构。轩辕时代是一个创造发明非常多的时代，我们现在通常把指南车、农耕、冶炼、纺织、医术，车船、房屋，包括社会最初的礼仪，都说成是在轩辕时代创造合成的，因此被称为“人文初祖”。当然，其中有的只是传说，甚至可能有附会。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地位是公认的。人文初祖的逐步形成过程，其实是文化、社会、经济成果交流共享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指南车并不是轩辕发明的；文字也不是轩辕创选的，是仓颉；包括农耕文化，那是神农部族创造的。很多我们民族现在归给轩辕的那些历史文

化成果，实际上都不是一个部落或一个人创造的，而是各个部落支系发明、创造以后，通过轩辕时代的交流、整合，而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成果，供全社会共享。轩辕、蚩尤大战，在道德坐标上，我们一直扬轩辕而抑蚩尤，但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蚩尤部落的冶炼技术远远超过了轩辕。轩辕打败了蚩尤，并没有灭绝他的文化经济成果，而是把冶炼术拿过来，变成整个民族共有的财富。黄、炎大战，黄帝打败炎帝之后，也是把炎帝的农耕文化成果拿过来，变成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成果。正是这种交流和共享的精神，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日益壮大。

庞进的研究，从图腾入手解读它背后文化的大格局、大天地，这又正是图腾形成的逆过程。作者从一个很小的口子进入，执着地深掘，大幅度地打开，用实证的原生文献资料论证了一个模糊集合的文化图腾，都堪可称道。

对庞进的龙凤研究，很多先生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对龙凤文化、龙凤图腾所附着的诸如皇权思想、迷信色彩以及其他负面的东西，应有深刻理性的人文反思。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加强文化理论深度，使之进一步扩展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研究？又如何进一步在中外图腾文化的比较中扩展研究成果？我感到，现在的研究向旅游市场倾斜，从向社会民间扩展龙凤文化研究成果的角度看，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好。是否能够分流？一方面更深刻的进行纯人文的解读，一方面继续扩展普及性的研究成果，分流来做。混淆到一起，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就很难处理好。还有，我感觉研究的民间资料性、民间文献是很够的，但是理论的深度、理性的升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资料性、文献性中，民间的、民俗的资料非常丰沛，对历代龙文化学术研究资料的集存和梳理还需进一步下功夫。

今天这个会，是一个学术水平非常高的会，是一个充满了思考的尖锐性和气氛的和谐性的会。大家以文会友，以学术会友，进行了一次高层次学术对话，开得非常好。感谢庞进先生的辛劳，感谢西安日报社对庞进的培养，感谢今天所有到会的朋友们。

（此文系作者2006年3月25日在“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

从民族文化的深渊大海中 “淘腾”出一门学问

李星

读了庞进的几本书，我是佩服得不得了。读了那么多书，引用了那么多资料，古今中外，各种典籍……里边有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还有心理学、民族学，涉及的面非常广。庞进的研究，搞出了味道，搞出了层次，搞出了意义。这是个“淘腾”的工作，依我看是很难的，因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人类，这么浩瀚，你要在里边找出一点东西，把它淘腾出意义来，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很寂寞的事情，淘腾出新意来，更为不易。所以我这里要向庞进表示敬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以为，把庞进的这个工作不能仅仅定位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它还是一个跟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一项工作。我们讲现代化的矛盾，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城乡差别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很多。而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矛盾，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的冲突。过去理解传统就是保守，现代就是改革，就是不断地想新点子、鬼点子、贼点子，冲破现有体制的一些束缚，向世界开放。现在看来改革到目前这个程度，是应该重视文化冲突的时候了。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成为一道门槛、一个瓶颈、一个马行夹道。这个关过去了，我们就成功了。所以我说庞进所从事的龙凤文化研究，绝不是一种淘腾历史、倒冷门、炒冷门的一个工程，而是跟中国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工程。因为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有可能处理得比较好。这实际就是文化视觉、文化视野、文化胸怀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改革，就像外电经常找毛病评价的那样，充满着严重的危机，有出现动荡的危险。庞进做这个工作的深层意义应该在这里。

它不是个冷工作，而是个热工作。事实上，从庞进的著作上看，他确实把他的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各种冲突融合起来了，是一种现代视野、当代视野、现代化视野下的龙凤文化研究，而不是那种书斋式的、完全学究式研究。

第三点，我对西安日报社重视学者化的资深记者、编辑，给他们开研讨会，重点朝出推的做法很佩服。报社重视非常基础性的文化建设，既着眼于提升报纸的文化品位、报人的文化层次，又努力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贡献，这是很有眼光的，也是很大气的。

（此文系作者2006年3月25日在“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李星：著名评论家，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拓展龙凤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刘学智

虽然不能说龙凤文化研究的领域最早是由庞进先生开创的，但是我可以说，把龙凤文化的研究提升到目前这样的高度，引向如此的深度，扩大到目前这样能引起广泛关注的程度的，舍庞进，别无他人！虽然不能说是龙凤研究建立了一门学科，但至少是开拓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此前，这一领域“百姓日用而不知”，虽然大家经常在说在用，却缺乏对他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是庞进的研究，使人们对龙凤有了一种文化自觉。

庞进目前已出版了十余种有关龙凤文化研究的专著，这些专著从多角度、多层次面对龙凤文化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和解读，达到这样的高度已经不易，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布止步，仍然在这一领域继续辛勤耕耘，上下求索。他的研究的重要特点是，不是满足于对龙凤的一般性、概念性和一般故事性地阐释，而是努力创新，不断向理论的制高点攀登，力求从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人类学角度、哲学升华的理论高度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和民众生活的广度等方面，全方位地去对龙凤文化及其精神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例如，庞进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模糊集合——多元容合”的龙凤起源说，认为龙、凤是中华先民对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和系统整合而创造的两种神物，它经过至少八千年的演进和升华，才成为龙、凤这种文化符号。自龙凤图像形成之后，经过历代人们的不断升华和创造性发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按照庞进的说法，就是成为“中国的图章”。庞进进一步分析总结了龙凤所内含的基本文化精神及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指出龙凤体现了一种容合创新精神、积极进取精神、造福众生精神、和谐协调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实际上正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凝聚。这些文化精神为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

道德规范、话语系统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提供了智慧参照和发展动力。可以说，庞进的这些研究，为我们所以把炎黄子孙称为龙的传人做了绝妙的注脚。

在此基础上，庞进对龙凤的文化现象做了更为细致的创造性分类，提出了容合龙、福生龙、谐天龙、奋进龙等具有不同价值意向的概念，这些龙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正能量”；同时他也注意到曾在历史上发生过负面价值的所谓帝制龙、灾祸龙等，主张要弘扬前者而抛弃后者，这是很有创见的。同时他的龙凤文化研究还能与时俱进，结合今天人们面临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环保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等问题，适时地提出要创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龙”，如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等，这些新的龙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更具有现代意义和普世价值。可以看出，龙凤文化的研究也要跳出中国文化本位，而进入全球视野。这一点庞进已经注意到了。他说“龙凤文化本源于中国，适合于全球；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对国人，它可以致和美，对世界，它可以开太平。”这就使龙凤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更广阔的视野。

庞进对龙凤文化研究的执着，本身就体现着龙的奋进精神和凤的宽厚胸怀。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深深地感觉到，只要谈及龙或凤，就能激发起他极强烈的兴奋点，他就会穷追不舍；只要谈及某处有一个特殊的龙的形象，他的眼睛就会为之一亮，并尽力去加以搜求。他搜集到的有关龙和凤的图像已难以用数量来计算。这想这正是他所以能做出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会为庞进及其团队的龙凤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而也为推动我省乃至全国龙凤文化的研究给力。龙凤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深化，我以为需要在上下古今四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强化：

其一，“上”。就是向形而上的层面拓展，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联系，追索龙凤文化的形上本体。龙凤是体现中国人“体用不二”的思维特征的。龙既有其体，也有其用。我们要由其用而求其体。龙的形象是“用”，而其内在的根据是其“体”。我想这个体就是“道”。道是各种具体之道的形上化，龙也是由各种动物整合而成的形象符号。道的核心精神就是龙的文化精神。道的本性是自然，道无为而无不为，龙凤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演化而成的，龙凤的精神无所不在，

龙凤文化正是道文化的外在化、功能化、形象化。但是对龙凤所体现的道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其二，“下”。就是要研究生活中的龙与凤。透过龙、凤的形象研究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精神风貌，研究龙凤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体现，龙凤对社会生活发生的作用。事实上龙凤的元素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有处处有，在美术绘画、音乐艺术、节日庆典、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体现。这也需要深入研究。

其三，“古”。探讨龙、凤的文化渊源、原始根据、神话原型及产生和演变的历程。虽然包括庞进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是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如龙的起源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四川三星堆文化就有关于龙和凤的形象。这对于探讨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重要的意义。

其四，“今”。如同庞进所说的，要随着当代社会许多新问题的出现，我们在探讨应对之策时，也应该通过重新创造，使传统的龙凤精神为当今的社会精神文明建构服务。庞进关于创新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观点，值得关注和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

相信龙凤文化研究院在西安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关心领导下，在庞进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成绩，一定能使龙凤文化研究拓展新视野，提升新高度，使龙凤文化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刊于《西安龙凤文化·冬之卷》2014年1月。刘学智：著名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一个擅长以散文形式 表达哲理性思考的学人

刘学智

庞进是我的大学同学，在大学时就发现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在学习本专业的各门课程之外，还广泛涉猎，经常到外系听课。我们政教系七七级到外系听课的，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庞进，一个是杨效斯。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大才。庞进常到中文系听课，而杨常到数学系听课。杨目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庞进则成为著名作家和龙凤文化研究的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家。这两位学人的成长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启示之一，就是学习的路径是要由博而约，在“博”的基础上“约”。只有在广泛涉猎、知识有了充分储备的基础上，再进入一个专深的领域，才有可能有所成就。庞进读书虽博而不杂，有着明确的目标。作为一个立志于文学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是自然要读的，问题是他曾用很多时间去读古代哲学方面的书，经史子集，他都有兴趣，且大量阅读。当代学者的哲学论著他也认真地读。他曾给我说，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我的《中国哲学的历程》一字不拉地读了一遍，我很感动。而且与我谈起来，非常专业，非常深入。记得我们有一年夏天在周至的深山一个叫厚畛子的山庄聊了一个晚上，谈了人生寻求意义的问题。谈到人生的意义是不断赋予的，我们很有共识。同时他还大量阅读天文地理、当代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量子力学，他也有涉猎，并和他的龙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启示之二，就是目标选定后要有恒心，要持之以恒。庞进就是一位极有恒心的人，他做事绝对要努力做到极致，从不放弃他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曾给我说，他曾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骊山历史文化的书，但是在边家村乘车时，不小心被小偷将提包偷走了，而包里就装着那部手写的书稿。他非常伤心，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这事对我触动很大。没有恒心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启示之三，就是用功。鲁迅先生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写作上了。庞进也是一个非常能用功，且极善于利用时间的人。他经常早上很早（4、5点）起来开始写作。我们因搞一个课题外出考察，在路上，当我们大家在欣赏外面的风景时，他却眯着眼在思考，不经意间一首诗就吟出来了，真让人叫绝！

庞进的散文，其特点是富于哲理，或者是说，他以散文来阐释形而上之理。把形而上的学理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这还不多见。我最早见识他的这种表现手法的，是他所写的《创造论》一书。创造论既可当专著读，也可当散文读。他如同随机漫步一样，把一个很具哲理性的命题，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出来，读起来既沁人耳目，又启人心智。《创造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不仅人，而且宇宙万物时时都在进行着创造活动，这就给所有客体赋予了主体的特性。本来，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创造是主体的活动，只有主体才可能进行这种创造的活动，他却认为宇宙万物都时时在创造。植物生长是创造，太阳运行是在创造，水力发电是在创造，空气流动也是在创造，等等。这个观点无疑带有颠覆性。仔细分析，这个观点有点象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在亚氏看来，如果把制作一座雕像的过程看作运动，那么铜的原料就是质料因，雕像的模型就是形式因，雕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雕像的成品就是目的因。就是说那些参与其过程的所有客体都参与了这座雕像的创造过程。反之也可以说一切都在创造。庞进事实上对一切客体都赋予了主体能动的功能。亚氏是通过逻辑方式来论证的，庞进则是通过散文式的语言娓娓道来的。

庞进以散文特有的叙述方式，在追问古往来今人们一直在思考的“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性问题。庞进从空间的无限性上来进行追问和思考，他提出了一个“宇宙力”的概念，认为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力的综合。一定程度上，宇宙力相当于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先哲老子讲的“道”、哲学家讲的“无限”。他认为宇宙力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地球、人类，都是宇宙力的产物。这个说法很新颖。先秦时庄子曾从时间上追问过这个问题，说：“有有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追究到最后，发现人类的认识是无法达到终极的，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即认为以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要认识无限的宇宙，是不可能的。

这和庞进说的“宇宙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去认知、一定程度上去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够整体上掌控宇宙力”的说法有点相似。宇宙从终极上说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其实恩格斯早已说过：“相互作用是宇宙间的终极原因”。

庞进说宇宙力是道，是无限，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但是庞进又说有个“灵魂力”，他给灵魂力的界定是“人的灵魂是人的思维、意识、愿望、理念等的总称，是作为人的肉身一部分的大脑产生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我们可称其为灵魂力”。我发现庞进说的这个“灵魂力”其实与我们哲学上说的“主观精神”“意识”相通，是人脑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的属性和功能。这与南北朝时范缜所说的“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中的“神”相似，它不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其实可以用“潜意识”等来作以解释。看到这，我还为庞进捏了一把汗，以为他要走向唯心论，承认有灵魂存在，原来庞进仅是与唯心论擦肩而过，而对人的特有精神现象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而已。

不过，庞进又说：“相信人的灵魂即思维、意识、愿望、理念等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是一种力；相信人体内尤其是大脑里积存的灵魂力通过养育、强健可以冲决肉身躯壳的束缚，进而被龙接引、承载，到达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与宇宙力相汇合，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把意识现象说成是“一种物质”，或可以独立运行的“力”，这可能就与机械唯物论划不清界限了。其实在魏晋时，佛教徒慧远就曾对王充、桓谭等人所做的“薪火之喻”把神说成一种特殊的物质提出了批评。认为神是精魂而有灵者。庞进没有走向唯心论，但却走向机械唯物论。进而庞进更大胆地把他所说的宇宙力与他一直孜孜研究的龙文化相贯通：“相信龙是宇宙力与人类灵魂力之间的中介；相信龙是宇宙力尤其是暗物质、暗物力的代表和体现；相信龙在人的肉体躯壳消散之前，能够接引、承载人的灵魂力冲破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压力而到达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对庞进关于龙的研究一直很关注，也很赞赏他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标志，并提出龙道，也就是把龙文化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来认识，龙道就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之道，就是“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道，这些对我很有启发性。

但是如果把龙视为“宇宙力与人类灵魂力之间的中介”，“暗物质、暗物力的代表和体现”，甚至龙可以“在人的肉体躯壳消散之前，能够接引、承载人的灵魂力冲破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压力而到达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这一点则超出了我个人的思维想像力，也超出我的接受能力。庞进的思维视野已经超出我们常人的限度。我担心的是，真理往前多迈出一步，就可能走向谬误。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庞进的思维总是具有超前性。他对目前最前沿的科学发现都给予关注，并把它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例如，他对目前的量子力学研究的一个现象“量子纠缠”给予了密切的关注。量子纠缠证实了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超时空的内在联系。庞进很机智地将“量子纠缠”与龙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提出了两个观点：一，龙是“量子纠缠”的中介。也就是说，是“龙”这个“暗物质”，通过“暗物力”，将相关量子联系了起来，进而才有了“量子纠缠”。二，龙可以与“灵魂力”发生“量子纠缠”。可以设想，在人的肉身力消散、灵魂力即将脱离肉身躯壳的关键时刻，构成灵魂力的某些粒子与构成龙的某些粒子发生“量子纠缠”，龙当即感知到灵魂力的活动意向，那么就可以及时地来到某人身边，对其灵魂力进行吸纳，进而完成承载其灵魂力奔向外太空使其获得永恒的使命。那么，如何才能使构成灵魂力的某些粒子与构成龙的某些粒子发生“量子纠缠”呢？他指出了一条道路，就是信宇宙力、信灵魂力、信龙。我很佩服庞进老兄的想象力，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庞进已经把本来是一个民族图腾的、多种动物综合而成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观念形态的“龙”实体化，同时又形上化，进而又玄学化。“暗物质”“灵魂力”是一种实体化；龙道是一种形上化；作为“量子纠缠”的中介，则是将其玄学化。这样的研究趋向，一方面有可能使龙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化，从而做出惊人的创造，也有可能使龙文化的研究走偏方向。最后怎么发展，目前我还不得而知。但是如果龙是“道”，则与《老子》所说不相合。因为“龙”是形有象的，是多种动物综合而成的，但《老子》说“大象无形”，而“道”则无形无象。所以以道喻龙，需要斟酌。

我主张龙文化的研究，尽可能地沿着人文的、价值论的方向前行，如果试图用科学来证明或说明它，可能会走向误区。

但是，我认为庞进在散文写作中尽可能地赋予其以哲理的内蕴，启示人们对自身生命本质做形而上的感悟，对灵魂自由大声地呼唤，以及树立对科学新知的渴求态度，这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的散文语言质朴、感情真挚，且极富穿透力，我虽然读的不多，但还是深有感触。为老同学高兴！

（此文是作者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刊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陕西日报》。刘学智：著名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刘学智（左）与庞进2018年7月16日 西安

腾龙起凤 福惠世界

晨雨

在浩荡的中国文化人群体中，庞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位。他从文学创作开始，向文化研究进军，几十年来，勤奋笔耕，求索不已。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和十余部系列专著，使他不仅以一位擅长写散文随笔的优秀作家而闻名，还以著名学者、专家的身份站在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的前列，成为该领域大家公认的领军人， 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从文学创作开始

庞进的文学生涯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庞进在学好哲学、经济学等专业课的同时，即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到了文学上。参加文学社团，听中文系的课，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诗歌等。短篇小说《婚愁》，发表在陕西师大校园刊物《渭水》第二期的头条位置，这是他变成铅字的最早的一篇作品，时在 1979 年。随后，他的一些散文随笔作品相继亮相于《西安晚报》《陕西少年》等报刊。1982 年，庞进大学毕业，分配至临潼文化局写作组，第二年，他的宗教题材小说《香火明灭》《皈依》发表于《延河》杂志，其别致的构思、优美的文笔令人刮目相看。

1984 年春天，庞进开始在西安日报副刊部供职。近三十年来，由编辑、主任编辑到高级编辑，庞进组织、编发了省内外作家、作者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业界和广大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他联系、促成了西安报业集团和海外媒体的合作，策划、主编了《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和《美洲商报·今日西安》专刊，使《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走出国门，为西安在海外开设了展示、宣传、推广的窗口。同时，他还结合职业特点，将创作精力集中在散文随笔上。发表作

品上千篇，结集出版《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大悟骊山》《卓立苍茫》《平民世代》《秦人家事》等七部，先后获全国及省市各种奖项六十多次。庞进的散文随笔以深刻独到的思想内涵与精当优美的文学形式相结合而见长。其《孩子，你还在襁褓中》《创造与宗教》《玉龙雪》《骊山云树》《我们离大师有多远》《关于人妖》《哦，小南门》《西安的隐士》等篇章，先后被《世纪名家散文经典大系》《2006年我最喜爱的散文100篇》等数十种选集收入。尤其是《天地苍茫一根骨》一文，不但先后入选《当代散文精品1999》《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新人文读本（珍藏版）》等二十多种选集，还进入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广西、四川等三十多个省市的高考模拟试题；而其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则有“立体的家谱”“开启了理解民族文化传统新视域”之评。2002年，庞进的散文集《灵树婆娑》荣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2006年11月，庞进作为陕西省当选代表，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向龙凤文化进军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庞进踏进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庞进矢志不移、孜孜不倦，广涉博取，精考细研，像钻井一样做学问。龙凤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作为一门学问，龙凤文化因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海峡两岸的统一、全球华人的团结紧密相连而凸显其重要。庞进的研究，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创建性和普及性独树一帜，为学术、文化界和海内外华人注目。

相关研究专著，庞进目前已出了《龙的习俗》、《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龙之魅》等十八种，另有《龙的基本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龙文化的哲学思考》《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龙文化的历史职能、精神底蕴和重要使命》《龙道文明概说》等论文、文章数百篇。在上述著述中，庞进提出了龙凤起源的“模糊集合——多元容合说”；分析了龙凤的基本神性及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总结、概括、揭示了龙凤的基本精神。对炎黄子孙为何称龙的传人、龙凤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龙道文明等均有创建性阐述。另外，庞进还于1999年7月在国际互联网上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龙凤文化为内容、以“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普天下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研究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聚龙凤传

人，昌盛龙凤故乡”为宗旨的原创性中文站点——“中华龙凤文化(<http://www.loongfeng.org>)”网站。十多年来，该网站的访问量累计已达八百多万人次。

对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凤凰卫视、多伦多网上电视、北美时报等海内外数百家传媒曾上千次予以报道和介绍，其观点多为海内外学者引用，论文、文章有数百篇被转载。并以特邀专家身份，先后上百次出席（或参与主持）全国性及国际性的龙凤文化学术研讨会、论坛，作主题发言；受聘出任政府部门及多家企业的文化顾问，担纲浙江、广东、广西、陕西、河南、海南、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龙凤文化项目的主题策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读到庞进的系列著作后，于2005年8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副委员长办公室召见了庞进，询问了庞进的工作、研究情况，肯定和赞赏了庞进刻苦自励、勇于探索、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和增强凝聚力，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图徽标志，研究其文化现象很有意义。”之后，又专门为庞进题词：“研究龙凤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向制高点攀登

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般化的对龙凤的阐释，而是努力创新，向理论的制高点攀登，力求从哲学的高度、人类文明的全方位视角来把握龙凤。用庞进的话说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

2007年3月25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配图发表了庞进的《中国龙文化解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庞进首先对龙文化做了一个定位：龙是中华先民对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一种神物，经过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接着，庞进提出了继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清理、抛弃“帝制龙”“灾祸龙”，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观点。

2007年5月29日，庞进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龙文化与和谐社

会”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发言，提出了“龙凤文化，为世界开太平”的观点。他认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是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五种基本精神，也是龙凤学赖以形成的五大理念，即：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世界观、方法论；福生（造福众生）——价值观、幸福论；谐天（与天和谐）——天人观、生态论；奋进——人生观、强国论；和美——理想观、目的论。这五大理念，不仅能够为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规范、话语系统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作为公理和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的人类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

庞进指出，龙凤经过了从最初的自然物容合、升华为神物（龙为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凤为太阳鸟、司风神），再由神物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后妃、喻比人杰俊才）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吉祥瑞征三个阶段。事实证明，龙凤是胸襟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智慧系统，它们不但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凤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当今一些普适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龙凤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作为象征物，龙凤是随人走的”，庞进如此说，“龙凤的内涵是人赋予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龙凤；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龙凤。”“龙凤文化本源于中国，适合于全球；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对国人，它可以致和美，对世界，它可以开太平。”

2000年，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庞进任主任；2007年，庞进被推举为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2008年当选龙文化当代十杰。2011年8月，龙凤国际联合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注册成立，庞进被推选为主席。2011年12月15日，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决定成立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2012年5月31日，庞进正式出任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2012年11月15日，西安市民政局向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西安民证字第040609号），庞进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法人）。

在2012年壬辰龙年到来之际，庞进曾撰写并发表了《龙道文明概说》一文。该文首次提出了“龙道”“龙道文明”“世界龙”等概念，将“龙道”定义为“以

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将“龙道文明”定义为“以龙道的创造、演进、宣传、推广、弘扬、应用所形成的文明”。从“天道”“仁道”“行道”三个方面举要说明了龙道文明的内容；提出“主体多元”“世界可龙”为龙道文明的立论依据。庞进说：“提出龙道文明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以美国为首推行的西方霸道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挑战和对世界和平的危害，龙道文明可以纠正霸道文化的偏差，克服霸道文化的弊端。霸道已衰，龙道当兴。”

上述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庞进的深厚学养和道义担当，是一位“文化自觉”者站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潮头，关注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郑重发言。我们支持庞进，愿他倡导的龙道文明发扬光大、福惠世界！

（刊于《西安龙凤文化·春之卷》2013年3月）



庞进当选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2011年8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

庞进：一生情系中国龙

常强

庞进，龙文化研究专家。单从名字看，他就与龙有着不解之缘。事实上，他的所思所为，也的确与其姓名暗合。观其姓，他的龙文化关涉庞大，内容丰满厚实，并已将龙文化的研究果实撒播在广袤大地；观其名，在龙文化研究的道路上，他始终精进有为，自强不已，终于硕果累累，赢得高度美誉。

庞进的办公室，设在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的办公楼上。办公室门口的牌匾上，刻着醒目的几个字：“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从门上的标识得知，庞进的办公室就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办公地，而他，正是研究院的院长。庞进的头衔很多，但社会职务多和龙文化、凤文化相关。在十多平米的屋子里，堆着一摞又一摞的书籍，随便翻阅便发现，多与灵瑞文化相关；墙壁上的书画，也无一能离开龙凤主题。

庞进的龙文化研究，自成系统体系，其龙文化理论成果，都有较高的概括性和创新性。概括性使他的理论显得系统完备，框架清晰，内容丰实；创新性使他的任何文稿都能给人带了耳目一新之感，探讨对象虽为文化本源和根脉的相关者，却总有一些原创词汇和概念去参与理论大厦的科学建构。

比如，他用五个词组来定义龙对中华民族的独特意义：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情感纽带；用六个词来总结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用四个词来概括龙文化的精神底蕴：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同时，他还提出了诸如“龙道文明”“龙道信仰”之类的文化命题。他认为，“龙道文明就是中华文明”，“龙道信仰是龙道文明即中华文明的中枢系统”。别出心裁又不无道理。

在庞进那里，但凡涉及中国文化、华夏文明，都与龙有着深刻关联。他认为龙意识是与中华民族的开始是同步的，“中华文化上五千年是伏羲开创的，下五

千年是黄帝开创的，龙文化就是伏羲文化，也是黄帝文化”，由此他把中国历史总结为“中国龙万岁”。

庞进把龙看做与中国人的生活、信仰、思维方式须臾不可分的一种事物。关于生肖，他解释道，十二属相中，有龙，还有小龙，“龙”占了六分之一，其他几种动物则皆为龙的模特。关于历史人物，他说，孔子称老子为龙，老子称孔子为凤，老、孔二哲开创了龙凤与现实人结合的先河；秦始皇被称作祖龙，汉高祖被视作龙种。在他那里，历代圣贤、精英几乎都与龙有着某种关联。

庞进把龙看做“自然界外在力量中统领一切的东西”，龙的出现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和而不同”之儒家理念。

庞进对龙的探讨视野，还会自觉扩展到中西文化比较上。在西方，“龙”被翻译为“dragon”，对此庞进不以为然。“西方这个翻译，是把龙完全当成了邪恶的、残暴的一种动物，而中国龙，尽管有两面性，但多数时候是吉祥、高贵、神圣的意思，与西方的含义正好相反”。有鉴于此，曾有人建议在英文中，直接将“龙”翻译为“long”。对此，庞进依然不满意，因为“long”在英国有专指，乃指“长度”。他同意相关学者的建议，把“中国龙”翻译为“loong”，庞进说，这叫“给龙加一个眼睛，构成一双有神的眼睛”。难怪，他的电子邮箱名称上，就有这个若不知晓内情会被误认为拼写有误的新单词。

由研究龙凤文化，庞进还对传统伦理道德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视和评判。由西方哲学理论，他提出了“多互主体观”的概念，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尽管会有职务、年龄、知识、智慧、阅历等方面的差异，但在人格上，每个人都是主体，人与人应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包容精神和文明态度，同样与龙的象征意义暗合。

谈到与龙文化结缘，庞进用周华健歌中一句歌词来表达：“一句话一辈子”。上世纪 80 年代，一位名叫韩养民（西北大学教授、民俗学家）的学者，编撰了一套《中国风俗丛书》，书中还没有写龙的，恰好龙年马上就到了，由于之前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加之文史哲专业科班出身，韩养民希望庞进去尝试写一写龙文化。韩养民的一席话，让庞进从此与龙结缘，开始了二十多年龙文化研究与普及的学术道路。在这里，庞进用了“一辈子”，说明年近六旬的他，要为龙文化“奋斗终身”了。

庞进始终没有忘记龙文化研究的时代价值所在。他说：“龙的基本姿态是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简称奋进；中国梦的打造者，若不迎难而上、努力拼搏、顽强奋斗，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中国龙的基本姿态与中国梦打造者、实现者所应具备的精神状态具有一致性的特点。”他的研究目的很清楚，那就是经世致用，借助龙文化助推国富民强，增强民族自信，就是“用龙的精神去做龙的事业”。正如歌曲《朋友》所唱：“一句话一辈子”。庞进以龙为业，以龙为魂，一生情系中国龙！

（原载 2014 年 7 月 27 日“西安之子网”。常强：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儒风大家》杂志编辑部主任）



龙道，连接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专访龙文化研究专家庞进

魏韬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对于学者庞进而言，他的身上有着诸多与龙相关的标签，而在他的人生轨迹中，“龙”似乎永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庞进有记日记习惯的话，那么近三十年前的1988年2月14日，他一定会浓墨重彩地予以铭记。因为当年主编“中国风俗丛书”的西北大学韩养民教授那天鼓励他研究龙文化的一句话，让他从此一头扎进龙文化研究领域，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句话，一辈子。”回顾往事，庞进感慨万千。起初原打算就写一本书，但没想到第一本《龙的习俗》于当年出版后，他就深深地沉浸在研究龙文化的精神之旅中，再也放不下了。在认识到龙文化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密切关系后，他越研究越兴奋，越研究劲头越大。辽宁、河南、贵州、甘肃、四川、海南、台湾、澳门……他在神州大地上栉风沐雨地行走，一路寻探龙文化的根脉、源流。

年届六十的庞进在谈起龙文化的时候，兴之所致，肢体语言异常丰富，眼神里仿佛能放出光来。使命，责任，担当，这是在采访过程中他屡次提及的词汇，这与他墙上那副笔酣墨饱的“适变图强”一起，勾勒出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者形象。

各界导报：您是学哲学出身，哲学里有三大终极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您研究的是龙文化，我想问，什么是龙？龙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又是怎样发展到现在的？

庞进：我给龙下了一个定义，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其实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是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符号、文明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这是目前我对龙的基本定义。

各界导报：您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龙道信仰”，那么龙道信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信仰？它的内核又是什么？

庞进：先说说龙的精神内涵。关于龙的精神，我总结了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容合就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龙是容合而成的神物，龙的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容合过程相一致；福生就是造福众生，无论是作为雨水神、农业神，还是作为祖先神、民族神、吉祥神，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大自然，就是生态文明。龙本身就是我们的祖先对大自然敬畏的结果，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古往今来，龙的形象多有瞪目振鳞、穿云破雾、向前向上者，而民俗中的龙舟竞渡更是突出地体现了奋进精神。

在揭示龙的精神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提出了龙道。这当然也是我们民族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现实需要。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支撑和灵魂依归。在我看来，就得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根本性的信仰体系。上个世纪，由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秉持了两千多年的以儒家为主、道家、佛家为辅的相对统一的根本性的信仰体系打碎、摧毁了，以至于难以恢复。今天，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佛家，都不能扛起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的信仰体系的大梁。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认识，我才提出了龙道和龙道信仰。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的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

龙道信仰即是对龙道的信仰。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目前可先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龙道信仰具有“有根、有容、通约、广适、时新、精炼”的特点，可以超越地域、党派、种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成为中华民族

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

各界导报：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寻根文学”，现在又有很多海外华人不远万里回国祭拜黄帝陵，寻根追祖。从文学的寻根到精神的寻根，追寻的是什么东西？

庞进：祭拜人文先祖，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从内容和本质上来讲，都是在寻找民族之魂。什么是民族之魂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所传扬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龙的精神。从远古发展到现在，中华民族走过了怎样的路？期间发生了什么？祖先们是怎么想、如何做的？作为后世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传承什么、发扬什么？于是，就产生了民族认同的需要。民族认同是身份认同、精神认同、价值观认同的统一。祭祖、寻根，体现、强化、宣示的，就是这种认同。

各界导报：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很长时间内奉西方文化为圭臬，并以其作为参照的标准。而现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建立起了众多的孔子学院来宣扬国学，以期通过文化输出的方式实现文化自信，您对此有何看法？

庞进：我们的文化本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也存在一些与世界文明潮流不太吻合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认识我自己”，知道我们的文化长在哪里，短在哪里，然后对于不足的、局限地方进行弥补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保守，也不是文化自大，文化自信一定是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我看来，适时地提出龙道信仰，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各界导报：您说过，“龙道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球之道”。龙道信仰能否起到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助力的作用？

庞进：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从精神立足点要找到根本性的理念。“尊爱利和”可以成为这样的根本性的理念。我们这个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曲折，也有很多屈辱。但是既然走到今天，就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以今天人的视野，来审视世界。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果基本性、原则性的理念不确立，会步伐受限，身份尴尬，所以说基本理念太重要了。

各界导报：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喻为“酱

缸文化”，中国人深受传统文化禁锢，积弊太深。有人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开不出现代文明之花。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反驳这一观点？

庞进：柏杨，或者说包括鲁迅等文化精英在内，应该说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看得比较多一些，比如鲁迅就认为传统礼教是“吃人”的文化。这些不能说都不符合事实，它是符合一定的事实的，我们的文化中确实存在压抑人性，轻视个体权利等内容，但是鲁迅、柏杨他们对于我们文化的自新、自愈能力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能够医治自身文化中的顽疾。中华文化不是一潭死水，它还是一直在向前流的。是的，中华文化是巨大的一潭活水，有内在的向前流的冲动和能力，它上接雨雪，下纳溪泉，与江河相连，与海洋相通；它有自净、自愈的功能，有生发、创新的本领。非如此，它不可能荡漾上万年，涵育众生灵。我提出的龙道信仰，就源自这巨潭之水，也是想为这潭水的旋律流向，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方案。

各界导报：我之前看到过您写司马迁的一篇散文，叫《天地苍茫一根骨》。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您研究龙文化将近三十年，也是在成一家之言。三十年孜孜不倦，埋头龙文化研究，对自己而言，收获最大的什么？

庞进：收获最大的是，把我这个“个己”与整个民族联系起来了。能够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提供有参考的价值观念，是我的荣幸。我很享受这个精神探索的过程，我现在六十岁了，但仍然觉得自己是四十岁的心态，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研究龙文化使我精神健旺、充满活力。龙文化提升了我、成全了我。

（刊于2016年8月16日《各界导报·世界华人周刊》）

庞进的“龙道”

柏峰

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是需要恢复还是需要重建——恢复或者重建的路径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也还是一个践行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在学理上探究明白这个问题，还要用来约束社会的群体和个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应该说，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探索，其探索的结果就是两部伟大的著作：《道德经》和《论语》。不过，老子多从哲学的高度，把整个天、地及整个宇宙纳入自己探究的视野；孔子则偏重于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从社会制度、君臣、人伦关系等方面探究，可以说，两位先哲在探究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确实是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的：一个是探究天、地及宇宙的演进规律，进而启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建设；一个是依据先王丰富的历史遗产，剥离出具有活力的能应用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用来规范和约束人，达到人的精神的提升，建设一个长幼有序、君臣等级森严的管理型社会。

老子和孔子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社会伦理道德学说的创始人，更是东方文明伟大的奠基者。当历史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他们的学说至今仍然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正如柏拉图之于西方文化一样。每当思想、文化发展遇到障碍甚或走到山穷水尽的关头，只要返回老子、孔子、柏拉图，就会绝处重生，重新获得健康的生命力。

庞进提出了一整套树立信仰、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构想，其理论基础是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把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融汇起来，结合自己的龙凤文化研究（也就是从我国传统景象文化、象征文化的角度）来系统研究，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我国的哲学和伦理学界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宏观的带有根本性的研究，大多是固守一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层面的学说是互不涉及的，以这样的思路去做学问，其成果显然是很薄弱的。

庞进从龙道入手，把伦理道德的哲学内涵和伦理范围以及人的如何践行，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把“信仰、规范和追求”结合在一起，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条款和要求，如果真能把这一套伦理道德规范要求推广于当代社会，我想，肯定会对匡正世风、挽救人心起到积极的作用。

庞进多年从事龙凤文化研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几千年以来关于龙凤的思想内蕴、哲学内涵以及社会景观的内在发展规律，有效地解读了一个往往被人忽视但却实在存在的文化现象，并使之成为一门学说，其功不可没！现在，又能在龙凤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现象研究，也就是把龙凤文化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研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只是开辟了龙凤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疆域，更重要的是让龙凤文化回归到社会、回归到民间和日常生活文化生活中去，确实是学术研究的正确之路。

庞进善于把自己的观点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出来，其文章没有那些高头讲章那样的密密麻麻的注释和引证，读起来相当顺畅。那么，我这里就不再过多地啰嗦了，还是请大家“亲自”去读一读，相信会有无量的收获。

（刊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北美时报》。柏峰：著名评论家，作家，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专著《论中国散文精神》、散文集《远山与近土》、长篇纪实文学《千水万壑走洛河》等）

关于龙道 ——来自庞进与师长、文友的通信

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庞进，你把龙文化研究到目前这样的高度，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坚持做下去，更大的成功在后面。坚持下去，你这一辈子就没白活，你就为中华民族立大功了。你的研究视野开阔，深入独到，是力求从根子上解决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面临的难题。你的理论从概念到话语，都自成体系。你是我的学生，但我很尊敬你。十多年前读你的《创造论》，我就觉得这个庞进呀不可小视；前年读你的《平民世代》，我已看到了你的气象；最近读你的龙文化论文，我更是由衷地感慨：庞进超越了，把许多研究者甩到了后边。前两天我还和陈忠实说你来着，我说庞进钻井一样做学问，如今已钻到富矿层了。现在人们都在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自觉”什么？“自信”什么？人们未必清楚。当年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只有知道中华文化的“美”在哪里，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美与共”。你的研究回答的正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2011年11月29日）

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庞进：你好！大作《龙道文明概说》写得很好，读后颇受教益。谢谢。有一点请再细酌，即“小让大”原则。一般而论，这一原则是成立的，但不能绝对化。关键看“小”处于什么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属性。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中，真正造成一种新的开端者，未见得都是所谓的“大”。有意义的“小”可以通过福自身进而福人类。一旦福大为先，可能会酿成不小的祸患，我们前三十年的历史不乏这样的实例。仅供参考。

（2011年10月17日）

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民俗学家）庞进兄：大作很好。这是带有信仰质的文化建构，我意需要在与大众对话中不断精致与完善。11月（拟定18日至20日）在西安召开中国民俗学术会，是否可缩为10分钟的篇幅在大会上演

述？祝平安喜乐！（2011年10月26日）

孙见喜（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著名作家）庞进：你的理论很体系化，为未来世界文化指出了一条路，是大道，大理，大境界。好。（2011年10月22日）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庞兄好。久疏问候，拜读大文，气象宏伟，似乎是一部大著的纲目？弟在写《二龙戏珠原型考》，雕虫小技，也望兄有所示教为盼。周末来西安小住十日，师大有文学理论会，不知兄可光临不？舒宪上（2011年10月22日）

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著名美学家）庞进先生：我去土耳其了，才回来，收到信。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觉得很有意思。也许一时半会，人们醒不过神来，然如果宣传到位，还是可以接受的。龙的问题其实不在内容，内容经过诠释，人们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外形，这般模样，中国人还能认可，外国人呢？不管怎样，我支持你。（2011年11月1日）

史晓眉（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宣传部长）庞同学：文章拜读。确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我倾向龙道和仁德之说，组合起来就是龙仁（人），道德。你的发言很值得思考和完善。周末愉快！（2011年11月4日）

庞进的“六个一工程”

——在传承弘扬龙凤文化拜师仪式上的致辞

田玉川

我和庞进是陕西师大的同学，相识、相知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尊敬的兄长，事业上的老师，对我生活上也一直无微不至的关怀。

庞进是当今中国研究龙凤文化的第一人。

他研究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从上个世纪最初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开始，到当今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我用“六个一工程”来概括他的成就。

第一，创立了一个学说——龙凤文化研究学

在庞进从事龙凤文化研究以前和当今，也有一些学者和专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唯有庞进提出了系统地、完整的龙凤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具有无可替代的开创性，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填补了传统文化这一重要领域研究的空白，也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孔子曰：三十而立。庞进正是在他人生的黄金年代，实现了由立身到立言的飞跃性转变，因而能够引领和带动海内外龙凤文化研究的热潮。全国乃至于海外的龙凤文化研究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无论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还是研讨会、论坛的定期举办，越来越常态化，规范化。

第二，构建和拓展了龙凤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作为第一个华人世界龙凤文化的专题网站，已经创办十五年了，累计点击率达到了上千万人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的龙凤文化研究专著多达二十本，无论数量和学术价值都是首屈一指的；还创办了专题刊物——《龙凤文化》，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报道学术活动；他还广泛参加海内外龙凤文化研究学术活动，加强了交流和推广。

第三，成立了专门的龙凤文化研究机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和中华

龙凤文化研究中心，成为龙凤研究的重要阵地。

第四，组建龙凤文化研究团队。由最初的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到当今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由专家学者定期交流到今天的师徒传承，龙凤文化研究的团队越来越壮大，专业性和学术水准越来越高。在我们这样有十四亿龙的传人的国度和华人世界里，需要有成千上万的龙凤文化研究者都不为多。庞进和龙凤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任重而道远。

第五，开发并推动了一个产业——龙凤文化的开发。文化产业是当今的黄金产业，国家战略，庞进被浙江、海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政府部门邀请，从事龙凤文化项目的研究、策划、开发，不仅为这些地区树立了文化品牌，也使龙凤文化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尤为难得可贵。

第六，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体现和发扬了文以载道、学以济世的精神。他三十多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不受世俗的纷扰，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并注重学以致用，让纯粹的学术研究变得可感、可学、可用，很值得我们大家效法和崇敬。

（2014年3月7日于西安。田玉川：知名文化学者，作家，报刊资深总编辑，诗人，策划人。曾任《科技与企业》《神州》《公益时报》《健康导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现任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康》杂志总编辑。出版《礼记与百姓生活》《孟子与百姓生活》《人情世故学》《圈子！圈子》等著作20多种。部分著作出版繁体字本和外文本。兼任金城出版社、文津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特约编审）

《庞进文集第十四卷·龙道》后记

微信朋友圈有人推荐，说一部名为《欢迎来到麦乐村》的电视连续剧值得一看。于是就通过“YouTube”看了若干集。这部电视剧主要演绎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如何以“仁心大爱”，在一个叫“桑纳”的国家救死扶伤。剧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讲到了一只雪豹和乞力马扎罗山的故事。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是当地民众心目中的“神山”“上帝的庙殿”。常年被冰雪覆盖的该山山巅乌呼鲁峰，海拔 5895 米，是世界最高孤峰、非洲第一高峰、有“非洲屋脊”之称。有资料介绍，1926 年，一位名叫理查德·罗伊施的登山者，在乞力马扎罗山接近山巅的地方，发现了一只被冻硬风干的雪豹尸体。若干年后，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了这只雪豹，言“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于是，问题来了：雪豹为何要冒被冻硬风干的风险，攀临乞力马扎罗山山巅？《欢迎来到麦乐村》的主人公，是在职业旅途遇到挫折后参加援非医疗队的，他到非洲的一个目的，便是寻找活着即生命的意义。当他经历种种磨炼，并在知道雪豹和乞力马扎罗山的故事之后，他面对破云而出的雄奇的乞力马扎罗山，颇有悟觉地讲出一句富含哲理的话：“抵达就是意义”。

是的，抵达就是意义。那只雪豹，如果只在雪线之下，即常年积雪带的下界讨生活，不去高度酷寒的雪线之上，即临近山巅的地方，就不至于被冻硬风干。我们不妨猜猜雪豹的心思：乞力马扎罗山是一座神山，乌呼鲁峰是神山之巅，神山之巅该是绝险而风光绝美，值得登临、观览、体验——豹类从未抵达过的吧？于是，它攀登了，义无反顾地攀登了。显然，绝险而风光绝美的神山之巅是一个高度，这高度既是物象的，更是精神的。也就是说，雪豹以绝险而风光绝美，值得登临、观览、体验——豹类从未抵达过的神山之巅为目的，以奋力“抵达”的方式，活出了精神的高度、生命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何尝不是一种“抵达”？只要你进入某个领域，投入毕生精力了，研究了，写作了，不论成果多少、影响大小，你的精神就有高度了、生命就有意义了。比如我的龙凤文化研究，就堪比奋力攀登一座高山；而我提出的龙道信仰，就堪比经过历险而抵达风光绝美的山巅。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 (<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2023年12月15日于加拿大凤华阁)